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4月號 總46期
No.46 APR. 1987

詳細報導

大陸政情
專題分析

胡耀邦住進301 ● 鄧力羣攻擊中國之春

留學生楊巍

支持
民運

被捕案

改革死了，改革萬歲！



中國留學生 郭城 手舉火炬為民主長跑

留學生郭城的 民主長跑壯舉



在上海被捕的留學生 楊巍

美國國會立意
保護簽名的
中國留學生

美國國會立意保護簽名的留學生

正當大陸留美學生因國內形勢驟變而擔心回國後遭到「整肅」之時，從美國國會傳出消息：參議員赫姆斯於二月十七日提出決議案，要求里根政府准許因支持民主活動有可能被中國拘捕的中國留學生，特別是那些日前曾聯名向中國當局發表公開信的留學生，延長留美時間，要求對這些學生給予延期自動離境（EXTENDED VOLUNTARY DEPARTURE）。

由於留美學生楊巍、天津大學學生林杰等人在國內紛紛被捕，一名北大學生甚至被判處二十年徒刑，已把留學生搞得人心惶惶。一方面留學生對國內局勢深表不滿，另一方面也對自己的未來表示擔心。特別是那些在簽名信上簽名的學生，更是憂心忡忡；一些定於二、三月份回國的留學生，也準備繼續留在美國觀察動靜。

現在此事已在美國國會中引起很大反響；有的議員提議案，有的議員積極與中國和美國政府接觸，決意保護留學生。我們相信美國政府自會做出公斷，保護從事民主運動的留學生免遭不測。

廣大留學生是愛國的。他們在美國說了一些話、做了一些事，都是出於高度的責任感。他們渴望着民族的繁榮，國家的強大，他們多麼希望有個民主富強的國家。

但現在國內的情勢已逼迫人們緘默其口。留學生真正感到愛國、報國是多難啊！

但有志的留學生是嚇不倒的。歷史上任何時代的任何民主進展都是靠一些人前仆後繼的大無畏精神和自我犧牲精神換來的。民主不是賜予的，而是靠奮鬥爭取來的。面對着大陸的滾滾寒流，留學生必然更能捨身忘我地投身到民主運動中去。

在此我們也願提醒北京當局：獲取民心要靠德政而不是暴力。寬鬆的政治局面和持續的開放政策是贏得廣大留學生心的先決條件。我們希望中共能汲取歷史教訓，不要官逼民反，把留學生逼上梁山。

讓人們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當代極權體制最突出的特徵，是它對人民群眾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到家庭以至個人生活的全面控制。在這種控制下，民眾在何方面稍有「出格」，都被加以殘酷的懲罰，以致於在它統治下，人民毫無任何安全感可言；人們缺乏的，首先還不在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而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不少留學生在私下表示贊成「中國之春」的許多觀點，但害怕和「中春」沾邊，個別人甚至還要表態罵一下「中春」。「中春」有什麼可怕的？留學生怕的是，和一個被定了性的團體接觸，一旦被中共知悉，後果將不堪設想。或許個人的生死尚不足惜，可是一想到父母、子女、親戚、朋友、同學、師長，一大堆人都會受到株連，一絲恐怖的陰影不禁襲上心頭。

最近幾年大幅度的改革、開放，好不容易使許多人逐漸地走出這個陰影，壯起胆子來為人民群眾說幾句話。可是隨着胡耀邦的辭職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緊鑼密鼓的展開，開放的大門似又關上，陰影重又在中國上空上徘徊。

留美研究生楊巍、天津大學學生林杰等因支持學運在國內被捕，一位北大學生甚至被判刑二十年的消息傳到海外，使得在海外簽名聲援國內民主運動的留學生們惴惴不安，不知回國後等待着他們的是什麼？中國駐法教育處人員指責簽名者的要求和「中春」的觀點一致，更等於判了這些人的刑。真是一幅活生生的官逼民反的現代翻版。九名留法公費生就是由於懼怕，向法國政府尋求政治庇護。一個國家非

但不能保護她的公民，相反地她的公民爲了個人的安全，反而必須求助於另一個國家。這是何等的悲慘！對極權體制又是多麼大的諷刺！恐懼從何而來？歸根結底，來自維持極權政體的專政機器以及不民主的制度本身。人們

蘇聯在前進，中國在後退

二月十日蘇聯政府宣佈釋放一百四十名政治犯。同時，一個委員會正研究修改刑法，取消對付「誹謗國家」的法律，縮減禁止「煽動及反政府宣傳」的法律範圍，以保障人們不被輕易送進監獄或勞改營。另一個委員會已草擬新法律，以保障批評政府官員的新聞從業員免受報復，允許記者有更大的採訪自由；設法保障法院的判決免受黨委的干擾，擴大律師的辯護權。戈爾巴喬夫在二月十九日還宣佈：今年將在各地黨支部、地方政府及工廠等部門採取多名候選人競選的民主選舉。

僅僅三個月前，駐北京的西方外交官還一致讚許中共的一些領導人，有眼光、有魄力，在改革上走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頭。曾幾何時，由於學運的震撼，中共大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胡耀邦、朱厚澤相繼罷官，方、王、劉被開除出黨，相隔一個月又傳來「人民文學」主編著名傷痕文學作者劉心武停職檢查。看來大有回到五七年反右的局面，改革已全面停頓。

蘇聯一向以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大哥自居，用坦克粉碎了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是社會帝國主義的最後堡壘。陳雲、李鵬等人

害怕坐牢、殺頭，害怕各級行政組織對自己及家庭的種種刁難和迫害。如果人們生活在恐懼之中，什麼也不敢說，什麼也不敢做，終日唯唯諾諾，畏畏縮縮，人們就變成一群麻木不仁的芸芸衆生。這樣的一個社會是絕對不會進步的。

同胞們，讓我們首先爭取不恐懼的自由吧！

，一心想以蘇聯為師，還戀着着五十年代的計劃經濟模式。現在連這最後的堡壘都在加緊改革，而且是政治、經濟改革一起來。一口氣釋放那麼多政治犯更表現了戈氏改革的決心。戈爾巴喬夫甚至在蘇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聲稱，如不實施改革計劃，他將辭職。這不正表示，蘇聯舊的那一套也不靈了，再不改不行了。以俄為師的中共守舊勢力，想想吧，也學老大哥改改吧！

幾十年的社會主義試驗，並沒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相反的，社會主義國家，無一例外的遠遠落後於民主國家，東、西德就是最強烈的對比。在社會主義國家生活的民眾都堅決要求改革，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改革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已是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誰推動改革，誰就得民心。就是越南，長征等人還集體辭職，將權力交給年輕、務實的改革者。

民心可用。大規模的學運表達了中國人民對改革的渴望。改革派應善于結合民意，重整力量。不妨學學蘇聯，釋放政治犯！

蘇聯的改革在前進，中國的改革為什麼倒退？！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 507-6442

(718) 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一九八七年四月號總四十六期

一九八七年四月號總四十六期目錄 ■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出版■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Y.

社論

3 ■ 蘇聯在前進，中國在後退。讓人們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讀者·作者·編者

6 ■ 國家安全部調查我們每個人嗎？ (大陸留學生) 于浩寧

專題 中國改革爲什麼未能成功

9 ■ 什麼樣的改革才能成功——談改良與革命 (中國民運) 王丙立

15 ■ 改革死了，改革萬歲！——論中國經濟改革的失敗 (國內) 張綱

● 兩岸風雲 ●

24 ■ 侯德健悔之晚矣·中共宣傳部長好難當·俞國華先生老生常談·參樂仁事件給世人的啓示 (中國大陸留學生) 宋凡章

專輯 留學生郭城舉行民主馬拉松長跑

28 ■ 為大陸民運長跑的一條好漢——郭城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鄭爲民

29 ■ 致中共中央、國務院公開信 (中國大陸留學生) 郭城

30 ■ 告各界同胞書 (第一號) 全美支持大陸民主運動委員會

31 ■ 告各界同胞書 (第二號) 全美支持大陸民主運動委員會

特輯 留美學生楊巍被捕案及其反響

32 ■ 救救我的丈夫 (楊巍的妻子、中國留學生) 車少卿

33 ■ 就楊巍被捕致中國留學生的公開信 (楊巍的妻子、妹妹和妹夫)

34 ■ 就楊巍被捕案致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封信 (楊巍的妻子、妹妹和妹夫)

34 ■ 中國官方對楊巍案的正式反應 (本刊記者·中國留學生) 周純香

35 ■ 楊巍案驚動美國國會和國務院 (轉自紐約「中報」的報導)

36 ■ 美國會參眾兩院關心楊巍案和中國留美學生的命運

(中國大陸留學生) 劉福致

37 ■ 楊巍案在留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 (本刊記者·中國留學生) 王明致

37 ■ 九名中國留法學生在法國要求政治庇護 (本刊記者·法國) 丁立

38 ■ 爲人的存在而奮鬥——訪楊巍的妻子、妹妹和妹夫

(中國大陸留學生) 邱厚

42 ■ 上海「一二·九」大示威實錄 (國內·獄中) 楊巍

59 ■ 營救楊巍委員會聯絡電話及地址 (本刊資料室)

編者的話

國內政情變化引起了全世界對中國改革的重新檢討。本期刊出國內張綱及民聯主席王炳章的二篇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國改革的問題所在並對其前景進行了預測。王炳章先生的文章，還對「革命與改良」這個敏感的題目進行了理性分析。王炳章先生目前正在全美各大學巡迴演講，所到之處無不引起留學生和僑界的關注。本期刊登的王炳章先生的文章，是他巡迴演講的一部分內容。

楊巍被捕一素，已引起廣大留學生和美國國會和政府的關注。可以說，中國發生的歷次人權案中，像楊素這麼引起美國國會關注者并不多見。本刊儘量收集資料，對其詳細而客觀地報導。我們希望廣大留學生協助我們，進一步收集楊素的資料，並打聽楊巍的下落。楊巍一素的結局，將對我們每個留學生的命運產生影響。

留學生郭城的民主長跑，正升火待發。他要用他的雙腿，喊出中國人民對民主的渴求，讓我們為他加油。

發生在一九七八年雲南數萬知識青年大罷工事件，鮮為外界所知，本期予以詳細披露。

下期預告

國內政局正在逆轉，變數很多，高層爭論不休，下期將有更為精彩的內幕分析。

對於中國的改革，國內張綱另一篇關於深圳特區的長文，將有進一步的透視。

張諱女士在本刊四十五期上「為了忘却的回顧」，僅是她北京監獄生活回憶文章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將於下期推出。

對於楊巍素，郭城長跑壯舉，本刊都將有追蹤報導。

專輯 支持改革·反對倒退

- 44 法戰前夕的沉寂與準備——大陸二月份政情分析（本刊記者）馳遠
- 47 中國留美同學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及第二批簽名名單
- 49 給中共黨員大眾的公開信（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偉雲
- 50 不同的看法、相同的方向——敬致許偉雲教授（中國之春經理）林維清
- 52 鄧力群氏批評日本（中國民聯·日本）姚月謙譯自「讀真新聞」
- 52 鄧力群為何對中國之春怒不可遏？（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黎晉
- 56 自由有罪·民主倒車（台灣作家·美國）何偉康
- 58 學運黨運國運族運（台灣旅美作家）劉添財

專題 中國的薩哈羅夫方勵之（下）

- 60 可能失敗的改革——方勵之教授在浙江大學的演講（國內）王樹軍、楊虹煜整理

台灣專輯

- 75 「二八」四十周年話台灣——訪雷震素律師林頌和先生（中國大陸留學生）楊曼克

- 53 台灣解除報禁以後（華僑美國·鮑蓮）

- 54 對台灣解除報禁的雜感（美國）周立仁

民運報導

- 79 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大罷工記實（京下鄉知識青年）吳曉紅
- 88 憋了八年的歌（大龍工讀導者之一）江講
- 90 香港各界十五個團體仗義營救劉山青（香港營救劉山青籌備團體）
- 91 劉山青事件報告書（本刊記者·香港）江流
- 93 為營救劉山青，請您慷慨解囊（中國之春·香港）

留學生園地

- 94 恐懼——讀報有感（中國大陸留學生）宋佳佳
- 95 李服令和李跟黨的故事（中國大陸留學生）尚昆
- 106 精神負擔何其多？（中國大陸駐外人員）王小軍

文藝園地

- 27 詩二首（中國大陸詩人）嵐之巖
- 93 復活（詩）（國內）草葉
- 96 朦朧詩運動評述（國內）尹小明



國家安全全部調查我們 每個人嗎？

柏克萊研究生徐XX一年前歸國，國內報刊曾給予盛譽，多種報紙（包括人民日報）長篇報導其愛國熱情。不久前徐XX輟羽而歸，轉回美國。他不是第一人，不足為怪。但有一事值得每個在美的朋友注意：徐在上海，曾與某名演員戀愛，市宣傳部某負責人警告此女演員，說徐「情況不清楚，國家安全全部正在調查。」這場戀愛就此黃了。徐得知原因後，很生氣，到北京找國家安全全部，安全全部對他說：「我們對去過國外的人進行調查是正常的，你的問題外交部早就做了結論，我們不認為有不清楚的地方。」

徐此番經歷在舊金山地區留學生中流傳頗廣，知者多矣。如果真是「正常的」，那麼我們每個人都有資格被國家安全全部立案調查。

當然，大部份留學生見政治就避，靠政治立國的共產黨國家，其公民必須非政治化，這個習慣也帶到國外，查不查都那麼回事。但是，我們在美國活動如此分散，國家安全全部通過誰來查？如何查法？如何保證調查的正確性？

如何保證不至於出冤案？如何讓被調查者有機會為自己辯護？我們又如何才能為自己辯護？不知那位能解答這一串兒謎？

中國大陸留學生 李 浩於加州

做得比大陸好！

我覺得貴刊在談到台灣時，不應使用過於籠統和肯定的口氣。我是大陸來的留學生，和多數大陸留學生一樣，對台灣的事不很了解。如果能從各個社會角度，多報導一些真實的事件，再稍加評論，將有助於我們對台灣進一步的了解。

我希望中國能強大起來，我希望台灣各方面要比大陸強些。畢竟，台灣的強盛是中國人的驕傲之一。就我個人目前的看法，台灣在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和民生問題上，做得比大陸好！

大陸留美學生鐵成鋼於密州

薛德之遊行也犯法！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公佈了「薛德之在北京被依法逮捕」。他犯了什麼法呢？人民日報這麼寫：「他混入學生遊行隊伍，冒充學生……曾到廣州學校發表演說，後來又到上海的學校……最近他跑到北京，混入北京師大學生宿舍……喊口號，並發表演說。」

這次參加遊行的人，都是自願的。如果薛認為學生的觀點與他個人的相同，他願以遊行方式去宣傳他的主張，那麼他與學生的關係應該叫「同志」。怎麼能說是薛混入學生隊伍呢？

？

「五·四」運動時，上街遊行的是以川北大學生為主。遊行過程中有許多工人、商人、市民「混入學生隊伍」，共產黨是怎樣看待「五·四」運動呢？對那些所謂混入學生隊伍遊行的人又是怎樣看待的呢？是不是由此訂下了青年節？

北京師大學生宿舍並不是監獄。本來就是可以去去的。這也犯了法？或者說，就因為他不是大學生進了學生宿舍，參加遊行，中共就可「依法」逮捕。這到底是依的那家「王法」呢？

大陸留學生王志平於加州

真有一種叫「資產階級的 自由」嗎？

中共六中全會的決議，保守派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認為，自由就是自由（FREEDOM），根本不能硬劃分成「資產階級的自由」、「封建階級的自由」、「小資產階級的自由」、「無產階級的自由」等等。正如飯就是飯，不管這飯由誰吃，飯還是飯。不能因吃飯者的身份而改變。例如這頓飯由一個資本家受用，就屬於「資產階級的飯」，由一個工人吃，就屬於「無產階級的飯」。飯在唐人街餐館中被白種人吃，這飯就成了「白種人的飯」，被中國人吃，又成了「黃種人的飯」。這種「物質由於被不同的人使用，物質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的觀點，是再也荒謬不過的了！你把白飯的標本分別送給世界上幾個科學最發達的國家化驗鑑定，各國的化驗結果，中國化驗人員會說：「請問這種白色的穀物是由誰吃的，我們才可以指出這是什麼，因為一切都

要用階級觀點進行分析」。

同樣的道理，自由的性質不會因使用人的不同而發生變化，不管誰享受自由，自由是不變的。從幾千年前起，奴隸向奴隸主爭取的自由，農民向封建領主爭取的自由，工人向資本家爭取的自由，到天安門事件中群眾向「四人幫」爭取的自由，以及劉少奇在獄中渴望的自由，都是同一種自由。幾千年來的性質都未變過。中共心中也知道，人類渴望自由，在與當年腐敗的國民黨鬥爭中，提出了要爭取自由的口號，得到了成千上萬天真知識分子的響應和支持。但中共一獲得政權後，馬上就開始禁止人民談自由兩個字，連一首解放軍軍歌中「自由的旗幟高高飄揚」也改成「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禁止人談自由，在道理上是說不過去的。

但自由對於人的靈魂，有如飯對於人的身體，缺之是不行的。

中國留學生上昆於加拿大

民聯組黨的時機已到來

最近大陸學運的激發和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鄧小平改革政策延緩所致，是「四五運動」的再爆發，也可追溯到「五四」、「一二·九」和「五七鳴放」的繼續。一池死水般的「安定團結」終於掀起軒然大波。歷史已把民聯推向前台。你們應如何面臨當今的形勢呢？做為一個關切你們的朋友，我的建言如下：

儘管中共視你們為「叛國」、「反革命」，但海外輿論一致認為你們是愛國的，是反「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目前國內學運的高漲已註明一個鬆散的聯盟是不足以肩負如此

巨大的歷史使命的，因此在海外組黨打破中共一黨獨裁的時機已經成熟，你們應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有所準備。同時，你們也不必冀望所有的朋友都加入你們的組織，要看到雖然他們由於種種原因，以及認知上的距離，只能成爲一起吶喊的朋友，但是他們與你們的目標是相同的。

楚人聖誕節於北美

「中國之春」和「人民日報」之比較

讀罷中春總第四十四期茅于軾先生的《銷路、浪費與質量》一文，覺得有必要也說幾句話。

單憑銷路的好壞來評判一家報刊的質量委實有失公允。但《人民日報》之銷路不佳，同其質量低劣，又確存在因果關係。這裏的大陸學生、學者均按時收到免費贈閱的《中國之春》，部分人也曾收到免費贈閱的《中國之春》，兩相比較，最能說明問題。

每期《人民日報》到手，我們僅僅看個大標題就丟進了垃圾箱（當然在國內還要積攢起來——不是做爲資料留存，而是攢足一定份量後賣給廢品回收站，一斤可賣兩毛錢！），連聲說：「又是連篇八股，嚼之無味。上當，上當！」這次國內高校學生鬧學潮，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其規模和影響在國內均屬空前。我們雖身在海外，心裏總希望國內的事情能夠辦得好一些，十分關心祖國的命運，也關心自己熟識的同學、同事和親友們的命運。我們多麼希望能在《人民日報》上見到對學生運動的客觀報導和評論，多麼希望國內高層領導能夠寬宏大度，即不僅不壓制，且能親自同學生

們會面，共同探討中國實現民主化的問題。但是我們又一次失望了。我們祇能從官方的社論、評論及官方人士的發言來揣摩學運的進展和規模，以及捲入的學生們之遭遇。

自去年十二月中的合肥、上海遊行，到今年元旦的天安門大示威，在這段時期，我們這裏許多學生、學者顧不得工作忙與臨考的壓力，抽空看報紙、聽廣播、看電視新聞節目，仍感覺瞭解很不全面，早就盼着中春八七年二月號出刊。我們信任中春，知道有她才能最充分、最客觀地向我們傳遞這些信息。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一人收到中春，人人爭相傳閱，個個愛不釋手。我就常常是翻來復去，唯恐漏看某篇文章。

我們大陸訪問學者，生活費每月還不到四百美元，有人說大陸出來的人很窮，這一點沒有人會反對。就是這每月三百多元，我們也不忍心全部花掉，將來總不能空着兩手回國去見含辛茹苦養育子女的嬌妻和哺育自己長大成人的老母吧！說心裏話，要我們從這點錢中再擠出一部分來訂雜誌，我們當然很猶豫。如果我們在經濟上能再寬裕一些，我們自然會出錢訂中春，但即使我們中頭獎發橫財，也不情願訂《人民日報》！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李容

勝利屬於「中春」

讀完總第四十二期「中春」有關控訴「人民日報」的各篇文章，使我如夏天喝涼水，痛快淋漓！多少年來這份御用報紙爲中共推行其專制獨裁的統治，進行種種造謠誹謗、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報導，可說是罄竹難書。對這

份官方的喉舌、專政的工具，誰也不敢哼個「不」字。誰要胆敢講句真話，不是坐牢，就是腦袋搬家。卅多年的現實，無休止的鬥爭，使人們已噤若寒蟬。只能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環境中唱同一個調子來粉飾太平。

「中春」以爭取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作為自己的宗旨，廣受我國留學生及旅居海外華人的歡迎，凡是真正熱愛祖國的人都希望這些理想能早日實現。可是這種正義的呼聲却觸怒了中共當局，中共以它慣用的手法對民運人士加以污蔑誹謗。然而，它却忽略了被侮辱與打擊的對象所處的地點——美國——是個重法治的國家，人權是不容侵犯的！

這是破天荒第一遭，民運人士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而人民日報竟也不顧事實，謊言是騙不了人的。無奈何只有乞靈於「外交豁免權」。這不正好說明了他們的心虛，不敢對簿公堂。不管日後法院如何宣判，人們已經看清了事實的真相，勝利是屬於堅持真理的一方。想靠強權壓制人們屈從，是枉費心機、徒遭訕笑罷了。

我來美不久，難以提供財力的援助，但我願從其它方面盡力而為，請與我聯絡。

讀者王信安於美國

我們可以作證

說起某些人對王炳章先生進行人身攻擊，由來已久。記得一九八三年一月一天晚上，由當時北京教育部外事局長李濤，該局派的處長謝其綱（據說此人現在美國，教育參贊）和北京師大教師李燕杰三人代表中共中央來美加「慰問」出國學人，在俄亥俄州立大學 Ohio

UNION 會議室召集大陸學人開會。該校大約一百多人，約有五十至六十人參加，在會上先放了中央領導的錄音後，由李局長介紹國內大好形勢，最後講到，「你們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加拿大有個王炳章，被一個台灣女特務俘虜了，他自己已經也墮落成了國民黨特務，現在孤立得很，沒人會上他的當。他愛人已經在石家莊法院告了他，告他重婚，讓他回去過堂。」他講什麼人權，他一點也不尊重他愛人的人權。」記得當時有一個學者在下面也小聲說，「人不在也能離婚，人死了都能離婚。咱們毛主席活着時愛人是江青，死了才換的賀子珍（指紀念堂花圈改由賀子珍領銜子女敬獻事）。」此事很多人可以作證。

太德於俄州

「愛國之爭」有感

從前兩三期的「中春」上，筆者發現不少有關「愛國」和「不愛國」的爭論。尤其是遇羅錦、黃鳳祝等人的文章都多次提到愛國的問題。讀者深感受國是中國人和歷代執政者講得最多的問題，但總是糾纏不清。中國講愛國可原因很多，除了中國歷史悠久，文化豐富，但却多次遭到列強侮辱之外，可能要追究到中國人的民族性了吧！然而時代的變化，科技的發展，世界各國交往的頻繁，都使得國與國之間的距離縮小，人類正向國際化方向發展。本人感到，出國留學後，眼界大開，胸襟更寬。尤其是留學生，更應以「大丈夫四海為家」開拓新天地的胸襟去看待中國人和以前執政者亂扣的「帽子」。筆者十分贊同英國十八世紀的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所提到過的一句箴言：

「要一個人愛國，這個國家必須是可愛的。」

如今，中共大肆宣揚「愛黨，愛社會主義，愛祖國」不外乎是要人民百姓支持其統治。這種感情反而沒有深入人心。反觀美國，從建國以來就注重政體的民主化，司法體系的完善合理，極力保護自由人權，反而很少宣揚愛國，但是美國的民主政體却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外籍的愛國人，其中，中國人多得不計其數，本人也算一個。道理很簡單，因為美國是一個可愛的國家。中國有美國的體制嗎？如果有，今日也不會有國共之爭，香港回歸，人才外流，留學不歸等等一系列問題了。

本人真希望，中共及中國人少爭論愛國或不愛國，多多學習歐美的政治體制、科學技術。以後國家變得可愛了，不怕中國人不愛國，恐怕老美也會移民幾個去大陸呢。請不要糾纏愛國和不愛國之爭了。

大陸留學生張 沈於加拿大

更正

本刊上期（四十五期）因編輯疏忽，出現了數處錯誤，更正如下：

一、二十二頁下欄右二行「許良玉同志」應為「許良英同志」。

二、二十五頁上欄左十一行「除了宗教」應為「除了說教」。

三、二十九頁下欄右十七行「社稷大學」應為「社區大學」。

四、八十八頁張諄的文章四十五期只登了上半部份，文末應有「未完待續」字樣。

另，四十三期六十八頁上欄「薩氏應諾貝爾物理學獎」應為「和平獎」。四十一期十四頁上欄左九行漏印了「中國之春日本語版選集」。

什麼樣的改革才能成功？

——談改良與革命

（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和俄亥俄大學的演講）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二日和十三日） （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

- 如果不對官僚們採取「給壓力」和「給出路」這兩條金科玉律，改革是不會成功的。
- 執政者使改革成爲無望之舉，就可能觸發革命。
- 革命不是做出來的，是自己到來的。
- 中國民聯在推動改革，并希望改革成功。但改革失敗而觸發革命時，我們也必須迎接革命。
- 政治體制改革成功，民主派將成爲合法反對派；改革失敗而引發動亂，民主派將收拾亂局。

胡耀邦的去職及最近中國政情的逆轉，使全世界感到震撼。改革受挫了。

人們在問：爲什麼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派重蹈了王安石和康梁的悲劇？難道改革絕對在中國行不通嗎？怎樣的改革才能成功？改革派還有沒有機會？中國有沒有爆發革命的可能？同時，人們自然會問：中國民聯是否在盼着改革失敗？是否在鼓吹革命？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是值得從事民主運動的人認真思考的。

共產黨極權官僚架構

改革受挫的重要政治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守舊勢力過於強大。守舊派的強大並不在

於人數——他們在人數上遠不如要求進步的人民，而在於他們有一個現成的官僚機器、一個組織網絡。有了組織就有了力量。

共產黨的官僚架構可用附圖一表示之。共產黨極權政體的特點是，它在意識形態、經濟、政治三方面對人民進行全面控制。

意識形態方面：其官僚機器有中宣部、文化部、國家出版總署和廣播電視部等，以及它們在省、地、縣的附屬機構。

經濟方面：其官僚機器是從中央到地方的管理計劃經濟的各個「部」、「委」、「辦」及其對應機構「廳」、「局」、「科」等。

政治方面：其官僚架構是中央、省、地、市、縣以及各個單位的黨組織，政工組和人事

科是各級黨組織最重要的工作部門。

共產黨管理意識形態，目的是控制人們的思想；共產黨管理計劃經濟，控制了人們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共產黨管理政治（主要是人事調動制度），則控制了人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權力。

總之，共產黨就像一個封建家庭的大家長，什麼都管。其動機固然不壞——把大家「管好」，但效果却是扼殺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共產黨本身也因管得太多而疲憊不堪。高層改革派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故決定採取「鬆綁」和「寬鬆」等政策，雖然這種政策離真正的民主措施還有相當的距離，但畢竟給了人民鬆口氣的機會。

有人常問：中國大陸、台灣、南朝鮮都尚未建立民主政體，但中國大陸與後二者有何實質區別呢？其區別在於：中國大陸共產黨的政體是極權主義政體（TOTALITARIAN）——意識形態、經濟、政治全面控制；而台灣和南朝鮮的政體是專權主義政體（AUTHORITARIAN）——只在政治上專權，在意識形態和經濟上不實行嚴厲管制。經驗已經表明，管得太緊，必然限制社會的發展。

共產黨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經濟、政治官僚架構網，是它自己的權力基礎，也是它改革的最大障礙。守舊派首領之一薄一波曾說過一句很有道理的話。他說，共產黨的官僚架構就像一個網，每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魚，誰也跳不出這個網。想想看，魚兒被困在網中，還有什麼活力？

觸及利益必遭抵抗

任何一項改革措施，不論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不論是以社會主義名義進行的、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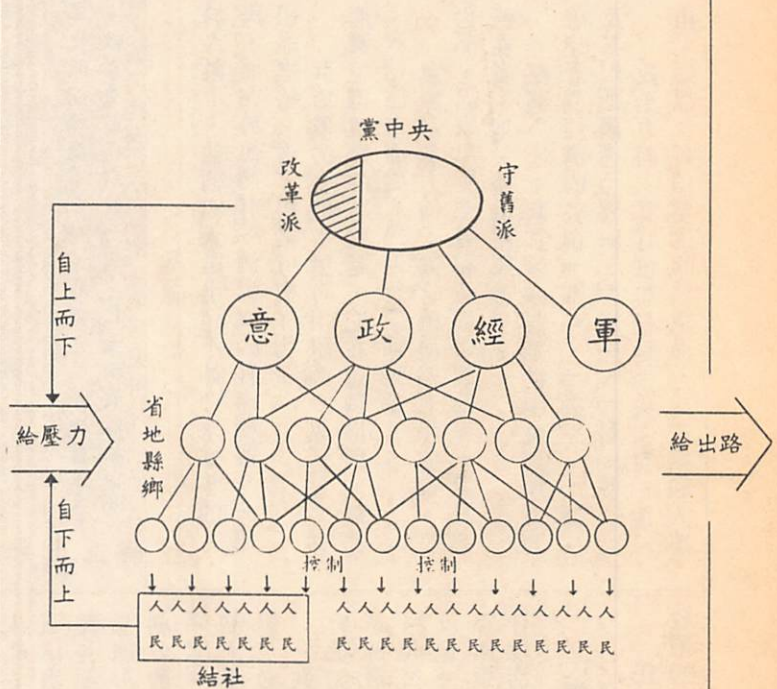
以資本主義名義進行的，只要觸犯了共產黨官僚架構的既得利益，都會遭到抵抗——這是人的本性決定的。

讓我舉一個中國民聯自己的例子。中國民聯會由總部投資、在香港辦了一個「中國之春書屋」，經銷書籍、文具。由於書屋是公有制企業（總部犯了與共產黨同樣性質的錯誤），雇員們負盈不負虧——賺了錢雇員們有好處而虧了本由總部補貼，結果書屋始終賠錢。總部不堪負荷，限其在六個月內轉虧為盈或至少持平。六個月之後，因書屋繼續虧損，總部決定予以關閉。總部的決定傳到書屋時，一位雇員立刻撕毀了民聯的盟員證，宣布退盟，並批評總部「獨裁」。他的「造反」行爲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他失去了原來的工作。儘管這位盟員原來是富於理想的，但當個人利益受到損害時，他採取了不理智的行爲。

幸好，民聯只辦了一個「中國之春書屋」，如果在全世界各地都辦起這樣的書屋，那就走進了共產黨全盤公有制的死胡同。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創辦了大大小小無數個公有制的企業單位，以及代表這些單位利益的一整套官僚架構（見附圖一），改革起來，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改到一定程度，官僚們的既得利益受到傷害，他們就會群起而反。

拿經濟改革來說吧。經濟改革要繼續深入下去，要徹底打破大鍋飯制度，必須開放勞動力市場，即企業經理有權雇用和開除職工。什麼樣的職工最容易受到開除的威脅呢？當然是那些不懂技術的政工幹部。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本能需要，這些政工幹部大多是維護大鍋飯制度的。任何打破大鍋飯制度的措施，都會招致他們本能的抵抗。在前一階段的城市經濟的初步改革中，政工幹部少發幾元獎金都怨氣衝



圖一：共產黨一元化極權專制官僚架構圖

- 說明：
1. 意—意識形態；政—黨政系統；經—計劃經濟系統；
 2. 省地縣鄉—各級官僚架構；
 3. 改革派在中央高層力量是弱小的；
 4. 結社—人民公社才能形成力量。

天，他們對進一步改革措施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至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如解除工廠黨委書記的實質權力（黨政分家的必然結果）等措施，官僚們就會更加地反抗了。當年，蘇聯赫魯曉夫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他想廢除高級幹部的終身制。年邁的中央委員們聽到要被迫退休而失掉權力，就串聯起來，把赫請下了台。

「給壓力」的策略

如何解除各級官僚對改革的阻力呢？總結古今中外改革的經驗教訓，方法無非有二條：一條是「給壓力」；一條是「給出路」。這六字「秘訣」掌握好，改革就可以進行下去；不

理解這六字「秘訣」，不按這六字「秘訣」辦事，改革無不失敗的。

先談「給壓力」。誰都不願意自動放棄已有的特權，這是人性的特點。要讓大批官僚放棄特權，必須向他們施以壓力，讓他們感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壓力可來自最上層的改革派，因他們有權勢、有地位。然而，單從上面來的壓力還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可以說往往是無效的，整個官僚架構可用「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對策」的辦法，把高層改革派的命令頂回去。

最有效的壓力應該來自下面，來自人民（見圖一）。人民的力量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輿論的力量，一個是組織的力量。可是，在沒有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情況下，這兩個力

量都形成不了。從政治上而言，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形成實體。不組織起來，人數再多，步調不一致，只是烏合之衆而已。因此，使分散的人民群眾形成真正的政治力量，必須實行兩條：開放言論和結社自由。黨內高層改革派本來是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達成上述兩條的。

外國政治領袖利用這兩條動員群眾力量而擊敗官僚體系的最佳例子，莫過於西班牙卡洛斯。他大膽地開放了黨禁，實行徹底的結社自由，人民很快結合成了政治實體。右派官僚們頑固抵抗卡洛斯的改革，他們甚至醞釀政變，並在國會開會時製造流血事件。但是，在崛起的人民力量面前，守舊派官僚終於敗北了。

在中國，運用結社自由而打碎官僚體系的最成功的例子，應推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文革前，毛澤東很大一部分權力已被劉少奇、鄧小平的官僚體系架空。爲了擊潰劉、鄧的官僚網，毛澤東實行了結社自由（實際上就是政黨自由），鼓勵學生們組織「紅衛兵」、教員們組織「紅教工」、工人們組織各種各樣的「造反派」……毛澤東運用了這些新的政治力量，打敗了劉、鄧的官僚機器。遺憾的是，毛發動文革的目的並不是真正爲了實施民主，而是爲了奪權和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驗。然而，毛澤東與卡洛斯用以解除官僚架構阻力的手段，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如果胡耀邦、趙紫陽當初在地位穩固時，利用手中的權力及時落實言論和結社自由，以動員人民的力量，今天的局面就不會如此悲慘了。

社會變革的模式通常有三種：（一）自上而下；（二）上下結合；（三）自下而上。第一種難以成功，因高層改革派力量太小。第二種——上下的壓力互相結合，是較爲有效的改良模式。第三

種——自下而上，則往往表示革命的興起。可惜，高層改革派並不懂得上下結合造成壓力的模式。

「給出路」的策略

再談「給出路」。壓力造成之後，也要給官僚們適當的出路，他們才會放心地離開權力寶座。否則，把人逼到牆角，任何人都會拼命反抗的。

古今中外的經驗表明，較妥當的「給出路」辦法是「經濟贖買」，即用經濟利益換取官僚們的政治權力。日本明治維新時，就是用封地的辦法解除幕府、武士的權力的。中國的當政者也有運用「經濟贖買」策略的成功經驗。例如，當年蔣介石失掉大陸，帶領數十萬軍隊退守台灣時，他面臨着「高官如雲」、「將比兵多」的局面。這些官，是他的權力基礎，也是他推行改革的障礙。他成功地使用了「經濟贖買」手段——給那些多餘的官僚們種種做生意的好處，讓他們脫下官服，掛上公司董事長的招牌。

有人說，鄧小平也使用了「經濟贖買」政策——他用汽車、洋房、原薪使一些高級幹部退了休。但是鄧小平的這種「給出路」的政策有一個最大的缺陷——這是一種「向後看」式的「經濟贖買」政策，不是「向前看」式的「給出路」政策。爲什麼叫「向後看」呢？高幹們雖然保持了原薪、汽車和洋房，但不再有什麼發展了，他們的處境已經「封頂」。由於他們喪失了最美妙的東西——權力，再加上每天無所事事，他們必然「向後看」——懷念過去，懷念前呼後擁的威風場面，更懷念能爲子女和親屬安排舒適工作的特權。於是，他們就

想重新奪回失去的權力，並在黨內尋找代理人。

真正有效的「經濟贖買」政策應該是一「向前看」的，即：讓官僚們開公司、做生意賺錢，今天賺了一元錢，明天就想賺兩元錢。這樣，由向「錢」看，變成了向「前」看。

據說，趙紫陽的決策班子曾經給黨政官僚們設計過「向錢看」（「向前看」）的「給出路」政策，即所謂「官商」、「皮包公司」政策。按着這種方案，黨政幹部們利用特權賺錢，先變爲「官商」，再轉變爲「純商」。對此，我曾在「中國之春」上寫過文章，引起了很大爭論。一些人出於對特權的痛恨，極力否定「官商」的作用。其實，我主觀上並不喜歡「官商」，但從政治上講，這不失爲和平解除大批黨政幹部特權的一種有效辦法。如果運作得體（主要是經濟立法要跟上），大批黨政幹部就會由改革的阻力變爲改革的動力。

在共產黨的國有制下，另一種可行的經濟贖買政策，是向黨政幹部發放企業股票，以此做爲換取他們政治權力的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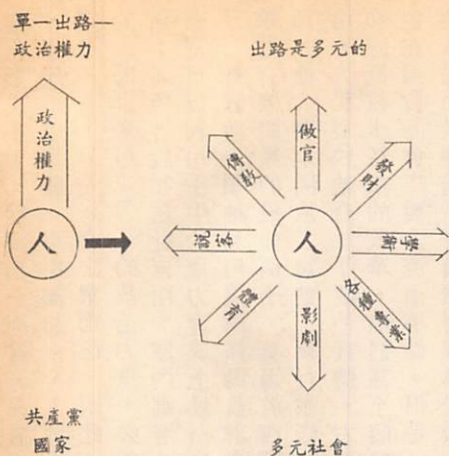
不幸的事實是，趙紫陽改革班子設計的「官商」式的「向前看」、「給出路」方案，很快就被黨內以陳雲爲首的正統派扼殺了。正統派、即守舊派振振有辭道：「這不是用錢腐蝕共產黨嗎？」他們哪裡知道，用金錢腐蝕了共產黨，這個黨也就得救了。

在共產黨國家使用「經濟贖買」形式的給出路政策是極爲困難的，因爲，任何一種「經濟贖買」，都是對私有制的開放。公開承認了私有制，也就等於徹底否定了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和存在價值。以消滅私有制爲己任的共產黨正統派，怎樣能夠容忍呢？他們一定會手持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武器，攔堵「經濟贖買」的

各種出路。因此，改革派要想成功地推行經濟改革，就必須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變革，推翻「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的偏見理論。

有人說，等陳雲、胡喬木、彭真這批老傢伙死了就好了。這只是一種幻想。從圖一可以看出，中國的問題不在人，而在制度。只要龐大的官僚架構在，它就會推出既得利益者的代理人，今天是陳雲、彭真，明天則是他們的第三梯隊。

「給壓力」、「給出路」，是在尊重人性的基礎上設計出來的策略，或者稱為改良成功的先決條件。我們不否認共產黨高層改革派們的改革意願，但問題是他們不知道怎樣改革，因為他們沒有把人性研究清楚。話說回來，共產黨從來就是不尊重人性的，共產黨的創使者以改造人性、消滅私有觀念為使命。把知識份子改造了三十多年，結果把民族精英都給扼殺了，而扼殺了精英，就等于扼殺了民族本身。總之，中國的改革（改良），如果不採取「給壓力」和「給出路」這兩條金科玉律，是不會成功的。過去不會成功，將來也不會成功。



圖二：中國需要由單元出路的社會轉變為多元出路的社會

中國需要出路多元化

分析到這裡，我們不難看出，共產黨極權制度有一個解不開的「死結」——人員出路的單元化。這個單元化的出路，就是權力的出路。因為，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有人把此現象做了個比喻說，中國人個個都是傑出的運動員，但跑道只有一個——權力的跑道。於是，人們在這單一的跑道上互相推擠，互相踐踏。結果，前天踏死了劉少奇，昨天踏死了華國鋒，今天踏倒了胡耀邦，明天還不知道又要踏倒誰。如果「跑道」和「出路」是多元的，權力鬭爭就不會那麼殘酷了。（見圖二）

看看美國這個出路多元的社會吧！你可以從政、做政治家，也可以從商、做企業家，還可做學者、佈道家、律師、說客、運動員、歌星、影星及各種各樣的專業人員。一個著名的球星、歌星不但日進斗金，而且受群眾歡迎的程度往往超過美國總統。在這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多元社會中，每個在各自行業有傑出成就的人，都有崇高的威望和影響力，都有能力滿足自己所尋求的精神和物質享受。在這樣的環境裡，政治權力對多數人並沒有什麼誘惑力。舉個例子：當年約翰遜總統曾邀請麥克納馬拉出任商業部長，身為福特汽車公司總裁的麥氏對此興趣索然。他想：小小的商業部長哪有福特的總裁威風？約翰遜總統為起用麥氏這個人才，決定給他當國防部長，這才將麥氏延攔入閣。麥克納馬拉幹了一段時間，覺得做官沒什麼意思，就辭掉了國防部長一職，出任世界銀行的總裁去了。如果中國也允許人們發大財，允許人們各自發展，從而創造出一個出路多元化的大環境，那麼，有能力的人就不必都湧向單一的權力跑道，做官也就成了無所謂的事情了。

改革失敗觸發革命

我們從來不認為改革在中國絕對行不通！儘管中國歷史上很少有改革成功的先例，我們是說，改革要成功必須有幾項先決條件，就像種子要發芽需要水份、溫度和空氣一樣。如果不提供這些必要的條件，種子發不了芽，或者發了芽也會乾枯而死。

現在，改革還有機會嗎？我們的答案是，并非絕對沒有，因為人世上沒有絕對的事物。但是，與前幾年相比，現在改革成功的希望已大為減少。因為，隨着時間的拖延和一次次的反復，高層改革者的威信在逐漸降低，人們的信心和耐心也在逐漸喪失。除非改革派採取迅速的果斷措施，改革是難以起死回生了。

一九〇一年，即慈禧太后鎮壓戊戌維新後三年，在巨大的社會壓力面前，她不得不撿起光緒和康、梁的政策，重新進行改革，但為時已晚，滿清王室的威信全無，它很快就被人民的反抗浪潮擊垮了。我們也可以預言：守舊派大將們在廢黜胡耀邦並進一步從改革派手中奪得權力後，也會宣稱從事改革。但是，無論他們怎樣信誓旦旦，也不會贏得人民的信賴和支持。等待他們的，只能是更悲慘的失敗。值得注意的是，改革的失敗是有可能觸發革命的。

中國民聯在鼓吹革命嗎？不！我們真心實意地希望改革成功。但是，如果改革不按尊重人性的規律進行而觸發革命時，我們也必須迎接革命。這是我們對改革和革命的基本態度。由於很多人聽到革命兩字就反感，我們必須澄清：是否革命就一定比改良付出更大的代價呢？

一談到革命，大家腦海中往往即刻浮現出國共內戰的陰影，往往把共產黨的農民戰爭與

革命兩字等同起來。其實，世界形勢發展到今天，革命的形式已與以往的內戰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菲律賓人民推翻馬可仕獨裁政權的壯舉，一致被稱為革命，但被美譽為「微笑的革命」。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人民的起義，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都是驚天動地的革命。這三次轟轟烈烈革命，都沒有發生什麼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匈牙利的流血乃由於蘇軍的入侵）。反之，戊戌維新運動和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是屬於改良模式的，但都有殘酷的流血事件發生。因此，革命不能和流血劃等號，改良也不能表示不流血。

至於革命與改革（改良）的定義，有時也難以嚴格地區分。西班牙從專制政體轉變為民主政體，應該稱得上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可是其君主制却保留了下來，也沒有出現大規模混亂和流血的局面，按照傳統的定義，似乎應該稱之為改良。另一方面，鄧小平和里根都將他們的經濟改革自稱為「第二次革命」，但就其運作形式而言，都稱不上什麼革命，而只能稱為改良。

為了便於討論，本文所談的未來革命，指的是社會形勢發生急驟變化，人民群眾奮起推翻共產黨的統治；而改良指的是經過一系列緩進的變化，一部份共產黨人（改革派）仍然掌權但容忍反對黨的成立和存在，並與執政黨平等競爭。打個比方說，革命猶如推倒舊房子，改良猶如翻修舊房子。順帶指出，改革與改良實際上是一個含義，英文稱為 REFORM。

革命不是做出來的

在革命與改良的問題上，我們要闡述的第一個論點是：「革命不是做出來的，是自己到

來的。」這是一位美國教授講的一句很有哲理的話。試想一下，在美國你能成功地發動革命嗎？美國有好幾個共產黨在鼓吹無產階級革命，但鼓吹了多年都沒有成功。這是因為，美國社會根本沒有革命的條件。反之，共產黨國家政府總是強調安定團結，却發生了匈牙利、捷克、波蘭的革命和中國的「四·五」天安門事件以及去年年底的學潮。革命是否發生，主要取決於社會矛盾的大小和執政者處理社會矛盾的手段。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矛盾過大而超過臨界點時，革命就會發生，這就像乾柴遍地、一顆火星即可燎原一樣。

革命往往不是大革命家刻意去做出來的，很多歷史事實說明了這一點。比如，蘇聯二月革命爆發時，列寧正在蘇黎世，他並未預見到這次革命。中國武昌起義倉促舉事時，孫中山事先毫無所知，他是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英文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的。因此，有人趣稱說：「革命是革命家坐在咖啡館中發生的。」當然，這麼說並不是抹殺孫中山、列寧長期的宣傳和組織工作，而是強調了客觀環境對促進革命的作用。如果孫中山和列寧當時面臨的祖國是民主制度，他們的革命鼓吹是不會成功的。

築壩防洪終致崩潰

第二個論點：「如果當政者使改革成為無望之舉，則可能觸發革命。」這是已故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的弟弟、司法部長羅勃特·肯尼迪的論斷。大家小時候學過大禹治水的故事。水漲時，大禹的父親用的是不斷築壩的辦法，結果，壩終於不堪巨大的壓力而崩潰。大禹接受了教訓，用疏導的方法征服了洪水。社會矛盾尤如洪水，當其逐漸增加時，執政者應該

用洩洪的辦法，也就是讓步性的改革措施，疏解社會矛盾。然而，如果執政者在人民的民主浪潮面前，將堤壩越築越高，終有一天，堤壩將被沖垮——那就是革命的到來。現在，黨內守舊派大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再次把矛頭對準知識份子和民主運動。這樣做必將擴大原有的社會矛盾。可以預見，未來的民主運動將以更加蓬勃的規模出現。

所以說，社會演進的形式，是以革命的方式還是以改良方式進行，主要取決於執政者。而社會能否演進，以及演進達成的目標，却取決於人民群眾。人民不要求自由和民主，自由民主的目標絕不會自動實現。

英國的民主政體就是在人民的長期爭取下建立的。但是，英國民主政體建立了，皇室和貴族却都保存下來，這是因為皇室、貴族逐漸讓步、改良、放權的結果。權力先從皇室轉移到了貴族院（上院），再移至平民院（下院）。執政者這種明智的作法，既保存了自己，也實現了還權於民。如果英國皇室在人民的壓力下始終死抱權力不放，他們早就步法國路易十四皇帝的後塵，被人民推上斷頭台了。

現在，台灣的國民黨變得明智多了，它開放了黨禁，又準備開放報禁。台灣的政情發展，令全世界刮目相看。顯而易見，隨着國民黨的不斷開放，台灣爆發革命的可能性正在減小。反觀中國大陸的政治倒退，實在令人痛心疾首。中共守舊派已把自己放到了火山口上，他們倒行逆施，必將自食其果。

成功改良防止革命

第三個論點：「制止革命的最佳之策是不斷地糾正妄行並進行必要的改良。忽略及時的

修繕必定釀成革命。」這是十九世紀英國邏輯學家和神學家理查德·懷特里的教誨。歷史發展的事實正是這樣：成功的改良是革命的最大免疫力；反之，失敗的改良則往往觸發革命。平心靜氣而論，中國民聯的成立理應是有助於中國改革的。如果民聯能在國內合法運作，那將提供了一個必要的洩洪渠道，有助於社會矛盾的紓解。另外，合法反對派的批評、監督與建設性意見，更是改革成功不可或缺條件。

然而，黨內的改革派們不知道怎麼改革，他們「摸着石頭過河」，他們不知道洩洪的原理，他們更不知道運用民主運動的力量。現在，「石頭」沒有了，河過不去了，甚至有被洪水沒頂的危險。

盡管如此，改良的歷史作用不容抹殺，它的作用有三：(一)瓦解作用——瓦解舊體制；(二)替代作用——給新體制的替代準備條件；(三)催化作用——催化革命的發生，倘若替代作用未能完成的話。

如果把革命比喻為摧毀舊房子，改革則可視為修理、翻新舊房子。修理地基和牆壁，要在去掉一塊壞磚（瓦解作用）之後，及時補上一塊好磚（替代作用）。只要有一塊好磚未能補上去，則牆壁就會出現裂隙，第二塊、第三塊磚就可能接踵而落，以至導致整個大廈的傾倒。改良的功績就在它的第一次推動，舉例來說，鄧小平派遣留學生之舉，就給海內外配合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需要全方位的開放

原則上講，共產黨極權制度是不能輕易搞開放的。它像內壓過高而封閉的鍋爐，開一個



他的学习成绩
——干了这么多年，学会几门技术了？
——白，——哪一门？——文学费。

裂口就可能導致爆炸。極權制度本來就是封閉型的，內壓增高通常用加固爐壁的辦法來解決。要開放嗎？可以，但必須是四面八方都開放，不能只開一個裂縫。這樣，蒸氣均勻地四散而出，鍋爐就不會爆炸。用政治學術語講，這叫全方位的開放，全方位的現代化。共產黨的領導人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們只開放經濟，不開放、甚至收緊政治和意識形態。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這種單向性開放政策，可能是受到西方一種流行的理論影響之故。這種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若起飛經濟——必須以政治安定為前提——執政者應實行強權政治——人民須暫時做政治忍耐，甚至犧牲民主要求——經濟起飛後再開放政治民主。這種理論是在新加坡、南朝鮮、台灣和南美一些國家的經驗上形成的。

我們不知道上述理論對其它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是否適用，但我們可以說，它對中國大陸

是不適用的。因為，中國雖然是發展中國家，但與其它非共產黨統治的發展中國家不同，它們是專權主義政體（人見前），而中國是個在意識形態、經濟、政治方面實行全面控制的極權主義政體。在這種政體下，意識形態、經濟、政治三因素密切咬合在一起，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動，都會立即牽動其它因素（如經濟開放必然涉及私有制理論問題）。真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主張全方位開放的原因。

民運立於不敗之地

現在，改革受挫了，中國革命的因素正在積累。中國民聯在推動着改革，並真心希望改革成功，但這僅僅是希望而已，客觀事物有它自己的發展規律。如果改革徹底失敗而能爆發革命，我們和人民一道，也必須迎接革命的到來。

中國民聯目前尚屬於一個壓力團體，在形勢需要時，我們將與其它民運人士和團體共同組成反對黨。我們的二個假設前提是：

一、如果中國政治體制獲得成功（它是經濟改革的必要條件），中國就會容忍反對黨的存在。那時，中國民聯便可公開在國內合法發展、合法活動，起到政治監督和政治制衡的作用；

二、另一方面，如果中國改革的失敗而引發動亂，民運人士便可利用時機，發展力量，因勢利導，推動中國民主政體的建立。

無論政治形勢向哪一方面演變，我們都立於不敗之地。因為，中國形勢的發展，需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和多元的營養，需要鼓吹這些觀念的新的政治力量的興起。

讓我們新的一代伸開雙臂，擁抱未來！

改革死了，改革萬歲！

論中國改革的悲劇

(國內)張綱

一、改革者沒有好下場

大陸著名的「試管改革家」——袁庚一年前曾對胡耀邦說：「中國歷史上改革者歷來沒有好下場，但願這次不要如此」。胡耀邦當時自信地回答：「這次改革是黨中央直接推動和領導的，全黨上下團結一致，改革路線深得民心，這次不會重演歷史的悲劇」。

然而，這位前總書記未免過于自信了，事實不幸被袁庚言中。這一次，不但為改革堅定吶喊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受到壓制，就連「黨的第一把手」也沒有逃脫歷史的厄運。中國的改革再一次以悲劇落幕。

二、中國經濟改革的失敗

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若從農村改革算起，可以說歷時七年。若從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算起，則只歷時七個月，從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公佈關於進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起，至一九八五年四月全國經濟大收縮為止。可以說，除了這七個月，其餘基本上都處於「調整」時期。

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不但短命，而且從一開始就露出敗迹。說句「馬後炮」的話，由於中共改革派的局限性，這次改革幾乎是注定要失敗的。

(一) 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各條戰線中，最先發難的是外貿體制改革。幾乎是在「決議」公佈的前夕，國務院宣佈了外貿體制改革方案。這個方案的核心就是要實行「代理制」，兩個配合措施一是「放權」，二是擴大出口企業的外匯留成份額。實際上，這個方案的主要目的與其說是要改革大陸外貿體制中不應應開放要求的弊端，還不如說是為了急于卸掉一個巨大的財政補貼包袱。所謂「代理制」，就是要把外經貿部屬下的一系列專業外貿公司從中間商變成經紀人。過去它們要墊付資金，壟斷經營，虧損由財政補貼。實行代理制後，它們只要作為中間人促成出口企業和外商成交即可，交易成功則收取佣金，交易不成也不用承擔任何風險，可謂旱澇保收，只盈不虧。然而，這種如意算盤只是掩耳盜鈴的把戲。大陸出口的虧損根本原因有兩點：一是生產和經營企業的經營不善，效益低下；二是人民幣匯率偏高，限出獎進。只要這兩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出口的虧損就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這個包袱中央政府不背就由企業背，企業背不起就得地方政府背。總之，總要有人來承擔，駝鳥把頭藏進沙堆裡並不等於它就消失了。實行「代理制」實質上是讓企業自負盈虧，也就是讓企業自己背虧損的包袱。企業也有高招，隨着權力下放，它們的留成外匯額度增加了，可是紛紛用這筆留成外匯在海外進口耐用消費品（電視、冰箱、摩托車等等）高價出售，以國內市場

的超額盈利來彌補出口帳面的虧損，以達到收支平衡。這樣就形成了一九八四年底到一九八五年初「倒賣洋貨」的熱潮，造成大量外匯流失。大陸的外匯儲備從一九八四年十月的一百四十四億美元，猛跌至一九八五年六月的五十億，再跌至年底的三十億，外貿體制改革一頭栽進深谷。於是國務院不得不實行外匯凍結，把進出口權上收，恢復中央各部的條條專政，以致有深圳中外合營企業每筆出口交易都要跑到北京申請許可證。一時間，出口企業紛紛窮倒不幹，港商外商個個叫苦連天。外匯被凍結一舉，使大批進口合同違約，欲送往大陸的貨物在香港堆積如山，造成無數公司破產，老板跳樓。於是中共在世界貿易中的信譽和後來人民幣幣值一道，一落千丈。由於企業基本上無法承擔虧損，所以過去被中共財政甩掉的包袱現在不得不由地方政府背起來了，外貿體制改革在折騰完了外匯儲備之後幾乎又原封不動地退回到了原地，換湯不換藥。

(二) 緊接着外貿體制改革的是金融體制改革。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國人民銀行變為中央銀行，作為金融的宏觀控制機構，其原來的業務由新成立的工商銀行承擔。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以人民銀行為首，下轄工商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四個專業銀行的架構。為了改變過去「統收統支，帶帽下達」的信貸制度，在一些金融機制轉變已經完成的地區，開始試行「統籌計劃，劃分資金，存貸掛鉤，差額包干」的辦法，其目的是為了逐步把各專業銀行及各地區的分支銀行從出納員式的行政機構變成經營型的企業單位。中央銀行以信貸形式劃分給下屬各行一筆本金，在這個基礎上貸款額度放鬆控制，給各專業銀行及地方銀行以更多的經營自主權，多存可以多貸，每筆差額承

包。這樣一來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劃分資金」在什麼基礎上進行。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國務院宣佈各銀行一九八五年所能得到的資金份額以一九八四年的實際信貸額為基數。政府的政策如渠，企業行為如水，既然渠是這樣挖的，水必然會朝着這一方而流。中共的銀行幹部過去當「出納員」當慣了，毫無經營思想，他們所想的主要不是如何擴大存款，而是如何向上要到更多的錢。為了擴大一九八五年所得的資金分配額，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擴大一九八四年的實際信貸基數。於是整個十二月各地區都發生「銀行勸貸」的熱潮。過去向來是企業求銀行要貸款，可現在反過來了，是銀行主動找上企業的門，伸出錢袋動員企業借錢。湊巧，一九八四年年底又出現一個資金需求的高潮：一是傳統的基建投資飢渴症；二是年底各單位濫發獎金形成現金需求的飢渴症；三是當時恰巧出現了一個「辦公司」的熱潮，五花八門的「皮包公司」大量需求資金。這三個資金需求的高潮就匯集成為一個洪峰。僅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個月工商銀行貸出的資金就相當於當年全年資金數的一半。這股熱浪的慣性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五年上半年，以至四月份後國務院已嚴令收縮銀根仍利不住車。企業借了錢自然不是一下子用完的，而是要存在銀行帳戶上去支取，這樣就形成了虛假存款，給銀行造成假像，加速了資金的放貸。隨着緊縮的風越吹越緊，企業紛紛提款，虛假的存款一下消失，露出巨額貸差。至一九八五年底，全國除貴州、青海等少數幾個最窮的省分尚有存差之外，絕大部分省市都出現大量貸差，其中貸差最大的深圳市共達二十一億人民幣，幾乎相當於它全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到了一九八五年下半年，中國人民銀行新任行長陳慕華嚴令各行要追回去年

十二月的放款，否則只存不貸，並揚言要追查地方各銀行首腦的責任，在這重壓下，四川省某銀行行長以自殺抗議。其實這筆錢怎麼可能全部追回呢？眾多的「皮包公司」在緊縮風中紛紛倒閉，有的踪影全無，扔下一筆爛帳，在銀行帳目上形成一個又一個窟窿。與此同時，國務院財政部長王炳乾竟蹟一般地宣佈當年財政收入扭虧為盈，消滅赤字。一方面是信貸的窟窿，另一方面是財政的「盈餘」，這種掏了左口袋去補右口袋，打腫臉充胖子的把戲未免有點滑稽。銀根緊縮之後，商店和倉庫裡積壓了大批商品，但企業缺乏周轉的流動資金購買。「皮包公司」的盛行使整個社會的信用幾乎崩毀，所有的交易雙方都堅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使原來的窘境更加陷入僵局。企業被債務的聯環鎖串成一串，只要信用不恢復，銀行不放貸就誰也動彈不得，大眼瞪小眼，一籌莫展。國民經濟產值隨着信貸膨脹的慣性，一直上升到一九八五年九月，於第四季度一頭栽了下來。金融體制改革的鬧劇終於在蕭瑟的秋風中草草收場，中國經濟再一次進入「調整」階段。多災多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它的經濟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處在「調整」中，而另外三分之一則是處在狂熱的動亂中。

(三)在金融體制改革還未及露出敗迹的時候，價格體制的改革緊接着出場了。長期以來，對居民的各種補貼一直是政府財政的一個巨大負擔，至一九八四年其總額已達三百多億人民幣，成為財政開支的最大項目。各類補貼中尤以農副產品的價格倒掛補貼為最，達一百八十多億人民幣。自一九七九年中越戰爭起，中共就陷入了財政赤字之中，扭虧為盈的心情頗為急切，很多改革措施的倉惶出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一個潛在的內在因素，就是要擺脫財

政的困境，外貿體制改革如此，這次價格體制改革亦然。一九八五年一月，大陸各大中城市的農副產品價格一下子放開。由於選擇的行動時機是在嚴冬一月的蔬菜淡季，於是形成一方市場商品奇缺，另一方面物價暴漲的局面。老百姓說：毛主席時買菜數銅鏰（分），華主席時買菜數毛票（角），鄧大人時買菜帶着（大團結）（元）。在北京，過去買兩毛錢一斤的黃瓜現在一下子漲到二元錢一斤，過去一塊多錢的豬肉一下子漲到三塊，百姓們開始罵街，怨聲載道。價格改革的另一條戰線是在生產資料市場和基礎設施收費方面。長期以來，大陸的煤炭、鋼材、木材和糧食等基本原料的價格以及水電、交通、通訊、郵電等基礎服務部門的收費偏低，影響了這類企業的積蓄性，阻礙了它們的發展，使其成為國民經濟的瓶頸，因此，價格的調整和改革勢在必行。國務院採取的辦法是「雙軌制價格過渡」，計劃內的原料由國家按計劃價供應，產品由國家按計劃價收購，計劃外的原料由企業在市場上議價採購，產品由企業在市場上議價出售，於是形成市場價格與計劃價格并存的局面，隨着議價部分的逐步擴大，經濟運行機制逐步向市場化過渡。平心而論，這套方法不失為一個比較高明的戰略。但現在的問題是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後果由誰來承擔？擺在中共面前的有三條途徑：一是政府承擔；二是企業承擔；三是消費者承擔。政府承擔顯然是不可行的，財政已不堪重負，消費者承擔風險太大，顯然為最下策，上策自然是由加工企業內部消化。然而，由企業消化的前提是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可是由於企業改革養了夾生飯，企業並沒有真正的自主權，加上金融收縮帶來的獎金凍結，大大打擊了職工的積極性，便企業的「消化能力」受阻。企業為了在夾縫中求生存，只

能用各種手段提高產品售價，將生產資料提價的後果轉移到消費者身上去，居民們很快就看穿了其中的「把戲」，很多商品只是換了一個商標就大幅度提價，於是罵聲不絕。至于價格管理部門的「檢查」完全是一場自欺欺人的遊戲。一位物價局官員說：「我敢肯定，你抽查的那種商品肯定不會漲價，而沒抽到的肯定漲。價格指數一年只升百分之二、三，這種鬼話連我們都不信」。基礎設施服務的收費漲價更加凶猛，飛機、火車（局部）、電話、郵費（國際和港澳）的提價幅度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甚至超過百分之一百，電費、水費、房租、煤氣、公共汽車、電影院的收費均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提高，在如此短期內這樣大幅度的提價，實乃世界罕見。據官方消息，一九八五年物價指數上漲百分之二十二。一九八六年為百分之二十六，可是實際看來不止此數。農副產品、日用工業品和各種收費的提價使廣大群眾處於三面楚歌的夾擊中，幸而一九八四年是獎金獲得最多的一年，故一九八五年初百姓們儘管罵娘，但實際生活水平尚未受影響。可是八五年第二季度後的金融收縮帶來了對獎金的嚴厲控制，獎金總額封頂，全年獎金總額不得超過職工一個半月的平均工資，超額部份則以百分之三百的比率抽稅，也就是說企業要想發一萬元的獎金，必須上繳三萬元的獎金稅。一邊是物價上漲，一邊是釜底抽薪，老百姓處于四面楚歌之中，不滿情緒終於以各種形式爆發。最典型的是北京，先是社會青年的「五、廿九球迷事件」，接着是售貨員、售票員以及各業服務員的態度不約而同地惡化，與顧客無端爭吵，然後是汽車司機的怠工、罷工，最後的高潮是「九一八」的學生示威遊行……人們不滿情緒的爆發儘管形式不同，引爆點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的潛在因

素是肯定的，這就是通貨膨脹。東歐各國幾乎每一次改革翻船都是栽在價格問題上。價格改革是所有經濟改革的鬼門關，中國正處在這個鬼門關口，凶多吉少。其實所謂的凶兆並不是來自群眾對改革失望的不滿情緒，而是真正來自藏在改革派身後虎視眈眈、磨拳擦掌、伺機反撲的保守派和極「左」派。



各地代表在深圳取經

（四）工資制度的改革本是計劃隨價格改革後推出的，可是後來因銀根緊縮而流產夭折。由于輿論早已造出，群眾引頸以待，然而千呼萬喚却不出來。工資改革是群眾最關心的事情，人們抱以巨大希望。可是對這種價格調整雷厲風行，突然襲擊，而工資調整却拖拖拉拉，遲疑不決的現象極為不滿，這種不滿也通過上述的各種形式表現

出來。一九八六年初，幾經難產的工資改革終於出籠了，然而它便幾乎所有的人都大失所望。無論是企業還是行政事業單位，基本工資一律四〇元。按人頭算，然後每加一年工齡加〇、五元，然後是職務工資，分成不同等級。實際上這次工資制度改革只起到三個作用：一是取消了部份補貼（實際上是企業背起來了）；二是縮小了兩級差距，使收入更平均化了；三是簡化了過去過於繁瑣的等級，其餘和過去的工資制度幾乎沒有什麼差別。由于幹部能上不能下的問題沒有解決，職務工資並無意義，與過去的級別工資沒有區別。由于兩級差距反而縮小，吃大鍋飯的現象依然存在。另外由于獎金封頂，物價飛漲，大多數人的實際收入反而有所下降。一般職工在工資調整後收入所增無幾，不足以抵消物價上漲，而高薪階層（高幹、高知）甚至名義工資也有所下降，在這次工資改革中唯一的得利者是最近新提升的中青年幹部，即所謂「第三梯隊」，而最倒楣的仍舊是最通情達理的「老九」，尤其是中青年知識分子。由于從一九八二年起，科研機構和大學的職稱評定就已凍結，恢復高考後上學的中青年知識分子至今沒有職稱，所以工資與行政級掛鉤，而中國歷來有唯官獨尊的傳統，故這種掛鉤大大有利于行政幹部而不利于教研人員。于是學者們人心浮動，導致這幾年畢業的研究生「從政熱」，誰也不願到科研、教學單位這類清水衙門受清苦。這次工資改革的目的本應是刺激群眾的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率，並抵消物價調整所帶來的副作用。但實踐證明它毫無效果，相反，由于長久存在群眾心中的希望終於破滅，普遍的怠工現象日益嚴重。這次工資改革不要說成功，就連評它失敗都事實上是恭維它了，因為它是否是一次「改革」還有所爭議。

(五)企業改革的情況也不樂觀。在中共中央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中，曾把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當作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這是完全正確的。但由於中央財政捉襟見肘的被动局面，使「利改稅」的進展遲遲不前。小企業、集體企業、社隊企業基本上已過渡到稅制，現在只剩下主要靠國營大中型企業背負着財政上繳的任務，養着父母官。各級政府遲遲不願斷掉這條利潤上繳的財路。金融方面，「撥改貸」的改革也沒完成，很多企業的基本建設投資還是由政府財政撥款，既然是我投資，那麼你向我上繳利潤就是天公地道的。另外，幹部制度未變，國營企業的廠長、經理仍由上級主管部門任命。企業和政府之間在財政和人事方面這兩條臍帶沒有割斷，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自主權，而沒有自主權，提高企業積極性和經濟效益就是一句空話。一九八六年初福建省曾有六十個廠長、經理聯名寫信呼籲給企業「鬆綁」，其實「鬆綁」談何容易，這不是哪個省長、市長可以說了算的，這涉及到一系列的體制問題，需要一系列領域的配套改革。企業的進取精神取決於企業的獨立利益和企業家的獨立立場。而大陸的「企業家」是沒有獨立人格的，他們要麼代表「國家」，只對上負責，唯命是從，甘當傀儡；要麼代表職工，濫發獎金，大搞福利，收買民心。這兩種傾向對企業效益的提高都有害無利。事實上，企業不但沒有被「鬆綁」，而且負擔越加越重，政府財政為擺脫困境將很多包袱都卸給了企業，企業不但要管職工的吃飯、交通、教育、幼托、醫療、住房、婚喪嫁娶、退休勞保等，甚至還要負擔原來由政府財政承擔的大量補貼。總之，企業在所有職工的生活方面都要「自主」解決，而唯有生產不能自主。難怪國內有人寫

文章嘲笑說現在是「政府抓生產，企業辦社會」，狗拿耗子貓看家。說到底，企業自主權最終會碰到一個所有制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政企就不可能真正分家，企業就不會有活力。最近大陸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已經看到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了，提出小企業承包，大中型企業股份化的建議。但由於中共領導始終不敢跳出馬克思主義和「堅持社會主義」的框子，使企業改革這輛車最終停在所有制這堵牆前，無法前進。

再來看「對外開放」。從一九七九年春籌建蛇口工業區至今，「對外開放」政策已實行八年，它是以特區建設和沿海城市開放作為標誌的。然而到今天為止，按國際一般標準在所有特區和技術開發區中，除蛇口工業區尚屬成功之外，其它均毫無生機。除大量投入巨額資金及人力外，幾乎一無所得。即使有，也得不償失。深圳特區是對外開放的一面旗幟，幾年來報紙曾大肆鼓吹過「深圳速度」。可是今天的深圳一片蕭條。那些曾經被引為自豪的高樓大廈因無人租用而空空蕩蕩，但是它們腳下却壓着數十億的巨額資金。深圳的失敗再一次表明了中共幹部只計投入，不計產出，追求速度，好大喜功的惡習。到一九八五年底，通過各種渠道投入到深圳基本建設中的資金共達六十億人民幣。企業總欠銀行貸款四十二億人民幣，市政府欠七億，而當年深圳市社會總產值總共才達二十六億人民幣（還連成本在內）若按百分之六的複利計，深圳人下輩子也還不清這筆錢。深圳市在一九八三年至八四年時確實「繁榮」過一陣，因為那時其它城市尚沒開放，深圳得天獨厚，海外投資者蜂擁而至，想通過這個門縫擠進十幾億人的市場。深圳借着手貿易賺了一大筆買路錢，發了一筆橫財。以

「外向型」為建設宗旨的深圳却有百分之七十的產品事實上是內銷的，若不計替代進口及內銷的外匯券收入，它連本身的外匯平衡也辦不到。一九八五年，其它十四個沿海城市紛紛開放，深圳失去壟斷優勢，開始走下坡路，它當時的商業貿易機構設施已達本市需求的百分之四百以上，旅業中高檔床位四萬四千張（香港三萬四千張）蕭條風一到，各種商店，貿易公司紛紛關門倒閉，飯店旅館的使用率不抵三分之一，職工連發工資都困難。深圳的工業更是可憐，不計蛇口，它幾乎沒有引進什麼可以值得一提的技術，一九八五年十月，深圳新任市長李灝為挽救梁湘留下的殘局曾召集中央十八個工業部的代表在深圳開會，呼籲他們支持特區在此投資，可是由於深圳，第一勞動力成本高，第二技術水平低，第三沒有外匯出口補貼，相對於其它沿海城市已失去吸引力，所以落實項目寥寥無幾。李市長不得不承認深圳將出現一個長時期的蕭條。實際上，最能體現「深圳速度」的應當是深圳市工資指數增長速度，到一九八四年底，深圳市平均工資水平已超過全國水平一倍以上。由於工資剛性規律，勞動力的成本是一個加工業出口地區的生命線，工資上升過快將大大縮短它的「壽命」。深圳的壽命現已受到工資上升和蕭條的腐蝕，可以說，即便它能夠復甦，也氣數將盡了。深圳特區的另一個宗旨是城市體制改革的試驗品。本來一張白紙好畫最新的圖畫，可是這張白紙畫得比內地還糟。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機構臃腫一點不亞於內地，凡是內地有的機構這裡都照葫蘆瓢建一個。深圳市僅副市長就有八個，每個市長都有權批准建樓，到一九八五年底，全市由市長們批准建的十七層以上的大廈共達三百座，其中建成的四十二座，建成一半的八十



鄧小平在梁湘（左一）、梁靈光（左二）陪同下視察深圳。

七座，八支筆胡亂批，可沒有一個人知道總數是多少。當國務院調查組告之他們總數時，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深圳的幹部大多為當地寶安縣和附近惠陽、梅縣地區的基層幹部，文化水平十分低，但「終身制」未改，所以先佔茅坑者為主，後來有一大批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流入的知識分子只能屈居他們領導之下，這批人中集中了相當多全國精英，然而被這些文化水平很低的土地爺領導得哭笑不得，目前又紛紛向內地倒流。深圳市的整個行政機構若搞市場經濟則太臃腫，若搞計劃經濟又太無能。外國的東西沒學到，反而把看家的本領給丟了，可謂邯鄲學步不成，以至壽陵失步。李灝市長在接任後，面對這架「比內地還內地」龐大機器，幾乎是束手無策。深圳的虛假繁榮和它的領導者文過飾非的作風，確實會給不少人以假像，甚至把前來視察的鄧小平也蒙住了。

一九八五年初，一位眼光犀利的香港學者陳文鴻在香港「廣角鏡」上發表一篇「深圳向何處去」的文章，揭開了這個爛攤子的蓋子，於是圍繞着深圳問題開展一場大辯論，然而事實勝于雄辯，深圳的蕭條終于使人們承認了它的失敗。

其實何止深圳，大陸十四個開放的沿海城市都陷入困境。一九八四年二月鄧小平從深圳視察回來心血來潮，一下又開放十一個沿海城市（除原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特區）于是中國又出現了「大躍進」式的局面，所有的開放城市都學起了深圳經驗和速度，搞起了技術開發區，投入資金共達一百多億人民幣。大連的粘魚灣開發區原計劃五十平方公里，按每平方公里一億的開發費用需投資五十億人民幣，現已完成五平方公里，然而最近一些日本投資者到當地視察，認為地理位置選擇不好，搖頭而去；上海虹橋閘行開發區曾鄭重其事地搞過一些規劃，可現在已無聲無息；廣州黃埔開發區原計劃投資一億八千萬，結果施工中發現地質選錯，地基下大量流沙淤泥，需追加投資，現在騎虎難下；湛江市開發區花了七千萬人民幣修了一條公路，結果沒有下文；寧波市由包玉剛出錢修了一段北侖港碼頭，然後不了了之。實際上，連開發區吸引外國先進技術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打算，事實證明外商並不熱心，近幾年各開發區基本上是借特殊政策倒賣一些洋貨來維持生存的，目前狀況比較好的廣州和天津開發區雖然已有三十幾家廠投資，但據其內部的知情者透露，真正效益好，能賺錢的幾乎沒有。從經濟意義上來說，這些開發區完全是得不償失的。其實這十多個沿海城市和深圳情況完全不同，它們不是一張白紙，而是原來就有雄厚的工業基礎，完全可以利用老市區的基礎

設施，引進外資進行老企業改造，這樣比白手開出一塊新區要成本少，效果好，同時對外商吸引力也大。可是當一些經濟專家提出的這個意見佔了上風的時候，所有的開發區都已經騎虎難下了。「一窩蜂」的鬧劇在大陸的經濟舞臺上久盛不衰。

海南島的事情更荒唐，起因也是鄧大人一句話：海南島在二〇〇〇年能否趕上台灣？于是一切機器都圍繞着這個目標轉起來，海南島成了特區。按一九八三年的人均國民產值計，海南島不到一百八十美元，而台灣大約二〇〇〇美元，設兩者人口增長率相等，海南島若要在本世紀末趕上台灣當年水平，需要達到百分之十二點五的年平均增長率，若按台灣以百分之六的速度遞增的話，海南島要達到百分之二十二點五的年平均增長率，這幾乎是奇蹟了。當然，如果傾國庫之囊投入海南島，在本世紀末趕上台灣也未必不可，可是這是否經濟？何況國庫沒錢。既然國家不給錢，又要追台灣，海南島只能自己搞錢了。雷宇的辦法是進口汽車倒賣，結果鬧出了一個震驚全國的「汽車事件」，流失外匯五億多美元。海南島經過中央紀檢會的整肅之後一蹶不振，領導班子幾乎癱瘓，于是二〇〇〇年趕上台灣的口號從此消聲匿跡。

三、中國政治改革提出的背景和失敗

一九八四年的國慶大典是鄧小平時代最輝煌的頂點。這個頂點是乘着農村改革和輕工業調整之風而達到的。農村的改革實際上只不過是給網在農民脖子上的繩子鬆了一下，結果誰知它所喚出來的巨大潛力震驚了全世界，把鄧

小平送上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壓縮重工業，發展輕工業的「調整」政策實際上是向人民還債，但它却帶來一個一片光明的盛世，市場繁榮，人民收入（即消費基金）迅速增加，國民生產總值的數字飛快地增長，整個中國都沉浸在歡欣鼓舞中，以至中共不惜花四十億人民幣來歡慶三十五周年大典，以揚國威。隨後，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公佈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趙紫陽口袋裡裝着一百四十四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躊躇滿志地拉開了城市改革各條戰線的序幕。

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形勢的變化會這麼快，七個月之後，改革的勢頭就急轉直下，從峰巒跌進深谷。外貿、金融、物價、工資、開放……全線失利，改革派碰得頭破血流。這一結果不但大出一般人所料，恐怕連反對改革的人也都沒有料到。於是，中共改革派不得不轉攻為守了，他們就拋出「鞏固、消化、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與保守派對峙。但是在長達一年的對峙中，改革派是相當被動的，改革中所出現的失誤比比皆是，面對保守派步步緊逼的反攻，防不勝防，要想擺脫被動，必須轉守為攻。可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各條戰線像一張網裡的螃蟹，互相制約着，誰也動彈不得，而只要這張網不解開，這個僵局就打不破。這張網就是大陸現有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即所謂公有制），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的，然而它開始得太晚了。

在一九八六年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對改革派來說，實際上是避而走險（具體我們後面分析）。當然成功的希望不是沒有，但需要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勇氣。可是由於中共改革派本身的局限性和軟弱性，使他們成爲這場鬥爭中必然的輸家。

四、中國改革失敗的原因

改革失敗了，然而它的原因和教訓何在？（一）沒有一套成熟完整的改革理論，一方面摸着石頭過河，另一方面掛羊頭買狗肉。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全線展開，然而改革之後中國究竟要形成什麼樣的經濟體制，誰也不清楚，走一步看一步，胸無成竹，容易形成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緒，同時使各個領域的改革難以配套。儘管如此，中共改革派仍不願放棄四個堅持中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羊頭招牌，哪怕他們內心裡也並不相信這一「指導思想」，而實際上賣的是狗肉。這樣一種自相矛盾的作法事實上對保守派十分有利，因為改革派雖然走的是改革的路，但揮的却是他們的旗幟。這樣就使保守派完全能夠以「傳統」的身份對改革中出現的失誤進行指責，並利用馬克思主義、毛



鄧小平、胡耀邦主持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經濟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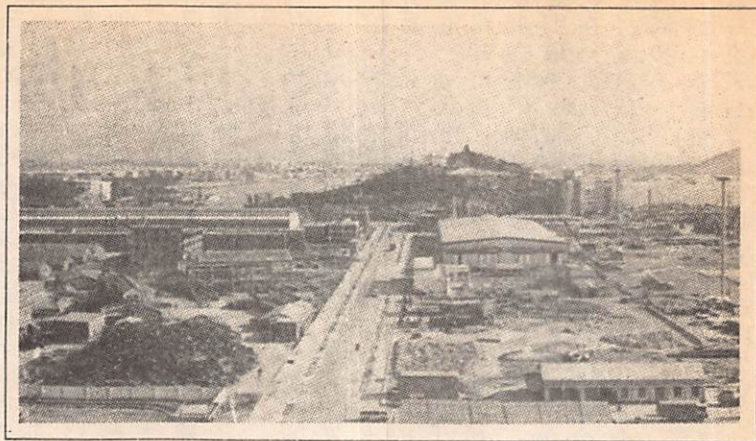
澤東思想的指導原則對改革派進行清算。在這種指責和清算面前，改革派毫無反擊之力，有理難辨，只能打落牙往肚子吞。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一次，改革派正是被他們自己所高舉的棒子痛打了一頓。

中共改革派爲自己辯解的理由是：中國進行的改革是史無前例的，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鑑，所以只能摸着石頭過河，闖出一條路來。另一個理由是：理論都是在實際的基礎上產生的，所以要先實踐，後總結理論。

然而，這種辯解是完全站不住腳的。請問世界上有哪一場改革或革命是史有前例的？美國作爲殖民地的獨立是有先例的嗎？可是它的「獨立宣言」却有盧梭的「天賦人權」的理論作爲指導思想。美國的立憲難道有先例嗎？可是它却有孟德斯鳩和洛克的「三種分立」、「權力制衡」的理論作爲指導思想。羅斯福所實行的「新政」難道有先例嗎？但它却有凱恩斯的理論作爲指導思想。列寧的「十月革命」同樣也沒有先例，但它却有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爲指導。反過來說，「天賦人權」的理論誕生在獨立戰爭之前；「三種分立」的思想也產生在美國立憲之前。凱恩斯從沒推行過他的赤字財政政策，但寫出了「通論」，馬克思並未親眼目睹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先寫出了「共產黨宣言」。

實際上從廣義上說，「史無前例」也是不對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不是也有東歐的前例嗎？特區，加工出口區的發展不是也有台灣的高雄楠梓、南朝鮮的馬山、黑里等先例嗎？儘管中國有它特殊的情況，但並不是沒有一點經驗可循的。

歸根結底，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沒有形成指導理論，正是因爲中共改革派不願跳出一四項



建設中的蛇口工業區

基本原則」的框框所致，同時也是他們「掛羊頭賣狗肉」的行爲所致。

(二)官僚體制的腸梗阻。從經濟改革的大起大落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各級領導人的決策既沒有民主作風，也沒有科學態度，全憑拍腦袋瞎指揮。而鄧小平則是頭號的「瞎總指揮」。他的一聲令下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及讓海南島在本世紀末趕上台灣的決策，足以爲後世傳爲笑柄。不但如此，還聽不得批評，老虎屁股摸不得。這一點深圳市的領導人十分典型，只願聽好話，不願聽批評，唱贊歌的熱情款待，

提意見的橫眉冷對。一次會議上一位外地幹部對深圳提出一點批評，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盧祖發立即氣急敗壞地駁斥：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真是貽笑大方。然而不准批評並沒有使深圳免于失敗。相反，民主風氣也不會使天下大亂。蛇口工業區之所以頗有成效，正是袁庚在這個孤懸海外的試管裡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試行民主制度，讓群眾參與決策，批評罷免領導所致，從而避免了深圳式的重大決策失誤。

官僚主義首先起源於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能上不能下的制度。只對上負責便好大喜功，報喜不報憂成風，「鐵交椅」又使那些平庸腐敗之輩下不來，優秀傑出的人才上不去，並且犯了錯誤照戴烏紗，無法罷免；其次起源於一黨獨尊及限制言論的專制制度，沒有壓力團體和獨立輿論的監督，哪怕聖人也會犯錯誤，而且不碰南牆不回頭。

不可否認，政治體制改革的提出是中共改革派在經濟改革失利後反思的結果。改革派的某些開明人士在碰了官僚主義的南牆之後，曾提出過「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問題以及黨政分家的問題，例如萬里在軟科學會議上的講話，胡啟立、鄧小平的多次講話。然而他們的思想僅僅局限於在原來官僚體制的基礎上進行修補，而對於徹底改革這官僚體制的根本措施，如民主選舉、言論自由、開放黨禁、分權制衡等，仍視爲異己。

(三)難以逾越的障礙——公有制。一放就亂，一收就死，幾乎成了中國近四十年來經濟發展的不治之症，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這一惡性循環的悲劇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又原封不動地重演了一遍。其實這個不治之症的根本子正在於公有制。爲什麼會「亂」，因爲掌權人手中

的財產不是自己的，揮霍交學費個人不會受任何損失。資本公司對企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權力，可以決定僱用工人，買賣財產，但同時也負有百分之一百的責任，企業倒閉他要傾家蕩產，甚至跳樓；可是共產黨「企業家」有絕對權力，但不負任何個人責任，大筆一揮可以調動成千上萬資金、人力，可是失誤了也不用扣工資，說一聲「交學費」就不了了之。大陸有的廠長或經理說：「只要是共產黨的錢，百分之二百的利率我也取借」。爛帳是國家的，他當然敢借。所以管理者的責權分離，是公有制一個不可解決的矛盾。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失控的根本原因都在於此。企業管理者濫發獎金，大搞福利是消費基金失控的原因，但這樣作不但能收買民心，而且由於廠長的工資也在職工工資總額中，他們只有增加了全體職工的收入才能正大光明地增加自己的收入，水漲船高。基礎擴張是積累資金失控的原因，然而反正錢是國家的（無論銀行信貸還是財政投資）能否回收與己無關。可是攤子鋪得越大，級別越高官當得越大，同時增長速度最快（體現在統計數字上）證明成績越大，升官越快。只求速度，不求效益，只計投入，不計產出的作風由此而來。

爲什麼會「死」？因爲企業沒有內在動力。對大陸「企業家」來說，企業不是自己的，盈利了他不會發財，虧損了他不會破產。好壞工資照發，何必爲了降低成本，更新產品，打開市場等問題奔波？何必爲了管理紀律而得罪工人？

經濟體制改革失利之後，大陸一些經濟學家看到了所有制這個核心問題。北京大學的著名經濟學教授厲以寧就曾提出國營企業股份化

的建議，可是由於中共改革派不敢跳出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框框，始終未敢邁出這一步。

（四）貽誤戰機。東歐一些經濟學家在總結東歐各國的改革時發現一個帶有共性的規律，這就是共產黨國家在改革初期都會出現三、四年「黃金時代」，它往往是由政策突然放鬆，被壓抑的生產潛能突然釋放所帶來的，但由於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和制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當這種潛能釋放完畢之後，這一「黃金時代」就會消失，從而陷入停滯狀態甚至困境。改革的領導者最初往往被「黃金時代」所迷惑，不願再去觸動一些帶有根本性的棘手問題。當經濟陷入困境時，他們才意識到解決這些問題的必要性，並被迫下決心，可是這時機會已經失去，他們不得不在逆境中背水而戰，其結果往往有二：要麼無可奈何，要麼一敗塗地。於是，研究改革的專家們總結出這樣一條經驗：儘可能在「黃金時代」解決最根本最棘手的問題。

中共改革派這次又重蹈了東歐前輩的覆轍。平心而論，中國的農村經濟改革是相當成功的，它所釋放的能量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是世界所罕見。再加上輕工業調整所釋放的能量匯集在一起，為中國的改革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絕好時機。在中國的改革中，風險最大的棘手問題有二個，一是價格體制改革，二是政治體制改革。按照以上理論，如果中共改革派能夠在一九八〇和一九八四年這段「黃金時代」解決這兩個問題，則中國的改革非常有可能走向成功。

國內本身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這一點，當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六年全國各大城市農副產品價格暴漲，民怨沸騰時，唯有廣州和附

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區農副產品價格保持穩定並有所下降，同時一九八五年的「九·一八」前後，全國大學比較集中的大城市中，廣州的學生沒有示威遊行。原因是廣州的農副產品價格改革是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的，經過管二放八，管四放六，……按品種逐年放開，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全國農副產品物價全面放開時，它的改革已經完成。在中國人的消費結構中，食品支出占最大比重，故農副產品的價格開放是風險最大的，可是由於廣州地區利用「黃金時



電視機大量銷往農村，說明了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功

代」解決了這一問題，所以輕而易舉地渡過了這道「鬼門關」。中共幹任何事情都有一個規律，就是要先搞「試點」，以點帶面，這恰恰體現了其改革沒有完整的理論指導的弱點（也體現了他們所掛的「羊頭」根本無用。這種方法表面上很穩妥，而實際上往往在貽誤時機，而且成功率並不高。正如廣州農副產品開放的成功並不一定導致全國的成功，蛇口「試管」的成功並不能避免全國十四個沿海城市技術開發區的失敗一樣。另外，中共和世界其它所有共產黨一樣，本身帶有保守的惰性，所以在改革中總是避難就易，先吃肉後啃骨頭，先把得民心，「摘桃子」的好事辦完之後，方被迫解決風險大的棘手問題，結果為時已晚。

在政治體制的改革問題上，中共改革派同樣錯過了一個好時機。如果他們能夠利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的「民主牆運動」和「大學生競選熱潮」的聲勢，上下結合，一舉擊潰保守派，實行全面政治體制改革，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掃清道路的話，則很有可能取得中國改革的成功。由於當時的農村經濟改革和輕工業的調整帶有向人民還債的性質，它們所帶來的後果必然是物質的豐富和人民消費水平的改善提高，所以當時如讓人民講話，是不會發生匈牙利、波蘭式的動亂的。但是遺憾的是，中共改革派為了與保守派達成妥協，鎮壓了把他們捧上台的社會民主力量，使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沉悶了達五年之久。它所帶來的兩個連鎖後果已經被後來的事實所證明。

首先：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已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絆腳石。一九八四年十月開始的城市改革的失敗，已經使很多人（其中也包括中共改革派中的開明人士）認識到這架龐大的官僚機器不可能適應經濟改革需要了。

其次，由於錯過了「黃金時代」的時候，使一九八六年復出的政治體制改革處於十分被動的險境。第一，農村改革的勢頭到了一九八五年達到了頂點，潛在的能量釋放完了。分田到戶之後公共設施的建設管理十分薄弱，文革時期修起的水利設施逐漸殘廢，農民抗災能力下降，同時由於農民對政策變化的恐懼，對土地進行了掠奪式經營，基本建設性投資不多。所以農村面臨大量的投資（這次不能像文革時期無償徵用農民勞力大修水利了，而要國家投資了）和改革的深入。桃子摘完了，現在該種樹了，中國改革所乘的「東風」現已成爲強弩之末，它再也揚不起城市改革之帆了。第二，輕工業增長過速，一下子把基礎工業拖住後腿。電力、交通、通訊、原材料等部門成爲「七五計劃」所面臨的問題。同樣，桃子摘完了，現在又要種樹了。基礎工業的投資與輕工業後果不同，不但投入多，見效慢，而且需要人民群眾壓縮消費，勒緊褲帶。若再加上與價格轉軌的重合，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引起群眾不滿。一旦民主運動興起，極易誘發群眾的激烈情緒，出現匈牙利式的亂局。同時基礎工業的建設需要財力集中，爲保守派的收權和復辟計劃經濟體制製造了有利的條件。第三，經濟改革的全線失利，引起人民的失望和不满，同時爲保守派的反撲提供了諸多借口，政治改革將面臨一個更加動盪的局面。綜上所述，如果說一九八〇年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順風順水的話，那麼一九八六年的政治體制改革則是逆水行舟了，它可以說是一次挺而走險，後果凶多吉少的改革。

中共改革派壓抑民主，貽誤政治體制改革的舉動除了出於他們天生懼怕群眾的局限性外，還由於當時黨內和社會上流行的「經濟決定

論」的影響。中共改革派內部的一些開明人士即便贊成政治改革，但也認爲應先解決經濟問題，再解決政治問題。認爲一方面經濟改革要求「安定團結」的局面，另一方面經濟改革的成功會爲政治改革製造條件。可是他們沒有想到中國的國情是政治決定一切的，現有政治體制將成爲經濟體制改革的障礙，中國過去所有的經濟失誤都是由政治失誤或動亂引起的，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同時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五年城市經濟改革的失敗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當然，不可否認，一個社會制度是建築在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上的，正如建房子要從地基開始建一樣，可是改革與其說在建房子不如說是在拆房子，拆房子卻要從房頂開始拆起，所以，思想解放和政治變革的領先，幾乎成爲任何一場成功的改革或革命的規律。其實中國亦是如此，若沒有「真理討論」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打倒「四人幫」，擊潰「凡是派」的政治變革，就不會有後來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

（五）中共改革派的局限性和軟弱性。一九八六年復興的政治體制改革儘管對改革派來說是挺而走險，但並不是毫無成功希望。當學生、知識份子、廣大群眾要求民主的運動興起之後，中共改革派唯一成功的希望就是背水一戰，徹底與共產黨的專制傳統決裂，聯合社會民主力量，實行比較徹底的政體改革和社會改革。這樣做儘管要冒與保守勢力和官僚體制的既得利益階層決戰的風險，但並非沒有成功的條件。中國當時的情況是：在中共最高層，改革派占據主導地位；在社會最基層，群眾擁護改革，此乃民心所向；改革的障礙主要來自群眾和中共高層改革派之間的中層官僚，他們是

中央內部保守派的社會基礎。這種勢態就是人們常說的：兩頭熱中間涼。中共改革派所處的局面是：若聯合社會民主力量，則在總力量對比上占優勢，若排斥社會民主力量，在整個官僚層中占劣勢。若走前一條路，則有可能取勝，若走後一條路，必然在保守勢力的壓力下步步退却，最後完全喪失陣地。前一種方法在世界不乏成功範例，其中最典型的就西班牙的「卡洛斯革命」。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這種方法成功的範例。毛澤東作爲中共最上層的代表聯合社會下層的民眾將中間的官僚層壓得粉碎。毛澤東儘管是個專制暴君，但不可否認也是第一流的策略大師，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地雖不可取，但方法和策略未必不能借鑑。

如果中共改革派能夠堅定地站到民主力量一邊，那麼它必然會成爲廣大群眾民主運動的旗幟。人民會呼喊着他們的名字去戰鬥，就像「匈牙利事件」中的納吉，「布拉格之春」中的杜布切克，天安門廣場事件中的鄧小平一樣。即使他們在決戰中被打敗，也會有東山再起的機會。鄧小平的經歷足以說明這一點。

假如鄧小平能夠這樣做的話，成功了就是中國的華盛頓，失敗了也有可能第四次復出，成爲世界上獨一無二，四起四落的風雲人物。即使他沒能活到那一天，人民也將永遠紀念他，那怕他過去犯過多少錯誤。

可是，這畢竟是假設，中共的改革派出于本身的局限性而走上了第二條路，鄧小平親手鎮壓了學生和民眾的民主運動，仍不能平息保守派的怒氣，只能揮淚斬馬謖，拋出了改革派中的開明人士胡耀邦。此舉不但使他本人在人民中的威望喪失殆盡，而且使改革的失敗成爲定局，同時爲他身後的動亂埋下了伏筆。

改革死了！改革萬歲！

侯德健悔之晚矣！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韓魯仁



台灣校園歌手侯德健

以創作「龍的傳人」一舉成名的台灣校園歌手侯德健數年前去了大陸。他着實風光了一些日子。但是不久，侯德健不開心的消息即由各種渠道傳出。嚐到一番酸甜苦辣之後，如夢初醒地發現大陸並非作曲家的「天堂」，河山雖美，人事全非，尋不着英雄用武之地。他擬在廣州辦一家錄音公司的申請，經那班尸位素餐的中共官僚老爺們討論來、討論去，沒有誰肯賞臉給他一個明確的答覆——「YES」還是「NO」。他曾回四川探風，却發現鄉親們竟然

如此貧窮，僅僅湊出二十斤花生米相贈；而他自己的副部長級高幹的薪俸，却仍入不敷出。有時正在工作，只要聽得窗外呼叫「賣排骨」，即得扔下手邊的事情，直奔排骨攤而去……凡此種種，使這位幾年前預言進入大陸則將出現創作高潮的小侯情緒沮喪，莫知所從……

作為曾與侯德健有數面之緣的我真不禁要為他扼腕嘆息：侯先生悔之晚矣！

目前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十億同胞中，藝術家、藝術家們實在是一群精神上極其痛苦的人們。共產專制制度所到之處，皆實行「箝口政策」，嚴禁老百姓說實話，說真心話；從全球的共產國家來看，從蘇俄到越南，從中共到古巴，雖使用的手段有粗細分野之分，本質上却並無差別。然而，文學家、藝術家以「為民請命」、「為民代言」為天職，自然順理成章地被紅色統治者視若死敵，必然以「胡蘿蔔加大棒」交替使用，責令這幫人俯首貼耳，大唱大寫「社會主義天堂」的讚美詩，不敢跨越雷池半步。但身為文學家、藝術家，總得講究個「藝術家的良心」，而且其感情又非常豐富，見聞又特別廣博，論及其氣質類型，又多是多血質、胆汁質的，誰人能夠長期在民衆的疾苦面

前裝聾做啞，替紅色統治者指鹿為馬？！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每每政治風潮湧起，總少不得有許多離共產主義之經、叛馬列主義之道的文學家、藝術家們為民請命！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如此，一九五七年中共所謂「反右」如此，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亦如此……文學家、藝術家們在鐵幕下為爭取創作自由而鬥爭，歷久不衰！

如此觀之，侯德健幾年前拋妻別子，進入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去尋找其「創作高潮」，是何等的幼稚，何等的不自！中共統戰人士操如簧之舌，百般允諾，這侯氏竟信以為真，悲夫！

也許，侯德健以為既然中國音樂的發祥地在大陸而不在台灣，那麼當然還是在大陸進行創作更好一些，那兒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音樂素材。他却未更深地想想，以大陸同胞之多，人才之衆，為甚寫不出好作品，難道只要他侯氏飄然渡過海峽，就如同降下一位神仙，使大陸樂壇頓改前觀？！這種想法真是天真極了！

在中國大陸，文藝界是所謂「重災區」，路人皆知中共每搞政治運動，總是要在文藝界鬧個天翻地覆不可。久居文藝界，難免捱上刀傷劍痕，能夠平安混過各次政治運動的福將還真是打着燈籠難尋（即以爬上中共宣傳部副部長高位、終日板着「左」面孔亂打棍子的賀敬之而言，五十年代整「胡風反革命集團」時，亦被隔離審查。）論及鬥人整人的花樣經，古今中外也罕見。文革之前，中國大陸音樂界先有批李凌「輕音樂無害論」，後有批德彪西的印象派；及至文革一來，則不分良莠，玉石俱焚。唯有北京市「中國音樂學院」學生創作的一首「牛鬼蛇神嚎歌」風行一時，響徹雲霄！

(其歌詞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我要老老實實，如果我不老實，把我砸爛砸碎，砸爛砸碎！」)筆者當年參加「紅衛兵大串聯」，曾在北京、上海兩地親耳聆聽包括馬可、賀綠汀在內的第一流音樂家為皮鞭所逼高唱此歌，真令人不忍卒聽！更可悲的是，作曲家落筆稍有新奇之處，亦可能罹難。有位作曲家想拍毛澤東的馬屁，譜了一曲，最後副歌歌詞是「薩拉姆毛主席」，據他說是少數民族語言「讚美」之意，但音樂界的中共幹部忽發奇想，認為此句之諧音乃是「殺了那毛主席」，於是乎單憑這一句，「現行反革命」的大帽子從天而降，拍馬屁者被劣馬踢傷了！還有人因配器方面力求出新，不

●兩岸風雲●

中共宣傳部長好難當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宋凡

繼胡耀邦去職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一如人們所料想的那樣隨之下台了。這不僅僅由于朱厚澤當初的升遷有賴于胡耀邦的大力提拔，按照「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中共官場原則理應受貶；更重要的是，朱厚澤一年多的政績顯示出他的確是一個開明人士(人們很難說出朱氏在中宣部長位子上做過什麼引人注意的事情。妙就妙在此處：中共中央宣傳部本來就是無益于國計民生的贅疣，因而無所作為的部長即是最好的部長!)。這樣的部長被捲土重來的保守派指責為「執行黨中央的方針不

落俗套，明明是一首吹捧老毛的歌，亦被指為「影射」、「冷嘲熱諷」，受到殘酷的整肅。熟悉大陸文藝界的人都知道，那裏各種與文藝無關、專門整人監視人的中共官僚機構比比皆是，形成一大幫對文藝事業一竅不通、專吃黨飯的中共幹部，騎在廣大文學家、藝術家頭上做威做福的局面。許多文藝界的黨棍們搞不出創作，就去搞評論，寫不出評論，就去搞行政當領導。其結果是當行政領導的管着搞評論的，搞評論的管着搞創作的，最無才能的管着最有才能的。因此，侯德健欲自開一家錄音公司，其中請書落入中共飯桶幹部手中，遭此厄運，絲毫不足為怪。

在如此惡劣的高壓環境裏，作家藝術家有

力」，實在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朱下王上——王者，前「紅旗」雜誌副總編輯王忍之是也。關於他，人們都有這樣的印象：在一九八三年那次短命的、不得人心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他是一名活躍的角色；而在今年一月，他更主持了「紅旗」雜誌關於如何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討論會。無怪乎外電普遍認為王忍之是一個意志堅定的鐵腕人物。

中共中央宣傳部歷來是一塊是非之地，亦是黨內諸派必爭之地，稱之為「火藥桶」也不

多少機會施展才能，也就可想而知了。人人自危，個個難保，連赫赫有名的頭面人物也不例外。影壇巨星趙丹曾「酒後吐真言」地說出這樣的話：「我很想見毛主席，向他要一塊牌牌，上面寫個『免』字，免鬥，我才敢說真話。」當然，假如他真敢斗胆向老毛索要什麼「免鬥牌」，只能是罪加一等。

當初，中共當局對侯德健大吹大捧，並非高度評價其藝術造詣，而是出於統戰的需要。這種狀況由於台灣人士時有回返大陸而不可能持久。一個藝術家淪為政治舞台上的一件擺設，又貶值為極不起眼的小物件，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侯德健悔之晚矣！

算是誇大其辭。這是因為中共領袖歷來對意識形態極端重視，凡有風吹草動，總要在宣傳部門尋找原因。毛澤東曾經說過：「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兼生死冤家林彪則有一段家喻戶曉的名言：「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

三十幾年來，隨着中共高層鬥爭的起伏變化，中共中央宣傳部時而是統管全國輿論的革命大本營，時而是製造黨權奪權輿論的反革命閻王殿(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對中宣部發出「打倒閻王，解放小鬼」的口號)。因此，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難做，則是不言而喻了。細細數算一下，建國後歷屆中宣部正副部長，除夭亡者如何凱豐，掛名者如徐特立外，有哪一位能逃過殘酷的打擊和清算呢？陸定一是欽定的黑幫分子自不必說，其手下得力幹將許立

群被整成一個連日常生活也難自理的痴人，另一才子姚溱（國共內戰期間以「秦上校」筆名寫的時評風靡一時）三十八歲榮任中宣部副部長，四十五歲上吊身亡。據其妻透露，姚溱自縊前反覆翻閱法國文豪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這一點極具諷刺意味。文革初期，南霸天陶鑄北上接任中宣部長，其悲慘下場，在他

●兩岸風雲●

俞國華先生的老生常談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方秋禮



行政院長俞國華先生

最近，台灣政治形勢發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良性變化。繼蔣經國先生毅然宣佈解除黨禁後，俞國華先生又表示即將解除報禁，委實令人為這些明智之舉感到欣慰。

然而，當此之時，同是這位俞國華先生，却又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重彈老調，謂稱：「

女兒陶斯亮的回憶錄中已有詳述，不贅。中宣部在文革時期屬於理當砸爛的「三舊」（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之首，當時中宣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童大林（此人近年來竟成爲改革派要角，可稱奇蹟）悲嘆道：「中宣部難逃農村工作部的厄運了！」（農村工作部因鄧子恢失勢而被撤消）。果然，十年文革

中華民國對中共「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立場，是反共立場的一部份，決不會改變。——他並對此作了早已使人聽厭的解釋：因爲中華民國信奉三民主義國策，走的是自由民主及自由企業的道路，和中共所信奉的反民主、反自由和反對私有制的共產主義是絕對互不相容的。兩者的信念、主義和制度既然如此南轅北轍，自然無法妥協、接觸和談判。他還強調調說，對中共而言，接觸就是給予他們滲透、顛覆的機會；談判就是迫使我們屈居地方政府的地位；妥協更是投降的代名詞，云云。

幾年來，台灣政要反來覆去地重複上述僵化、刻板的論調，連個別字句都少有出入。整個台灣高層宛如一架破損的老式留聲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高唱陳陳相因的老調，不見半點具有進取精神的新意。明明是苟安一隅，不思政治上的進取，却終日聒噪「三民主義模

期間中宣部被這個小組那個小組取代了。華國鋒上台後一度安插其親信張平化爲中宣部長，然張平化僅僅是五日京兆而已……

現在，不孚衆望的王忍之騎上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這個火藥桶。他的結局如何？讓我們拭目以觀！

範省」、「復興基地」之類的囁語，錯失許多介入中國大陸政局的良機。

天地萬物無不變之理。當年國民黨政權作爲中央政府坐鎮金陵，其腐敗不堪聞問；而中共的陝甘寧邊區政府作爲地方割據政權，却頗有欣欣向榮之勢。及至江山易主，中共政權作爲中央政府坐鎮北京，漸被絕對權力腐化，走上國民黨政權的老路；而倉惶渡海的國民黨政權降格爲地方割據政權後，却勵精圖治，成爲舉世矚目的經濟小老虎……。由此觀之，國共兩黨似皆是治省有方、理國乏術的政黨也。中共的「一黨專制」和國民黨的「一黨獨大」都不可能將中國引向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

中國的政治出路在於民主化，而民主政治是多元化的政治。國民黨政權與中共政權進行面對面的談判，必將有利於中國政治民主化，也必將給中國大陸群眾性民主運動增加新的助力。然而，一向視全中國版圖爲已有的國民黨政權，却對進軍中國大陸畏葸不前，實在是貽笑大方。

看來，目前執政的國民黨領袖在這方面是很難有所作爲了。這也難怪：三十幾年前在解放軍天兵天將追殺下的那次大逃亡，使他們至今心有餘悸——不僅怕蛇，也怕井繩。好在國共雙方老朽們來日無多，人們有理由寄望於較年輕也較開明的政壇新秀。

麥樂仁事件給世人的啓示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宋凡

一名「法新社」記者麥樂仁最近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罪名是「從事與記者身份不合的活動」——這是各國政府在間諜事件上的習慣用語。

事件發生後，許多外國記者對此深感不滿。他們聚集在北京外國記者俱樂部開會，以投票方式決定寫信給中國外交部新聞司，要求當局拿出指控麥樂仁的證據，否則應該允許他重返工作崗位。在這封信上簽名的有來自東歐、西歐、日本和北美的四十三名各國記者。

中國政府對此採取了出人意料的強硬態度。外交部拒絕接見遞交這封信的外國記者團，並警告他們不要捲入麥樂仁案。西德「明鏡」週刊記者史蒂芬·西蒙斯說，外交部的態度顯然表明缺乏不利於麥樂仁的證據，其用意是讓我們覺得受到這件事的威脅。

作爲一個來到海外求學的中國留學生，如果站在狹隘的愛國立場上，是會感到一種沙文式的自豪的。百年來，歷屆中國政府軟弱無能，受盡列強欺凌，是所謂「弱國無外交」。而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美蘇兩家爭先示好的對象。她巧妙地利用了這種有利的態勢，取左右逢源之利。美蘇莫奈其何，她卻可以隨心所欲地示以顏色。美國人麥樂仁事件即是最新一例。然而，作爲在中國大陸生活多年而且最終將返回那裏的一名普通公民，却不免心生疑懼。中國大陸素無法治，進入八十年代後雖頒佈若

干法律，却又多是有名無實，令海內外失望。

爲此，當局會屢次掀起所謂「社會主義法制宣傳教育」高潮，並迭次申告天下，以圖改變形象。然而一場學潮之後，保守派大舉反撲，原已取得的某些進步轉眼之間毀于一旦。麥樂仁即是因與天津大學學生林杰保持聯繫而不能見容於當局。在中國大陸，「國家機密」一詞從無確切定義，全隨執政者的意志而轉移。這次

●文藝園地●

(中國大陸詩人·嵐之蔚)

夜雨

夜半的雨
把我從夢中吵醒
門，裝有彈簧鎖的廠雖能擋住
異客，陌生者的脚步闖入
窗和窗帘却不能
關住把夜色洗疲乏了的雨聲
讓它像一個孕婦
獨自在街上嘔吐
喧囂紛亂的城市啊
何時你才能平靜
只有你，紅十字會一般的夢啊
何地才能不被插手打擾
輕柔溫暖的懷抱
幸或不幸的人枕着他踏上無風無波的小島

路

街道靜止地排列
無數條幾何形的路、筆直、彎曲、模糊而清晰
伸展着、首尾銜接、縱橫交錯
向藍天拼寫出「L·I·E」
這勾勒出時間之永恆輪廓的路啊
被四季的手飄然撫觸
用古老而年輕的聲音低訴
比風更不可忽視的悠長的故事
奇譎的霧，雷鳴的光閃
雨的清洗，夕陽的溫情
還有層層疊疊的脚印
走進了黃昏，出現在黎明
……你喜歡這光幻莫測的路麼
但終究走着，把愛帶進夢，或恨，窗外扑簌簌
搖晃的樹
幾何形的無數條路，筆直、彎曲、模糊而清晰
永遠向宇宙深處伸去：「L·I·E」

四十三名外國記者聯署的信函中，要求澄清外國記者在中國工作的權利。他們並希望知道，在中國法律之下，什麼是不能接受的活動？

中國外交部不肯勞神答覆這一問題，原因是他們自己也心中無數。在一個法治不存、長官意志至上的國度裏，凡事都沒有一定之規，任何情況均有可能發生。

像許多類似案件一樣，牽入麥樂仁事件的中國大學生林杰入獄後音訊全無。讓人既不能接受公開審判，也沒有向社會各界自辯的權利。在中國大陸，人權至今得不到起碼的保障。麥樂仁事件是保守派得勢、外交姿態從而變得強硬而僵化的一個象徵。如果中國政局繼續逆轉，估計此類事件將不斷發生。

為大陸民主運動長跑的一條好漢

——郭城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鄭為民



郭城在自由女神像前點燃火炬準備長跑

我要向全世界證明，
中國人有骨氣

「我願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跑遍全球，跑遍每一個有華人居住的國家，去宣傳民主，喚起海內外華人爭取民主自由的信心和意志。如果中國民主運動不能得到勝利，有一天我會宣佈絕食跑，一直跑到死。你們支持我嗎？」受大陸民主運動的觸發，聽過王炳章先生在柏克萊加大分校的演講後，徹夜未眠的大陸留學生郭城，激動地對我們說出了這番話。

我們為這個突然出現的中等身材、相貌平平的大陸同學的獻身精神和毅力所震驚。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正如方勵之所言，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在於鬥爭的軟弱性，崇拜權勢、自私自利。很多人儘管心理上強烈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權，但稍涉危險和一己私利便會退避三舍。然而，今天站在我們面前這位貌不驚人、語不譁衆的北京留學生，甘願拋棄自己學業的燦爛前途，犧牲學業和個人的一切利益，決心做為民主運動奔跑呼號、死而後已的孺子牛，能不使我們為他的出現震驚嗎？

他以為我們的驚呆和敬佩是不相信他，便急切地說：「你們放心，這件事我想了許久，我會說到做到的。我認為學位不能救中國，只

有民主才是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所以，我要用我身上流着的炎黃子孫的熱血和中華民族爭民主的堅定意志去跑。外國人能享受民主，為什麼中國人就不能？我就不服這口氣！我要向全世界證明，中國人有骨氣。所以，路上萬一遇到不測，爬，我也要爬到目標。」

我們都被郭城的民族精神和崇高理想所感染，決定盡我們所能，支持他為大陸民主運動長跑的壯舉，並使他健康地為大陸的民主運動作貢獻。

談起大陸的封建專制，海內外華人無不切齒。提起中華民族的劣根性，很多人也是深惡痛絕。但如何打倒封建專制，根除中華民族的劣根性，則很多人頻頻搖頭，認為這是很遙遠的理想。確實，中華民族這兩個大敵相當強大。但如果中國人能像大陸上街遊行的青年學生、方勵之、劉賓雁以及留學生郭城這樣，那麼存在於中華民族的封建獨裁和劣根性還愁不被迅速打倒嗎？

不能眼看同胞被打擊迫害
而無動於衷

本來，年已三十四歲的郭城，由於出身於右派分子家庭，上山下鄉，受盡了人間苦難，

對中國大陸的官僚政治極其厭惡。來美後，決定安心讀書，了此一生。然而，最近大陸發生的石破天驚的民主運動，使他深受鼓舞，感到中華民族有了新的希望。但隨之而來的對民主運動的攻擊誣蔑，胡耀邦的下台，對知識分子的整肅，使他對大陸當局深為失望。尤其是逮捕民運人士和「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倒行逆施和高壓政策，使他義憤填膺，忍無可忍。他認為作為一個大陸留學生，不能自己在美國享受了民主、自由和人權，就忘記了還生活在貧窮落後狀態中的勞苦大眾。我們不能被美國的

專輯 留學生郭城舉行民主馬拉松長跑

致中共中央、國務院公開信

祖國是你的，也是我的。每個人都有為她說話的權利。這權利每個黃子孫生而有之，絕不是任何政黨賞賜的。

繼今年初中國大陸的學運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胡耀邦被免職，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等大批知識份子被整肅和批判；更為嚴重的是留美學生楊巍和林杰等一批學生和工人身遭逮捕，至今下落不明。四川「劍南文藝」的編輯劉德被判徒刑七年。經濟改革受挫，「人民日報」上又出現了與文化大革命雷同的「帽子」文章，實行以言治罪。現在的中國大陸「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更詳細的消息人人都在世界的報刊上得知，更精闢的理論有待眾多的智者講出。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無論地位高低、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明白這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的實質。人們都在擔憂這政治權勢的鬥爭會影響中國的經濟改革。人們都不會從心裏同意中國人民剛剛收回的一點點民主、自由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被奪走。

雖然歷來我不愛參與任何政治活動，雖然我現已身居海外，生活得不錯。但是我仍然和千千萬萬的海外華人留學生一樣，對國內這場政治地震深感震驚和不安。「位卑未敢忘憂國」，不平則鳴。希望被憂慮所

豐富物質和花花世界弄昏頭腦而忘記了自己應對中華民族所盡的責任和急待支持的大陸民主運動。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不能眼看見自己的同胞遭受種種打擊迫害而無動於衷。他說「一個腰纏萬貫的兒子，如果有一個衣衫襤褸的母親，那麼他永遠會被人咒罵」。我們的祖國還在貧窮落後中，即使我們在美國發了財，拿了博士學位，也會被外族鄙視。所以，他立志用中華民族爭民主的意志和熱血去長跑，期望喚起台灣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民族心和義務感。如果海內外華人都有此心此感，那麼中國土

地上的政治民主就為期不遠了。

當前民主是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再靠幾年前的鎮壓和恐嚇是決不可能抑止十億人民爭民主的步伐。如果中共的領導人還想保持晚節，為十億人民留下不朽功業的話。就請順應民意，在解決封建專制，給人民以民主、自由、人權上多做些實事。這要比論起「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棒打擊自己的同胞強多。須知，「物極必反」，鎮壓羣衆的民主運動，只能激起千千萬萬個郭城式的人物為民主而戰。

擾，對中華民族的責任心逼我不得不說：民主是世界的潮流，也是海內外華人的民心所向。只有政治和經濟改革才是中國的前途。我贊成胡耀邦的解放思想、平反冤案、開拓改革的政治主張。我認為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是正義的，他們的言行代表了十億中國人民的心聲。楊巍、林杰，以及被捕的學生和工人們是無罪的，他們沒有採用暴力去推翻政府，沒有違反憲法，只是採取了合理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願。請不要因為他們參加了爭取民主的學運而以「莫須有」的罪名加害他們。

為請求停止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一大批知識份子的整肅並恢復他們的聲譽和職位，釋放楊巍、林杰以及被抓的學生和工人們，我開始舉行個人的「民主馬拉松環美長跑運動」，以表示為中華民族求民主自由求人權的決心和意志，向全世界表示別的民族能做到的事，中國人也會做到。而且我將呼籲海外華人捐款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營救楊巍、林杰等學生和工人。我們海外同胞絕不會等閒視之。一人有難，萬人相助，這是中華民族歷來的美德，也是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將會做的。

與此同時，我也希望中國政府為楊巍家屬的生活而考慮，也捐一點款項。如果成為事實，我也會把「中國共產黨」的名字掛在胸前的，絕無戲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是千古不變的真理。

因我身經文化大革命，歷來對大塊的理論文章不悅；所以採用這種辛勞的方式和簡單的短文來表達自己的心意，總比說無數美妙的謊言更有利於自己的民族和同胞。

中國大陸留美學生郭城



郭城跑前招開記者會，多家報紙記者出席



郭城由自由女神像開始，一小時跑抵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向中國官員遞交公開信。



社區聞人 楊煥倫(左一)、人權律師李亞倫(左二)、全美支持大陸民運聯合會會長鄭為民(右一)及郭城(右二)合照于記者招待會上。

告各界同胞書 第一號

為支持大陸的民主運動出錢出力，是每一個關心中華民族前途的華人應盡的責任。我們希望在美華人帶頭支持我們發起的「一人一美元」的籌集民主運動基金的活動。

關於籌款的幾個具體問題，聲明如下：

- 一、目的
 1. 營救被捕的民運先驅人士，如魏京生、徐文立、楊巍、劉德等；
 2. 獎勵對大陸民主運動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士和團體。
3. 支持辦好對大陸民運有影響的報章雜誌。
4. 維持長跑必需經費。

二、使用權限

三、管理辦法

如何使用民主運動基金，將由郭城、支持大陸民運聯合會代表鄭為民及律師事務所楊煥倫共同在冠東銀行開戶。帳號是一〇〇〇三四三二。此民運基金由紐約的著名律師李亞倫擔任公信，並定期向報界公佈。

四、誠徵贊助人及贊助團體
捐助五百美元以上者，即為贊助人，其名字將公佈報界，並寫在郭城運動服上。

已有的贊助人：

1. 黃奔(華盛頓) 一千元，並支持一個小臥車。
2. 徐英朗(舊金山) 一千元。
3. 全美支持大陸民主運動聯合會。

五、急需如下幫助

1. 各城市願意幫助我們組織演講會者。
2. 有駕照的自願協助者。
3. 一輛小汽車（能開為準，用後歸還）。
4. 協助辦理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歐洲、台灣、香港、大陸為民主運動長跑的出入境手續。
5. 解決在華盛頓、阿特蘭它、達拉斯、休斯頓、洛杉磯及舊金山及沿途中小城市住宿和歡迎問題。

六、聯繫地址及電話

通信地址：MR. KUO CHEN C/O

ALAN LEE

2 PENNSYLVANIA PLAZA

SUITE 2640 N. Y. 10121

電話：紐約 (212) 564-9496 聯繫人：楊愛倫
舊金山 (415) 969-2835 聯繫人：林心聲

七、捐款辦法

捐款抬頭請寫：MR. KUO CHEN C/O

ALAN LEE

告各界同胞書 第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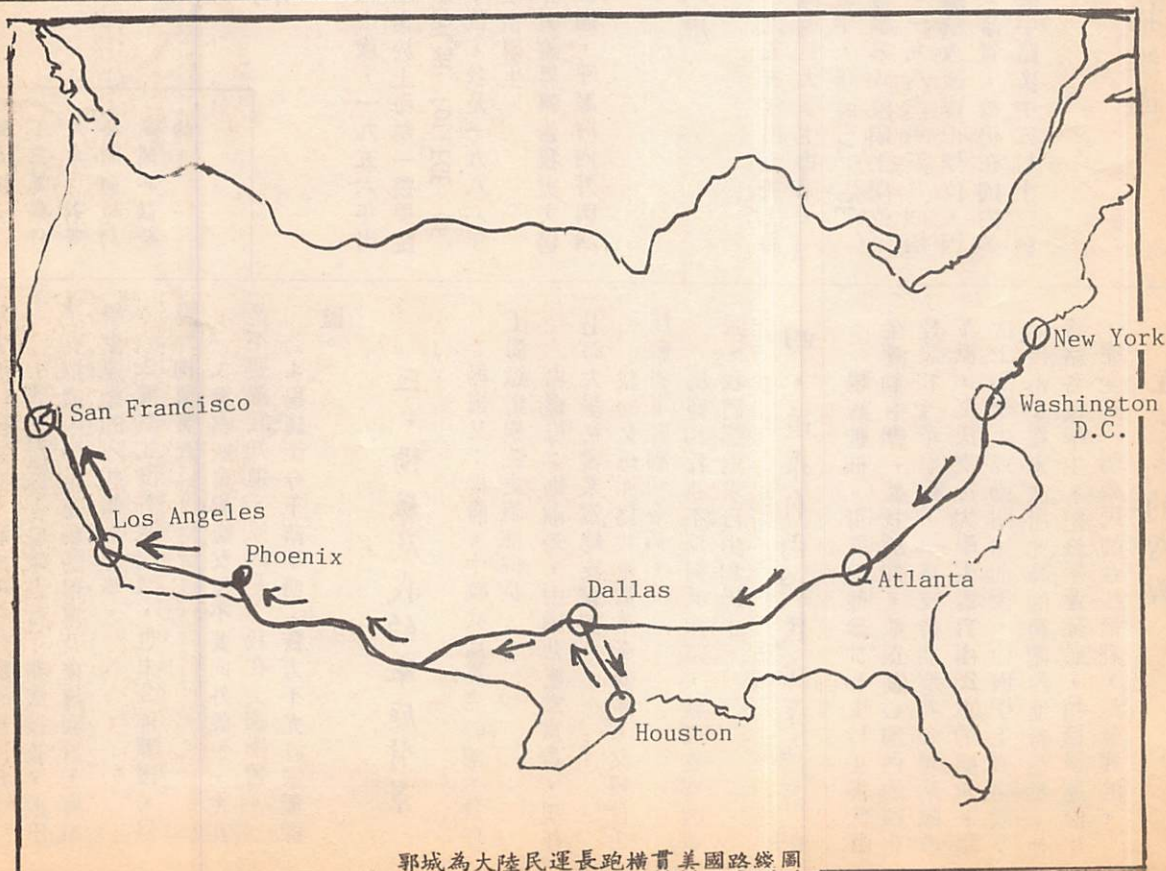
一、大陸留學生郭城為民主運動長跑，第一階段將於三月初在東部紐約起跑。繞美國南部，約經四個月到達西部的舊金山。沿途將經過華盛頓、阿特蘭它、達拉斯、休斯頓、洛杉磯等華人集中的地方。如果其他城市願意歡迎郭城長跑，請通知我們，俾作安排。
第一階段長跑路線，請看下圖。

二、郭城已於二月二十日在自由神像前點燃民主的火炬，通過紐約唐人街跑到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遞交了給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及告各界同胞書（第一號）。

三、近日內郭城將與華人各界廣泛接觸，宣傳民主，為民主運動籌款。

全美支持大陸民主運動聯合會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



郭城為大陸民主運動長跑橫貫美國路線圖

救救我的丈夫

(中國大陸留學生·楊巍的妻子)車少莉



編者按：以下三篇稿件是車少莉等公開向紐約新聞界散發的。

我叫車少莉，今年三十歲，一九五六年出生於上海，一九八三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現在在德州的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攻讀博士學位，我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份來美的自費公派留學生。

現在，我要向全世界輿論界報告我丈夫楊巍在上海被秘密拘捕的經過，呼籲海內外輿論給予聲援與營救。

一·楊巍的簡歷

楊巍，三十一歲，一九五五年出生於上海，一九八一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生物系，一九八三年自費公派來美留學，在 UNIV. OF ARIZONA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系攻讀碩士學位，一九八六年獲碩士學位。一九八六年五月回國與我結婚，並等待來美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因博士生獎學金一事一直未落實，故仍在國內等待。楊巍家住在上海市廣中路廣中五村十三號四〇四室。

二·楊巍的被捕經過

楊巍於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一日在上海父母家中被秘密逮捕。逮捕時有幾點值得注意：

1. 警察對楊巍父母家進行了非法搜查，搜出了支持國內學生運動的傳單及楊巍關於上海市學生運動的一些個人紀錄。
2. 警察並沒有逮捕證，也未公佈罪證，只說「拘留審查」。
3. 警察威脅楊巍父母不要向外聲張，尤其是不容讓我知道，原因是：我在美國學習。

4. 楊巍至今下落不明，警方不允許家屬探監。

三·楊巍及我的家庭背景

楊巍父：楊爵，中國共產黨老幹部，曾任上海鐵道學院走讀部部長。

楊巍母：畢淑筠，中國共產黨黨員，現任上海大學秘書系黨總支書記。

我的父母亦為共產黨革命幹部，父親曾任江蘇省軍區副司令員。

楊巍和我並不反對共產黨，我們支持改革派，我們都追求自由和民主。

四·追求自由與民主是無罪的

楊巍被捕，可能與他參加和支持上海大學學生運動有關。據我所知，他很關心國內的深化改革和改革過程，一貫支持胡耀邦和趙紫陽改革派，堅決支持大學生對自由民主的要求。這次上海學生運動開始前後，他與學生聯絡頗多，但都是在憲法所允許的範圍內進行活動。他聯絡各校學生，紀錄學運經過，拍攝學運照片，完全是一個公民的合法權利，是無罪的。

五·我的觀點

1. 楊巍未做任何違法的事。
2. 上海市公安局逮捕楊巍是不合法律手續的。
3. 上海市公安局威脅楊巍父母不要聲張完全是一種心虛行爲，對我保密更說明了有關當局對出國留學人員的不信任。
4. 逮捕至今，不把楊巍的下落通知家屬是

歸國留學生們的安全何在？

——就楊巍被秘密拘捕一事
致全體大陸留學生的一封信

（楊巍的妻子、妹妹和妹夫）

我們——大陸留學生楊巍的妻子、妹妹和妹夫，懷着震驚與悲痛的心情，向全體大陸留學生披露一件關係到所有歸國留學生們命運的事件。

楊巍，男，三十一歲，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生物系，一九八三年赴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細胞與分子生物學系攻讀研究生，一九八六年暑假回國探親並結婚，因為博士研究生資助問題一時尚未落實，短期留在國內等待，隨時準備返回美國完成博士學位。這期間中國發生了大規模的爭取自由與民主的學生示威遊行。正如一切關心祖國命運前途的青年一樣，楊巍也參加了國內學生的活動，紀錄了遊行實況；拍攝了遊行的場面；並張貼了支持趙紫陽、胡耀邦等黨內改革派以及呼籲堅持改革反對倒退的標語。這些行爲，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每一個公民的正當權利。但令人震驚的是，上海市公安局却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在無任何逮捕證件的情況下，秘密的拘捕了楊巍，

違法的，不人道的，完全是政治迫害。

5. 上海有關當局如此對待歸國留學生，令海外留學生感到膽寒。最近，千餘名留學生發起了簽名運動，我也是簽名者之一。楊巍的命運表明，幾百名簽名的學生回國後都有被迫害的可能，據我所知，很多回國留學生都受到盤問和審查。如此下去，留學生回國後有何安全

無視人權，搜查了楊巍父母在上海的家，搜走了他的私人信件，並且威脅其父母不准向任何人透露楊巍被拘捕審查一事，甚至不讓他的妻子（美國大陸留學生）知道任何消息。一九八七年一月廿一日，即海外發表千人留學生公開信之後，上海市公安局決定以「反革命罪」無限期關押楊巍，並不准其父母探監。

作為楊巍的親人，我們了解楊巍的一切。他不過是一位普通的留學生，他從未有過推翻政府的思想念頭，只不過像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支持改革派，反對守舊派，他同國內大學生一樣要求自由民主，黨內守舊派爲什麼如此不能容忍？我們的父母都是爲黨和政府兢兢業業工作了一輩子的共產黨幹部，專政機關憑什麼理由對他們進行抄家和威脅？

我們有理由爲楊巍的生命安全、前途命運擔憂，我們深知黑暗的拘留所比監獄更加可怕。公安部門不讓他的親人去探望他，我們也不知道他被關押在什麼地方，誰能保證楊巍不會

感可言？

六·我的要求

1. 立即公佈楊巍的案情；
2. 立即無條件釋放楊巍；
3. 希望海內外輿論界給予聲援與營救。

秘密地消失了？誰能忍心等待爲又一個「冤假錯案」平反？人有幾條命？人的一生又有幾十年？天啊，那些駭人聽聞的案件我們中國人聽得太多了。由此，我們聯想到廣大中國留學生的命運，尤其那些在千人「公開信」上簽名者的命運。我們擔心，黨內守舊派逮捕楊巍，是將整肅矛頭擴大到歸國留學生的一個信號。據我們知道，很多歸國留學生都受到專政機關的公開或秘密審查。我們也都是留學生，我們也都在公開信上簽了名（第二批）。我們認爲，楊巍表達的只不過是和我們大家一樣的願望和憂慮，他的所作所爲並未超過我們。

可怕的是大陸在校大學生幾乎無人知曉楊巍被拘捕事件，也正因爲楊巍不屬於任何學校的學生，所以公安部門敢拿楊巍開刀而不遭到國內學生的強烈抗議，避開輿論的壓力。可他們却忘記了楊巍是海外留學生的一員，我們的命運和楊巍的性命緊密相關。因此，我們三人以極度憤慨與悲哀的心情，懇求與呼籲全體海外的大陸留學生們起來救救我們的親人，救救你們的同學與同志。我們懇求大家通過各種渠道向當局詢問楊巍的下落，爲一個有良知的普通留學生說句公道話。

同時我們也強烈抗議黨內守舊派無視人權的做法。楊巍犯的是什麼法？爲什麼如此害怕外界知曉？我們強烈要求將楊巍案情公佈於衆

，人民，包括我們海外留學生有權作出判斷。我們要求不要對楊巍進行人身侮辱與虐待，而且我們的親屬有權進行探望。我們強烈要求上海公安局迅速釋放楊巍。

特輯 留美學生楊巍被捕案及其反響

致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一封信

鄧主任、趙總理：

最近，我們驚悉在國內的親人、歸國留學生楊巍被上海市公安局秘密拘捕。至今，他的家人不知楊巍的關押地點，沒有公開審判，不許探監。我們——楊巍的在美留學的妻子、妹妹和妹夫對此深感不安。

我們確信，楊巍決不會「反革命」，他所反對的僅僅是黨內的一些保守力量。他一貫關心國內的改革過程與四化建設，希望中國繁榮昌盛。他回國後，深為中國改革和建設所取得的成就而歡欣鼓舞，更希望祖國的四化建設取得更輝煌的勝利。正是在這種動機的指導下，他參加了一些國內的學生運動，支持改革與進步，反對保守與倒退。他所做的一切，並沒有超出憲法所給予的權利，更談不上什麼「反革命」罪了。

目前，海外廣大留學生，對國內的局勢深為關注，他們的心情與楊巍是一樣的。楊巍被秘密拘捕，無疑給廣大海外留學生的心靈罩上了一層陰影，使他們在憂慮國家命運的同時，更加上了一層對自己回國後安全的擔心。我們

廣大留學生們，爲了我們歸國的安全，團結起來，爭取中國大陸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我們呼籲大家展開各類營救楊巍的活動，營救楊巍，就是保衛我們每個人的人權！

（楊巍的妻子、妹妹和妹夫）

懇求你們過問楊巍的案子，對楊巍的人身安全予以必要的關注。

我們的父母親，都是為黨工作了多年的老幹部，但到了晚年，却面臨兒子無辜被抓，不知音訊的局面。更不人道的是公安局禁止我們的父母向任何人談及此事，讓他們獨自承擔起

特輯 留美學生楊巍被捕案及其反響

中國官方對楊巍案的正式反應及「營救楊山魏委員會」的立場

● 本刊記者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周純青

中國大陸留學生楊巍在上海因支持學運被捕的消息，經由元月卅一日「華盛頓郵報」、二月一日「紐約時報」和「美聯社」以及各華文報紙披露後，中國官方感到不能再隱藏下去了，被迫正式表態。

二月四日，「美聯社」駐上海記者就楊巍被捕一案詢問了上海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外事辦公室官員王明陽證實，上海公安局已逮捕楊

中國大陸留學生 車少莉（楊巍的妻子）
中國大陸留學生 楊瀟貝（楊巍的妹妹）
中國大陸留學生 余 芒（楊巍的妹夫）
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

全部的痛苦和不安。至今，他們不知道兒子在何處，不許他們去探望，不知兒子可能關到何時。想想看，這對於兩個孤獨的老人的心靈是何等的摧殘！我們懇請你們允許他們去看望自己的兒子，知道關於兒子的一切，以減輕他們的痛苦與不安。

我們相信你們——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能夠明智地考慮此事，能夠理解我們所作所為的良苦用心，儘快釋放楊巍，使他能夠與家人早日團聚，完成他的學業，為祖國的四化努力。

中國大陸留學生 車少莉（楊巍的妻子）
中國大陸留學生 楊瀟貝（楊巍的妹妹）
中國大陸留學生 余 芒（楊巍的妹夫）
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

巍，公安局指控楊巍觸犯了法律。但王明陽說，他不清楚楊巍被控的具體罪名。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教育處官員馬敬平，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留學生集會上，在回答留學生關於楊巍一案的問題時指出：「楊巍因反對『四個堅持』而被捕，反對『四個堅持』就是反革命。」馬敬平的話引起了留學生們的紛紛議論。

中國官方對楊巍被捕案最具權威性的答覆，是中國駐休士頓領事館教育處處長羅福全和官員王嫻文向楊巍的妻子車少莉當面傳達的「正式文件」。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七日晚，王嫻文在中國駐休士頓領事館正式接待了車少莉，告訴她：「國家教委關於楊巍一案，已有正式文件下達。文件的全文是：楊巍因張貼反動標語及大字報、投寄散發反動宣傳品、煽動學生鬧事而依法逮捕。」羅福全和王嫻文都未能說明「反動標語」和「反動宣傳品」的具體內容。

中國官方的上述表態，經新聞界傳播後，在留學生中引起了進一步的議論和疑慮。在美國中部一所大學學習社會科學的中國留學生指

特輯 留美學生楊巍被捕案及其反響

留美學生楊巍在上海被逮捕事件

美國務院及國會皆表示關注

哈佛大學留學生及美籍人士組成營救委員會

〔據《中報》二月十日報導〕由部份中國留學生和美籍人士組成的「營救楊巍委員會」，已於日前透過美國政府機構，展開聲援楊巍的工作。

楊巍在亞利桑納大學獲分子生物學碩士學位。據報導他於去年十二月參加上海學運不久之後，即於今年元月十一日被上海公安局逮捕。

據該委員會六日稱，營救楊巍委員會的代

出：「中國官方給楊巍定的罪名，所用語言都是文革的用語。什麼『張貼反動標語』、『投寄散發反動宣傳品』，都是近年來不曾聽說過的罪名。文革中，因這種罪名而被迫害的人不知有多少。從楊巍一案，可見中國司法最近也在大倒退。」

一位在美東某大學即將結束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已決定在美國尋求居留權。他說：「我本來是想回國的。楊巍一案使我震動很大。我是在千人簽名信上具名的人，回國後難免遭到與楊巍相同的命運。我不是不想回國，但在保守派掌權的狀況下回國，別說業務上沒前途，就是人身安全都保障不了，何必自討苦吃？看看再說吧！」

表丹尼爾·思佛曼 (Daniel Silverman) 博士二月四日和五日專程赴華盛頓為營救楊巍奔走。思佛曼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工作。

「委員會」稱，思佛曼五日上午會見了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處副處長馬繼賢 (Martin)、國務院人權局代表湯姆·摩菲 (Tom Murphy)、國務院中國事務處代表約翰·文則思 (John Waiters) 等，共同開了一個圓桌會議。據「委員會」說，國務院官員在聽取

由楊巍在美親屬發起的「營救楊巍委員會」已向外界表示，他們希望中國官方能提供楊巍案的細節，如張貼了什麼樣的「反動標語和「大字報」、散發了什麼樣的「反動宣傳品」等。「營救楊巍委員會」還向中國官方提出如下合理要求：

一、對楊巍進行公開審判，允許楊巍聘請律師和自我辯護；
二、應允許家屬探監；
三、應允許楊巍與外界、尤其是他的妻子有書信往來；
四、願與中國官方合作，以盡快結束楊巍一案。如果楊巍無罪，應盡快釋放他並允許他返美完成學業。

楊巍案後作如下表示：

一、已得知上海政府證實楊巍被捕的消息。
二、對楊案表示關注，表示密切注意其發展。

三、將通過官方渠道與中國政府接觸，以讓中國政府詳細說明楊被捕的具體原因。

四日和五日思佛曼及一位由紐約赴華盛頓的楊巍的朋友，還走訪了甘迺迪參議員辦公室、眾議員外交委員會人權小組 (主席與 Gus Yatron 眾議員) 和亞太小組 (主席為索拉茲眾議員)，請求營救楊巍。國會有關部門表示，他們已得知楊被捕一事，將會就此事，與中國官方接觸。

另，楊巍屬於中、美生物學教育交流計劃的人員，該計劃的主持人為康乃爾大學生物系吳瑞教授，他已寫信給中國官方，詢問楊巍案的細節。

楊巍原所在學校亞利桑納大學生物學主任
對楊巍一案也表示關切。

楊巍在美留學的復旦大學同學和許多留學生們紛紛打電話給車少莉和余芒。「委員會」說，可見楊巍一案，在留學生中反響很大。

特輯 留美學生楊巍被捕案及其反響

美國參眾兩院關心楊巍案 和中國留學生的命運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劉福致

中國大陸留學生楊巍在上海因參加民運被捕一案，已引起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強烈關注。

一九八七年二月五日，眾議院人權和國際組織小組主席、民主黨議員雅特隆(GUS YATRON)分別致函中國駐美大使韓敘先生和美國國務院，要求澄清楊巍一案。

雅特隆議員致韓敘大使的信函全文如下：
尊敬的大使先生：

今書此函，乃關於中國留學生楊巍被捕一案。楊巍曾在亞利桑那大學學習，原計劃不久返校繼續他的學業。

對返回中國的留美學生採取如此行動，勢將危脅中美兩國的學術自由和表達自由，對此，我表示關注。做為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人權和國際組織小組主席，我請求您與貴國政府的有關部門接觸，轉達我對楊巍一案的關切，並澄清楊案的案情。此外，我希望貴國政府將繼續進行政治

紐約時報週日稱，一群哈佛大學美國人及華人已成立一個名為中美人權協會的組織，展開營救工作。

(轉載自紐約《中報》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

上的開放，並且按照國際法準則，保障中國人民基本的自由與民權。

等候您的回音。

您忠實的 格斯·雅特隆

(人權和國際組織
小組主席)

雅特隆眾議員致國務院主管立法和政府間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愛德華·福克斯(EDWARD FOX)的信函全文如下：

尊敬的助理國務卿先生：

今書此函，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學生示威及該國政府壓制示威一事。我尤其關注的，是楊巍在中國被捕一案。他是亞利桑那大學的學生，並計劃返校完成他的學業。對不能容忍楊巍自由表達意見及不能容忍在美中國留學生的溫和異見一事表示關注的華人，已與我接觸。

做為眾議院人權和國際組織小組主席

，我一直密切關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態發展。我擔心，逮捕楊巍一案，將導致中國留美學生不敢自由表達意見的結果。這類逮捕事件以及最近中國務實派和溫和派領導人的變動表明，中國已倒退到反精神污染運動時期，而且表明北京將對溫和異見者採取清洗態度。

我迫切要求美國國務院對一切蹂躪基本人權的行為表示關注。應鼓勵中國領導人放寬對自由與民權的限制，而任何壓制行為都應引起美國的負面反應。

很期望您關注此事，我很樂意知道國務院對此事的觀點。

您忠實的 格斯·雅特隆

(人權和國際組織
小組主席)

另外，美國參議院共和黨參議員、外交委員會共和黨首席委員赫姆斯(JESSE HELMS)於二月十七日針對中國大陸目前的人權狀況及政治倒退提出一項決議案。該決議案中除了提到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被壓事件外，還特別提到了楊巍被捕案。該決議案建議美國政府採取措施，在中國大陸人權狀況未澄清之前，延長中國大陸留美學生在美的居留時間。

二月十九日，赫姆斯參議員在參院就該決議案發表演說，尋求支持。

赫姆斯參議員的助理、參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顧問崔布列(FRIEDRICH)，對上述決議案向報界做了詳細說明。他說，赫姆斯參議員對留美學生尤其是日前一千多名向中國當局發表公開信的留學生特別關注，他擔心這些學生回國後會受到麻煩。崔布列強調了楊巍被捕案，以說明參院對中國留美學生命運的關切是

有根據的。崔布列指出，赫姆斯參議員的決議案主要要求美國政府對那些因參加和支持民運的中國留學生，給予「延期自動離境」(BX-1)

特輯 留美學生楊巍被捕案及其反响

楊巍案在留學生中引起強烈反响

本刊記者 ●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王明威

楊巍在上海被捕的消息在留學生中傳開後，使大陸留學生因國內政治風雲變幻而產生的憂國之情更是與日俱增；楊巍案在留學生中引起強烈反响。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愛荷華州立大學、密執安大學、休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等校的留學生還為此組織了不同形式的討論，並紛紛詢問中國使領館。大家一致認為，不管楊巍觸犯了何種法律，都應該進行公開審判，應該允許家人探視和中外記者前去採訪。

大陸留學生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公開信的簽名徵集人及推動簽名信的積極分子，對此案更表關切，紛紛致電車少莉，表示同情和安慰。他們告訴車少莉：「你不是孤立的，我們都站在你的背後。」

此外，楊巍在美留學的復旦大學同學和許多其他留學生也紛紛打電話給車少莉和余芒。其他的留學生也議論紛紛，不僅為楊巍擔心，也為自己的前途擔心。

面對留學生的巨大反響和新聞媒體的壓力，中共使領館如針芒在背。他們按上級指示統一了口徑，對外一致說楊巍「違反了國家法律

TENDED VOLUNTARY DEPARTURE)。該決議案的副本已轉交給美國國務院和中國駐美大使館。

。當俄亥俄州大的學生於二月十二日晚問紐約領事館的馬敬平，楊巍究竟犯了什麼罪時，馬則回答，楊反對四個堅持，而反對四個堅持就是反革命。同學們對此很不滿意。

特輯 留美學生楊巍被捕案及其反响

九名留法公費生申請政治庇護

本刊記者 ● (法國) 丁立

在巴黎出刊的一家中文報紙二月十八日稱，巴黎現有九名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因寫信聲援大陸學生民主運動受到中共有關方面警告後，已向法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

中國大陸留法學生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巴黎舉行新年聯歡會時倡議響應國內學生運動，第二天(元旦)一百六十多位留學生群集中國駐法使館教育處，要求公開聲援學運，並在幾大張聲援信上簽滿了姓名。教育參贊王仲達滿臉怒容指責道：「要求民主、自由、人權……這些觀點不都是『中國之春』的嗎！」這話立即引起留學生們的不滿。王參贊又當眾表

楊巍案已在留學生中引起巨大恐慌。特別在美國已經說了一些話、做了一些事的學生，更覺「心裏沒底」，唯恐回國後遭到不測。原訂三月份回國在簽名信上簽名的留學生準備延長留美時間，留在美國觀察動靜，「以觀後效」；也有個別人乾脆就申請了政治庇護。如最近在法國留學的九名學生就申請了政治庇護。面對這種「令人不快的」局面，北京當局應該怎麼辦？我們認為明智之舉是立即放人，解除留學生對回國的恐懼。放得愈早，就愈主動。如果硬撐下去，勢必在留學生中造成更大反響，恐慌就會像連鎖反應似地散佈開來，那時恐怕就不是中共使領館靠統一口徑和到各校遊說就能對付得了的了。

揚一位進修生沒在聲援信上簽名。誰知這位進修生不但不買帳，反而轉身便在信上簽上大名。在衆多留學生的正義要求下，王參贊只得答應將簽滿了名的聲援信轉交國內有關方面。數天後留學生們還在巴黎第七大學舉行座談會，張貼標語、大字報、發起簽名運動，向駐法大使館送交請願書。

但隨着方、王、劉三人被開除出黨，胡耀邦辭職，國內大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局勢急轉直下，部分參與簽名請願的留學生被分別叫到教育處挨批評。留美學生、學者的行動沒有留法的來得快

，直到一月十六日傳出胡耀邦辭職，才積極發動簽名；但留美學生的聲勢大，徵集了一千多名，在美國幾家大中、英文報登載，中文報紙還刊出四百八十二位公開姓名的簽名。據內部可靠消息說，此舉大為震怒中共當局。雖然簽名信以支持改革作基調，却明顯的是一次政治表態，與迫使胡耀邦辭職的黨內守舊勢力劃清界限。中共中央已決定：所有簽名的留學生回國後都得接受審查；是黨員的，都得開除出黨。這些決定悄悄地在留法學生中傳開，引起元旦簽名者的不安。

留美研究生楊巍回國時積極參與上海的學生運動於一月十一日在上海家中遭公安局秘密逮捕的消息二月初經美國的中、美傳播媒介披露後，更引起留法學生的不安。人們紛紛自問：楊巍，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能作什麼呢？不過發表些議論、張貼大字報、參加遊行示威而已。如果這樣，公安局也逮人，實在太過份了。我們這些簽了名的留學生怎麼辦呢？將來回國等待我們的會是什麼呢？王參贊當時不就說我們要求的都是「中國之春」的觀點嗎？平常教育我們，一提「中國之春」，總說他們一夥人是反動、反革命、反華份子，被國民黨收買的特務組織，這下把我們等同了，回去是什麼結局？最輕也少不得審查一番罷！

元旦簽名聲援活動是完全自發的，事前既沒發起人，事後也沒成立推動、負責的組織。令人不安的消息一件一件傳來，簽名者沒了主心骨，不知向誰證實這些消息，不知由誰來承擔責任，更不知由誰和中共使領館負責人交涉。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自救一途了。於是不約而同的尋求了政治庇護，走向不歸路。

九名公費生幾乎同時向法國政府尋求政治庇護，大概是中共建國後破世界紀錄的創舉。

公費留學生都是在各自專業領域內拔尖的人物，學成回國後前程更是輝煌。對於中共「領導」下的子民，尋求政治庇護即意味着「叛國投敵」；要不是身家性命受到威脅，又有幾人願意作出這麼絕決的選擇呢？然而，可以預料的，隨着這九名公費生尋求庇護的消息傳出，各地留學生更覺惶恐不安，勢必有一大批人不旋踵地投入政治避難的行列裡。

人才外留，嘆中華花果飄零！責任誰屬？為政者不可不深思！沒有用手投票的自由，只好用腳投票。如何扼止這股「叛國投敵」的狂

特輯留美學生楊巍被捕案及其反響

為人的存在而奮鬥！

訪楊巍的妻子及親人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邱淳

編者按：據報載，中國大陸留美學生楊巍，因參加去年十二月底的大陸學運，已於一月十一日，被上海公安局秘密逮捕。其妻車少莉向報界披露此事後，引起此間各界人士強烈的反響。美國國會也就此案正式做出反應，保守派參議員赫姆斯並且提出決議案，要求延長中國學生留美時間，以免參加民運的學生遭中國當局逮捕。

本刊收到一讀者邱淳的來稿。邱女士自稱在楊業發生後，曾多次與車少莉（楊巍的妻子）、余芒（楊巍的妹夫）、楊蕭貝（楊巍的妹妹）接觸，出於同情和正義，採訪了他們三人，並將此稿投寄各報社。文中車代表車少莉、余代表余芒、楊代表楊蕭貝，全名為編者所略。

魚雁往返，終締姻緣

邱：楊巍因為參加去年十二月大陸學生運動，被公安局秘密逮捕。此事經各報社披露後

，引起社會人士廣泛的注意和關切。大家想進一步地了解你們。你是否能夠簡單談談，你們由相識、戀愛、結婚到今天的這個過程？

車：我和楊巍的結合在一般人看來可能是很輕率的；我們在結婚之前，根本沒有見過面

潮？相信只要做到下列幾點，並不難。

- 一、向廣大參與簽名的留學生作出保證，保證回國後不受迫害，並施行更開放的留學政策。
- 二、立即停止「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停止迫害知識份子，為最近因學潮被撤職的人平反。
- 三、立即無條件釋放此次學潮被捕的人士
- 四、繼續加快原先改革的步伐。

。所以，我們在剛結婚的時候，我家人都覺得楊巍是一個陌生人。

邱：你們是怎麼認識的？是經人介紹的嗎？

車：是余芒介紹的。余芒是他的大學同學，也是我研究所的同學，對我們兩個人有相當的認識。

邱：你們是靠通信談戀愛的嗎？

車：對。那時候他在美國讀書，課業相當忙碌。不過，他能寫信，他的信既有味道又有深度。他給我的第一封信是寫他的「求偶論」。大致是說，文化水平要高，最好是大學以上的程度。其次，人要心地好，熱於幫助別人。身體也要好，最好是喜歡體育的人。因為，據他的觀察，喜歡體育的人通常比較坦蕩樂觀。致於長相，並不重要。後來想想，覺得這條太含糊了，沒有明確的定義。所以，又加了一個定義說，只要不是公認的醜人；換句話說，如果十個人中有一個人認為不是醜人，就不是公認的醜人。致於女方的性格，是金口難開，還是多言多語的；是安靜文雅，還是活潑開朗的都不重要。最後說，如果這個人還懂得八十年代的新思想，就是大福了。

邱：你們認識多久結婚的？

車：我們通信了一年後，他回國與我結婚。當時，他已完成碩士學位的課程。

邱：結婚後多久，妳先出來？

車：半年以後，他因為還在等獎學金，我在去年十一月份先出來的。

革命家庭，注重民主

邱：妳是楊巍的妹妹，可否先自我介紹一下？

楊：好的。我也是文革以後第一批進大學的學生，畢業後在一所很小的學校教書。八五年到美。

邱：能不能談談妳父母和他們的工作？

楊：我父親叫楊爵，母親叫畢淑筠，目前都已退休在家。我父親以前一直在上海鐵道學院當電訊系主任。母親的工作很多，文革前，在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當教師。文革時曾被下放。文革以後，又回到上海復旦大學文學院工作。

邱：妳父母從小對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期待，常常怎麼教育你們？

楊：我父母對我的期待並不高。主要是對我哥哥期望比較大。他們希望我們好好讀書。文革期間，讀大學是靠推薦，當然我們沒什麼機會。等鄧小平恢復高考制度後，我們已經荒廢了好幾年學業了。總的說，他們的期待主要是希望我哥哥在學術方面能有成就。

邱：有沒有灌輸你們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

楊：當然囉。我父母都是共產黨員，常教導我們要愛勞動、愛社會主義，共產黨把勞動人民解放出來了，所以，要聽黨的話。

邱：所以說你們也是成長在革命的家庭裡。

楊：是的。另外我要強調的是，我們家的民主氣氛是很濃厚的；不管是大人、小孩，只要有意見，都可以自由發言。而且，父母對我們的意見都很尊重。

嗜書如命，樂於助人

邱：就妳對妳哥哥的認識，妳覺得怎樣來形容他是最恰當的？

楊：我覺得如果把我哥哥擺在美國社會來看，並沒什麼特別。但在中國大陸就不一樣了。解放三十年來，人的性格很受壓抑。楊巍是比較有積極性、創造性的人。所以，很多人都覺得楊巍是跟他們不一樣的人。有人說他怪，有人說他是書呆子，有人說他老實。各種說法很多。但共同的感覺是說，他不一樣。

邱：少莉，妳認為楊巍最吸引妳的特質是什麼？他有什麼樣的人生觀？

車：他的人生觀最好他自己的話說。他說，人的存在很渺小，人必須努力奮鬥，使自己的存在實現，被別人承認。他說，奮鬥就帶來孤獨。但他又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好像他很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絲毫沒有虛無感。這點我很羨慕他，覺得他是很幸福的人。

獨立思考，洞燭機先

邱：你是楊巍的妹妹，也是他的大學同學，請你簡單談談你們當時的學習環境。你在求學時期以及後來對楊巍的認識和評斷。

余：是的，我是他的妹妹，也是他在復旦大學四年的同學，同時我們也是室友，所以對他是比較了解的。我們是文革以後，第一批的正規大學生。大家都有種心願，很想在校裡好好學一些東西。也覺得國家落後的狀態應該有所改變。楊巍的表現又比一般人突出。可以說，他是一個很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有他獨特的學習方法。而且，在學術問題上和對國家命運的思考，都有他自己的見解。除了在功課上努力學習之外，對周圍的事情、政治也都比較關心。有個小故事，不僅可以表現是我，而且是全班同學對楊巍的看法。畢業前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有人出了主意，要在紀念冊上給

每個人做個評斷，叫「班級之最」。多數人得到的評語都是比較表面而且不一致的。唯獨在評楊巍的時候，共同的認識是「思路最怪的人」。(笑聲)這就說明楊巍在思考問題時，的確有他獨立的見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邱：是不是說，在當時覺得他怪，但在一段時間後却很同意他的觀點。

余：對的。的確有這種感覺。另外，大家都知道楊巍是非常善良、也非常熱心的人。所以儘管笑話他怪，但心裡却是佩服他的。覺得不管是在學業或其他問題上，楊日後一定會有所作為和成就的。前面提到他很助人為樂。這是他很大的特點。在大陸多數人都是坐公共汽車或騎自行車的。他那輛舊自行車，大家都可以隨便用。這說明，他是比較慷慨的人。另外還有一個小例子。有一年暑假，我們男女同學一起到黃山旅遊。楊巍平常就喜歡打拳，玩單槓，鍛鍊了很棒的身體。我們爬山攜帶的東西，都是他搶着揹。爬山的時候，也總是一個人奔在前面。另外，他學習相當用功，是很講究效率的人，就連爬山也不願浪費時間，他一個人搶先在前頭，拍了許多美景，還說我們走得太慢，好景都沒看到，時間都給浪費了。他一個人先到了山頂上，便坐在亭子裡，拿出書來，研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不但說明他是分秒必爭的人，也能夠說明，他非常助人為樂。

熱愛科學，熱愛祖國

邱：楊巍過去是在亞歷桑那大學分子生物學和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的學生，他回國後也申請了博士班的獎學金，打算再來美國深造。請你談談他在自己專業上的經歷和態度。

車：他對他專業的態度可以說是從不了解

到了解。他在大學時候就是生化專業，而且也學得很好。所以，儘管他覺得自己的專業太過尖端了點，但也很難改變。基本上，他是個熱愛科學的人，他選修過系統工程、計算機等課程，也都修得非常好。

邱：他喜歡讀書是不是從小培養的？

車：我覺得這可能是天性。

邱：他看的書多數是科學方面的嗎？

車：也不是。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從小就有一種數學病。但他文科的書也看得很多。我覺得書是他的命根子。

楊：他看的書很廣，對哲學的書很有興趣。在文革期間，所謂哲學不外是馬克思、列寧之類的書，很少能夠看到西方哲學的書籍。但光是馬列的原著，他就讀了不少，是真正做了一點研究的。另外，因為我媽媽是研究文學的，有一些西方的小說。文革當中，我媽媽都叫我們不要把這些書外傳，甚至叫我們都不要去讀它，怕我們讀了這些西方的小說後，會受毒害。當然，這些都是官方的講法。最主要的，我媽媽怕我們看了這些西方的小說後，會受批判。

邱：你認為形成和支持楊巍一貫的思想、行動的背景和動因是什麼？

車：我覺得是因為他們的家庭相當開明。但是，他家人可能沒想到他會涉及政治問題。因為，他從小就是一付搞科學的樣子。還有，可能就是他父親對他的影響。他父親是個非常明理的人，楊巍有什麼事都會跟他商量。在美國的經歷使楊巍接觸了另外一種社會，他覺得這個社會的運轉是更有效的。

邱：瀟貝，妳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楊：我想多少是受文革的影響。我們父母在文革時都受到一點衝擊，比方，受隔離審查

啦，學生貼批判他們的大字報、下放到農村好幾年啦。那時候，我們住在工人的住宅區。在那個地方，我和我哥哥很受人歧視。所以，我們兩個跟其他小朋友的關係都不是很好的。我們的個性很受壓抑。也許是這樣罷，我們都躲在家裡看書。

邱：少莉，楊巍對祖國的四化和改革的態度如何？

車：他希望中國改革，是毫無疑問的。他希望改革，希望能給許多人提供更多的機會。他說，台灣沒有衛星也沒有火箭，但人家生活比我們好，國民產值比我們高，他認為追求世界尖端的東西在當前的中國大陸並不是特別重要的。

邱：瀟貝，妳是否能夠理解，妳哥哥支持民主運動的精神？

楊：當然能夠理解。我哥哥對國家大事很關心。他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富強。而且，希望每個中國人都有做人的權利，不要像文革時一樣，每個人都講假話。我還記得，我哥哥也喜歡寫詩，他的詩寫得挺好的。那時候，正值文革，他的詩的內容多半是歌頌社會主義的。但即使是這樣的詩，他們學校都說現在出版什麼樣的詩都是不容許的。

余：我覺得楊巍參加學運是相當正常的。本來，大家都可以看到改革已經有一點成效。但現在有人要搞倒退。只要是有點抱負的人，都會關心祖國的命運，關心改革，所以，如有人反過來要搞倒退，誰又能甘心呢？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參加遊行等這些舉動，我覺得是一個正常的、有理性的、愛國的青年的表現。

英雄本色，兒女情長

邱：少莉，妳至今仍支持他的這些做法嗎？

車：實際上，楊巍所做的事是每個有責任感、有血性的中國人該做的事。他所做的是值得的，我沒有什麼理由攔他。可是，我也很替他擔心。

邱：是否妳覺得愛他，就應該尊重他的信仰和追求的目標？

車：是的。我是這樣認為。我想，愛一個人應該幫他去完成他想做的事，幫助他塑造他自己希望最可能成爲的最完美的人，而不是我希望的最完美的人。

邱：滿貝，妳哥哥這次參加學運被捕，妳的心情如何？

楊：當然是很難過。我跟我哥哥從小感情就很好。在我記憶中，從小到大我們就沒吵過架。我哥哥對我也很照顧。我也覺得他很有學問，很崇拜他。

余：他們兄妹的感情是很深的。爲什麼我這樣講呢？我總有個感覺，很少有哥哥願意在他同學面前講他妹妹，誇他妹妹。但楊巍却經常無意識地提到他妹妹。很自然地表現他對妹妹愛護的情感。這也是爲什麼他引起了我對他妹妹的注意力。（笑聲）

邱：他會不會是有意的，有意撮合你們？（笑聲）

余：不會的。因爲楊巍是個書呆子，他不會有意去替他妹妹找丈夫的。而且，我們已經好了一年，楊巍才曉得這件事。從他經常談起他妹妹可以看出，楊巍是很愛護他妹妹的。楊巍的妹妹對楊巍的感情也是很特殊的。她很願

意跟我談小時候哥哥牽著她的手，帶她去玩的事。在她小女孩的心目中，愛人的形象就是她哥哥。（笑聲）

楊：他在罵我了，這點可不可以不要寫？

余：我都不吃醋了，寫有什麼關係？這世界上的男人，在她心目中的地位，第一個是她父親，第二是她的哥哥，第三個才是我。

邱：余芒，你來日方長，你再加油吧。（笑聲）

邱：少莉，妳是否可以談談楊巍被捕以後，妳的心情？

車：楊巍是一個天性敏感的人，往往以理智控制自己。我很擔心他在牢裡會支撐不住，怕他的理智防線會崩潰。楊巍在國內等待獎學金，對他而言已經很不容易了。因爲，他覺得在等待的這段時間裡，會把時間浪費掉了。後來，他找到了他要做的事，但也因此被捕了。我覺得他活得比我有價值，如果有可能，我寧可代他去坐牢。

同舟共濟，支持民運

邱：中國當局已經宣佈楊巍被捕的罪名，包括張貼「反動標語」、散播反動宣傳品。少莉，妳對中國當局的宣佈有什麼看法？

車：我認爲這是不正確的。中國政府不允許他的思想和行動。但他的行動和思想並沒超過憲法中的規定。不應該被安上一「反革命」的罪名。我認爲他的思想是革命的，是希望中國社會進步的，在國內，可以說人人都可以想像楊巍所想的問題，但是敢做的人並不多。好像楊巍並不知道，在中國只能想，不能做。所以他被捕了。

邱：由楊巍被捕的事件來看，你覺得海外留學生，特別是在公開信上簽名的留學生，回國後的安危如何？你對他們有什麼建議？

余：我覺得楊巍的想法和舉動並沒有超過在公開信上簽名的留學生的想法和舉動。我覺得中共當局給他的罪名都是莫須有的。上海公安局的保守份子如此對待楊巍，那麼，我覺得我們這些在公開信簽名的留學生的安危也是值得擔憂的。我相信在公開信上簽名的留學生若置身學運當時的情境，都會挺身而出的。因爲楊巍的命運，的確跟我們大家連接在一起。我覺得留學生們應該起來，營救楊巍。因爲營救楊巍也就是保衛自己的安全。

邱：楊巍被逮捕的事情公諸報端後，各界人士對此事有何反應？

余：我連夜接到電話，大家都對楊巍的事表示關心。對上海公安局保守派的作法，表示強烈的不滿。

車：我還沒回到休斯頓，就已經有很多電話來過了。大家都很表同情。另外，經過某些人士自願爲楊巍的案子四處奔走，目前已經有了一些成效。上海公安局對楊巍父母的態度已經好轉，當局也向外宣佈確實逮捕了楊巍。這些，都令我感到欣慰。

邱：余芒，你希望各界人士給予怎樣的幫助？

余：我希望各界人士，包括廣大留學生，通過各種途徑，包括信件和電話，向當局詢問，並表示關心對楊巍事件的處理和發展。

邱：今天的訪問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上海「一二·一九」大示威實錄

(國內獄中) 楊巍

各報紙、雜誌社：

中國官方正式給楊巍定的罪是張貼「反動標語」、「投寄反動宣傳品」。我認為這種指控是不實的。楊巍確實給我寄過他寫的關於上海學運的記錄，但僅是普通的記錄而已。他的記錄，目的是讓我和海外朋友了解上海學運的一些情況，並沒想公開發表，更沒有所謂「煽動學生鬧事」。現在，為了向外界澄清事實，我決定把楊巍寫給我的「上海學運記錄」公佈出來，讓公眾評斷。

楊巍給我的信及「學運記錄」是否被中國海關查獲，我不知情。但我可以說，楊巍的「學運記錄」代表了他的真實觀點。如果我國政府根據類似「學運記錄」的資料而認定楊巍犯有「張貼反動標語」、「投寄反動宣傳品」的罪名，我希望中國政府能夠理解楊巍關心學運的心情，重新評審楊巍的案情。

車少莉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九日

上海「一二·一九」大示威是以大學生為主導的、空前的一場大規模民主運動。大示威

的起因是這樣的，武漢大學與中國科技大學的大學生因為不滿校方選舉舞弊，起而抗爭，並派人四方串聯。消息傳到上海，交通大學首先起而響應。從十二月十六日起，校園內大字報舖天蓋地，校方悍然指使人去撕毀，造成學生與校保衛部門發生幾次衝突。十七日晚，上海市長江澤民親自到交大與學生代表對話。學生提出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要求未獲滿意答覆，於是就正式決定於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在人民廣場集會。於此同時，同濟、復旦的學生也紛紛行動起來，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同濟的學生頂着校長的「一號禁令」，遊行到復旦，衝破了校方匆匆組織的封鎖綫，受到了學生們的熱烈歡迎，人們稱此為大示威前的預演。

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大街小巷的里弄幹部都忙碌起來，「他（她）」們走訪各家各戶，尤其是走訪有大專生、大學職工的家庭，傳達「上級指示」，說明天下午二點，大學生將在人民廣場鬧事，希望「廣大青年」提高警惕，勿受人利用，別到人民廣場去「看熱鬧」，（不說不許參加，大概是普法教育「後的」成果）。於是靠着這個中國式的、最有效的廣告系統，大學生「鬧事」的時間、地點傳遍了上海

的千家萬戶。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二點三十分，筆者趕到人民廣場（由於上海交通十分擁擠，筆者比里弄幹部通知的時間晚到了），廣場中心已聚集了三、五百人，主要是大學生，在東一團西一簇地交談。交大的學生正在介紹他們那天晚上與江澤民市長的交鋒。三五成群的警察臉色冷漠。三點左右，在一片喊聲中，人群中忽然打起了「上海交通大學」的大紅旗，幾塊標語同時豎起。瞬息間，大批學生和市民從四面八方奔來，一下聚起上萬人，在上海人大大樓前的鐵籬笆外擠得水泄不通。標語上寫着「打倒官僚主義」、「爭取自由，民主永存」、「自由民主萬歲」、「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等。走上三五步就可看到一架照相機，估計照相機總數在一百架以上，人群中還有少量外國人，用英語與學生交談。鐵籬笆內，警察東跑西顛，忽聚忽散，引起大家一陣陣噓聲和轟笑。

在運動主持者的呼籲下，擁擠的人群慢慢地後退，坐下，時而高呼口號，時而齊聲唱歌。四點左右，復旦和同濟的學生大批趕到（因為交通擁擠而來遲），受到了在場者雷鳴般的掌聲歡迎。兩校的大學生沒有紅旗，便以薄板寫上「復旦」、「同濟」字樣。他們的標語中有「取消報刊檢查」、「開放禁片禁書」、「民主萬歲」、「同學們讓我們一起前進！」等。各校組織者不斷向現場的警方交涉，要求去叫江澤民市長來見學生，不要害怕民衆，要求提供高音喇叭。學生們齊呼「要喇叭！要喇叭！要喇叭！」，偶而齊呼「往後退，快坐下」以維護秩序。學生中除了以交大、同濟、復旦為主之外，幾乎每個高校都有學生個人趕到，相互介紹。人群中到處都有人拍照，有的拍慷慨激昂的組織者，有的拍情緒熱烈的學生們，有的拍忙

疎的警察群。市人大大樓的三層，幾乎每個窗戶口都有人往外看，據說這是正在開會的人大代表們。但是這會兒他們誰也沒開會，都在往外看，偶而有幾個人拿出照相機來拍攝。

五點左右，學生們不滿官方的拖延不見策略，一個個爬進了鐵籬笆，湧上了大樓台階。不一會兒，各面標語旗幟都進了籬笆，在大樓門庭處揮舞（此時我也翻入了籬笆）。外面的學生興奮地大喊，打出V型手勢。警方數次阻止人們翻入，最後乾脆登上籬笆組成人牆。但不到半分鐘，裡面的同學就紛紛把警察從籬笆上拖將下來！警察的人牆垮了，人群如決堤之水般地漫過，瞬間淹沒了大樓門庭。學生們攀着一樓的窗戶叫着「官僚們，快出來對話」，幾個憤怒的北方同學叫着要砸窗子，但被更多的同學阻止了。



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在看大字報

眼看學生與警察的對抗要升級，警方人員開來了一輛廣播車（約五點半），一個聲音在喇叭中叫道：「同學們，大樓的廣播設備壞了，我們為大家借來了廣播車（人群歡呼），請各校運動的組織者來講話。在學生代表講話前，我先說幾句——」，「你是誰？」學生大聲問，「我是此地工作人員。」嘩！學生的怒吼和笑罵聲壓倒了高音喇叭，那個便衣「工作人員」只好讓位。

交大、同濟、復旦的代表在話筒裡講話了，他們一方面要求學生們保持理智，維持秩序，保衛運動成果。另一方面提出了各項要求——以同濟的五點聲明為代表：一、要求江澤民市長到場見面對話；二、要求承認學生有貼大字報的言論自由，有遊行集會自由；三、要求承認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正義的民主運動；四、要求報紙、電台如實報導這次示威，以體現新聞自由；五、要求保證每一個運動參加者的人身安全，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迫害。每唸一條，人群中即爆發出「對」的喊聲，聲音響徹雲霄。朗讀者激動得嗓子發啞，聽者也有激動得流淚的。

天暗下來後，黑壓壓的人群中閃光燈此起彼伏。一面用白色窗布改製的標語旗在人們手中傳遞，旗上寫着「爭取民主，自由萬歲」，人們紛紛拿着旗幟攝影留念。有的故意將成排的警察作為背景攝入鏡頭。

我忽然發現人群外停着好幾輛大客車，都是各校方派來「引導」學生回校的。我登上了同濟的車。幾個幹部模樣的人還在車外大叫「同濟的同學請上車」，但是不敢跨向人群。車上的學生大都是已經餓了或無處解手的，催道：「再不開車我們又要下車啦！」於是車開了。開出廣場時發現不知何時起，警方已在廣

場兩端佈置了封鎖綫，嚴禁一切人車進入，大批人群被阻擋在外。學生們在車上對警察極力譴責。

車在南京路上開着，在外灘開着，車內同學們還在興奮地講着半天的鬥爭。一個男生眉飛色舞地描繪自己怎樣一口氣從籬笆上拖下三個警察。另一些學生則在談晚上還要複習功課，以應付明天的考試。我在默默地總結今天示威的特點：一是規模大，廣場上人數絕對超過一萬，有人估計是三萬。照相機前後約二百多架。據說交大學生幾乎傾巢而出。二是膽子大，學生在大批警察中穿行，高談，旁若無人，不怕誰來監視。三是目標集中，始終談的是民主，自由。儘管三天前剛發生印度在西藏南建邦事件，但學生們沒有提出民族主義口號，這與去年北京的九一八遊行不大相同。四是秩序好，學生們自動維護秩序，大片人聽令坐下，沒有發生爭吵和傷人事件。與警察的鬥爭也很有分寸，沒有發生不必要的戰鬥。這些都說明中國大學生的民主運動正在向更高的水平發展。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補記：十二月二十日事態繼續擴大，據說昨晚學生在人民廣場通宵示威。警察於凌晨五點至六點在外灘與學生發生衝突，有人受傷，詳情待核實。目前外灘汽車已不通，人潮洶湧如過節，路中間欄杆皆被擠倒，市政府等機關大門口警察林立，高懸告示，曰衝擊政府機關將觸犯刑法一五八條云云，人民廣場交通斷絕。我越過警察綫入內，見全市各校的標幟都已出現，警察比昨天增加兩倍，看來學生又將通宵示威，上海市民交談中絕大多數對學生抱同情態度，隨時準備為學生吶喊助威。

——記於十二月二十日晚

決戰前夕的沉寂與準備

中國大陸二月份政情分析

●本刊記者●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馳遼

一、黨報耐人深思的現象

自上月胡耀邦去職，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知識分子遭到整肅後，中共高層的權爭正密鑼緊鼓地進行着。改革派雖遭到胡耀邦去職的巨大挫折，但胡的班底之殘餘力量和趙紫陽系的中共各級領導，却進行着頑強的保衛改革成果之戰，並在中央人事安排和輿論宣傳上，進行着激烈的較量。

這一切，在中共控制的幾家重要報紙，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北京日報」上已有明顯的反映。如果稍為注意中共報紙最近的輿論宣傳，人們就會發現，今天是這樣的調子，明天是那樣的調子，過幾天，可能又是一種新調子。昨天趙紫陽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有節制，不能擴大化；今天彭真或鄧力群又發表講話，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重要性，要堅持和加強社會主義教育；明天，鄧小平就說，反自由化運動只限於黨內，不影響改革開放政策，不在經濟領域搞。

怎樣解釋這種現象呢？從理論上講，這是極權專制制度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必然會因過份緊束而出現的一種癱瘓現象。具體的辦事機構在中央出現分歧時，就不敢承擔責任。各報編輯，在中央的權力鬥爭未能塵埃落定之時，完全採取一種觀望策略。他們無法斷定誰勝誰

負，爲了保護自己，他們只好採取一種順從的做法，不向任何一派靠。上面不管是誰，給了我什麼樣的指示，我就寫什麼樣的文章。趙紫陽的指示我聽，鄧力群的指示我也聽，只要上面有人指示了，就可以推卸責任說，這是誰讓我這麼做的。

從近一個月官方報刊前後矛盾的現象看，輿論鬥爭主要發生於現仍在權位上的趙紫陽和保守的陳雲、薄一波、鄧力群之間。趙紫陽竭力抵制「反自由化運動」，使之侷限在黨內和思想領域，不讓擴大到經濟領域中去；與此相反，彭真、鄧力群等人則甚囂塵上地鼓吹「四個堅持」，改革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等，企圖把反自由化運動擴大到全國各個領域中去。

現在北京市內各種謠言紛起，就像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前夕的情況一樣，有各種各樣的猜測在社會上流行，這反映出人民對中央上層權力鬥爭的擔憂與不滿。人民已經預感到，一場新的大變動就要到來。有人講「老鄧已經起不了什麼作用了」，又有人講「陳雲已經逝世」，還有說真正的實力人物李先念「正在坐山觀虎鬥」，想在兩派大傷元氣後，出來摘桃子。有人說胡耀邦是「被人硬逼到醫院去的」，等等，什麼樣的說法都有。

不過，有一點是最難預料的，即趙紫陽現在手裡握着兩個棋子，一個是總理的位子，一個是總書記的位子。故可以說這盤棋還沒有擺

開，各派還在那裡運籌籌策。如果說，趙紫陽確定了總書記還是總理一個職務，那麼另一步棋就要跟着下起來，全盤棋才能走活。這樣，全國形勢就會出現很大的變化。現在，趙紫陽一手握着一個棋子，難於決斷出那隻手的爲好。中共高層其它派別，也在焦慮地觀望和等待。

二、總書記、總理人選的大爭論

目前趙紫陽是代理總書記職務，但是內部傳出消息說，趙紫陽不願意放棄總理職位，因爲那是保守派架空他的陰謀，趙離開國務院就等於與他的班底分開，地位難保。故趙紫陽可能堅持繼續做他的總理，而暫代總書記之職，待中央各派達成妥協，確定誰接總書記時，就交出去。

現在可能的總書記人選有下述幾個人：一是習仲勛。習是元老派中勢頭較強的一個。習仲勛原是高崗的人，資格很老，在毛澤東整肅了所謂「高饒反黨聯盟」後，習仲勛的政治行情幾十年裡一直不順。在鄧小平七八年重新獲得權力後，習仲勛又被起用，且成了鄧左右的少數幾位親信之一。現在習仲勛可能接任總書記，做爲過渡接班，待中央選定新的接班人後，再行轉讓。習仲勛接總書記，各派也都能接受。

另外一種說法認爲楊尚昆可能接總書記。

楊目前是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屬第二號實權人物。楊本人有意接總書記職，這樣可以進政治局常委。鄧也考慮目前中國局勢不夠穩定，誰接總書記，都會像胡耀邦那樣，得不到軍隊的支持而垮掉，不如先讓楊尚昆來接，這樣軍隊穩定了，「黨指揮槍」的原則才有可能保持，無人再敢挑剔。

還有一種說法是鄧力群要接總書記，自胡耀邦去職以來，中共高層除彭真外，最活躍的就是鄧力群。而且，中共的所有保守派人士都支持鄧力群，因為鄧力群是保守派鳴鑼打鼓的幹將。

所以，現在在總書記人選問題上，中共是群雄逐鹿中原，然鹿死誰手，還要看一段時間才會明朗。但估計最大的可能性是找一個各派都能接受的平衡人物來過渡一下混亂的政治局面，此一可能性最大。

此外，總理的人選也在大爭論。趙紫陽雖有可能繼續做總理，但按照憲法規定，他只能做兩屆，很快就要到期。那麼誰來接總理呢？目前守舊勢力正在極力促成留蘇派的李鵬來接這一職務，目前已經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因為李鵬接了總理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動向都很有可能向蘇聯偏而疏遠西方。

而趙紫陽則極力想把他從四川帶到京裡來的理財專家田紀雲提拔上去，但是目前的形勢對這一舉措有諸多不利。因為前一段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遇到問題後，保守派把責任推在了田紀雲的身上，所以田已予人以把柄了，接總理班的難度非常大。

三、老鄧的權威地位已失，動向受注目

不管此次胡耀邦下台，老鄧採取怎樣的態

度，鄧的權威此次因其選定的接班人下台而大打折扣了，鄧在民衆中以及海外的威信也大大下降了。人們說老鄧是「老邁智昏，晚節不保」，甚至稱他為毛澤東第二、毛二世。鄧小平此次年初整肅知識分子，撤換了胡耀邦的作法，完全是在承襲毛澤東晚年的衣鉢。

同時，人們可以看出，鄧小平完全控制中國政治局勢的能力，已經大大地減弱了。近一個月來，老鄧的動向尤其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從一月中旬到現在為止，老鄧始終沒有出面。有人說老鄧已心力交瘁，打算放棄第一號人物的地位了。有人說，老鄧正在調動安排重新樹立一個接班人；還有人說，老鄧已被彭真架空，正準備與彭真做一搏鬥，兩人之間的矛盾正在擴大。

由老鄧一葉知秋。中共元老派的幾個巨頭，只有彭真似乎蹦得最歡，但也好像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了。陳雲已經病入膏肓，李先念也正在療養之中。可見中共一代元老的日子，都不會很久了。儘管目前他們仍然大權在握，但終究不會成仙，挨不了幾年了。這就是中國人治的悲劇。幾個老病夫只要活着，就能使中國的政治停滯下來。從醫學上講，這幾位八十多歲的人，頭腦已經開始退化了，還在掌握着中國的命運。

四、反自由化受到人民的廣泛抵制

現在中共保守派正在極力鼓吹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但遭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抵制。這種形勢很像一九八三年底，鄧力群搞「清除精神污染」時候的情況一樣。社會上充滿了反感和厭惡的情緒。據說在傳達文件時黨委書記經常被下面的噓聲打斷。討論的時候，

大家都以嘲弄的口吻去聊天。

從全國的局面看來，反自由化運動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儘管中央控制的報紙每天在那裡大做文章，但下面對這些姚文元式的文章根本不予理睬。當然，有些單位的極左分子、黨委書記，也在借機反攻倒算，公報私仇，大整改革家和敢言的知識分子。

特別是山西、湖南兩省，極左派尤為猖獗。山西省的學生、工人在二月裡仍舉行了一定規模的示威活動。故山西省委發出指示，要嚴厲「鎮壓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挑戰」，並向全國提議將學生送往工廠農村勞動改造，名為讓學生「了解中國社會實際情況」，重彈毛澤東「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的老調。湖南在毛派毛致用的安排下，也大搞極左整肅活動。毛致用的活動以及王海蓉的再出現，說明毛派有死灰復燃的可能性。

五、學生及民主力量的準備

自從今年初，中共連續下達了一二三四號文件以來，形勢驟變，鄧小平揚言「必要時可以流血」，至此，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再也沒有發生。有人認為學運被徹底鎮壓下去了，但實際情形並非如此。中國的學潮是有特定日期的，如一二九、四五、五四、九一八這樣的日子，很容易爆發學潮。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學校放寒假，北方的學校暖氣都停了。故放假學生一散，學潮也自然告一段落。

民主運動具有很多形式。上街遊行是一種形式；互相串聯、搞沙龍活動又是一種形式；經過一場大學潮，靜下來反省一下總結經驗，也是必要的工作。據說，寒假期間北京、上海的許多大學生，到工人中去串聯、鼓動，在社

會上與市民溝通思想，爭取在下次學運中，得到市民和工人的參與支持。所以，目前表面上看，學潮過去了，但這只是暴風雨之前的寧靜。學生、民運力量和改革派都在進行準備，新的高潮很快就會出現。

一個重要的理由是，導致這次學潮以及中共黨內外政治改革的社會矛盾並沒有解決，所以還會導致新的民主潮。至於需要多長時間的準備和醞釀，新的民運高潮才會爆發，現在很難預料。我們估計在四月五號、五月四號、或九一八，都有可能出現新的高潮。但是透過中共報紙，我們看到，保守派已經開始嚴密佈置，防止在這樣一些敏感的日子再發生新的學潮。

六、胡耀邦可能東山再起

國內有一種自「清污」以來就有的奇怪現象，即中共批判誰，誰的威信就會提高。胡耀邦自七九年以來，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高。這與文革初期毛澤東批判劉少奇，以及文革後，鄧小平搞垮華國峯時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照。因為胡此次的失勢，就像鄧小平七六年清明節失勢一樣，與民心形成了一致的關係，故人們認為，目前不能排除胡耀邦有東山再起的可能性。鄧小平正走着毛澤東晚年的老路，而胡耀邦也似乎正走着鄧小平在文革後期的老路。

另外一個因素是胡耀邦本身的條件。胡氏畢竟在黨內經營了好幾年。各省市乃至各大軍區，都有胡的很大勢力，不是輕而易舉地就能肅清的。共青团系統的人，很不甘心在這次運動中的失敗，他們比保守派年輕，正在忍辱負重地等待新的時機到來。故在鄧小平、彭真之

後，胡耀邦最有可能重新抬頭，恢復失去的權力。

當然，胡耀邦目前正面臨着很大的危險。胡耀邦住進了三〇一解放軍總醫院，有幾種可能的猜測：一是胡耀邦本人稱病避禍。中共權力鬥爭史上，很多人在政治行情不利時，都採取這種方式，林彪、康生最長此計。但是，從胡氏本人的性格來看，此次住院，不像在採取這種策略。另一種猜測，胡耀邦是被逼進三〇一醫院的。根據這種猜測，胡的處境則十分危險。三〇一總醫院是個神秘的去處，說它神秘，是因為很多中共老幹部，在這裡不明不白地神秘死掉了。陳毅元帥便是一例。中共保守派是很想把胡置於死地而後快的。

人們都知道，胡耀邦直到去年底，身體都一直很好，怎麼會突然住院了呢？此事必有玄機。

七、各派暗中聚集力量 等待決戰

現在中共的局勢很有意思，不論那一派都在等，都不願意先下手去給對立的一方致命的打擊。因為誰都難操勝卷。老鄧健在，還是一棵腐朽了、但沒有倒掉的大樹。所以，各派之間也互相關心地做一定程度的妥協。如這次胡耀邦雖然辭了總書記職，但仍然保留着政治局常委一席，從排名第二變成排名第五。現在也沒有立刻把胡啓立等胡耀邦班底一下子搞掉，他們還有一定的迴旋餘地。

再如，趙紫陽在此次政局動盪裡，也沒有很強烈地抵制守舊派的倒行逆施，只是設下各種限制，防止擴大化，也都是緩衝的方式。

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目前各派都在等待最後的機會，誰都不願意把自己的意圖暴露太

多，以免在未來的決戰中處於被動地位。而且中高級幹部也都沒有形成清楚的陣營分野，大家都不知道誰會佔上風。

而社會上的民運力量，也都認為目前的時機尚未成熟，也不願意把力量過份暴露出來做最後一搏。大家意識到，在鄧小平去見馬克思後，社會上各派政治力量，都會進行重新組合，那時真正的較量才開始。

但是，各派都在加緊進行暗連密訪，各種社會沙龍也在進行周密計劃。傳說各大軍區新近提拔起來的高級指揮官，與保守的中央和中央軍委意見並不一致。他們是跟着胡耀邦一道才走運的，才得到迅速提拔的。如果沒有胡耀邦的裁軍計劃和實施幹部年輕化的措施，他們這輩子都很難爬上高座，非等老軍人們死掉，茅坑才能讓出來。故最近楊尚昆、彭真等人正號召軍隊要保衛社會主義體制，這說明中央的幾個元老並不能夠完全控制軍隊。

目前的大陸正處在一個決戰前夕的準備狀態，好像很沉寂，但一場大風暴會在老鄧死後，甚至老鄧死前突然到來。中國政局的這場大動亂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目前，民主運動正在進行幾個方面的準備。第一就是理論和思想方面的準備，對局勢要有準確的把握和分析。第二就是要進行組織上的準備，要儘量擴大發展組織力量，在國內建立更多的據點，以沙龍的形式聚集社會精英。第三就是要進行財力方面的準備，要在海外多聚集一些錢財，以便急需。這三方面，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準備，爭取更多的人投入到民運行列中來。要通過宣傳，讓大家了解共產黨外強中乾的本質，看到未來中國有可能出現戲劇性的政局變化，我們努力把這變成一場喜劇，一場民主化的喜劇！

中國大陸留美學生發表

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

編者按：繼一九八七年一月千人簽名上書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後（見本刊總四十五期五十頁），八七年二月又有一批留學生聯署此封公開信。

這次參加簽名的共有七十二所學校的六百八十二名同學，其中願意公佈姓名的有兩百一十九人。

本刊發表的名單是轉載自紐約發行的報章。

以下是公開信全文：

中共中央、國務院：

我們這些在海外的公、自費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們十分關切近來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們難以理解在學生遊行已經平息之後，中央為什麼反而採取一系列嚴厲措施，使胡耀邦總書記突然去職，並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進行懲罰處置。這種突然變化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深的憂慮。

(一)自粉碎四人幫以來，胡耀邦同志為我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平反冤假錯案、開拓改革局面，以及在文化思想領域創造寬鬆氣氛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去職將極大地損傷全國人民進行改革與建設四化的積極性，使我們感到震驚和不安。

(二)對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等人的處置

和批判，在國內外都使人感到這是打擊知識分子、壓制思想解放歷史悲劇之重演。這種做法不僅失信於民，大大降低了黨和政府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而且動搖了我國政策的穩定性與連續性，嚴重損害了我國的國際形象，這不利於安定團結、不利於民主與法制的建設、不利於發展對外經濟合作，也不利於祖國的統一大業。

(三)在黨的報刊上，又出現了對人們的言論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的現象，使我們感到打棍子、扣帽子、抓辮子的極左的作法又重新統治了宣傳與思想文化領域。這種作法，使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中國學生對我國的經濟與政治改革前景深感不安。我們擔心文革中流行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政治局面再次出現。

我們以為，近來事態的發展是與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國策背道而馳的，並使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等權利受到了嚴重侵犯，發展下去會斷送我國的經濟政治改革。

國家興亡，人人有責。我們強烈期望黨和政府堅持改革，反對倒退，堅持民主法制，反對以言治罪。出於對祖國的責任感我們認為不能不公開向中央和國務院表達我們的心聲。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

第二批簽字者名單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公佈)

編者按：這裡公佈的是第二批簽名者名單。第三批簽名運動還在繼續。新簽名者可將名單寄給第二批簽名者聯絡人員（電話、地址見本刊四十五期五十三頁）。原公開信上附的六點聲明，是個別人私自加上去的（詳見本刊上期說明）。

以下是各校簽名者名單（校名後括弧中的兩個數字，前者為願意公佈姓名者的人數，後者為參加簽名但不願公佈姓名者的人數。惟均由所在院校的聯絡員核實作證。）：

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翰校區（一，〇）吳琪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〇，三）

亞特蘭大大學（一，〇）鄭赤。

阿罕布拉成人學校（一，〇）高金林。

貝勒醫學院（一，〇）車少莉。

波士頓學院（一，〇）楊存輝。

伯明翰大學（一，〇）韓健。

紐約布魯克林學院（〇，三）

布蘭岱斯大學（一，〇）志華。

加州州立大學北嶺校區（一，〇）韓山。

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八，卅九）徐國民

、陳建、李慧章、梁杰、林海、劉高、陶宙、

鄭玉璽。

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二，五）徐邦泰、

周國強。

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二〇,一六)韓玉明、韓珉、鍾曉輝、王衛東、王興波、熊豫生、吳銀東、沈東明、王學保、夏海驥、胡世眞、林鋒、宋蜀渝、李國新、李學新、曹紅、張月素、馮大淦、王左峰、劉松喬。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二,六)顧小敏,唐三一。

卡內基梅隆大學(九,三)王建生、王雲、張劍清、黃思明、王韋、貝世鈞、章雪清、黃小力、李宗雨。

凱斯西方儲備大學(一,〇)王力。

美國天主教大學(〇,一)

紐約市立學院(一,〇)任光宇。

紐約市立大學(三,〇)張絹子、蔡俊修、張麗紛。

康乃爾大學(一,〇)楊躍。

杜克大學(一,一八)方渡飛。

喬治亞理工學院和艾摩瑞大學(一,一六)王權長。

喬治亞州立大學(〇,二〇)

哈佛大學(三,〇)李援民、麒一青、顧自由。

休士頓大學(六,三)黃鳴、姜玲、林昕、廖冰、黃志軍、何之恭。

印地安那大學(二,五四)余芒、楊瀟貝。

紐約國際攝影中心(一,〇)石志民。

魯普大學(一,〇)劉卡林。

路易斯維爾大學(九,二〇)段清德、黃強、黃松、馮琦、馬凡鳳、武進、喻啓甦、朱益民、朱重遠。

瑪莎葛蘭姆現代舞蹈學校(一,〇)文勤勤。

馬利蘭大學(一三,二三)吳超、張秀琴

賈申、博林、蔡海松、辜嘉瑜、曾明、袁曉平、包建中、尤志平、熊小雄、陳抗、張預純。

麻薩諸塞大學(一,五)劉軍。

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校區(二,〇)陳永赤、劉曉青。

新罕普夏大學(一,〇)楊光。

紐約理工學院(〇,二)

紐約大學(二,〇)顏文亮、龐龍。

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校區(〇,一)

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二,三)葉方舟、方鶯。

東北大學(〇,一)

俄亥俄州立大學(一六,一八)關普華、沈志勇、楊秀生、劉曉輝、陳衛東、瞿潭霞、魯勇、劉毅、曾曉成、林立特、吳珉珉、曾韶

氣、王志強、袁綏華、謝漢文、莫意長。

奧克拉荷馬大學(四,二)劉希凡、陸瑞良、唐克仁、章安眞。

奧勒岡州立大學(九,十一)丁雲貴、洪海、楊明輝、唐志強、陳曉、肖光、楊崇合、金曦、楊雪珊。

佩斯大學(〇,一)

賓州州立大學(二,〇)陳先、張啓東。

匹茲堡大學(二,一)唐軍、王聰。

普林斯頓大學(八,一)李小青、鄒舟、蘇玻、楊頡、陳幼林、梁守丹、韓小鋒、李國英。

普渡大學(〇,十一)

潤塞拉夫理工學院(〇,十九)

萊斯大學(二,二)沈天祥、陳健。

威岩、張奇偉。

聖卡雷頓高中(一,〇)彭青。

舊金山州立大學(一,〇)張學人。

舊金山大學(〇,三)

灣區其他學校(三,一)馮鎮賓、柳天樹、夏麗。

南伊利諾大學(二,〇)曾易生、俞曉陽。

史蒂芬斯科技學院(一,一)黃漢丁。

德州農業機械大學(八,〇)畢道深、屠海若、石路、陳雷、李波、裘世躍、沈翔、李鋒。

德州大學阿靈頓校區(一,〇)張仁佑。

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三,一五)吳小憲、楊仲俠、劉繼海。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〇,二〇)

猶他州立大學(一,〇)隆輝。

猶他大學(一,〇)徐衛龍。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卅八,二三)

莫峰、袁卡佳、皮洪、傅敏躍、田林竹、潘忠黨、方彥、朱效燕、唐儉、劉浩立、王建平、薛求真、王晴、王炳成、趙曠、胡向東、邱岫

胡儉、震亞、吳名、劉雲仁、何平、顧亦軍、謝宇、黃小冬、沈一農、劉捷、單龍鋼、楊嘉林、嚴敬德、倪軍、雷寧、呂丹竹、張肅、張培蘇、左躍、陳興宇、王浩。

威斯康辛大學密瓦基校區(〇,一七)

維吉尼亞理工學院和州立大學(〇,一六)

華盛頓大學(六,四一)葉坦、卜眞偉、巫虹、單曉東、冷健、于新生。

給中共黨員大眾的公開信

● 本文作者放棄版權，歡迎報刊轉載 ●

(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 許倬雲

文革十年浩劫之後，人心厭亂，容易有了幾年喘息的時間。這幾個月來，隨着學生運動之後，你們又看到了上層的爭權鬭爭，你們大概又在心中惴惴，不知道是否又將有一場大風暴正在醞釀之中。——你們的憂慮值得同情，因為你們受過的苦太多了，受苦的時間太長了。

但是，這種變化是出你們意料嗎？你們是否已頓悟到，反反覆覆，爾虞我詐，正是中共結構中先天的絕症？是中共上層領導體中不能排除的毒血？

你們之中，有不少在青年時期即投身共產革命，只爲了你們會相信共產主義會爲人類帶來公平的社會。你們也有不少爲了中華民族的前途而加入抗日游擊隊，以爲在打敗日本之後，中華民族將有安樂富強的好日子。你們之中，也有不少在反專制反獨裁的口號下，投入內戰的戰場，以爲推倒國民政府，中國人民會有一個自由與民主的政府——而那是中共曾經提出的承諾。

這四十年的事實呢？中共的承諾沒有實現，中國人民還在受苦，忍受史無前例的貧窮與恐懼；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史無前例的專制與集權；中國社會漲漫了史無前例的欺詐與虛偽；中國的官僚組織又是史無前例的沒有效率；中國政治領袖的專制權力，也是史無前例。大家都以爲毛澤東時代的罪惡已是登峰造極，此後

只可能有改進，不可能再重復毛時代的局面了。事實呢？四大堅持不還是毛澤東的原則嗎？

你們曾以爲共產主義會帶來天堂，今天的當局仍舊不斷地提醒你們：共產主義的優越性，不許有所懷疑。如果共產主義真是優越的，爲什麼世界上沒有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能喂飽自己的百姓？爲什麼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都要依仗武力來保持共產主義的專政？爲什麼共產主義國家中能夠解決民生問題的，都必須走修正主義的路線？爲什麼鄧小平也非走修正主義的路不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究竟在哪裡？

上一個世紀，馬克思以爲他找到了歷史的定律，以爲人類的歷史，必須遵照這條演化的定律。自從蘇聯立國以來，共產國家以國家的權力，強制大家相信馬克思發現的定律；強制大家以宗教的熱忱信仰這一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但是，一百多年來，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及人類學各科目的進展，早已將馬克思理論的基礎修正了，甚至已經否定了。今天的社會科學中，無人再敢於自稱發現了顛撲不破的歷史定律。馬克思的理論至多只應當是社會學的一家之言。馬克思的理論只能借政府壓制思想的權力在共產國家內部作爲經典與偶像。你們會相信馬克思思想，以爲自己站在人類歷史上勝利的一面，今天，你們還能這樣的自信嗎？如果共產政權的領袖也有堅強的信心，爲什

麼不敢讓人民公開辯論，自由地驗證馬克思理論？爲什麼一定要依賴武力鎮壓方能撐住這個虛假的偶像呢？

中共的黨員們，你們大概也聽說過，一個國王，身上沒有寸絲，却要百姓稱頌他的新衣。最後，有一個幼童天真地叫了，「國王身上並沒有衣服！國王沒有新衣！」你們人人都知道共產主義是騙局，中共的結構是爲了把持權力而撐起來的空架子。你們不願相信這個騙局，但是這個騙局能維持下去全靠你們的支持。中國古代有虎假的故事：老虎食人，死者的靈魂成了佞鬼，爲虎服務，引來更多的受害者讓老虎撲食。你們正在扮演佞鬼的角色，你們還真的心甘情願繼續擔任佞鬼，讓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繼續犧牲？一代又一代永遠生活在這個欺人而又害人的政治制度下？

中共的黨員們，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以至過去的魏京生、李一哲……都已發現了國王其實沒有穿衣服；海外無數的留學生也已發現國王其實沒有穿衣服。你們是願意繼續自己騙自己嗎？只要你們一個一個站起來，你們會有力將這個共產騙局揭破，會有力將中國真正解放的！請你們想一想，誠實地想一想！

自從延安整風以來，中共內部的各種整肅及迫害一波又一波，從未停止。你們當年入黨

編者按：許倬雲博士，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教授，設在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譽滿中外的歷史學家。北京領導人近年多次邀請許教授訪問大陸，因種種原因未能成行。此文為許教授憂國憂民的力作，但不完全代表本刊的立場。本刊經理林樵清在文後寫了一篇闡述本刊立場的文章。

時滿懷理想，意氣憤發，現在則嗒若寒蟬，不敢動也不敢想。半個世紀了，多少好同志死於非命，更多的伙伴身體受到殘傷，精神受到戕賊。現在，你們只能做上級的應聲蟲，黨的政策與決定哪有一般黨員發言的餘地？

你們也許認命了，願意一輩子做黨的奴隸。你們的子女呢？他們正在要求自由，要求民主，要求人的尊嚴與權利。你們應當支持自己的子女，幫助他們重獲這些基本的人權。你們應當在黨內發動革命，徹底地改變中共的性質。這是上策，也是正本清源的做法。退而求其次，你們也該在黨內站起來，要求更多的發言權，不要再容忍由上而下的專政。最糟的作風，則是繼續保持緘默。緘默即是默許現在的情況繼續下去，也就是你們仍舊自甘為虎作倀，幫助中共延長對你們子女的專政，坐視你們的子女一代又一代仍活在恐懼與屈辱之中。

你們當年參加共產革命，是爲了中華民族甚至爲了人類，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有了這幾十年的經驗，你們應該夢醒了。如果你們已經看破中共的本質，却爲了自己也分享了權力的殘餘，而不再記憶當年參加革命的動機，則你們對不起中華民族，對不起自己的子孫，更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我相信你們的良心還在，你們也愛護自己的子孫。願你們早下決心，改變這個政體，推翻這個專政的集團。你們不是沒有力量，因爲中共的權威建築在你們各位黨員大眾的集體之上。你們主動而自發地要求改變，上面一小撮人將無法抗拒。只有當每一個人，都畏懼黨，依附黨的時候，黨對黨員才有無比的權威。你們必須站起來了，只有你們自己解放自己，你們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中華民族也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我一生未加入任何政黨；我是一個學歷史的人。這一封信是一個中國人對祖國的懷念，也是對你們的關心。言出肺腑，願能鑒察。

不同的看法，相同的方向

敬致許倬雲教授

（中國之春雜誌經理）林樵清

許教授大鑒：

看完了您的這篇「給中共黨員大眾的公開信」後，對您在文中所流露出來的憂國憂民情懷，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尤其是在許多學者教授及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還在保持沉默的時候，您這篇文章，不啻暮鼓晨鐘。

您的道德文章，世所景仰。您在「中國之春」第二十六期上所發表的訪問錄「分權富中國」，更是難得一見的好文章，在中國留學生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我們收到了您這篇文章後，發現其中有兩處地方和我們的看法略有不同，於是就由我致電給您，看看是否可以稍加更改。第一處是在倒數第三段第五行「……你們應當在黨內發動革命，徹底改變中共的性質」。我們建議改爲：「你們應當在黨內發動改革，徹底改變專制的性質。」您同意了將「革命」改爲「改革」，但反對將「中共」改爲「專制」。

第二處是在倒數第二段第八及第九行「：願你們早下決定，改變這個政體，推翻這個專政的集團。」我們建議將「推翻這個專政的集團」改爲：「使其走向民主和法治」。您堅決反對，並開始有些不悅地說：「我就是要把它翻它，如果你們要改動這句，就把文章寄還給

我，你們連推翻它的勇氣都沒有，還搞什麼民主運動？……」

放下電話後，我們就開會商討，最後決定：您這篇文章一字不改地全文刊登，但文後由我寫一篇文章來闡述我們的看法。

首先，中國之春不鼓吹暴力革命。因爲中國自太平天國迄今，就不斷地革命，結果不但沒有達成民主或解放的目標，反而使人民的生

一代仍活在恐懼與屈辱之中。你們當年參加共產革命，是爲了中華民族甚至爲了人類，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有了這幾十年的經驗，你們應該夢醒了。如果你們已經看破中共的本質，却爲了自己也分享了權力的殘餘，而不再記憶當年參加革命的動機，則你們對不起中華民族，對不起自己的子孫，更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我相信你們的良心還在，你們也愛護自己的子孫。願你們早下決心，改變這個政體，推翻這個專政的集團。你們不是沒有力量，因爲中共的權威建築在你們各位黨員大眾的集體之上。你們主動而自發地要求改變，上面一小撮人將無法抗拒。只有當每一個人，都畏懼黨，依附黨的時候，黨對黨員才有無比的權威。你們必須站起來了，只有你們自己解放自己，你們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中華民族也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我一生未加入任何政黨；我是一個學歷史的人。這一封信是一個中國人對祖國的懷念，也是對你們的關心。

許倬雲教授諄諄鐵言的手稿

命、財產被革掉不少，人民的痛苦也愈來愈深。這一點您已同意更改，故在這方面沒有什麼爭論。

至於我們建議您將「徹底改變中共的性質」一句中的「中共」改為「專制」，是因為您並沒有確切地指出中共的性質是什麼。中共的性質有許多，如專制獨裁、反覆多變等，這些必須徹底改變。但也有一些性質如堅持獨立自主、堅決反抗來自蘇聯使其成爲附庸國的壓力等，是否也應徹底改變？中共性質中的專制獨裁，我們當然應該徹底改變它。但並不是說因爲它的名字叫中共，我們就得徹底改變它。故我們建議將「中共」改爲「專制」，只是想替您把話說得更爲確切而已。但如果您堅持使用「中共」一詞，那也關係不大，只是讓人覺得籠統一點而已。

但在討論到「推翻這個專政的集團」一詞時，爭論就比較大了，因爲我們認爲使用「推翻」一詞，容易讓人產生誤解。

「推翻」總令人想到暴力、流血和動亂。中國人民的苦難已經夠多了，不要再動亂了。何況從歷史上看，一個以暴力革命取得的政權，往往會轉變爲專制獨裁，然後等著再被另一個暴力革命推翻。造成了以暴易暴，源源不息的局面。中國近代史就已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沒有人希望再重蹈覆轍。

中國之春內部有許多成員具有共產黨員的身份。他們也希望中國能走上民主和法治的道路。除了「革命」和「推翻」，他們同意您在文中所有的觀點。

當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知道有人要推翻他們時，相信他們定會和保守派聯合起來，誓死反抗的。沒有誰願意被無情地「推翻」。我們認爲：不要把共產黨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

、來打擊。這是國民黨的做法，也是他們近四十年來不能成功的原因。事實上，共產黨並不是一個整體，也不是鐵板一塊。它內部有許多派系鬭爭。如何幫助其中的民主改革派取得成功，是我們主要的目標之一。如果強言推翻，只會促使他們團結，反而變成鐵板一塊。

還有就是策略問題。如果今天劉賓雁、方勵之等人在一開始就揚言要推翻共產黨，您想想，他們不馬上被捕才怪，那裡還有機會到處去散播民主的種子？您能說劉賓雁、方勵之這班人沒有勇氣嗎？我們總要在客觀環境容許下，找尋一條和平而又走得通的道路。等到所有和平的道路都被封鎖，那時民運人士自然而然會被迫採取另一層次的策略。

共產黨將來倒不倒，或如何倒，完全取決於其自身的作爲。一棵樹、一棟房子，如果裡面都枯萎腐爛了，風吹草動也會使其倒塌，用不著我們高喊推翻。國民黨喊了幾十年「推翻」，但結果却讓共產黨搞得其自身難保。反倒是國民黨在被逼的情況下讓台灣有了民主雛型的兩黨政治，却給了大陸上的民運人士莫大的鼓舞，也助長了中共內部的衍化。

今天，改革派暫時受挫，令許多人大失所望是不爭的事實。但如果說改革派從此就在政壇上銷聲匿跡，那却令人不敢苟同。當初保守派也是被壓抑了四、五年才有今天出頭的日子，又焉知改革派在今天受挫後從此就永無翻身之日？須知改革派有廣大的人民支持，永遠被壓的可能性並不大。

另外，中共高層兩派的權力鬭爭還在激烈進行中，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如果今天就要中共黨員喊出「推翻」的口號，但又不能立刻達成推翻的目的。無疑將會給在鬭爭中暫時處於劣勢的改革派增加壓力，使他們的處境更

爲艱難。

但假如將來改革派徹底擊潰保守派，牢牢掌握政權，却又實行專制獨裁，那時人民就會看透這一切，而自然會將民主運動推向另一層次。中國之春也從來沒有把希望完全寄託在改革派身上。

我一直認爲中國在對日抗戰前的口號：「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和平未到絕望關頭，絕不放棄和平。」是很服人的！我不要犧牲，但我被迫犧牲；我要求和平，是你逼我上戰場的！最後，當抗戰全面開始時，立刻得到了全國的景從，舉世的同情。一直到抗戰勝利，中國都沒有向日本正式宣戰。今天，對中國的局勢，我們似乎也可以說：「推翻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推翻；改革未到絕望關頭，絕不放棄改革。」

關於您說我們沒有勇氣。我們不準備做太多的辯解。我們只能說：沒有勇氣的人不會加入中國之春！中國之春的成員很清楚知道他們面對的是什麼。王炳章先生甚至連性命都會遭受威脅。但這些並沒有嚇倒我們任何人。中國之春有的是勇氣，而且是理性的勇氣。

您和中國之春都朝著「把中國推向民主」的同一方向而努力，不同的只是我們之間的看法而已。中國之春不怕誤解、不怕打擊！中國之春怕的只是可能因爲這次的看法不同，而失去了一位像您這樣爲中國民主前途汲汲努力的良師益友。我希望我們不會。不多寫。

此致
敬禮

中國之春雜誌經理

林樵清

PS. 中國之春盼望讀者們能就此事展開討論。

鄧力羣仇恨中國之春的証據

《譯文照登》

(日本)姚月謙譯自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

《讀賣新聞》頭版

圖片說明：這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讀賣新聞」頭版的消息，指出：鄧力羣對日本政府允許「中國之春」在日活動極為不滿。畫前頭處為有關內容。

鄧力羣氏が対日批判

「日本製品は質が悪い」

【東京十四日 共同通信】鄧力羣氏が十四日、北京から来た演説で、中国共産党書記胡耀邦の批判に答えて、中国共産党の腐敗を痛罵し、中国共産党の改革を促した。鄧力羣氏は「日本製品は質が悪い」と述べ、中国共産党の改革を促した。鄧力羣氏は「日本製品は質が悪い」と述べ、中国共産党の改革を促した。鄧力羣氏は「日本製品は質が悪い」と述べ、中国共産党の改革を促した。

讀賣新聞

THE YOMIURI SHIMBUN

第39748号 (日刊) 読売新聞社1987年

2月15日 日曜日
昭和62年(1987年)

発行所 読売新聞社
〒100 東京都千代田区丸の内1-7-1
電話 (03)242-1111
電報掛 読新 4-612

鄧力羣為何對中國之春怒不可遏？

專輯 支持改革·反對倒退

十四日自北京傳來的消息：中國共產黨書記（黨中央委員）鄧力羣在最近黨內的會議上，反復提出「日本產品品質不好」、「中曾根鼓勵軍國主義」等等內容的對日嚴厲批評的發言。今後，對日關係將有大幅後退的可能性。鄧力羣是中共前宣傳部長，據悉與楊尚昆、習仲勳兩位政治局委員同時為黨總書記候補者的大人物。

鄧力羣的對日批評講話，是和對前總書記胡耀邦的批判相連的。同一消息來源講，鄧批評的內容為：(1)中國在經濟、貿易方面過份對日本讓步；(2)日本的产品品質不好；(3)日本政府鼓勵民間團體與台灣往來；(4)日本對中國的技术轉讓不積極；(5)日本政府容許台灣獨立論者(台獨)和反中國現體制的組織「中國之春」在日本國內進行活動；(6)中曾根鼓勵軍國主義。胡耀邦與中曾根在多方面都會有過親密結交，鄧氏這次並沒提及一九八四年胡氏自做主張在中國招待三千日本青年的事。

同一消息來源說：鄧氏的對日批評講話尚未以公文形式發表。當趙紫陽總理兼代總書記，田紀雲副總理兼政治局委員都很重視對日關係之際，據測鄧的講話如果想公开发表會遭到反對。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黎音

日本「讀賣新聞」今年二月十五日頭版刊載了一條引人注意的消息，報導了中共保守派頭號「大棒」，不久前倒胡(耀邦)政變的幹將之一鄧力羣，在最近中共中央內部一次會議上，對日本進行批評講話的主要內容。鄧力羣在這篇講話中，列舉了六條日本對中國(應該說是對「中共」更恰當)不友好的「罪狀」。其中，將「日本政府容許變革中國大陸專制制度的組織中國之春在日本進行活動」也列為「罪狀」之一，氣勢汹汹，盛氣凌人，不僅使日本各界深感驚訝，同時也暴露了鄧力羣對中國

之春怒不可遏的惱恨情緒。

中共保守派歷來對改革派進行攻擊的口實之一，就是改革派的頭面人物過份親日。所以，當田紀雲副總理一月份訪問日本時，一再表示「要加強與日本友好合作」之言猶在耳，鄧力羣便迫不及待，橫眉立目地向日本發難。不過此中是非、奧妙并非本文所要論及。筆者只想對鄧力羣惱恨中國之春的緣由略加剖析，進而說明鄧某言之無理。

鄧力羣恨中春由來已久，套用中共的一句話講，這是由於他「派性作怪」所決定的。

首先一點，因為鄧力群是中共黨內僵化的保守派一員主將。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誕生以來，便一直全力支持中共開明領導人「改革、開放、搞活」的政策。當然鄧力群一夥視中國之春如洪水猛獸。他們在國內極力歪曲醜化中國之春的形象，封鎖中國之春的消息；在國外則對中國之春大肆圍攻、中傷和誹謗。過去鄧力群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時，真是不遺餘力，手揮大棒，必欲置中春於死地而後快。沒想到他壯志未酬先丟官，因此，耿耿於懷。過去他失寵之時，人在台下氣滿腹，尋機報復再捲土；而今他得勢之日，批資清污講馬列，拿來中春開殺戒，這倒也符合鄧力群的一貫為人。

其次一點，因為中國之春及王炳章向美國法院控告了人民日報和鄧力群。中共堂堂的機關報紙和不可一世的黨官僚，第一次被人控告而處於被告地位。特別是當國際輿論廣泛同情中國之春，而人民日報又拿不出惡言誣蔑中國之春的確鑿證據情況下，中共感到十分被動，鄧力群也不僅一次因此而受到責難和批評，這使得鄧先生更是怒火中燒。丟掉烏紗帽，還要當被告，真如同烏鴉鑽灶坑！憋氣又窩火，黑上加黑。鄧力群惱恨中春已是入骨三分了。

最後一點，因為中國民聯日本分部這些年在日本的活動不斷加強。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實在令中共頭痛。任你封鎖再嚴，我自見縫插針；憑你謠言惑眾，我自坐端行正；哪怕你「反革命」大帽子飛到海外來，偏有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向我靠攏。在日本這個地方尋不到政治避難庇護所，可是仍然有在中共「紅旗下長大」的學生、學者，捧過中共「金飯碗」的幹部、黨員紛紛投入到民主運動的行列。這充份證實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說明了真理與正義在祖國同胞的心中永存。

鄧力群的講話實際是代表了一批人，在目前保守派占上風的形勢下，可以看成是黨和政府的官方意見。中共可能以為由一位大人物出面，略施威脅小技，日本政府便會做出讓步而對中國民聯日本分部加以限制或取締，妄想把「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伸到海外來打人。但此計差矣！中共怎可忽視日本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有自由、民主憲法和尊重人權的法治

●台灣專欄●

台灣解除報禁以後

(旅美作家·台灣)鮑進

台灣要解除報禁了，對許多人來說，這當然是一個值得雀躍的消息。

大家在討論台灣以「三不」對付中共的「三通」時，許多人認為統戰不是中共的專利，中共可以統過來，台灣也可以統過去啊！你越怕它，它越向你統，等你真正上陣和它正面作戰，說不定退縮的是它不是你。華航事件的談判就是一個證明，當中共提出談判台灣沒有答覆時，中共叫的聲音是很大的，等台灣同意談判之後，中共的聲音立刻小了下來。

由此可以證明，台灣今天在政治上所面臨的種種問題，迴避不是辦法，只有積極迎戰甚至主動出擊才是上策。

對內部的一些問題也是如此。去年底國民黨宣佈要解除戒嚴法，黨外立刻少了一個攻擊國民黨的口實。解除黨禁也是一樣。事實上即使不解除，現在民進黨的這些人仍然會出來競選，該當選的還是會當選，讓他們打出民進黨

社會；中國民聯更是個光明磊落，宗旨高尚而又遵守所在國法律的民運組織，她在世界各地都有日益深廣的社會基礎，在日本也不例外。中共即或再霸道，畢竟還沒達到可以支配世界的程度。所以鄧力群的發言，不過是氣急敗壞，虛張聲勢的表現，如此無理濫言，絲毫不會影響中國民聯繼續穩健地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標邁進。

的旗號，對國民黨在實質上並無傷害，在國際上反而造成了有利的形象。

報禁的問題應該也是如此，國民黨怕觸及一些政治上的禁忌，不願有新報紙出現，但現在民智日開，台灣每年出國的留學生和觀光的人數有增無減，在國內聽不到、看不到的消息，一到了國外什麼都知道了，於是產生一種在台灣幾十年一直都在受騙的感覺而心生反感。如果在國內早就知道這些事，到了國外對許多事也就不會感覺新奇，對一些國民黨視為異端邪說的东西，如飢如渴的照單全收了。

如今報禁雖然還沒有正式開放，但原則既已決定，何時開放只是遲早的問題。一俟新報出現之後，一些政治上的禁忌和敏感問題，一定會有人提出。就算不立刻提出，以後總是要提出的，因為這是政爭不可避免的。

因此，國民黨與其他人提出之後再來解釋，不如主動先說明自己的處理原則和方法，

有需要討論的地方也可讓大家表示意見。如果確實是自己處置不當，最好的方法是承認自己的錯失，並作迅速的補救。國民黨大可趁目前絕大多數文宣工具都掌握在自己手上時，主動作這件事。否則一旦變成被動地處於守勢，主客易位，對國民黨是很不利的。

國民黨不願讓大家提一些禁忌和敏感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來是它目前的處境，再者是它的歷史包袱，使它不願或不能公開談一些問題。但是對一個反對黨來說，越是執政黨有顧忌的問題，越是它的有力攻擊武器，只要這些問題不解決，它就可以不斷地提出，執政黨將永遠處於守勢和挨打的地位。

例如二二八事件，黨外和國外對這個問題寫了許多文章也出了一些書，連中共也在這個問題上湊熱鬧，這是國民黨最不願觸及的問題之一。有台灣朋友說，二二八事件的一些當事人家屬，到現在還不讓他們出國，不知是否真的如此。對一件四十年前的事到現在還不能作一了斷，對國民黨並無好處，何不在反對黨的新報出現之前，公開所有的資料，對這個問題徹底作一解決。

另外，對於黨政高階層的人事，台灣報紙上有所謂「見光死」的事，意思就是說，某一職位本來是要給張三的，但報紙一登，張三的煮熟鴨子又飛了，因為主政者不願讓人知道他的用人決策。其實這是很笨的想法。如果我是反對黨報紙主編的話，我最不希望某人出任行政院長，我就成天說他要出任行政院長，讓他「見光死」，讓國民黨犧牲一名可以勝任的行政院長。

其實國民黨的這一作法不始於今天。抗戰勝利之後，中共怕國民黨釋放張學良回東北，周恩來於是公開要求釋放張學良，國民黨果然

上當，共產黨吃了甜頭還賣乖，到今天還在以張學良作國民黨的文章。

國民黨如果怕別人猜中自己的人事，自己先公佈不就行了嗎？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黨政高層人事實在沒有像國民黨那麼保密的必要，因為「見光」而「死」掉的人，錯不在他本人，為什麼要因此犧牲他一生忠黨愛國、奉公守法、兢兢業業的努力？這是多麼不公平和沒有必要的一種作法，反對黨可以這麼輕而易舉地打掉國民黨的一名戰將，任誰也會多多使用這種方法的。美國的一些高級人事、駐外大使往往在半年前就會公佈某人要退休了，由某人接任，從未聽說還有什麼不良後果。

對一些社會上關心的案子，新報也很可能會提出來，遠的如雷震，近的如李荊蓀案件，外間的傳言很多，在海外流傳着李荊蓀是被國民黨大老陶希聖陷害的說法。如果讓耳語不斷的流傳，不如坦誠地交待清楚，誰是誰非讓社

●台灣專欄●

對台灣解除報禁的雜感

(美國華僑)周立仁

台北當局去年底宣佈要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並且首次出現了正式以反對黨姿態參加選舉的情形。

今年二月初，行政院長俞國華又宣佈作開放報紙登記的準備，實際上也就是要開放報禁了。這三項發展在走向自由、民主方面，勝過以往三十多年進步的總和。

對於在美國的華僑和美國的政客來說，任

會作一公斷。

俗語說，太陽下面沒有十全十美的事，也沒有永遠的秘密。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上，主政者是沒有錯誤的，有過失都由臣下擔當，所以儘管儒家的學說要人「吾日三省吾身」、「過則無彈改」、「知過能改、善莫大焉」，甚至「聞過則喜」，但是對主政者而言，不但不喜歡聞過，更不喜歡談什麼改過。其實人皆有過，政治上有缺失迅速設法改正，使損害減到最小程度就是了，掩掩飾飾不但很痛苦，有時候反而欲蓋彌彰。

政治是眾人之事，反對黨或任何團體將來辦了新報之後，也該了解台灣今天處在一個錯綜複雜的局面中，有許多事也許不是正常方法可以辦到而要用迂迴方式的，站在一般民衆的立場，這些報紙在報導、批評時，一方面應該言之有物的就事論事，另一方面也並不為己甚，這樣才不失一個報人的風範。

何說詞都不能使他們信服有不准辦報的理由。尤其是對美國的政客而言，許多台灣、香港的報業集團到美國來辦中文報紙，中共也在美國發行「人民日報」海外版，但台灣却不准它的人民在自己境內辦報紙，中共也不准民辦刊物存在，這是多大的一個諷刺。

對國民黨來說，三十多年的報禁固然達到了它的部份目標，但政治上產生的負面影響也不小。儘管政府主管官員每次在立法院，或在

答覆海外學人時，都表示台灣並無報禁，而且說現有的三十一家報紙，已能充分顯現出言論的自由，但事實是否如此，大家心裏明白。

對國民黨更不利的是，在報禁之下，反對派辦了大量的雜誌，它們對執政者，對政見不同的人，甚至對同是反國民黨但派系不同的人，在文字上的謾罵、侮辱、誣衊，即使連美國這個最尊重新聞自由的社會，都是無法想像的。它們還在政局上、政府人事上作出種種策略性的「預測」，因為它們明知國民黨不會也不能公開的予以澄清或辯白。國民黨以及它的領導人，在受到不斷的謾罵侮辱之後，還措了一個箝制新聞自由的惡名，有時還受到國際間的指責，實在不值得。

由於報禁，台灣的報紙還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分成許多地區版。因為一天只能出三大張十二頁，爲了容納更多的廣告和滿足不同地區對當地新聞的需求，於是另一方面儘量縮小字體，尤其是廣告字體，對讀者的視力造成重大的傷害，一方面按地區分成不同的版面，如高雄屏東、桃園新竹苗栗、台東花蓮等。這是台灣報紙爲了突破限張想出的一个奇招。

在報禁正式解除之後，限張的辦法相信也會跟着解除。以目前資訊的發達、台灣地區人民對政治關心的熱烈程度、國民所得的水準、經濟繁榮的展望、廣告市場的需求、社會生活的多采多姿，一份十大張四十頁的報紙，絕對可以有很充實的內容以資報導。

儘管辦刊物，尤其是辦報紙是件極辛苦的事，但仍有許多人對辦報有癮，也有不少人爲了宣揚自己的主張希望辦報。從紐約的中文報紙上看到，紐約已有人回台北準備參加新報的工作。但是否真的有很多人會出來辦報呢？恐怕也不見得，因爲這畢竟是一件需要龐大資金

和大批專業人才的工作，如果經營不善，多家的家當都可賠得精光。

但是新報必然會出現，現有的報紙不一定都能長期生存。反對黨的報紙出現之後，讀者的分配會出現變化，廣告市場當然也會調整。民進黨的人說他們目前的資金和人才都不夠創辦日報，有人認爲這是故意在現階段採取低姿態，因爲三十多年來，台灣新聞科系的畢業生何止上萬，現在一些報紙中的人員也有一些是同情黨外的，人才應該不會成問題。反對黨的資金更不會成問題，在美國反國民黨的人士和團體，支持美國少數兩三位參、眾議員的競選經費，一擲萬金都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拿點錢回台灣辦報直接和國民黨打文宣戰應該不成問題。而在台灣境內，黨外的資本家，加上黨外刊物有固定的讀者群，支持一份報紙應該也不會成問題。

國民黨的報紙當然會改變經營方式。有人認爲開放報禁之後，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會支持不下去。我個人認爲不至於如此，因爲無論如何，國民黨的政策、態度乃至於一舉一動，都必然是大家非關切不可的，而且中央日報也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麼不堪。在紐約看到它的海外版，我個人認爲它不失爲一份相當有水準的報紙，何況在新紙的衝擊下，它也一定會改。至於其它有些報紙，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添加設備、提高工作人員待遇（台北的晚報員工，大多數是其它日報的人去兼職，待遇極低），擴大消息的來源，必然會遭遇困難。優勝劣敗是競爭的必然結果，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相信報紙的家數必然會減少，分爲政見不同的幾個派別。

在這種情形之下，最應該避免的是在言論上的兩極化和情緒化。任何一個社會都應該以

祥和爲主，儘管一般人民關心政治、熱衷政治，但一定要有安定的生活才能去關心和參與政治。將來不論誰創辦新報，不論現有的報紙是否改變它們的經營方針，都應該平心靜氣的就事論事，即使不談法律問題，謾罵、誣衊也有失厚道。

而情緒化最大的壞處，是它不但不能給讀者一個選擇的參考，反而會使讀者的情緒進入高亢。如果有一大批人的情緒長期處於高亢狀態中，絕非台灣社會之福。在一個經濟上作自由競爭的社會，報紙雖然也是一種商品，但它畢竟是文化事業，社會的公器，不能以發洩個人的私慾和宣洩少數人的情緒爲目的。

台灣解除了戒嚴、黨禁和報禁，中國大陸何時拿掉「四個堅持」？國民黨雖然有戒嚴令，但整個社會仍然是相當開放的，一般人民在生活上幾乎感覺不出來有什麼不便。黨禁未開放之前，黨外和無黨籍的政治候選人，也在各級民意機構中有一定比例的席次，各縣市長也不斷有黨外候選人當選。報禁之下台灣的一些黨外刊物出版也一直沒有中斷。如今國民黨正式要取消這三樣東西，不管它是從善如流或迫於形勢，它畢竟這樣作了，這總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希望今後台灣的報紙，除了理性的宣揚自己代表的政治立場和主張外，應以讀者、社會的利益爲前提，在一般新聞報導和言論上，務必要戒除殺伐之氣。

相形之下，中國大陸在經歷了這次學生爭民主、自由，導致了黨內的整風之後，更加顯現了在共產黨統治下自由、民主道路的艱難和遙遠，海外華人不應厚責台灣當局而對中共的不肯放棄「四個堅持」視而不見，在爭取全體中國人的自由和民主方面，十億人口的大陸應該是大家更加努力的目標。

自由有罪，民主倒車

(台灣作家·美國) 何偉康

劉賓雁要「罷寫」的時候，海外譁然，中共居然曲為開脫，使劉賓雁能繼續揭發社會主義的陰暗面，痛詆「不正之風」，被目為大陸社會的「青天」。但他本身的麻煩不斷，從各種「不正之風」的根部射出各種明槍暗箭。像許多做得好、有具體成績的企業經營者被拉下馬的情形一樣，都同樣來自一個癥結：權力威勢仍舊嚴重地在損害正面人物以及人們向上的意志。它不祇是阻撓社會進步，也給中共的現代化開倒車。這種情形使許多有識之士，像王若望、方勵之等人，不得不發表言論指陳中共政策的缺失。這些批評無疑獲得青年的熱烈響應，青年確乎受了他們的感召而走向街頭，喊出口號，向中共要求民主和自由。去年十二月五日由安徽合肥所發起的學生民運，主要是由中國科技大學的副校長方勵之倡導的。方被目為「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壞人」。說他「跑到外國去轉了一圈，就把西方國家說成無比美好的自由世界，主張全盤西化，實行多黨政治」。科技大學的學生要去示威的時候，方勵之說只要合乎憲法，他就支持。他支持到什麼程度，我們不確知。他的「熱情響應」是可以想像的。資料顯示，他對外國記者說過：「學生的要求十分正確。」學潮結束之後，胡啓立（曾經庇護過方）首先說：「像方勵之

那樣的人最好叫他退黨。」鄧小平更進一步說：「不是要勸他退黨，而是應該開除他的黨籍。」在中共的體制之下，這種開除就是剝奪他的發言的權利、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連帶他的職業和生存的機會，並陷於四面敵視的孤立之地。這只是因為鄧小平在一念之間開了倒車。

鄧小平在八六年初就一語解紛，化解了一場北京軍區司令員和公安部的正面衝突。這事起因於三十八軍軍長的兒子在八五年學潮中公開指責陳雲和彭真。他給抓起來以後，他的軍長父親認為他兒子參加學潮是憲法範圍內的活動，由於自己交涉不果，就向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報告，秦就派了武裝部隊開進監獄救人。事情鬧到鄧小平那裡，他說了句很有趣但絕對不合法的話：「學生娃娃沒有罪；救得好，救得應該。」之所以如此，緣因三十八軍是王牌部隊，而秦基偉是鄧小平的「硬膀子」；鄧小平也不得不讓他幾分。由今天鄧小平抨擊「資產階級自由化」來看，那前半句是基於私誼的戲言，後半句則是避免內部矛盾深化的右袒。說來輕鬆，實是苦心經營過的。一般人很惋惜鄧小平把自己「家長化」，因為這種「家長化」，也是來自封建的意識。同時人們不再對鄧小平寄予更高的期望。這次方勵之激怒他，使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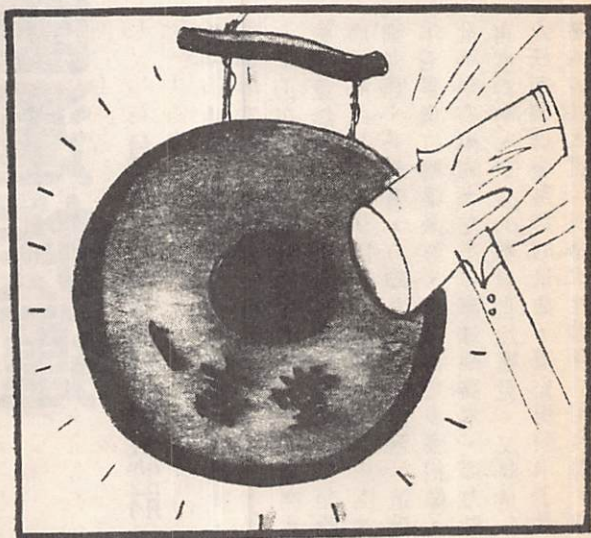
祭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法寶來對付這類「一小撮份子」，不只是使海外以往的期望為之冷卻，也同時看出他的抉擇還是私誼重於公義。因為方勵之嚴厲地批評過在歐洲訪問的某領導，說他搞混了天文學上兩個偉人布魯諾和哥白尼，「有辱國體」、「不學無術」，在中共內部已經發展到有「方勵之不敬領導」之說的地步。他批評周谷誠的反民主怪論，批評萬里的黨與學生的關係是母子關係，都用詞尖銳，使對方含恨在心。中共不願拿學生開刀，又覺得怪罪於美國之音和台灣廣播未免有失面子，只得找方勵之這樣的自由份子做替罪羔羊。雖事態使然，基本上也源於方君頭角太露，大佬心中暗恨，他只有吃不了兜着走了。

但是，鄧小平祭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法寶，來「整肅」中共內部的異己分子，「旗幟鮮明」地向左轉，使我們為之驚愕痛惜，深深感到心情沉痛和失望！

我們之最關切者，是方歷來言論中肯定的：「知識份子社會進步的主導力量」，反對把知識份子當作「毛」，非要粘在黨的這張「皮」上。他在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的世界經濟導報上說：「中國知識份子必須把屈着的腰挺起來，不要唯上是從，不要樣樣事情等待上面的意旨，更不要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某某官員的恩賜上面。」此處已經暗暗指著鄧小平的鼻子上去，並且直衝「自由是上面給的」這種論調予以正面的反擊。毛澤東在文革以前就有篇人人必讀的「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深植中共的黨「心」。雖然中共憲法上規定了人民享有自由，那也跟國民黨給的自由都一樣是打了折扣的，甚至根本就是騙人的。鄧小平這時說出來「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使全世界期待中共「坦率」開放的人為之扼腕。

嘆息。基本上鄧小平仍舊走不出黨封建的世界。鄧小平也真是老了，不再能扮演英雄式的角色，不能不在私誼和黨封建的體系中求苟全，遂將自由冠以「資產階級」之名，橫加鞭撻。嗚呼！自由，自由，一七八九年法國人權宣言以來，即有人說「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事隔兩百年，中共竟說自由即罪惡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自由是罪惡，如何有民主？

要研究中共的「民主」，了解他們所謂民主乃是由中國共產黨所串演的形式選舉，構成一個「橡皮圖章」式的人代會，整個權力操在中共的核心人物手裡這個事實，才會明白何以搞自由、倡民主，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黨就是反中國共產黨，反社會主義是個贅詞。因為自由民主的終極目的，是要做到國家權力共和化。一黨專制，絕無民主和自由可言。專制的結果，造成權力集中在中共的核心份子手中。劉賓雁說起一些中共的官僚麻木不仁，到了「幾百萬人在挨餓，他可以置之不理；面臨哀鴻遍野的現象，他也可以無動於衷；甚至有人可以隨便劃幾個圈就決定槍斃人。這些都是中國可悲的『特產』。」這一「特產」好像說的是民初軍閥割據時的現象，怎麼會是搞社會主義幾十年的中共所統治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國家？劉賓雁在上海「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上公開指出：「中國有一些人患了政治上的陽痿。」這是中共抓權、搞絕對權力以致造成絕對的腐朽的結果。鄧小平也害怕中共與人民相脫離，曾經在中共內部發出警告，要幹部不要背離群眾的利益，力主政治改革，尋求黨政分家。一則發現權力集中導致腐朽的情形確很嚴重，二來也想把中共一肩獨挑「腐朽」的責任轉嫁給他的螟蛉子——「政」，以免人民對黨離心。這個動機幾乎騙過了全世界的



一錘定音

耳目。所有關心中國政治改革的人，無不抱着樂觀的態度等待鄧小平這一伙人搞個翻天覆地的大改革：權力核心自我大蛻化。若不是這次中共一口氣開除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的黨籍，發動「整自由之風」、「整民主之風」的運動，我們畢竟還不能清楚中共的體制究竟是什麼。

中共對自己的了解，正像許多專制政體一樣，是非常閉塞的。在大陸訪問幾次，幾乎人人都百感交集，但又很少能具體說出什麼觀感來。蔣子龍是個工人出身的作家，四十六歲，在上海文學討論會上提出了一個很恰切的說法：「現代（中國）社會是患了一種『飢餓綜合系列』。（中國）現代文化精神空虛、慘淡，到處都流露飢餓的蒼白——感情的飢餓、消費

的飢餓、以及人性的飢餓。」這個河北滄縣出來的漢子雖然以「燕趙悲歌」成名，他還是沒有把「人性的飢餓」當中的精義發揮出來，他還沒有「悲歌」人性當中對自由的祈求，以及民主對維護個人基本權益和尊嚴的重要性。他還不如張賢亮敢於直詆中共的政治結構。張賢亮已經主張「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體制、司法制度、行政管理、人事制度、縱向的經濟指導方式和橫向的經濟聯合方式，改造我們超穩定的社會——政治結構。」作家是民族的靈魂，人民的痛苦往往由他們作代言人來申發。儘管張賢亮在文學理論上的表達（像他在「綠化樹」這篇小說中硬植大量的馬克思思想），和前面引文所顯現的對現代經濟知識的理解，都不足為訓，但他呼籲中國西化的急切之情，的確是代表中國人民在說話。

南華早報在引述中共中央的「一號文件」時對鄧小平的話有很形象的描寫。鄧小平提到一九七九年的「民主牆」運動時說：鎮壓反政府人士不會嚴重損害到中國的國際形象，「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放他（指魏京生），可是在國際上也沒有引起什麼麻煩。」國際間的緘默，助長了中共的專制，乃至引發了他今天的指示：「如果必要的话，我們對那些違抗命令的人要嚴厲處置，流一點血也沒有關係。」專制的氣焰咄咄逼人。方勵之說不要等待這些人的民主恩賜，我們客觀地看，這不純然是知識份子的尊嚴問題，而是他們的恩賜不可靠。它有時有，有時沒有；對張三寬容，對李四就嚴厲。時而「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轉腦就全盤收緊、清除污染。好壞的評置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特別是當危及中共的領導，損及其專制權力時，一切說過的話就不算數了。

中共統戰的口號中，對卵翼的小黨有十六

個字「基本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前八個字大家有目共睹，無須細表。後八個字要是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也是可以說得通的。各民主黨派之肝膽要照給中共看，並視中共之榮為榮，視中共之辱為辱。我之榮辱予汝與共，才能得以長期共存。在這種情況之下，冒着嚴寒上街喊口號要民主、要自由的學生，他們真是太可愛了，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希望新聞自由、多黨制衡，不是太天真了嗎？在香港的溫輝居然主張聯合政府，並引用毛澤東的話說：「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人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無束的選舉，召開國

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這是老毛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的講話，過了三四十年，老毛由香山遷居北京中南海。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他寫了封信給宋慶齡，說他「仰斗之誠，與日俱積……建設大計，亟待商籌……歡迎先生北上……以便就近請教。」九月二十一日在北京舉行政治協商會議，他已經把一切搞定，十月一日就宣告「站起來了」。毛先生的聯合政府就由他自己導演一齣「政協戲」而交過過去。「仰斗之誠」者，遁詞也。中共在過去三、四十年當中，早把「聯合政府」這個觀念置諸腦後。國民黨當年並未接受毛澤東的建議。同樣，如果蔣經國今天向鄧小平建議搞聯合政府，也是與虎謀皮。不要說在北京的那些尾巴黨沒

有和中共平起平坐的資格，蔣經國如果真的要北京和鄧小平見面，若說要和中共組成聯合政府，最多也不過重演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的鬧劇罷了。中共連國務院都不願分權，難道他們肯分權給國民黨乎？建議蔣經國學孫中山做最後的談判，既看錯鄧小平遠非段祺瑞可比，在客觀形勢下也不允許蔣經國身殉這個和平的事業。

台灣的和平有賴大陸民主運動的緩慢抬頭，而能長期保持對台灣民主先進的「仰斗」。大約一、二十年之後，現在三、四十歲的開明份子掌權，受到內部民主浪潮的壓力，也許真有建立聯合政府的機緣。即論到那時候，全盤西化的民主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專輯 支持改革·反對倒退

學運黨運國運族運

(台灣作家·美國) 劉添財

一、扼腕痛心

中國大陸發生學生運動之初，中共當局還假裝頗有度量，沒有抓人整人，而學生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護之下行使示威遊行權利，也表現得頗有分寸，合情合理合法，沒有過份要求，沒有野蠻粗暴，充滿和平理性和自制。由青年學生對國家民族社會人群的關心來促使中共更進一步地開明，開放民主改革，經濟政治同時並進，快速完成「四化」，四海歸心統一祖國。在台灣國府宣佈解除戒嚴與黨禁之

後，中共也該露兩手好樣兒的給世人瞧瞧，看誰更得民心，那該是何等美事？

正在海內外企盼讚賞之際，中共却突然變臉，竟然撤掉了它自己的黨總書記，又開除了廣受海內外尊崇、國際知名的共產黨忠臣精英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三人的黨籍，這與當年毛澤東打擊梁漱溟、馬寅初是多麼相像。一批不學有術的「左王」渾球胡喬木、鄧力群等再度得勢，更多的整肅必然難免。又將是一個妖顛倒群魔亂舞的景象，這充份顯示了共產黨的虛怯本質，真是本性難移信用喪盡，使人為之震驚憤怒，扼腕痛心。

二、以罪為功

中共三十幾年的專政，除了自誇其「建國」之功效外，對於人民實在少有做過什麼好事，知識貧乏、固步自封，黑暗落後、獨裁專制，千千萬萬人衣食不周，肉體折磨、精神痛苦，建這樣的國可謂其罪大矣，又有何功可居？幸而毛林「四人幫」等或死亡或失勢或被囚，中共改弦更張，一付浪子回頭之狀，誰知好了沒幾年，却又倒退了回去，什麼反「全盤西化」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無政府主義」，無理取鬧，真是蠢頑愚劣的潑婦，使得大陸充滿一片肅殺之氣，一付文革回潮景象，這樣反覆覆的胡搞亂整，國家民族還有多少元氣可供消耗？是誰給了中共這樣的權力讓它隨心所欲的折騰？

中共最會玩弄名詞花招，明明是專制獨裁，却要自稱那是「社會主義高度民主」，明明

視人民群眾如草芥却要口口聲聲說是爲了「人民群眾」，在他們眼中黨就是人民，而他們這些保守當權派就是黨，可以爲所欲爲。明明是閉塞黑暗錯誤連連，却要自稱偉大光榮正確，還要強迫人民群眾讚美它偉大光榮正確。

一月廿六日北京「光明日報」稱：開除王若望、劉賓雁是爲中共去掉了腫癌。其實，這個指鹿爲馬、強橫霸道、顛狂而喪失理性的中共政權才真是中華民族的腫癌！它真該從地球上消滅掉了！但因爲它仍然實際掌握着中國大陸，大家投鼠忌器，因此對它抱着善意的期望，如果它能知錯改錯，漸漸開明修正，就可以免了流血革命。現在筆者真懷疑，這樣的一廂情願，姑息養奸，會不會更加延長中國人民的痛苦，更加窒息中華民族的生機？對比一下清末改革派的失敗終於導致了清王朝的覆亡，難道今日中共也是註定了它劫數難逃的命運？

三、優取劣棄

中共「左王」們居然打着民族自尊的旗號瞪眼狂叫，其實並沒有人要「全盤西化」、「資產階級自由化」、「無政府主義」。只要是洋人或資產階級的好東西，我們就應該學習引用，這並不限於科技經濟，其他人文、社會、法制、政治、哲學等等，同樣也應該學習引用，而不好的東西也就不應該學習引用而要儘量避免防止，譬如洋人社會的頹廢、奢華物慾、吸毒、濫交等等。

「左王」們反對西化，但却忘了他們所堅持的百多年前過時落後的馬列主義也正是「西化」，馬列主義絕非中國土產！不幸這個西化也是造成現代中國大災難、大悲劇的種因之一，馬列是一種不良的、應該丟棄的西化，而「

左王」們情有獨鍾非「堅持」不可。

胡耀邦在當權時也有不少失誤，但當時沒有人敢就事論事提出批評，今天胡氏下台就什麼毛病都出來了，這還是「四人幫」時代的打落水狗的作風。試看美國里根總統今天還在台上掌權，但他對伊朗事件和尼加拉瓜事件處理不當，立刻就受到批評檢討以防止他更多更大的錯誤，其他尼克森總統、卡特總統也是一樣，因此美國絕不可能發生「文革」那樣瘋狂的大浩劫，由此看來似乎「資本主義民主」遠勝「社會主義民主」，「資產階級自由」好過「無產階級自由」。事實擺在眼前，中共徒然空口吹噓其「高度」民主「真」自由又有誰會相信呢？要救中共的封建專制官僚腐化，恐怕還是需要「走資」「西化」一番，雖然「走資」「西化」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點。

四、民主必勝

一月十七日舊金山僑學界支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示威，竟然拿着青天白日旗唱着「中華民國頌」，把一件單純正義的事情搞成了國共黨派之爭，實在沒有太大意義。試想想如果在國府抓政治犯送往綠島迫害時，左派朋友拿着五星紅旗唱着「東方紅」去向國府示威抗議爭取民主，那將是一番如何可笑的景象？

台灣新竹交大學學生貼標語支援上海交大學生却被國府禁止，台大學學生爭言論自由也受到壓制，國共之心態相當接近，只一百步與五十步之差而已。當然，說句良心話，今天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確實比大陸要好。

這次由大陸學運所引起的一系列變化，只是保守派逆流的迴光返照，不論中共多麼狠毒險詐，不論其組織多麼堅強嚴密，終究是敵不

過民主自由開放的潮流的，一千多中共留美學生自動自發簽名的抗議信，就是這浩蕩潮流的表現。海外左派報刊（包括打着「中」字旗號的）這次表現比某些幸災樂禍的右派報刊還要好，幾乎一致對中共規勸批評甚至譴責，個別左派人士也有寫信聲援中共改革派及被迫害的知識份子等行動，沒有像「四人幫」時代那樣昧着良心緊跟「歌德」，這才是真正的忠於中共，真的愛護中共，否則中共因瘋狂而滅亡，皮之不存，毛將焉存，左報左人也就不能混了。

如果大家早就堅持良心正義，中華民族又何至於遭受那麼多的浩劫？

營救楊巍委員會的聯絡地址和電話

（本刊資料室）

營救楊巍委員會的通訊地址和電話如下，他們歡迎各界與他們聯絡，共同打聽楊巍的下落，並為營救楊巍出力。

一、車少莉

Dr. Che Shai-Li
Dept. of Microbiology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TX 77030
Tel: 713-799-6015(O)

二、余芒

Yu Mang
Dept. of Biochemistry
Indiana Univ. School of Medicine
Indianapolis, IN 46223
Tel: 317-634-7018 (H)

可能失敗的改革

方勵之教授在浙江大學演講

王樹軍
楊虹煜 整理

(一九八五年三月廿七日)

編者按：這是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最近國內學運的領袖方勵之先生於一九八五年三月廿七日在浙江大學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問題做了廣泛的討論，特別點到了改革可能失敗的問題。此篇講話雖今天雖已近二年，但很多問題至今仍值得我們深思。不幸的是，方勵之在二年前關於「改革可能失敗」的警告，已成為事實。大規模民主運動就是在改革觸礁、停頓的基礎上發生的。讀一讀方的這篇講話，對理解國內改革和這次全國性民運，很有幫助。

一、思想領域沒有優越的

參考系

今天有機會到浙江大學來談談我們共同感興趣的問題，我覺得很高興。

剛才主席介紹了我的一系列頭銜(笑*)。這些頭銜當然有一定代表意義；不過在這種場合，我覺得不應當提什麼頭銜，特別是一些行政的職務，譬如校長、副校長。我在科大就對同學講過，這種「校長」、「副校長」并不代

表着一個人的學問，校長講話的正確性也不由其職位而決定。當然，我在這兒和大家並沒有行政上的關係了；在科大我曾經這樣講過，現在各部門都在做「服裝」，工人有「工作服」，法官有制服，警察也有服裝；我看你們的門衛也做一套服裝(全場笑*)，大家知道，現在中央有了通令。禁止用國家的錢濫作一些「工作服」。後來我們有些校長在一起談論的時候，說倒是應該給我們這些校長特別做一種服裝。意思是說，如果我穿上這種服裝出來講話，我才代表校長，在作行政的指示。我如果沒穿上這種服裝，我就仍然是一個教師，仍然以研究學問的身份說話。這樣我說話份量就可以自由一點，不然總以為校長說話份量就重了。我覺得「校長」、「副校長」的行政職務并不說明他就更聰明，沒有這樣性的關係。

這些不說也沒關係，剛才我說了在浙大我沒有任何行政職務，只是在科大還有點兒作用。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今天我在這裏，也是在大學的講台。我想大學講台就應有大學講台的特色。什麼特色？在正題之前先稍微扯遠些，我們知道現在都實行「議會政治」。中國也是「議會政治」，我們現在正在開人大。議會政

治的一個特點，就是在開議會的時候，議員們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因為議會本身是立法者，如果它再受法律的約束，那麼誰又來立法呢？這就是矛盾。所以必須要求議員可以批評法律，改變法律，才能真正形成立法的作用。我們的人大原則上也是有這一條的。我的一些朋友是人大代表，他們說開人大的時候可以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制約來發言，原則是這樣的(笑)。我想借用這一個道理，我們知道大學是一個探求真理的環境，是尋求自然界的真理尋求社會真理的環境，我們不是立法者，而是自然界、社會規律的發現者、探索者。因此，在這樣環境中，對已有的人的發現，已有的人的成就，也可以提出異議，不受任何約束，這是大學必須有的特徵。我還可以再說遠一些。大家知道，大學這樣一個結構，最早在歐洲開始的，在意大利，英國等幾個國家。在那些大學裏，最早的系，可以說是神學系，而後再有法學、醫學、哲學等等系。神學也就是研究天主教的一套教義的。中世紀的歐洲是政、教合一的，教權就是政權；神學就是當時正統的思想。可是即使在那樣的環境裏，大學中研究神學的人可以批評神學、改變神學、

發展神學。當時歐洲的大學裏可以不受大學圈子外面的教規所制約。我有一年去了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學。它是意大利最早的大學之一，很多人物，像哥白尼、伽里略都曾在那裏學習過或講學。當時歐洲的教規有很多限定，不讓做這，不讓做那，在帕多瓦大學則是都可以做。譬如最典型的例子，當時天主教的教規是不准解剖人體的，因為人體是上帝造出來的。但在那個大學裏，就可以解剖人體。所以在一個大學的環境裏，探索自然界和社會真理是要比外邊更加開放；沒有任何思想可以作為正統思想不能突破。這就是一個大學講台所必須有的特徵。如果沒有這個特徵，我覺得就不能算是大學的講台。今天上午我們開的紀念愛因斯坦討論會，開得非常好。特別是有個年輕同志說了一句話，我覺得值得介紹給大家，就是「在思想領域，沒有任何一個優越的參考系」，我覺得這個說法非常好。原是物理學的法說就是說沒有一個特別的思想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其它思想，則是「平權」的。如果有了種種框架限制不能突破，我們怎麼能認識真理呢？所以在大學裏，在思想、言論上應具有更加充分的自由，才有可能得到新的東西。我在科大時學生會問我，「你當了校長後能給我們什麼東西？」我說：我身上就是這套衣服，也沒有別的東西。當然我知道學校可能有房子等等也許可以給你們擴大；即使這點我也不能給你們保證，我還沒算過我們的房子到底有多少。但是有一條我可以保證擴大的，就是思想上的自由。我認為大學裏邊大家說是教學的中心也好，是研究的中心也好，其實質是思想的中心。如果大學不出現什麼思想，那麼這個大學就沒什麼意思。所以大學就不應受某些思想的約束。對任何一種思想我們都可以提出疑問，加以研究和

發展。

我在和科大辦校刊、辦小報的同志座談時談到，我們現在的報紙都是受到一些領導的；譬如說，我們的《人民日報》是受黨中央的領導的，是黨中央的喉舌。《杭州日報》就是杭州市委的喉舌，這點我不加以評價。科大校刊是我們學校的，它就不必是我的喉舌。雖然我是學校的領導，我自己有喉有舌，我有什麼觀點就可以去說服人家，我說服不了人家，人家就說服我，都可以。不要給我來什麼喉舌。報紙就應當代表輿論；只有真正有了輿論，我們才可以有思想自由的環境。我今天講的話也并不特別，實際上在「五四時代」蔡元培就都講過類似的話，原話也包括了這樣兼容并蓄的思想。如果一個大學在探索問題，研究學問時不能隨便講話，就不成其為大學或者不夠大學的資格。自去年以來，科大的小報非常之多。我沒有統計過，有的學生告訴我高潮時候達到了十幾種；女生還有專門的報。只差一種小報了，就是「科大小報文摘」（笑），好！今天在大學講台上講話，我也要求是可以自由講話的權利和這樣的大學所應有的環境。

二、怎樣擺脫改革走向失敗？

今天我要談些什麼問題呢？海報上已經寫了是關於改革的問題。改革是大家目前很關心的，我們怎麼來看待這些問題。我想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改革到底能不能成功？中國的改革前景如何？這個問題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嚴峻的，我想在座各位都可以活到二〇〇〇年。（笑）是成功還是失敗？很多人都再議論，在火車上我們也經常和生人議論這個問題。今天我來談談我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可能是不成

熟的，但確實是我自己的真實的一些看法。首先，問改革前景如何、是否成功？就要問什麼叫「成功」？這也是物理學的特點，要把概念弄清楚了才能研究問題。什麼叫「改革成功」，我在談話中發現各人和各人，看法都不太一樣，各種人和各種人的看法也不一樣。我想這是允許的，大家對一個社會改革想像不一定完全一樣，所以什麼是成功也不完全一樣。譬如，我們在社會上碰到的改革問題是：工資什麼時候改革？能不能成功？（笑），這是現實問題，不是說來笑笑的。下面我還要說「工改」可能的前景。在大學裏的教師都關心提職的問題什麼時候能解決？現在正凍結着，怎麼改革？學生可能關心考試的問題和中學到大學獨木橋問題的改革。各種人有各種人的看法。有沒有共同的想法？也許是有的，就是到二〇〇〇年翻兩番的問題，認為「翻兩番」是改革成功的標誌，這是宣傳得很多的觀點。我覺得單純講工資，單純講提職，單純講考試都是不全面的，單純來講翻兩番也是不全面的。但是總的來講，這些不夠全面的看法湊起來也許是個全面的看法。改革能不能成功？我說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敗的可能。當然這句話等于廢話。不過我這樣說是要說明一點，并不一定我們的改革是必勝的，不一定！我想做一下證明。就從鄧小平同志的話證明起。我最近曾親自參加了科技體制改革工作會議。鄧小平同志給我們講了話，在報紙也發表了，講到了：再往後看五十年，世界上仍然會存在着的基本矛盾概括成四個字，東、南、西、北。這個提法是相當精辟的。東西的矛盾是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爭奪，即所謂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這個矛盾在五十年內是不可能完全解決的。另外一個南北的矛盾，就是經濟問題，貧窮和發達的矛盾，按

鄧小平同志的看法，五十年內仍然有一部份貧窮國家一部份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不可能都達到發達社會。因此，五十年內，中國有可能改革成功，變成發達國家，也仍然有可能繼續是發展中國家。根據鄧小平同志的話判斷這兩種可能性在我們中國都存在。這就不能不使我們仔細地想一想，我們的前景如何。當然，我們大家都希望改革成功，希望我們中國很快發達起來；但前景仍然是兩種。我覺得要看到前景中還有很多是未卜的東西。成功的可能性大家都歡迎；失敗的可能性不僅有，而且有先例。最近世界上進行經濟上、體制上改革，希望從發展中變為發達的國家很多。這些改革中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最近的兩個失敗的例子，我想大家都知道。一個是伊朗的失敗。伊朗國王巴列維要進行改革，企圖使國家現代化。但是失敗了，現在走到完全是教權的一條路上了。另外一個例子，與我們對比更近一些，就是波蘭的失敗。波蘭也企圖改革一些經濟體制，改變落後狀態，但是造成了社會的極度不穩定。到現在略微平靜了一些，但仍然沒有擺脫低潮的狀況。中國是不是一定不走到這條路上去？當然我們大家都這樣希望，但希望是希望，還必須認真分析一下有那些因素可能使中國走到這條路上。如果不看清這點，很可能會在盲目樂觀的狀態下走下去。

我下面再來說一說我們的改革應如何才能擺脫掉走向失敗的可能呢？對此，我沒作過很全面的研究，我自己的專業是物理學，對社會問題應當說是一知半解。不過，物理學家總是愛說一些社會問題，從我們的開山鼻祖以來就有這個習慣。物理學的開山鼻祖是伽里略，從伽里略開始就喜歡對社會說三道四。現在物理學家一般說來都喜歡說三道四。這類說三道四

裏頭有可能是不對的，但也有可能是正確的。社會改革怎麼做，才能避免走到失敗的路上去。我想現在說得全面是很難的，但至少有一條是必要的條件，就是重視科學技術。很早在一五四時代就有「科學」與「民主」來救國的兩個口號，我今天先講講科學的問題，順帶也講到社會的民主化問題。我們比較熟悉的語言「重視知識，重視人才」，實際上和「重視科學技術」是一個含義。我想一般的論證大家恐怕沒什麼興趣，因為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問題，大家都已學到一些標準論斷。我想講講中國一些實際的情況，我們理論上說得很多，但是否真正解決了？差距是多少？所謂知識，所謂科學技術是一個普遍的概念，不單純是一經濟上的概念，這是什麼含義呢？我們通常說中國經濟落後、要發展，經常舉的例子是缺乏科學技術；這類例子當然需要說，我給大家說點具體的。這次在科技體制改革會議上，宋健同志的報告中學的一個數子：對全世界一、二六個國家、地區的國民經濟產值做了統計，中國的人均產值在這一、二六個國家中是倒數第廿幾名。大家剛聽到倒數第廿幾是很落後了，實際上廿幾這個「幾」字是更落後，都說不清楚自己到底倒數廿幾的「幾」！（笑）不知道自己在那兒。按人均年產值，日本是一萬一千美元，美國是一萬三千美元，瑞士是一萬七千美元；中國相比是日本的二十七分之一，是美國的三十三分之一，是瑞士的四十三分之一。就以上海來看，人均年產值是二千三百美元。四個上海人的產值才頂上一個日本人的，六個上海人才頂上一個美國人。當然，上海是中國最好的地區，是中國的「奇點」。但要注意我們還有九個省份，人均產值在三百人民幣以下，不到一百美元。這九個省在中國三十個省份

裏已占了近三分之一了。如果在世界上排的話，這九個省和一個國家可以并列的，就是乍得。乍得在世界經濟中倒數第一。這種情況，給了我們很深的印象，要改變中國落後的狀況當然要大力發展國民經濟，這是我們往後五十年的重要任務。在座很多都是學工的，以後能去企業、工廠裏工作，也是為着這個前景。

三、現代化不止是經濟發達

我要強調說的重視知識、重視科學技術、重視人才，它的意義不只是在經濟方面。要改變一個國家的狀況，不能只看到經濟方面。經濟方面的確非常重要，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它上面。但是，僅有這條是不行的。而知識、科學或有知識的人的影響也不只是經濟方面。在中國，往往把科學技術看成只是一個生產力，（下面我要說它的確是一個生產力），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我覺得不對的。它應是代表一個全面的東西。為什麼西方整個發展起來，因為西方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及整個文化都受到了近代科學技術的影響和推進。所以能造成一個全面的發達社會。我下面要說一種觀點，就是說到底什麼是發達國家？國際上有很多觀點。當然我們可以具體說，美國是發達國家，日本是發達國家，西歐是發達國家。但要給出一個定義，指出這些發達國家的普遍特徵，怎麼定義？從中國最近的一些宣傳，我們就會定義經濟上人均年產值到幾千美元以上，就夠上發達國家了。這種定義是不對的，至少是不全面。只看經濟不行，我們可以找到反例。有的國家人均產值很高，但大家仍然認為它們不屬發達國家，譬如說阿拉伯世界，有些阿拉伯國家有石油，這些產油國家的產值很高，像科

威特。科威特國家的人不大工作，都是外國人去開油。他們自己也不學，不懂技術，完全是坐地拿錢。科威特的人均年產值很高（上萬美元），但仍然不算發達國家，這是公認的。當然還有南美的國家，像巴西，哥倫比亞，這些國家的人均年產值都超過一萬美元，也不算是發達國家。經濟指標不是唯一的，因此，我回過來說我們要說的問題。如果說我們到二〇〇〇年的任務只是翻兩番，我認爲是不全面的。翻兩番作爲標誌性的提法，當然可以，如果僅僅如此就可能不是發達水平，甚至還不到小康水平。社會是全面發展的，經濟的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不能作爲唯一的標誌。這些國家經濟上去了，其它都沒有上去，有很多因素。譬如，政治上腐敗，貧富懸殊和社會動盪是不能算發達的社會。要是單純強調經濟翻兩番，用任何方法都可以；我想並不是沒有什麼捷徑，但可能走到斜路上去。比如，巴西在不多的幾年中，產值就上去了。但還不是發達國家。我去年去了巴西一次，在里約熱內盧待了一段時間，看它的表面是相當繁榮的；但它的經濟怎麼上去呢？就是靠借錢，借了大筆錢辦起工廠，產值當然很快上去了。但是，這個社會是不發達的。我沒有全面調查過巴西的經濟情況，從我親身的感受和巴西人告訴我的來看，生活極其不穩定。通貨膨脹率百分之二百二十。在很多國家住旅館，都是到臨走那天再算賬，（我們現在也是這樣）。在巴西我待了兩個多星期，出了一件新鮮事。我住了第一個星期還要再住，並沒有走，店老板就把賬單拿來了，說你要交錢。賬單上寫着一條是必須在接到賬單的二十四小時內交清（好像是最後通牒一樣。）（全場笑），如果不在二十四小時內交錢，就要付更多的錢。爲什麼他要這樣？并

裁小鞋 方成作



非要使你爲難；他實際上也受不了。通貨膨脹太厲害了。如果他不一星期一星期地收錢的話，下星期就虧了。大家沒有在通貨膨脹的社會中生活過，所以不太了解這些：看到牌價擺在那兒，這星期這個價錢，下星期就另外一個價錢，看着漲。這種社會是極其不穩定的，這樣完全靠借債一套方法發展是不行的。（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負債國，借了一千多億美元。）翻兩番靠找些邪門歪道也可以，我再舉個例子，南美的哥倫比亞。我去年正好也去了哥倫比亞一次，它的經濟也是一下上去了。（人均年產值三千多美元）它是怎樣發財的呢？靠販毒。每年可以獲得八十億美元的販毒收入。販毒在哥倫比亞到處都是。雖然報紙上宣揚禁毒，哥倫比亞還查禁販毒，實際上這些都是做作，去年哥倫比亞搗毀了一個販毒的中心，爲什麼政府要抓呢？因爲那兒是一個游擊隊的基地。

儘管它的社會人均產值很高，仍然是一個不發達社會。我在哥倫比亞待的時間還長一些，有一個月樣子。剛才我說的通貨膨脹，在那個社會還少一些；但它的貧富懸殊特別大，甚至大到還有奴隸式的階層。不像發達社會比較平均、民主一些。我記得有次到哥倫比亞北部一個很小的鎮去玩，這個鎮在大的地圖上能看到的，叫卡爾塔海納。這個鎮儘管很小，但畸形的繁華。它的繁華就是靠販毒來維持的。我們到哥倫比亞聽到了多種多樣的販毒方法，其中一種就是用飛機，直接從哥倫比亞飛到美國空投。當然飛機不容易飛進美國，美國的雷達系統連蘇聯的導彈都進不去。販毒的飛機在卡爾塔海納起飛，都是小型的飛機，可以把草場當跑道起飛。它不直接飛進美國；等着美國的民航客機到的時候，跟在民航機後頭，這樣雷達就看不出是一架還是兩架飛機。就靠這種「卡爾塔海納技術」得到畸形的繁榮。我就說我這一輩子的生活各種各樣，到了卡爾塔海納居然還過了幾天「貴族生活」，「貴族」的定義並不是說生活標準特別高，關鍵是有奴隸來服侍你。我和幾個同事到那兒去玩，住在旅館裏；黑人種是不准進的，只有我們這些學者可以進去，在那裏住就完全是一種貴族生活。我們去海邊游泳回來，隨便在黑人攤子上拿了就吃，說你過會到我那兒拿錢去。我們進了旅館，而那些黑人却不准進去，在外面等着。你什麼時候出來什麼時候給他錢；你愛什麼時候出來就什麼時候出來，到了那種程度，完全是奴隸和貴族的一種關係，非常不平等。這樣一種社會，雖然人均產值很高，但絕不能定義爲「發達國家」。

我上面意思是說：不要只看到靠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是全面的。什麼是發達社會的定義

呢？現在還沒有很清楚，至少我還不知道有。但大家同意一條「判據」是比較合適的，就是教育的問題。現在看到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別在教育上是明顯的，不像剛才說的按經濟定義的含糊。在發展中國家的教育一定是普及的，看不到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是普及的，剛才我說的那些南美國家、阿拉伯世界，都有文盲。不是百分之一、二的，而是百分之二、三十、三、四十的文盲，在發達國家，有個強化教育的過程，整個來說沒有這個問題。西歐、北美、日本與這些國家有明顯差別。中國也是這樣，經濟不發達是個明顯的失利，教育不發達更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我們整個文化水平比較低，這是我們不能很快走向發達的重要因素。在全國來說我們的教育水平很低。關於這一點一般的例子舉了很多了，我想在這兒就不再舉這些例子來說明教育水平低怎樣影響工業，先進技術的掌握等等。我只舉一個很有標誌性的例子說明我們的文化水平比較低。去年《人民日報》六月十六號第六版，大家去看看，一定有這篇文章，題目是《水城的深情》。這篇文章是記錄趙紫陽總理訪問意大利的威尼斯的過程，文章裏有一段話，表現了一個重要的錯誤。描寫趙總理和市長會見時，市長送禮給趙紫陽總理，威尼斯市長送給趙紫陽總理一幅古地圖，（當然是一件有價值的東西，代表了人類知識、文明、進步的一件東西，表示很尊重從東方文明國度來的使者）趙紫陽總理接了禮物，問了市長一句話：這幅地圖是在哥白尼以前畫的，還是在哥白尼以後畫的？（這個問題問得很有水平，我們知道哥白尼是人類認識自然、宇宙的一個標誌性人物，而且在意大利學習過。這個問題的確非常得體、非常漂亮），市長答：這幅地圖是在哥白尼之後

畫的。下面趙總理說了一句話則完全錯了，趙總理說：是啊，如果沒有哥白尼，我們現在就不知道地球還是個圓的。這句話我們知道是錯的。哥白尼最偉大的發現是：地球是運動的。他是地動說的創始人；而地球是圓的是歷史上的地圓說。地動說和地圓說是兩回事，到哥白尼時代才承認地動，關於地球是圓的則是在古希臘就知道了，而且還測量過它的半徑。地圓這個概念不是出自哥白尼。我後來去過意大利兩次，他們也覺得這是外交上的一個失誤，這個失誤的確代表我們的文化水平較低，地球是圓的還是動的，是什麼時候知道的，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當然，我覺得這個事情不是趙總理一個人的問題，他可能沒有專門學過天文學史，是難免的。但是當時是翻譯譯的吧，我們培養的翻譯不懂這事，記者也不懂這事，還津津有味地寫下來（全場笑、鼓掌），《人民日報》的編輯也不懂，（笑、鼓掌）有一串人都都不懂。今天大家都笑了，我覺得這種笑是對於我們處於落後狀態的一種「笑」聲，不知道不知道地球是圓的或是地球是動的，跟經濟效益沒有關係，但是這是社會的一個標誌。這說明了一點，我們現在只看到科學技術的單純的技術的方面，的確應當看到這方面強調科學技術面向經濟，應當加強這方面的聯系、推動。但科學的作用絕對不僅僅是經濟的一個方面。昨天我在物理系特別說到這個問題，我們的物理學不但是技術的基礎，而且本身是人類的觀念。人類之所以達到今天的智力狀態，是和物理學有關係的。因為一個社會的發展除了物的方面還有人的方面，只有發達的技術，沒有開化的人，沒有智力的人，這個社會也不能稱為發達的社會。就不可能改革成功。

中國之所以現在文化落後，知識落後，科

技落後，這有各方面的原因，造成這種落後狀態；不改革這些，改革的前景并不美妙。這些原因當然很多，長的尺度來看跟我們的長久的封建歷史有關。短的尺度來看，跟我們三十年來各種各樣流行的「理論」，流行的觀念，或者所謂「正統」的觀念是有關係的。大家都知道，實際上我們三十年裏，特別是從一九五七年以後，搞了很多是完全仇視知識、敵視知識的政治運動。從所謂反右派鬥爭到文化大革命，實際上都是企圖消滅知識的運動。這些東西是造成我們國家現在知識水平如此低的一個近期的根源。雖然我們現在表面上看到了知識的作用，強調知識的重要性、說重視科學技術等等。而為什麼現實中並沒有改變得那麼多，是什麼根源呢？我認為是和近期的很強的正統觀念有關，造成這一系列仇視知識，仇視文化的政治運動，應當說是和毛澤東同志晚年的一套理論是有關係的。他的很多說法到今天還有直接影響，要提倡尊重知識，改變我們民族的落後狀態，而不涉及到他的一些錯誤理論，我想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毛澤東同志在晚年有很多這樣一些錯誤的東西，我可以列舉幾點，一個是五八年開始就說：「知識分子勞動化」，這個觀點的實質也是錯誤的。再進一步他又發表了所謂「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理論。一般說來，他的「高貴者」指的是有知識的人，只是不明確。如果不看含義，這兩句話好像還有點道理，但他實際上說的是：有知識的人最愚蠢，沒有知識的人最聰明。再往後說得就更清楚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說「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還是要」即可以辦，也可以不辦，等等。我覺得這些東西對我們現在還有一定的影響，並不是它的影響已經沒有了，所以我們今天在提倡尊重知識時，不能不涉

及這種問題。雖然，我們國內有些地方已改變了這種態度，但還有些地方仍然採取這套觀念來對待知識，對待人才，對待有知識的人，即對待知識分子。我覺得這種狀態如果不改變，改革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

下面再深入講一下，在最近這次會上，大家舉了很多知識不受重視的例子。上海的一位同志講到一個腦外科醫生，他的工資收入還不如一個理髮師的。也就是說，修理腦子裏頭的還不如修理外頭的（全場笑）。這種例子還很多，不用再舉了，俯拾皆是。知識分子的經濟地位倒掛實際上是和知識分子政治地位倒掛連在一起的。有知識、做複雜勞動反而拿的報酬更少，這是完全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我們要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或為什麼這種事情不能得到充分的重視而加以解決？我認為有它的理論上的根源。這與毛澤東晚年的那一套一直把知識分子放在「團結」、「改造」、「教育」的地位上的理論是有關係的。所以，要改變知識分子的狀況，首先就必須給知識分子到底處於社會上什麼地位以論證。

下面我來給以論證。這個論證大家也可以在已發表的「科技體制改革」第十一稿上看到。我參加了第五稿和第十稿的修改。第十稿的修改是在前不久開的一次科技體制改革會議上進行的。在今年一月份第五稿的修改中，我發了一次言，講到要改變知識分子的狀況，關鍵是要給知識分子的地位以正確的論證，給它以理論基礎。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應當處於什麼地位？從前知識分子是「老九」，現在當然升級了，升到了「老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全場笑）。首先，我就反對把社會上的人按等級的分法。首先是反對！但是，如果你要當真和我辯論誰是第一的話，我就要給你論證，

在那次會上，我也是這麼發言的。

四、勞動人民也要知識化

大家都公認的一條原則：科學是生產力。下面我們就從這條「公理」出發。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而且是生產力中最積極的因素，現在沒有人懷疑，因為現在我們正需要用科學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誰掌握最先進的生產力呢？是從事科學技術的人，也就是知識分子。從事科學技術的人就是掌握部分先進生產力的人，那麼他們在社會中應當占什麼地位呢？如果按照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論證：產業工人是社會中最積極的成份，或工人階級中最先進的成份（工人階級包括產業、手工業等各種各樣的工人）。為什麼說產業工人是工人階級中最先進的成份呢？那是因為產業包括煤炭、鋼鐵、汽車業等等。這些工業是社會生產力的帶頭者，這些帶頭發展了，生產力就發展了。所以從事這些生產的人就是工人階級中的最先進成份。這是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論證。現在我們完全借用這種方法論。那麼誰從事現在看來最先進的生產力呢？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掌握科學技術，而科學技術又是生產力中的最先進成份。由此看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這個詞不但應該說，而且還應該是工人階級中的先進成份。知識分子是從事生產力最積極因素活動的人，而從事最積極因素的人反而排在最後，這總不合道理吧。這個論證裏面沒有什麼邏輯上矛盾的地方吧！這不只是邏輯上的論證，事實的確也是如此。

我們知道隨着社會的發展，不同階層的人有生長、發展和消亡的方面。比如說，隨着社會的發展，最早是牧畜，後來農業人口越來越

多。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業人口就越來越少。美國現在的農業人口只占百分之一，從事農業已不占主導地位。隨着生產的更進一步發展，像現在一些發達的國家，從事產業的工人也越來越少。我們傳統所講的那些產業，如鋼鐵、煤炭、化工、汽車等需要體力勞動的硬工業，現在西方稱之為「夕陽工業」，即這些工業已經沒落了，已經是「夕陽」了。所以美國儘量把這些工業推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去，而它自己不發展這種又冒烟、又排廢水、辦得很的工業。它在印度最近出事的那個工廠搞的就是化學工業。從事這些「夕陽工業」的人越來越少，在經濟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小。而另一方面，則越來越多地需要科技知識的人。像美國這樣的社會，藍領工人已少于白領雇員。藍領工人是從事體力勞動的，白領則是從事技術工作的。也就是知識分子已占多數，所以知識分子是最有希望的一階層，從現在來看人數越來越多。農民則越來越少。我國的農民也越來越少，否則就沒有到達一個發達社會。由此可以看出工人階級的地位。我已說過我不贊成這種排隊，把社會上的人分成老大、老二、老三的方法。如果要排，知識分子應當排第一！對不對？不難得出，毛澤東同志對於知識分子的那句「知識分子要勞動化」是錯誤的。知識分子本身就是勞動者，而且是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勞動者（全場鼓掌）。「勞動人民要知識化」這句話當然還對，這是很需要的（笑，鼓掌）。

這些觀點是我在會上的發言中講的。這些發言，當然不能全寫進去，全寫進去要得罪一些人。但是大家注意，這次會上發表的文件第九節上，有句話反映了這種思想：「科學技術人員或知識分子是新的生產力的開拓者」。大家不要放過這句話，因為抓住了這句話，我們

就可以邏輯論證，推導出以上說的那些東西（全場鼓掌）。

我們的確希望社會改變對知識分子的觀點。但改變觀點是需要一場鬥爭的。是不是一定能夠把知識分子變成社會的主導，還不是當然的事情。剛才說知識分子對生產力起主導作用，其實不只這一點。科學技術不單是生產力，它對社會的文明、意識形態等都有影響。知識分子對社會也有多方面的影響。這種多方面的影響推動社會的發展。關於這個問題，我和歐洲的學者討論過。他們也說：在歐洲知識分子的影響也絕不只限于科學技術，而對社會有全面的影響。下面講一段歷史來說明這個問題。歐洲上百年來可以說一直在打仗。二次大戰前，從拿破侖、俾斯麥到希特勒一直在打仗。這當然有經濟上的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戰後歐洲突然就變了，特別西歐形成了一個共同體，它們之間沒有任何打仗的跡象，最後西歐國家之間的國界幾乎都沒有了。六、七年來我每年都去意大利，每次去都到意大利與法國的邊界上看看。最早去時，意大利和法國的邊界上還有一些警察、欄杆和崗哨。前年再去的時候，什麼都沒了。就有一個牌子，寫着：這邊是意大利，那邊是法國；就像街上的路牌那樣大小，這邊寫着意大利文那邊寫着法文就完了。開始消失兩個國家的那種概念。特別是在西歐共同體內部瑞士、法國、意大利等國家之間幾乎沒有什麼邊界了。爲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氣氛？如果現在想讓他們打仗，很難有這種可能。這種現象是不是搞政治的人員造成的呢？當然最後是一些政治家、政客簽字造成的。歐洲人之所以形成這種心理，覺得只有去掉國界實行合作；以共同體的方式才能發展整個歐洲，原因並不在於一些政客、總統等一些人，而是

一批物理學家。歐洲的非物理學界也是這樣分析的。最早揭示出合作才能使整個歐洲達到共同繁榮的事件是由物理學家促成的。這就是歐洲的聯合核子研究中心的成立。這是戰後歐洲的一件新鮮事情，不同國家的物理學家在瑞士的日內瓦建立了這樣一個中心，共同研究，它對社會觀念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們知道物理學家在我們國內的政治地位不是很高的，社會影響也不是特別大，那是因爲跟我們的社會發展有關係。但在歐洲這些人的影響是很大的，雖然只是做物理學研究，但有它的社會影響。原因是物理學本身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特別是原子彈造成了二次大戰的迅速結束，人們看到物理學有這麼大的作用，物理學家的合作對整個歐洲有刺激的作用。在公眾輿論的刺激下歐洲就向着合作的方向發展。

從現在來看，知識分子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在社會中應當起着先進的作用，而作爲知識分子則應該發揮這個作用，才可能使我們的社會避免一些倒退和失敗，走到改革的正確的路上。這就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目前面臨的任務，任務的確是很重的。我們還有很多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包括科學技術問題和社會問題，這些問題都有待於我們的工作去解決，才能夠使中國的改革不致於流產。

五、知識份子有社會責任

不知你們的領導有沒有跟你們透露一個消息？如果沒有的話，我跟你們透露這個消息。這學期一開學，我作爲科大副校長，便接到了上級的一個通知：你們校長要特別注意，不要讓學生鬧事。我在學校的時候便公開對學生說：「希望你們不要鬧事」（笑）。因爲在春節

以前全國有幾十所大學出現了鬧事。除了北大和師大有名的大學，還有一些地方院校，南京大學是比較早的。那麼鬧事的原因是什麼呢？主要的可能是伙食問題。有的同學說：我們要「反飢餓」（全場笑），關於這些事情我在學校時也給學生公開說，主要的要看學生鬧事的原因是什麼？真正鬧起了事校長也管不了；如果鬧得沒道理，自然不用校長管也不會鬧下去了；我是這種看法（鼓掌）。我曾建議我們科大的學生想一想，這些現象的根源是什麼？比如說你覺得食堂辦得不好，是不是我們學校的食堂辦得不好呢？當然，我們學校的辦得也不好，學校的食堂辦得好的確不多，我在學校生活了幾十年沒有聽說過某個學校的學生說食堂



第三代青年是不盲從的，圖為深圳大學飯堂

辦得很好。我不知道浙大的情況如何，我不涉及浙大的問題。學校食堂當然也是需要改進的，但根本問題是物價的問題。學校的菜牌子這個星期這個價錢，那個星期又是另一個價錢，是有它的根源的。我就建議學生應當去仔細想一想，這個問題的根源在什麼地方？如何去解決。這是我們知識分子的職責。怎麼解決？如果鬧事可以解決，也可以鬧事。如果這樣解決不了，就應當用別的方式去解決，應當多思索一下。有的同志特別害怕學生鬧事，我覺得使學生鬧事的那種觀點別的人不是沒有，我們教師並不是感覺不到物價在漲，也感覺到在漲，只不過學生習慣於比較直接了當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騰」（揮拳），你物價漲了！（全場笑、鼓掌）。我覺得這種鬧事表明了學生對社會的敏感，這種敏感是非常可貴的。我們應當利用我們這種敏感去解決社會的問題。

下面我說說，我們改革中出現了什麼問題。圍繞着改革的可能成功與可能失敗，學生鬧事是知識分子敏感的一種標誌，就像歐洲核子中心一個研究所對歐洲共同體的成立起了導火索的作用。我們應看到學生現在有些不穩定，為什麼會有這種動盪？儘管這些問題不大適于在報紙上公布。在這次科技體制改革的會議上大家也都提到了，實際上都估計到改革會有很多困難。從根本上來說，不要只看到表面上的菜牌子，要看得深入一點，菜牌子是個反映社會的一個晴雨表，從三毛漲到三毛五有它的深刻的根源，不是簡單的五分錢問題。我們所面臨的一些最大問題，實際上沒有解決好。如果再不能解決，改革的成功可能會成爲泡影，或走向歧路。第一個最大問題，我覺得我們的改革缺乏理論，整個改革目前都處于缺乏理論的狀態。我們的改革是多方面的，比如有一種

國際關係方面的改革，這種問題可能好辦一點。我們和香港的問題，現在是一國兩制，天才的思想。兩制我們可以維持五十年，以後怎麼我們不管它，至少我們這一代人不想它。這個問題不大，不再需要進一步的理論也可以維持五十年。但是經濟改革方面的情況就不同了，我說得深入一些。經濟體制改革現在引入這樣一個詞，叫做「計劃市場經濟」，這個提法含義是什麼呢？粗淺的想法就是想把計劃經濟中的東西拿來，把市場經濟中好的東西也拿來，湊到一塊兒就更好，使我們的社會發展得更快。的確，這個想法是好的。問題是能否真正把兩個好的拿來湊到一塊兒，是不是有可能造成這種情況？是不是完整？這個問題實際沒有解決。昨天，我碰到了中央黨校的一位同志。他告訴我，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在黨校裏也是不能講了。以前的那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寫法和我們現在的經濟改革這套做法完全不一樣，不是說修補補能解決，而是從系統上就不能對號。是不是新的經濟學就完整呢？我覺得不完整。用我們物理上的說法，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資本主義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套完整的東西，計劃經濟也是一套完整的東西。兩套東西十分不同，問題在於能不能把它們結合到一塊兒，我們希望能結合到一塊兒，能夠結合得好，但如何才能結合得好？並沒有完整的理論，所以我們經常會出現物價上漲，然後出現年底前學生鬧事的情況。爲什麼會出現？實際就是兩者沒接好，就造成所謂消費基金失控。消費基金一多，物價便漲；有的人收入增長，有的人沒長，特別是學生沒長，那肯定會出事。這種情況我想是有它的根源。原來是計劃經濟，現在希望發展市場經濟，在農村範圍內

可能還稍微完整一點，但到了城市裏就變得非常不清楚。這裏面有很多的漏洞，很多地方造成兩種體制在一塊不完整。在一個社會中，我們希望用兩種經濟體制中好的，但弄不好兩種壞的都來了。這個問題我覺得並沒有很好解決，只有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了，我們的經濟才能達到穩定的地步。剛才我說到了波蘭，也是這個問題沒解決好，波蘭鬧事就是改革中有一部分人的工資升了，有一部分人沒有，結果物價猛升，工人便遊行、鬧事。我們國家的政治情況和波蘭不完全一樣，尤其清除「四人幫」以後，我國政治情況還是比較穩定的。但社會有它自身發展的規律，經濟上沒搞好，政治上的穩定並不是就可以解決問題。這是很明顯的問題，現在就已有動盪的跡象。

第二個問題，我們的改革要有理論，還必須要有實際的東西。而實際上目前碰到的最大問題（我參加幾次改革的討論會有這樣一個印象），就是我們管理水平相當之差，整個國家的管理水平相當差，標誌是在心中沒有數字——心中無數。學物理的都知道，我們要完整了解一個東西，你要把方程式給我。我剛才說要有理論，就是要有完整的動力學方程式。同樣，要知道經濟的動力學怎樣，也必須有理論指導；這樣知道了現在實際的情況，我就可以計算和預測經濟是翻兩番還是翻幾番。社會情況如何？我都可以預測。對於管理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有理論，現在我們缺乏理論。此外我們還非常缺乏原始的數據。這次討論時，我也曾發表過這樣的觀點：我們文件寫的東西，儘量寫成這樣，但還是很粗糙的。尤其是第一段裏寫了很多這個這個太多，這個這個太少，這個這個不夠……，大家看文件裏有很多這樣的詞。我就這幾點發表過一些意見。我覺得像

「太多」，「太少」，「不夠」這樣的詞寫在一般的文件裏還可以，但在管理上是不行的；管理上你就要告訴我什麼叫「太多了」，什麼叫「太」？什麼叫「多」？如果沒有一個定量的數據，我是無法給你管理的。科學的文件必須有科學的管理才能夠體現出來，沒有這樣定量的觀點，是不能體現科學的管理的。我們以前往往是搞階級鬥爭的口號，不需要定量，只要階級敵人不過百分之五這一個量便夠了，（全場笑），其它的都不管。現在的經濟可不是只是這樣一個百分之五的簡單問題；必須要對各個部分都有數，才能計算將來怎麼樣。但是由於我們相當缺乏原始的數據，無法把剛才我說的那些「太多」，「太少」或「不夠」之類加以定量的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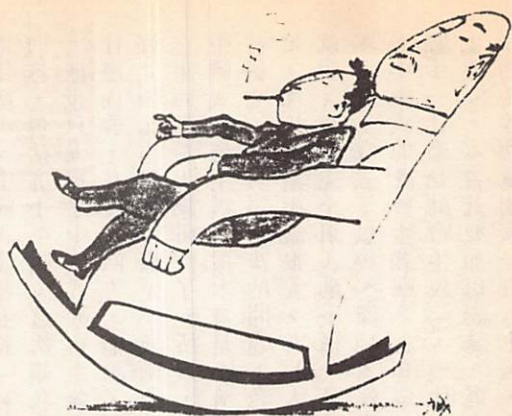
可以再說遠一點。我們在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管理，一會兒說我們的經濟發展應該是農業、輕工業、重工業，一會兒說重、輕、農，各種各樣的排隊都排過。其實這些都是幼稚的管理方法，或者說不是管理的管理。什麼叫重點是重工業，你必須給我一個定量的比例，否則怎麼說這是重點，寫小說可以這樣說，如果是定量的管理這樣是完全不行的。

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個定量的觀點才行；這種定量觀點的缺乏，在我們國內造成了管理上的紕漏，這確是我們面臨的問題。現在我說工資問題。工資改革為什麼到現在還遲遲不下來——千呼百喚不出來（笑）。可能在座的同學都不太關心這個問題，但在座的老師都關心這個問題。我聽到這樣一個消息，據說原來我們的勞動人事部，計算按職稱等提工資（講師按講師的提，教授按教授的提，這樣的工資叫職稱工資），計算了一下，我們國家再花三十億就足夠解決工資調整問題；去年夏季以後大

家可能聽到一點樂觀的風聲，可是到後來再稍微仔細一點兒算，說：可能要六十億，一下子就差一倍。在我們物理學上做實驗差一倍是不允許的，就不讓你出實驗室了！這叫什麼管理呢？一個人原來每天吃兩頓飯，現在只吃一頓，這差別很大了。後來到了十二月底再計算說六十億也夠不了。所以到現在就卡住了早就說的調整中小學教師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調，這已經成爲一個笑話了：中小學教師調工資——空調（笑，鼓掌）。這就反映了我們的管理水平相當之低。剛才說知識分子應起一些作用，我們科大有很多學生希望學管理，這是應當支持的。只有一定的基礎、文化來學習管理，才能逐漸把我們這種不定量的、含混的東西去掉，把誤差減少。否則管理國家的人一會三十億，一會六十億，這樣隨便調整本身就說明他自己不夠資格管理。所以這個問題是沒有解決的。那怕你有好的願望，但沒有這種能力，估計不準確，完全一下子會出現一些問題。大家可能不知道，去年夏天時說，我們的外匯儲備很多，多得很，大家用吧！趕快用！這是中央的一些說法。結果我們「嘩」的一下用，九個月外匯儲備從一百多億下降到六七十億。這種管理方法是幼稚的管理方法。外匯多了讓大家都用，那要有政策。像西方那樣一些社會（當然他們已調整好了）如果現在銀根緊了或是鬆了，那就調整利率來改變。錢多了希望大家借就把利率調得較低一點，那麼大家自動就去借了。不能靠號召的方式去解決問題。這種號召方式只有在階級鬥爭或衝鋒陷陣時才有用（笑，鼓掌）。現在我們總說所謂工作重心要轉移，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實際上工作方法依然是階級鬥爭的那套工作方法。因此我覺得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改革的成功仍然是很危險的。

六、特權是封建主義的特徵

再講一個問題：我們社會面臨的改革的成敗與否還有一個問題在裏面起作用，就是我們有長期的封建傳統。那怕解放三十年了，但我們並沒有把封建主義的東西消滅掉，而且在一些地方仍然還存在着、滋生着。封建主義的東西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特權。雖然我們幾次搞所謂民主化中都要指出來一些東西，但稍稍不注意，這個東西便又冒出來。因為這個東西在中國是相當頑固的，不是某個人、某種方式、某種改變就可以不顧這些了，一下改掉了，並不是那麼簡單的。我們常說的極左的東西便是封建的表現。現在有沒有呢？依然有！而且如不注意，依然很厲害。剛才說過由於我們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沒有結合得很好，因此有些人就可以在這裏面鑽空子。大家學熱學時都知道，如果有兩種溫度便可做成熱機了。我們的兩種體制便相當於這兩種熱源。有的人便在這兩個「熱源」中來回循環做熱機。這個「熱機」不是建設我們的國家，而是破壞，而是搞他的封建的東西。特別是我們現在的兩種經濟不諧調，有一種情況正在發展。這種情況就是所謂的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在發展，或新的買辦在發展。這樣說可能厲害一點，但實際情況是這樣。最近報紙上已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了，（實際上很早就有人指出了這一點）。比如說我們的銀行，原來我們的銀行是有計劃的，你這個工廠、學校要用錢是有計劃的，沒有現錢可以用，都是用計劃指標撥來撥去，不需要通過現錢。現在我們銀行可以搞活經濟（搞活經濟當然是必需的）。銀行可以貸款，這樣一來，銀行一搞活就不按計劃了。按計劃就無所謂了，不按計劃銀行就可以有選擇，銀行的選擇人就很有權力。如果弄得不好，銀行愛貸給誰



靠背椅 方成作

就貸給誰，怎麼貸，銀行選擇人便真正地變成老板。要占用這部分資金時他設計劃經濟是國家給我的權，如果說完全是國家的他又不能隨便用；他要用的時候說是市場經濟，又可以隨意用了。這種情況就造成了他在兩種體制之間沒有接好而來回鑽空子，造成了一部分掌握經濟權力的人或掌握政權的人進行經營，那不變成所謂官僚資產階級，實際上就是這麼回事。還要加上買辦，因為現在開放了，可以做洋貨了。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大家在學校關起門來也許不太了解這問題。我也不太了解，以前在學校裏做學問想宇宙如何如何，不大想人間的事情。實際上有很多這樣的問題，造成所謂「官商」。這些都是實際存在的，我們如何制止，如何抵制，如何改變，並不很清楚。我們的整黨，整不正之風，原來只是房子多少的

問題。房子多少雖然整了一下，但整得也不是很徹底；而占房子多少比起現在搞的新不正之風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現在不只是房子問題，而是把國家財產都變成自己的。根據消息，用軍艦、飛機走私等中國也不是沒有。像卡爾塔海納那種飛機中國也有了。為什麼老的不正之風還沒解決而新的不正之風就更厲害？我覺得實際上我們社會的封建性還很強，有一部份人把政權實際上是作為特權來掌握，是一種封建的觀念。我們國家民主的精神還是遠遠沒有發揚，這些東西沒受到群眾的監督。我們知道，那怕在美國，任何擔任公職的人，你往往要公布你的財產。在西方，私人財產有多少一般是一個私人的問題，你是不能問的，銀行裏有多少存款是絕對保密的。但是擔任公職以後，要調查你，你必須要公開。但在我們的國家這點上反而並沒有完全達到。擔任公職的人有多少資產，如果調查還有一定的困難。所以在我們的社會這是個更難的問題。只有靠民主化的方法，才有可能把它解決掉。而民主化的歷程的確相當長，還需要相當一代人才有可能把這個問題解決。

我今天就談到這兒，可能不是很完整。大家有什麼問題，我現在來解答。

（以下是回答浙大學生提出的問題。問題寫在紙條上遞到主席台上）。

問：為什麼在我們國家搞的很多東西都容易走極端？比如前一段時期搞的什麼「反精神污染」，但後來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為什麼在改革進程中還會出現這類運動？

答：這場運動從長的時期和短的時期看，都有它的原因，這個問題我想是已經有比較清楚的結論了；「反精神污染」當然是搞得不對的（鼓掌），這不僅僅是我自己的看

法。有人說這是不成功的一次文革。中央也承認只搞了二十八天。只搞了二十八天短命、沒搞下去（鼓掌）。但是從長遠來看，的確，不要以為在中國一次就能解決問題，我覺得剛才說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的進程需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要經過一些曲折和反復的。所以，出現二十八天也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問：請談談目前工資改革和物價上漲的問題，改革後可能結果有那些？

答：這個問題剛才我已說過了，現在的工資改革方案還沒下來，但大體是剛才說的所謂結構工資制，你是那個級別有相應工資，再根據你的工齡，然後還有職務工資、基本工資等方式。物價上漲跟工資改革倒不完全是一回事。物價上漲是我們現在消費資金失控，一些人不按經濟規律，濫發獎金；造成一部分人有很多的錢，手上的錢比市場東西的價值多得多，東西少當然物價就上漲。市場經濟必然是這個結果，產品少價格當然上漲。

下面兩個問題我沒法解答，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為什麼被免職？陳慕華被任命為行長說明了什麼？這個請去問中央組織部長。（全場笑）（註：原話如此）

問：你剛才的講話使我受到極大鼓勵，我不相信任何與事實不符的任何理論，所以我不希望你用空洞的論理來回答我的問題。當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生活水平遠低於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生活水平，即使是在相同條件下，如東德與西德，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大陸與台灣，蘇聯與美國。所以我認為，為了真正地使我們民族強盛，必須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堅

持社會主義道路只能引我國于死胡同，你認為我這個觀點如何？（鼓掌）你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如何？你認為此觀點如何？

答：這些問題當然非常尖銳啊！（全場笑）關於第一個問題，的確，事實我們都要承認，我想，作爲一個科學工作者，作爲一個正視事實的人，應當承認在戰後，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的確不如所謂的資本主義陣營。這個事實應當怎麼看，我覺得就是剛才才說的沒有解決理論的問題。現在有一種提法，我覺得倒是很對的，就是說：我們現在要重新認識什麼是社會主義；重新認識什麼是資本主義。雖然報紙上沒有公開這麼提，但某種意義上是這麼提了。比如說，什麼叫做「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就是企圖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我們知道什麼叫「中國式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回答，包括鄧小平同志這次給我們講話時，他也只是提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內容，並沒有回答，他說了兩條，一條是要公有制，一條是不要兩極分化，其它東西就讓大家研究了。所以，對什麼是中國式社會主義，這本身是不清楚的，是待研究，待實踐解決的問題；我去年到深圳，深圳那邊爭議很大。有些人去了以後就說：深圳完全跟香港一樣，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我去了以後，深圳人就說：你要看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嗎？就在這兒！所以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本身就要加以認識。這張條子裏說西德等西歐國家是資本主義，所以必須走資本主義道路，其實歐洲人自己并不這樣認爲。特別是北歐人說：什麼是社會主

義？我們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確，按是否有公有制這一條講，有很多歐洲國家的產業是公有制的。譬如英國的航空業、煤炭、石油、郵電等等都是國有。現在我們還有一點，不如他們，我們飛機公司還分成四個飛機公司，變成有點兒私人競爭的性質。而他們的公司只有一個。他們說：「你們社會主義講保險，而我們的保險比你們還要多，所以我們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確，我們要重新認識西歐。至少可以說他們的社會主義因素是很強的。意大利的社會主義保險是非常充分的；比如我們一向說社會主義國家不會餓死人，他們那些國家也是那樣，我們的農民還沒有退休金呢，他們農民甚至有保險金。我舉這樣一個例子，意大利的一個家庭中，男人找到工作後，這一輩子就有了保險，那怕你失去工作能力。而當男的死了以後，女的繼續接受這些保險。所以說，在意大利女的找到一個有工作的丈夫，這一輩子一定有吃的。自己不需要工作，當然，爲了興趣工作也可以。西方經濟學家把這些社會體制進行分類，分類的語匯跟剛才這位同志說的語匯完全不一樣，他們把我們所謂資本主義經濟叫美國式自由經濟；說北歐這一塊是社會主義經濟；那麼中國和蘇聯是什麼經濟呢？他們叫共產主義經濟。所以，什麼叫「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概念先要弄清楚，才能知道什麼叫「堅持走……」。

問：中國的改革是要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還是引進一套完整的西方文明的社會體制，以消除長久的封建統治的遺迹？

答：這已經很清楚了：孫中山就說得很清楚，

就不要我們來多說了。實際上孫中山已經承認西方當時的文明全面超過我們當時滿清的社會文明，所以不是個別引進技術的問題。（引進技術非常之必要）。從技術、科學、經濟、生產，到以及一些文化、社會體制來汲取現代文明，我想都是需要的。的確是要解決我們的封建主義這種問題。

問：你認爲近年來在中國是否可能出現第二次「反精神污染」運動。

答：剛才我說了，這就是我們知識分子的任務；我自己覺得，只要我們能夠抵制。爲什麼上次是十年，這次是二十八天就結束了呢？那就是因爲有很多人抵制。只有極少數人願意跟着那些人跑。所以我們知識分子如果能認清這一點，我想搞這種運動的可能性是越來越小。

問：現在高等學校之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受到新聞界的左右，即新聞界的偏愛，你認爲有否這種現象？如何避免？

答：我當然認爲的確是這樣。這種情況也是中國社會不發達的一個原因。往往消息唯一靠某些新聞的渠道，沒有一個全面的信息渠道。只有進一步發達、加強我們的信息渠道，加強相互了解，可以知道一些實際的情況，才能慢慢改變這個問題。

問：我們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爲什麼有的黨員（主要是領導幹部）犯了法而不按法處理，而只用「黨籍」來警告？「黨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嗎？

答：這個當然是成問題的。提問題的人如果具體針對哪個人，我建議你趕快去告他。（全場鼓掌）

問：方老師你對我們的國家有什麼設想？

答：這個說了太大，我不敢回答，也不能夠回答。實事求是，我對宇宙的模式有些想法，對中國的模型反而沒有（全場笑），應當承認自己的無知與淺薄。

問：剛才談到管理，聽說科大正在推行西方先進的管理，幾乎有點「西化」，不知你以為這種管理如何？請你發表些意見。

答：我不知道該怎麼說。科大的管理也不怎麼先進，也在試探。剛才說，我們提倡一些至少是思想上的自由，蔡元培都敢提倡，我們現在還不敢做嗎？在我們那裏，至少你講話不會受到任何制約。出點小報也不會受到任何干涉。對學生管理，我們取消了「政治輔導員制度」（全場鼓掌），因為我們認為我們要撥轉船頭，改變方向，從階級鬥爭轉到經濟建設。所以不僅是觀念問題，連組織形式都必須改變。取消政治輔導員也是這個目的。我們覺得政治輔導員並不是能做政治工作的那些人，有些很年輕的同志做政治輔導員，我們覺得很可惜，作了政治輔導員，業務耽誤了，跟同學矛盾也很大，這種形式是害了一代人；兩邊都害了，把做政治輔導工作的人也害了。這種組織形式本身就是要不得。因此我們取消了輔導員制度。

問：你如何評價東方道德觀與西方道德觀？

答：這個問題很大，要講一下午才能講完。我想在這兒不講了，當然這個問題我很有興趣。

問：你提出的知識分子在各方面起主導作用，并用新穎事實論證，請問這種觀點在「科技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得到何種反響？

答：很多人還是支持我剛才說的那種觀點，覺得還言之有理。當然，也有很多人說你暫

時不要公開發表，不要寫成文字公開發表。但是我在很多地方已經講了。我覺得在特別是探索真理的大學場合，我講就更沒有關係。有什麼地方不夠完整，不夠確切，當然可以討論。當然很多人還是支持我們觀點，特別是在年輕人裏是支持這種觀點的。所以應當看到我們還是有希望的。為什麼我們的宣傳機構，如報紙，電台等總是不敢對政府和高級官員的弊病加以揭露？這是民主太多了？

答：我覺得的民主太少了，是這個問題。

問：解放前夕學生「反飢餓」與現在的反飢餓有什麼區別？

答：這當然有區別；時間就不同了，也是對着不同的對象。

問：管理對我們國家的發展很有作用，那麼大學裏的管理課應怎樣開才能與改革的形勢相適應呢？請談談科大管理系的情況。

答：這是管理系學生問的問題。我想科大管理系還比較弱，應當承認。我們原來只有理、工科，沒有管理這種學科，是新設的。我剛才講的管理是個大的管理思想問題。還有很多具體問題，比如說，要求定量的管理，有些系統工程的觀點。在我們這麼大個國家，如果沒有系統工程的觀點，怎麼能預測那麼多因素。太簡單判斷是不對的。對一個學校來講也應當逐漸實行這種方法。

問：某一種國家的社會制度勢必要有一套與之相應的經濟體制。而當前的經濟體制改革走了兩種經濟體制下的結合，當前的社會制度能適應嗎？

答：這就是剛才我提的那個問題。我覺得這問題現在沒有解決。現在我們的市場經濟體

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結合，的確需要創造。我倒覺得不能說一定創造不出來，必須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中選擇一個，現在說這話為時過早。我們可以試探一下，找一找。外國人也很感興趣。我在國外時也碰到一些他們搞經濟的，說：「我們對你們的一國兩制的確很感興趣，以後你們成了一個國家以後，經濟體制怎麼能夠連續過來？是連續的？是躍變的？這個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經濟問題。當然，在廣東那兒有這麼一個問題，即「勢壘」或「勢井」的問題。在國家內部也有這麼一種問題，這種問題并不一定解決不了。我剛從南京來，我在南京的一些大學談了這個問題，他們也很感興趣。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是完全不同的兩套東西，用我們物理界的語言來說呢，一套是粒子性的東西，一套是波動性的東西，這兩套東西是不相容的。要麼是粒子要麼是波動；可是到了量子力學就相容了，量子力學中波動性和粒子性統一在一個波函數裏；所以我們現在也許（我說的是暢想曲了）是要建立一套「量子經濟學」。在座的搞經濟的或是搞管理的，很值得去研究。如果你證明出來這兩種體制不可能穩定地達到平衡，那麼很好，很有價值。如果證明出能夠使兩者結合，當然更好。

問：否定毛澤東同志在全國解放以後的理論以及認識其所造成一代人思想的墮落是否必要？

答：這個我們現在已經逐漸在做了。不過沒有、也不用搞成運動的形成。已經逐漸逐漸說明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剛才我已經說到的那幾點都是錯的了。

問：「工人階級要知識化，而知識分子要勞動化；」後半句我以為是說知識分子要從實際出發，深入實際，要更好地發揮知識的作用，沒有錯。

答：如果是這樣理解當然是對的了。不過我們親身經歷的人都知道什麼是所謂「知識分子勞動化」（全場笑，鼓掌）。要聯系實際當然是對的，我們現在學的任何東西實際上都是從實驗中來的。

問：開場白似乎否定了報紙的宣傳作用？

答：當然不是。我只是說，報紙不要成爲一種只是某些人能講，而某些人不能講的輿論工具；報紙當然有宣傳作用。他說我開場白強調了「我有口有舌，就不需要報紙」。我的意思是，以前科大校刊是由科大校長來管的，或者科大黨委來管的。現在校刊就不要只對校長負責，而是要對輿論負責。

問：你做科大校長後最重要的措施是什麼？最大的成效是什麼？

答：我當副校長也才半年，沒有什麼「重大措施」，也談不上什麼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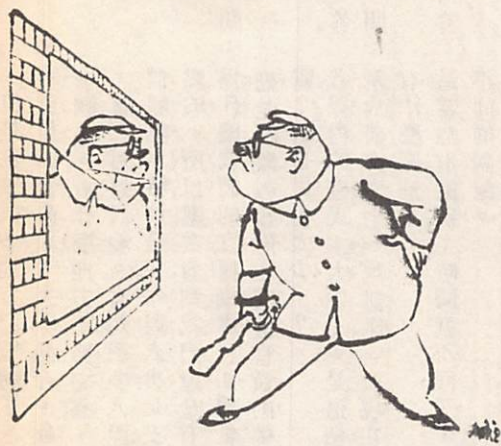
問：科大同學許多人三點一綫是事實嗎？您怎麼看的？

答：的確有這種問題。所謂三點就是食堂、教室、宿舍，我不知道一條綫指哪條綫。我覺得我們科大同學有一個弱點，我和科大同學也很直接了當地說，科大學生不夠活躍；說你們怎麼也沒點兒「鬧事」的跡象。問：您參加的社會活動繁多嗎？對學術活動有什麼影響？

答：從我們搞學術的人來講，我們很希望純粹去做學術，特別自己現在有很多關於這些的想法。現在我一做行政工作當然最多只

有三分之一時間做學術，我希望擠到三分之二時間做學術，也是很少的時間了。

但是社會活動對我們一個知識分子來講，還是必要的。不但是我們自己研究，而且用我們的研究，用我們的知識去影響社會，去推動社會。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我覺得自己做一點社會活動是應當的。比如說，今天我來演講，我覺得是很高興的。特別是跟一些年輕的同志來演講，我是特別地高興。因爲只有這些新的觀點被年輕人掌握以後呢，中國才有希望。（全場熱烈鼓掌）。昨天我給物理系的學生看了兩張物理界有名人物講的話，就是說歷史學上，物理學是這樣，科學是這樣，政治也是這樣，說：一種新的觀點，你要靠去說服來爭取別人的話是很困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怎麼辦才能呢？只有等那些人死



鏡子討厭 方成作

掉。（全場鼓掌）有些人有了固定的觀點。年輕人應當代表我們先進的方面。剛才那話是普朗克和麥克斯弗說的。

問：您是否認爲中國在翻兩番後貧富懸殊將增大？

答：這可能性是有的。如果搞不好，雖然經濟上翻兩番，但貧富懸殊會加大。就像我剛才說的巴西、哥倫比亞那種社會就是存在的，經濟增長并不代表整個社會狀況都能增長。

問：我們學生在改革中能做些什麼？

答：我想能做的事情很多。包括你們的學習以及對社會的影響。剛才我說中央也非常重視大家的「動作」。這些也是含糊，我可以和大家說。我在上次開那會議時，最後一天，教育部副部長黃辛白找了我們幾個參加會議的校長去座談。黃辛白同志非常坦白地說了一句話，他說「學生不要鬧事」如果說哪個地方的一個大學鬧事了，比如說浙大學生鬧事了，那麼浙江省省委就別幹什麼事了，完全圍着學生轉了。他也說北大、清華千萬別鬧事，一鬧事中央也就不能幹別的了，就圍着北大、清華轉。我想這個意思是非常明顯，我們學生的作用還是很大的，學生往往是非常敏感，能夠很敏感地看到一些社會問題。我覺得從政治上來講，不是單純地說要穩定學生，而要看到學生之所以不穩定的社會原因是什麼。那我們才能夠去改革社會推動社會前進。

問：爲什麼勞動人民要知識化？我想何以這麼說，但難道知識分子不屬於勞動人民？

答：這話問得很好！所以我把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分開說不妥。好，這樣說很好！應該

「沒有知識的人要知識化」。

問：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說是傀儡上面人說話，下面人舉手一致通過。

答：據我所知（我雖然不是全國人大代表），并非「舉手一致通過」。最近已經有的人并不贊成有些提案，是有這樣的情況的。當然說有的人還是願意當傀儡的。

問：校長同志，你是黨員嗎？你信仰共產主義嗎？

答：我是黨員，而且我是在學生時代就入了黨。學生時代我們就是爲了共產主義信仰入的，確實是這樣。今天我想也是這樣。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大家可能很不一樣，有的人理解所謂「共產主義」就是我可以升官發財；我們所理解的就是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消滅特權那種東西！這是最關鍵的，我們當時最樸素的思想就是這些。一幫人壓迫一幫人我們是非常反對的！從這種角度我要求入黨，到今天我的理想仍然適合，仍然是我追求的。

問：現在的改革已經明顯同馬克思主義相背離……在必要時，對祖國前途有利的主義爲什麼又不能高聲吶喊？……改革是對過去的否定，它只是打破了舊秩序，并不一定能建立新型的國家和人民有利的秩序。（按：此提法十分不妥，方教授未予回答，故略去部分）

答：最近已經開始涉及這個問題。大家可能注意到去年十二月七號的報紙上頭版頭條的評論員文章，有一句提到「不能要求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當前的問題」，反過來說就是中國當前的問題不能依靠馬克思主義來解決。但後來（第二天）修正了一下，「不能要求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當前的所

有的問題，」的確，馬克思主義必須發展，所謂發展當然就是有的東西要否定，這是事實。馬克思主義有很多論斷今天看就是錯的，這個我今天不再來談，如果要談的話，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的問題上，有很多論斷是過時的了，甚至是不對的。我們從物理學已經看到這點。剛才我說到的「社會主義」現在我們叫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不已經認爲原來「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或至少不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學也是這樣的。現在中央黨校裏連社會主義經濟學這一部分已經不講了。這是必然的現象。

問：你說了知識分子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在這種情況下教育出的人基本能適應社會需要是對的；但是我們目前培養出來的學生可以說大多數是不能適應我國的社會政治生活的需要。

答：這個是兩方面的說法；所謂什麼叫「需要」什麼叫完全「適應」什麼叫「完全不適應」？我想也是不能籠統斷定現在我們培養出來的人完全不適應我們國家的需要，我們國家之所以有些推遲，我看也就是靠了有些知識分子在做一些努力。

問：既然知識分子是社會生產力的活躍因素，爲什麼當前我國改革名人中知識分子則爲數不多？

答：這個怎麼說呢？只是說「改革的名人中」，大家注意，名人有的是宣傳出來的。所以有的人實際作了很多的工作，很有貢獻，但沒有成名。這正是我們現在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該出名的不出名，不該出名的出了名。（鼓掌）

問：你對分配改革有什麼看法？它有什麼利弊

？它的理論基礎？它對改革將產生什麼深遠影響？

答：這是同學們關心的。現在分配已經開始出現一些「市場經濟」，按供求關係來辦。雖然我們說經濟體制改革中勞動力不是商品，但是如果說其它東西是商品，而勞動力本身是生產力中的一個積極因素，很難不通過市場的機制來加以調節。通過「市場機制」加以調節的分配是當然有好處的。可以人盡其才。因爲以前的分配（我知道至少在科大）往往分配的人并不是真正懂業務的，而懂業務的又不參與分配。造成分配時很多啼笑皆非的現象。以前的分配叫所謂「包辦婚姻」，現在我們稍微解放一點，用「自由婚姻」可能更好一些。

問：那麼中國改革的前景到底如何呢？

答：可能我這個講話沒有結論。我們大家當然希望前景是好的，但是有這麼多這麼多的問題。剛才我說到的只要有一個解決不好，我們的改革就會出現問題。我是這麼一個答案。與其盲目地來信仰說我們的改革一定是必勝的，我們不如來分析一下我們有沒有可能走到失敗。只有分析清楚，我們才能不盲目地信仰必勝，更加有信心。否則那種信心是一種迷信，而不是信心。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首要是否先解決他們的工資和生活條件？

問：當然是，但是之所以這個問題沒有解決，老是遲遲不解決，是跟觀念上沒有解決有關係的。所以我們要在觀念上首先要衝破所謂老大，老二、老三這種觀點，我們才可能有所動作。

問：改革在目前的阻力是表現在左的意識殘留還是封建的意識？

問：我想「左的」的和「封建的」有很多是分不清的，既是「左的」，又是封建的。目前的黨的機構臃腫，是嗎？黨中央的政策為何難以徹底地在下面執行？

答：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們自己也承認黨內嚴重不純。所以在年輕的同志裏有很多不願意入黨；在座的學生裏肯定有這種思想。這種思想我也很熟悉，因為我的孩子在大學裏，他也說不願意入黨。我倒想對這些同學說幾句話：要想有志于改革，改變中國目前落後的面貌，改變剛才說的黨內那種面貌，入黨去更加方便（全場鼓掌）更容易改變這種面貌。所以我勸這些人去入黨。五十年代黨的威信的確是非常高的，但是五七年以後，到現在變得越來越「形象不太好」，我們應當承認這一點。一個唯物主義者應當承認這一點。只有靠我們這些人加入進去，才能改變它的面貌。我想勸年輕人這麼一句話。

問：請談談西方未來學所預測的未來社會是否比馬克思的未來社會更具體，叫人感到實在？（這也是比較理論性的問題，未來學派）馬克思主義的未來社會——共產主義叫人確實懷疑，因為從現在來看，從西方社會來看資本主義還比較穩定。

答：當然現在是這樣；實際上你真正看看馬克思原著的話，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的說法是比較含糊的，馬克思對上個世紀資本主義階段的分析的確是科學的。有些預測的確是有一定深度的。當然你不能要求他完全預言到幾百或上千年以後大家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只要有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就不可能做那樣的預言。

問：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只解決資本

主義和自由經濟的不合理，並沒有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那麼為什麼有人用中國的理論冠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過一段時間又改口了？你以為如何？難道一種理論體系這麼容易變嗎？

答：這個大概是說現在我們的政治經濟學經常是改變狀況；對此我不作全面的回答，我只說一句話。最近在中央的會議上，有人問宋健同志社會科學為什麼不在規劃裏寫上，他說：中國的社會科學目前仍然是在黑暗中摸索。現在還不清楚，所以經常改變。

問：現在全國都在推崇深圳，但我認為深圳目前個人意志、個人因素太盛，你以為如何？

答：關於深圳，我有對它的看法。我的看法倒跟這位同志不完全一樣。剛才我也沒有全面談深圳問題，如果要全面談，深圳問題有它的危險性，它的前景也有兩種可能，完全開放的經濟是不是上得去呢？不一定。我沒談經濟學的問題，一般現在國際上都知知道開放的地區靠外資、廉價勞動力開發，用這樣一個模式來發展經濟有的是上去了；但是如果自己不加創造的話，很快會下來。這個時間的尺度是七、八年，這已經很清楚。所以深圳目前靠廉價勞動力還可以，但是如果沒有足夠的科學技術的後盾和自己有活力的經濟，那麼七、八年就會垮掉。我沒有時間全面論證，我在參觀深圳的人也認識到了。深圳現在看上去是好的，但前景仍然有兩種。

問：知識分子總是希望將自己的知識貢獻於全人類，并不限于某一個國家，某一個地區，既然這樣，那麼你怎麼看待留在國外的

教授、學生和完成學業後留在外國工作的現象呢？

答：去年我從美國回來後跟國內一些領導特別說過這一問題。科大學生出去的很多，現在有好幾百人，當然他們很多得了博士後打算在那邊工作一段，或者更長時間。我覺得是正常的。我們當然希望他們能回國工作，但留在國外也不是對我們國家沒有作用。我自己覺得不要由于有些人留在國外了，就影響我們的開放政策。我特別和有些人說過：你們要估計到這點，年輕人當然有很多會留在國外的；但你們不要因此就大驚小怪，一會就收了。

問：我是浙大管理系的本科生，我們現在開了十門課，全是技術性的，和管理專業知識牛頭不對馬嘴，我認為浙大領導應該重視管理系的學生，讓我們多學管理方面的知識，讓我們去國外學習有些有益的東西，或者讓我們學習國內有些優秀專業的東西，或讓有經驗的實業家來給我們講課，你認為這種想法如何？

答：這個屬於浙大的內政問題，我想我不干涉了。（全場笑）

問：關於新聞干預生活，這是一件好事，新聞本來代表公共輿論。我們國家問題不在于新聞干預社會生活，而在于新聞是「國家新聞」，容易起左右視聽的作用，你認為怎麼樣？

答：剛才這點我已經說了。好，條子我就全都答完了。我最後說一遍，就是我所開始說的，在大學裏講話應該是開放的、自由式的講話。我這個講話裏有對有錯，是必然的。但是，有對有錯正是我們學術探討的階段。謝謝大家！（全場熱烈鼓掌）

「二·二八」四十周年話台灣

——訪雷震案名律師林頌和先生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楊漫克

編者按：台灣名律師林頌和，生於一九一八年，福州市人，避清禁煙名臣林則徐之五世孫。早歲畢業於福建學院法律系。一九六〇年雷震案發生，經台灣公論報社長李萬居推薦為該案辯護人，深為國民黨所不滿，繫獄四載始釋。四十年前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林氏身歷其境，多所見識；對雷震歷史之陳述，亦慧眼獨見。此篇訪問極富史料性，頗堪研讀。文中楊代表楊漫克先生，林代表林頌和律師。

本文發表前，已經林先生過目。

(一) 二·二八事件始末

楊：首先請林先生簡述一下二·二八事件的經過。

林：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發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事件，那就是「二·二八」

事變。這個事變的起因是事變發生的前一天，也就是當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台灣省專賣局（台灣省於酒公賣局的前身）的兩個查緝員，一個名叫傅學通，一個名叫葉德林，他倆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馬茶室緝私菸的時候，由傅學通開槍打死了一個擺香煙攤的老婦而引起，實際上這個命案只是導火線而已。

這位被打死的老婦的弟弟，第二天，也就是二·二八當天，開了一部車子，上面掛着一條大標語，寫着「同胞快醒」，並架起一面大鼓，車上坐了一二十個人。車子一直開到長官公署，公署的屋頂上的軍隊，便開槍掃射，接下去局勢便惡化起來，打人、衝警察局、燒車子等等。台北事發後，迅速蔓延全島。

(二) 二·二八事件目擊情況

楊：林先生，你親歷了二·二八事件，可否談談當時你目擊的情況。

林：我當時在台北縣政府做科長，住在台

北市，每天坐火車往返於兩地。二·二八事發當日下午，我坐火車回台北。一到站，發現月台上擠滿了人，一片混亂。羣衆一見到外省人就打，穿中山服的人就是攻擊的目標，當時外省去的官員都穿中山服。我那天穿了一套西服，但是還能被看出是外省人。我不敢下車，很危險。後來有一個公務員被羣衆追打，我就乘着混亂出了車站。進了台北火車站鐵路餐廳的後門。外面到處喊着打「阿山」，也就是打外省人的意思。這時不斷有本省人進進出出，我又坐在餐廳食堂的角落裏。過了不久，就看見外面出現了四部憲兵的警車，架着機關槍。這時候街上平靜了。到了晚上，我才回到家裏。這就是當日的事情經過。

一連十幾天，都是很危險的。外省人不敢出門。到了三月十日，大批的國軍開到台灣，情況就不一樣了，街上常見槍聲，常常有人被打死。

以後聽人說：二·二八事件平定後有許多二·二八事件的參加者被處決，根本不用審判。如台灣的基隆要塞司令部，就處決了很多人。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每天都有卡車將處決者送往要塞，被處決的人是用士兵的綁腿綁着，每條綁腿可捆兩個人。送到要塞後，在海邊的砲台上，他們將抓來的人往海裏一推，就結束了。那時一晚上最多時要處決十四卡車的人。

(三) 國民黨沿用殖民地方式管理台灣

楊：二·二八事變的起因是什麼呢？僅僅是因爲國民黨接收人員驕橫腐敗，不尊重台灣人嗎？在大陸，國民黨也接收了日本侵佔的東北，也有同樣的問題，但並沒有發生台灣那樣的衝突。

林：是的，台灣人在日本人腳下做了五十年的亡國奴，回歸祖國的興奮心情是不必講的。國民黨接收大員的腐敗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但我認為，國民黨當時犯下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在台灣成立了一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該署的組織法，是根據日本在台灣總督府的組織法作藍本的。日本總督府的組織法，是站在把台灣做為殖民地立場訂立的。國民黨政府沿用了日本人的組織法，翻版成了長官公署的組織規程。可見，國民黨對台灣人的統治，仍舊像日本人對待殖民地的態度一樣。

楊：國民黨這麼做的理由是什麼呢？

林：國民黨以為，台灣亡國五十一年，以前四百年都不要算。如果一下子把台灣省人的亡國奴的鎖鍊拿掉的話，一定會不習慣。所以，國民黨還要用殖民地時代的統治方式，管理台灣，否則不好管。國民的心理和統治策略就是這樣。結果，這個算盤打錯了。

楊：這正好與台灣人回歸祖國的心理大相徑庭了。

林：其實，台灣人很講理，並不是像國民黨想像得那麼難管。你仍舊把回歸的人民像對待殖民地人民一樣，當然很難管，結果出了二·二八事件。假使你國民黨把台灣人民當做正常的中國人，那是不會出亂子的。國民黨接收有所謂「五子登科」之說，即金子、房子、車子、女子、面子。女人就是漢奸們的太太、女兒。這種惡風氣，如你所講，在大陸如此，在台灣亦如此。這種原因雖然使台灣人同大陸人同樣不滿，但不是台灣獨特的原因。

楊：我想問的正是台灣的特殊性。

林：對台灣人，國民黨看不起，給他們一種精神上的壓力，認為台灣人是殖民地人。譬

如外省人穿皮鞋，踩台灣人家裏的「榻榻密」。台灣人的房子與日本人一樣，榻榻密白天是地，晚上是床。但是，外省的警察，走進台灣人的家裏查戶口，不脫皮鞋，就那麼踩在人家的床上。台灣人敢怒不敢言。二·二八事變後，國民黨當局也發現了這件事情，採取了措施。所有台灣警察穿的皮鞋是沒有帶子的，以便辦公時，隨時脫下來。從這一件事例上，可見當時國民黨對台灣人的不尊重。這樣的事情很多，所以使台灣人心對國民黨產生極大的不滿。

(四) 二·二八事變沒有政治傾向

楊：請問，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們，當時有沒有什麼政治傾向？是不是想脫離中國，搞台灣獨立？

林：那個時候很亂，沒有什麼政治意向，二·二八事件完全是民怨積蓄太深，一下子爆發出來的。沒有什麼組織、綱領或領導人。據我知道，當時並沒有獨立的口號或其它任何政治口號提出。

楊：在大陸，一般的官方說法是，台灣人民不滿國民黨統治，發動起義。而在台灣的共產黨，也參與和組織了這場起義。如後來去了大陸的謝雪紅女士，便是例子。

林：雖然有共產黨參與，但只是事變發生後才參加的，並沒起很大作用。二·二八完全是自發的羣衆暴動。

(五) 二·二八事件中的國民黨派系鬥爭

林：實際上，我認為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是二·二八事件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C

C系同政學系的權力鬥爭，是二·二八事變發生的重要原因。

楊：請您深入分析一下。

林：政學系的代表人物是張羣、陳儀。當時在台灣掌權的國民黨官員是政學系的陳儀。政學系與C系的矛盾由來已久。三民主義青年團屬於C系，在二·二八事件前以及期間，是站在所謂的「暴徒」這一邊的，他們要給政學系的陳儀製造麻煩。

當時有一位以後當選國大代表的叫做林紫貴，此人屬C系，曾經在南京國民大會堂開國民大會時喊叫「殺陳誠以謝天下」。這個林紫貴那時在台灣辦了一個「國是日報」。該報的立場完全站在羣衆這邊。

楊：林本人是台灣人嗎？

林：林紫貴是福建人，已去世了十幾年。當時林是國是日報的發行人兼社長。國是日報的文章支持羣衆。而三民主義青年團也參加了暴亂。這兩個證據，可以說明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也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因素之一。

楊：這是政治的複雜性，很少有人提到此點。你肯定「三青團」參與了暴動嗎？

林：這是事實。當時台灣有十幾家報紙，都報導過三青團參與「暴動」的事情。

(六) 沒有二·二八就沒有今日之台灣

楊：有人說二·二八事件也是一個省籍或地域衝突事件。您的看法如何？國民黨是否應負全部責任？

林：在我看來國民黨應負全部責任。

楊：我看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後遺症是太大了，今日的台灣運動，是否可以說因二·二八事件而起因的？

林：我想是這樣。二·二八事件以後，除掉殺和被抓的，許多人向外國逃，主要是逃向日本和美國。形成了今日台獨海外的兩個大本營，搞起台獨運動。這是國民黨欠台灣省人的一筆血債。

楊：國民黨後來退到台灣後，是否作過些修正？對台灣人有所交代？當時指揮鎮壓行動的陳儀被蔣殺掉，是否算對台灣人做了交代？

林：陳儀被國民黨殺掉，表面與二·二八事件無關。國民黨對陳儀在台灣的鎮壓行動，當時並未追究。陳在二·二八後調回大陸，還被任命為蔣介石家鄉的浙江省主席，這一點便可證明。但是，蔣介石退守台灣之後，槍斃陳儀是為什麼呢？表面名義上說陳是「匪諜」。匪諜在大陸槍斃就行了，為什麼還要等到台灣後再做呢？真正的原因是，國民黨要想在台灣蹲下來，滅出「確保台灣，反攻大陸」的口號，總要安撫一下台灣人的民心。但又不給二·二八事件平反，才以匪諜的名義，把陳儀斃了，等於把陳儀的血，向台灣人交土地押租金了。

楊：國民黨退居台灣後，是否對本省人作過些彌補性的事情？

林：除了槍斃陳儀外，國民黨還把參加二·二八事變躲起來的「主犯」蔣渭川，起用做台灣省政府的民政廳廳長，他是台灣抗日英雄蔣渭水的弟弟。蔣渭川曾是事變中被國民黨指定格殺勿論的人。陳儀抓他時，蔣渭川逃走，其女兒當場被打死。陳儀被槍斃後，蔣渭川才被任用。

當時有一件諷刺性的怪事，就是「台灣新生報」發表啓事：「祝賀蔣渭川先生榮任台灣省政府民政廳長」，簽名者有林紫貴等二、三十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名字，都是在二·二

八事變中被國民黨槍斃的人。這是一九四九年禁，故居然出現了這樣的怪啓事。

(L) 記住二·二八血之教訓

楊：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與台灣省人的一個歷史困結，一直未得解除。現在很多人提出來要修建二·二八紀念館，並定該日為國殤日或和平日。如果國民黨接受這些建議，為二·二八事件平反，一定會有助於紓解台灣人與外省人的矛盾，減弱台獨傾向。

林：國民黨一向不許人提「二·二八」這三個字，只因爲這三個字，就治過好多人。一九六七年林水泉寫過「二·二八事件二十年告台灣同胞書」，因此判了十幾年刑。一位彰化的醫生叫石錫勛，只因在原稿上改過一個字，判了八年。這個案子是我辦的。由此可見，二·二八是國民黨的言論禁區。現在對這個問題有了些開放，到底是國民黨的自願、或是被逼，還是民進黨的意思？我認爲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使每一個台灣的住民，不要忘記二·二八事變。所以我要發動一次手語運動，這是我在台灣坐牢時萌發的想法。

(八) 國民黨既反台獨又搞台獨

楊：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之際，很多人都會因國民黨對此事件不願正視而提出批評。台灣省人更可能從感情上面對這個問題，主張台獨。你對此有何看法？

林：台灣要不要獨立，不是簡單的問題，要有確定的條件。台灣人自己想，我已做過四百年的殖民地人了。這四百年間統治者換來換

去，都是使用武力，所以台灣人形成一種不相信任何人的性格，只相信自己。但是，我認爲台灣還沒有獨立的條件，會有很多勢力的利益影響其不讓它獨立。如中共就不會讓它獨立，台灣獨立對中共有些實質的受害，但面子的受害更大。美國人、日本人對台灣的獨立，也不支持。

至於說，國民黨反對台灣獨立，與前述幾個勢力的情況有着完全不同的角度。國民黨實際在搞獨立，不是「台灣人的獨立」，而是「國民黨式的獨立」。如果台灣人獨立，國民黨只有跳海了，跳進太平洋去。所以說，國民黨既反台獨，又搞台獨。

楊：國民黨能做不能說的是台獨；能說不能做的是反攻大陸。但目前國民黨對台省人的限制也放鬆多了，蔣經國先生是很明智的。

林：國民黨存在着很嚴重的問題。蔣經國認識到潮流在變，但黨內的軍事強人並不贊同蔣的改善措施，不知那一天就會做出很幼稚的事情出來，製造出類似二·二八的事件。

楊：您對民進黨住民自決的概念有何認識？

林：民進黨在黨綱中寫入「住民自決」的概念，是有其苦衷的。它明知喊這種口號會到處樹敵，被指爲有台獨傾向。實際上這是一種政治迂迴，民進黨自己也知道，這是手段不是目的。住民自決，表示一種選擇權：同國民黨同床而寐，還是投好於中共，或是自己當家，民進黨不見得能夠控制台灣的黨外，更不能控制台灣人的選票。民進黨目前還不能放棄羣衆路線，才能有作爲，故必須投合台灣人的心理選票。但羣衆路線是暫時的，將來必會過渡到議會路線去。

楊：其實，住民自決本身並無可指責，它是一個層次很高的民主概念，所以只能在民主程度很高的國家實行。如加拿大魁北克省法語民衆就曾要求自決，但全民投票後，沒有成功。台灣目前尚不存在這樣的條件，何況還有中共的問題。再者，住民自決曲折地反映了台灣傾向，也是無法否認的現實。

林：政治是現實的，許多政治口號的背後，都有很多複雜的原因。

(九) 反蔣氏連任是雷案主因

楊：您是雷震案律師，今天還想請您談一下雷案，台灣民主化政治能有今日之成就，我想與雷震是分不開的。雷震是台灣第一個組織的人，是台灣的民主先驅。

林：雷案的過程是這樣的。那是一九六〇年九月，正值蔣介石祝壽日，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刊出了祝壽專刊。當時蔣介石兩屆總統任期已滿，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是不可以再連任的。但是蔣介石還想做下去，於是從憲法中尋找合理解釋。而雷震的「自由中國」，則撰文反對蔣介石再連任。胡適、胡秋原都在「自由中國」上發表過反對蔣連任的文章。所以我認為，雷震組織反對黨，並非他倒幕的主因，而反對蔣氏連任，才是激怒蔣的關鍵原因，非除掉之不可。

這時，國民黨找到了一個政治垃圾劉子英，他曾在「自由中國」作編撰者。國民黨將他收買，劉氏不僅供認了自己是中共匪諜，還說他的匪諜身份雷震早已知道。這樣，就給雷震栽贓了一個「知匪不報」的罪名。

當時牽涉到本案中的共四人，雷震、劉子英、馬之驢、傅正。但傅正沒有被起訴，只是

送管束三年。當時台灣公論報的發行人兼社長李萬居，要我出面來替該案辯護。

楊：據我所知，當時國民黨與雷案雙方的律師，都是國民黨指派的，您是不是呢？

林：當時的一般政治案件是這樣的。但雷案轟動社會，有些不同。我是雷案方面辯護律師，我本人早在五四年便被國民黨開除黨籍。我從法律上參與此案，是因李萬居介紹之故。我當時一口答應做雷震的辯護律師，但雷震夫人宋英反對。宋認為應該請一個國民黨籍的律師，替雷氏辯護，理由是可以緩和空氣。因為當時同國民黨對抗反而不利。所以，又找到國民黨籍的梁肅戎律師，替雷震辯護。我亦不反對雷太太的意見，這樣，李萬居又提議我來替馬之驢辯護，以馬之驢的辯護律師的條件，幫雷震辯護，因為兩人的立場一樣。於是這麼定下來了。

辯護中，我在閱卷時，發現一個國民黨起訴雷案的資料，名為「一年來『自由中國』違法言論一覽表」，裏面羅列了四十篇文章，包括雷震、毛子水、徐復觀、胡秋原等人的作品。違法內容是什麼呢？大部分定義是「污蔑本黨（國民黨）」。所以，我提出了一個辯護書，登載在該年十一月三日的「台灣公論報」第一版上，標題為：「雷案律師林頌和指出：本案係黨派審判，非國家審判。」我說，軍事檢查官依據此資料來起訴被告，而該資料提出的違法理由是「污蔑本黨」，所以是黨派審判。

楊：當時為何由軍事法庭審判呢？

林：根據叛亂條例第十條規定，非現役軍人觸犯本條例者，一律由軍事法庭審判。

楊：雷案在法庭上的辯護過程怎樣？當時有沒有形成爭論？

林：辯護過程一庭終了，所謂「過門庭」

，充充場面而已，也沒有什麼爭論，宣判了一下就完了。雷震被判十年，馬之驢五年，劉子英被判十五年。馬之驢繼續上訴，判無罪，但同傅正一起管束三年。劉子英雖判了十五年，但並未坐牢，拿了一筆錢走路了，大概去了國外，至今下落不明。雷震則坐滿十年後出來，不久便去世了。

(十) 雷震是台灣民主化第一波

楊：林先生提出高見，任何雷震案的主因是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而被以「知匪不報」和「為匪宣傳」判了刑。但我以為雷震組織一事，對台灣的政治發展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儘管當時雷氏的影響局限於知識分子中間，組織亦近乎不可能的事。

林：雷震當年的勇氣是令人欽佩的。它是第一波，意義只是在這裏。黃信介是第二波，今日民進黨是第三波。

楊：林先生認為民進黨在今後的台灣會有所作為嗎？我對台灣能夠出現反對黨是非常興奮的。

林：這的確是令人興奮的事。民進黨正在經歷着考驗，現在它的內部分歧也很多，然而並不是悲劇，但我對它有兩個希望：①不要有山頭主義；②不要排斥外省人。山頭主義是爲了自己，不是爲了民衆、社會。排斥外省人也是偏狹的，不能把國民黨與外省人混同起來。

楊：目前是有排斥外省人傾向，民進黨中央只有一個費希平是外省人。

林：對。林正杰也是外省人，但還沒有入黨，但其太太楊祖珺女士是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

楊：就談到此，謝謝林律師。

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大罷工記實

(原下鄉知識青年) 吳曉紅

有人說，歲月的流逝會使人忘却過去。我說，不！絕對不！

我十六歲離別上海，告別親人的情景就在昨天。那手中的淚巾依然新鮮，火車的轟鳴還在耳邊……

忘不了啊，雲南！忘不了啊，西雙版納的八年！那頭頂香蕉，腳踏菠蘿的「美妙」八年……

這一切的一切，都在昨天……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軍區和昆明軍區奉毛澤東和林彪之命，派出大批現役軍人，在距昆明九〇〇公里至一二〇〇公里以外的邊境地區，以西雙版納為開發重點，建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生產建設兵團」。西雙版納地區有四個師的規模，每師少則六團多則十九團，每團多則二十二營少則十三營，每營多則十三連少則九連，每連隊多則五百人，少則二百人。這種編制是一種特別的編制，根據邊境地理和戰備情況，前方出國部隊（中國會派大批部隊援助越南，反對美國。中國援越部隊簡稱為出國部隊）的物資需要，以及每一地區的地理氣候生產規模而定。

與此同時（一九六九年三月），大批來自北京和昆明的高中、初中畢業生（知識青年），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按中央軍委統一規定，兵團的連以上幹部（連

長、連指導員以及營、團、師部的幹部）為現役軍人，而我們這些知青，只能當兵團戰士，雖稱為「戰士」，但沒有軍籍，實際上只是一批幹活的奴隸。

我們駐紮在西雙版納的十二個縣之內。西雙版納為邊境地區，我們不能私自返回內地，回內地要通過機關槍把守的邊防站。邊防站對持有通行證的人，才予放行。因此，我們兵團是沒有個人行動自由的。

西雙版納（西雙版納為傣族聚集區）是亞熱帶氣候，全年分旱季雨季，沒有春夏秋冬。西雙版納以種植橡膠為主，以及作一切為出國部隊服務的工作。如越戰前線需要血，每連隊立刻下達十至二十個名額，無條件地叫知青們獻血。如前方需要築路的木料，每連隊就夜以繼日砍伐木料。每團備有汽車修理廠、醫院、學校以及賣毛巾肥皂牙膏的小賣部。每營設立一個郵遞站，只負責信件。私人不得私自收發信件，一切信件必須經連隊查驗。連隊負責的軍人有權私拆任何家信和扣留家信。

每連隊連長和指導員均為現役軍人，而副連長和副指導員均為出國部隊中有功人員退伍回國者。連隊裡的「戰士」，即下鄉知識青年每月收入二十八元，伙食費八元。如逢國家遇有自然災害，如地震、水災、旱災等，一律以完成政治任務為借口，要在其餘二十元裡扣除

一部分做為「捐獻」。

軍隊嚴格執行林彪的一套軍事路線。軍人的口號是：「有令就行，行要行得通，止要止得住。」這是林彪副統帥的教導，不得違反，如有違反，送團部處理，情節嚴重者則送軍事法庭交以法辦。

每個連隊連一級幹部可以有權閱讀報紙。過期二個月的「解放軍戰士」雜誌和「國防前線報」，戰士（即下鄉知識青年）無權翻閱，不得過問。上述報刊一連隊一份，不定期從營部轉來。每二至三月營部放映一次露天電影。每人左手提着凳子走夜路，一個跟一個翻過山嶺，跨過小溪，穿越森林，去看一次「地道戰」、「地雷戰」之類的舊電影，文藝片一律禁演。

每星期一，全連露天廣場集合受訓；星期二，各排分排聽排長讀軍隊文件或指示；星期三，黨員活動。非黨員討論中央指示；星期四，全連集合受訓；星期五，團員活動；星期六，自由活動。這都安排在重體力勞動十小時之後，自晚八點開始。加班加點搞突擊戰從來不加薪。

一九六九年三月份，從昆明、北京兩城市來了第一批高中、初中畢業生，當兵團戰士。以後每年均有上海市區的高初中畢業生，上海郊區已就業的農村青年，以及湖南、雲南本省的各地青年，來到這裡參加建設兵團。一九七二年不再再有知青前來。各連隊除糧食供給，其他一律自給自足。每個連隊負責自己連的建房修路任務。連隊與連隊相距近者五六公里，遠則十多公里。一九七六年前一律沒有電燈，不少連隊從來就沒有電燈。住房靠自己建，從打地基、砍竹子、做竹牆，到燒磚、做木工，都是男女同幹。

連以上幹部的現役軍人，對現實都極為不滿，但又不敢不執行軍令，只有拿學生泄憤、出氣。知青敢怒不敢言。各連、營、團時常發生小規模的暴動事件，如用炸石頭的炸藥炸團部，偷盜軍器和結伙逃跑等。但常常由於無法通過把守嚴密的西雙版納邊卡——思茅邊防檢查站而遭失敗。知青享有二年探親一次的待遇（廿四天），但女知青常因拒絕連以上幹部（現役軍官）的強暴而遭百般刁難。

擔任連以上幹部的現役軍官，由於離鄉背井，在這荒涼的地區深感沒有出路，也對中共的軍墾政策深感不滿。再加上知青不斷造反生事，現役軍人們曾舉行集體罷工，要求調回部

隊，結束邊疆地區非人的生活。由於現役軍人不斷鬧事，他們終於於一九七六年九月全部撤離西雙版納。此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改稱為雲南農墾總局雲南農場。但是，地方農墾系統一時不肯接收我們這批下鄉知青，於是，三個月期間農場處於混亂局面，知青們紛紛逃離。由於逃不回內地（因邊防站武力阻止），很多人逃到緬甸，參加了緬甸共產黨的游擊隊。

一九七七年鄧小平復出。一九七八年，北京出現西單民主牆運動，一時間，全國出現了些活氣。

我們處於消息完全閉塞的邊疆地區，根本

人間地獄話兵團

——訪當年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大罷工領導人江濤

生產兵團生活實記

記：請您大致談一下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間，你們在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勞動、生活的情形，以及你們的待遇。

江：當時的勞動是以原始森林裡的伐木、墾荒、開梯田、種植橡膠為主。其次是築路、造房子、燒窯、打土。同時也為出國部隊提供各種服務，如提供蔬菜、水菓，知青無條件輸血等。而且墾荒和耕種都用最原始的方法，如放火燒山，用最簡陋的工具耕種。每天工作八

小時到十二小時。遇有突擊和特別任務，還必須持續三十六小時到四十八小時。頭三年的待遇是每月二十八元，以後增加到每月三十六元。吃的是發霉發爛的糙米混合着玉米，頂多是拌點鹽，連蔬菜都沒有。因為，我們那兒天氣熱，種的菜多半不結籽，只有少數種成的蔬菜又必須供應出國部隊。再說鹽巴，也因為當地不出產，交通又不便，實在缺得很。

另外還有一件值得提出的，就是當地流行的疾病，很多人都因這病而死亡，這是內地的人所不知道的。因為我們是處在亞熱帶地區，在三十九到四十度的氣溫下工作，每天汗流夾

不了解中國發生了什麼。我們實在活不下去了，於一九七八年不得已而向黨中央寫了請願書，組織了請願團。在北上請願途中，我們遭到一系列困難。首先，我們得不到離開西雙版納的通行證。如要強行衝過邊防線，只有遭到邊防站的機關槍射擊。而在我們衝過邊防線、千里迢迢來到首府昆明後，又遭省委派出的工人治安隊四處逮捕。下令昆明——北京的直達車停發，以阻止我們北上北京告狀。代表們決定分散開來，由成都等地轉道北京，從各條線在北京同一日匯集，到京後再正式打開北上請願團團旗……一場爭自由、爭人權的大鬥爭，終於爆發了……

背，形成一層層白色的霜沾在身上。雨季時更是艱難，常常在沒有任何防雨用具下，冒雨工作，工作量又很大。如果沒有完成任務，要扣糧食，扣工資，挨批判，遭不批假等種種刁難。一旦人被螞蝗、蚊子叮了以後，身上奇癢，癢了後就去抓。抓破皮的地方一被山上有毒的露水感染，全身發爛，又是血又是膿。即使後來病癒，身上也會留下許多疤。去過雲南的人沒有一個能夠逃脫得了這種疾病。另外，又有一種動物身上的跳蚤十分厲害，叫馬鹿蚤，一旦被叮，幾年以後仍然會癢。我出國已經有三、四年了，可是身上過去被叮過的地方仍然會癢，到現在為止找不到任何藥可以根治。最可怕的是一種流行性傳染病。得了這病以後，上吐下瀉，全身無力，在二十四小時內就要死亡。這種病在每個連隊、不同的山區、不同的季節都經常發生，一發生就幾百個人病死。我們連隊也有許多來自上海的男青年死於這種病。我想這大概是中國說的一種絕了種的傳染病，叫「二號病」。



請願團北上張貼的首幅標語



請願團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合影留念

此外，還有無數的冤獄，女囚犯被軍官強姦，知青為達到病退的目的作踐自己的身體等種種慘絕人寰的事件。我們當時有毛澤東思想政治輔導學習，我在團裡是年年被評為先進，比較有名。在一個幾千人的會議上，我對當時的政治提了一些看法，對當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一些反對的意見。別人批判我說，這是一種反革命議論，要我俯首認罪。我雖極力否認，但仍以政治犯的罪名被捕。這是發生在罷工及北上請願以前的事，這一切都是我們必須搞運動的原因。

全體罷工是致勝的第一步

記：北上請願是否有直接觸發的原因？
江：並沒有什麼直接觸發的原因。多年來青年受壓迫太厲害了，物極必反。所以這個事件可以說是長期醞釀的結果。起初，我們的各種活動都是沒有大型組織的。只有小型的組織，企圖搶武器，炸團部，以及強行越入國防綫



請願團在西單民主牆貼出請願書

內等等。這些都是自發進行的，沒有人指示，也都沒有能夠得到成功。也有人上北京口述，也有人去省委、市委告狀，但都沒有成功，反而遭到迫害。因此，由丁惠民出頭露面，寫了致鄧小平、黨中央的公開信，由秘密簽名到公開簽名，由丁惠民所在的景洪地區發展到思茅、勐臘地區。但是，三封公開信遞到北京後，都被中共中央的辦公廳退回雲南省。而省委根本就無視青年的死活，所以我們組織北上請願團。組織北上請願團是為達到遞交青年的口述材料和萬人簽名信。

記：因為北上請願團得不到通行證，曾經觸發了一次九十九天的罷工事件。請問當時的罷工有沒有受到鎮壓或阻撓？

江：當時簽名罷工的青年有五萬三千四百三十一名，包括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鎮壓班的人，幾乎全部的人都簽了名，所以，沒有人能夠鎮壓我們。但是，我們北上請願確實受到很多阻撓，例如州委不發通行證等。部隊是用槍阻撓，強行越境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我們開始罷工，以逼迫州委發通行證。州委雖答應發給通行證，但一路上的交通仍是個問題。我們便攔軍車、貨車，攔不到車時就步行。到昆明後，昆明省委停發直上北京的火車，還派工人糾察隊四處抓代表團的人。我們事先已知道可能會發生這種情形，所以，並沒在昆明亮開我們的旗子。並且，分散請願團的代表，經由成都、上海到北京。

知青哪裡來哪裡去

記：請願團到達北京後有什麼活動？當時北京民衆的反應如何？

江：在北京時，請願代表是住在農墾總局

的招待所。我們設立了招待來訪者的招待室，接受北京民眾對我們熱烈的支援。在北京民主牆，我們多次地貼上各種材料，內容包括邊疆青年的生活情況，以及致鄧小平、黨中央的三封聯名信。我們還在天安門前演講，散發傳單並展示各種巨幅的標語。這些活動都受到北京市民的熱烈支持。於是國家農墾總局副局長等人都來到代表的住處，他們代表國務院、國家農墾總局同意代表團提出的復工條件。第一、明確承認代表團的性質是合法的，我們的要求是合理的，並非無理取鬧。第二、罷工的工資照發。第三、知識青年哪裡來哪裡去。雙方並且交換了草擬文稿。農林部部長、知青辦公室主任、國家計委、勞動局長、知青辦主任也都接見代表團。中央負責人並且召開招待會。請願書由請願團代表丁惠民交王震副總理，當天就得到王震副總理的答覆，說是已於晚上八點三十分交鄧小平、葉劍英、華國鋒閱讀。共青團中央負責人陪同青年參觀周恩來紀念館。中央同意我們的全部條件，並派慰問團直下西雙版納。代表團當天就發了電令，通知復工。當時，我們買不到花圈，又必須立即離開北京，為了表示雲南五萬青年的心意，只有自己畫花圈，貼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這些也有照片為證的。

表面勝利下的颶風事件

記：請您談談「颶風」事件的前因後果。
江：「颶風」事件是發生在北上請願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九年三月。當時知青已全部回到家鄉，刮「颶風」的時候我們已經沒有組織了。只有當時規模比較小的生產自救隊。另外，新疆兵團也打算和我們一樣搞，曾經找



北京群眾爭睹請願書

我們談過，希望我們支援他們。當時中央的政策是大亂達到大治，中央不但很有效地制止了新疆的事件，也秘密逮捕了當時雲南兵團的一些主要人物。中央當時曾經簽字，同意我們是合法的，而且都有草案在。所以中央不能公開抓我們，只有暗中刮了一次「颶風」。這也說明當初中央無條件答應我們，並不等於妥協，實際上是一種手段，只是暫時平息知識青年和家長的不滿情緒。
記：您後來因為逃亡，是否和其他人失去聯繫？
江：我出國以後仍然透過各種途徑找尋丁



請願團要求見中共領導人

惠民。可是當時認識了惠民的知青無以計數，竟然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去年我回大陸一趟，也想盡辦法再找，可是連其餘的幾個領導人周玉倫、史永貴在內都無下落。
記：您是否可以大概談談這幾個領導人的背景？
江：可以的。丁惠民是一九六九屆中學畢業生，是上海知識青年，父母親是很普通的工人，在××廠工作。他的親戚也沒有一個當幹部的。周玉倫的父親是上海滑稽戲劇團的一個普通演員，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判過很多罪名。黃艷珊的父母是普通教師，也沒什麼幹部背景。
請願達到目的的因素
記：雖然「颶風」事件逮捕了一批人，但是知青也達到了返鄉的目的。最後請您談談你們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江：我認爲當時成功是有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因素的配合。天時，當時的政治形勢對我們十分有利。允許我們公開在民主牆上寫文章、口述，以及中央設有國務院的接待辦公室。當時正值鄧小平上台不久，當時黨中央的政策，是讓人民說真話，以這種方式來揭露以前領導人的錯誤，否定毛澤東爲首的一群人。

地利是指中越戰爭時有一條戰備公路，這條戰備公路完全受我們箝制。我們常常幾千人倒在馬路上，阻攔交通，軍隊不可能全部壓過。

，只有緊急向北京請示。所以，我們的北上代表團雖然只有二十四人，但實際上有近六萬的人在邊界，隨時聽總部的指揮行事。

人和是指大家的團結。我們當時做了很多輿論工作，在重慶、北京鋼鐵公司、首都汽車公司、四川二鋼廠、軍工廠，全都有知青的家長。我們從工廠、街道到市區廣場，在四川、重慶、北京、上海各個地方進行了宣傳。一旦北京的青年不成功，我們將舉行四川、上海十個郊縣的聯合罷工。估計罷工人數有三十多萬，包括知青家長和社會人士。又有上面提到的

六萬知青，在進出越南、緬甸、老撾的邊界綫上，控制所有的交通、武器、彈藥和醫院。這對中越戰爭是顆定時炸彈。一旦這顆炸彈爆炸了，加上北京、上海、四川工人聯合起來的三十萬人罷工，在政治、經濟上對一九七九年的撥亂反正、安定團結的新中央機構，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此外，我們不但簽名，而且滴血爲誓，若不成功我們也不願苟活。所以，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都有了後，中央只有無條件地答應我們的要求。

記：謝謝您接受訪問。

●國內民運●

人啊，人！

——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散記

（原下鄉知識青年）

齊秋霞

（一）「我要人肉」

小珍子是來自四川的知青，和我在一個連。她長得圓圓胖胖，又白又淨。她那既長又黑的辮子拖在滿是補丁的衣服上，形成一種特殊的風格。加上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顯盼有神，使她成爲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中人見人愛的女孩子。

而且，小珍子總有許多童年往事要告訴你。

她十四歲時便嚮往軍隊生活，心想軍隊是個大熔爐，可使人百鍊成鋼，於是背着書包就

來到了兵團。聽說她母親心疼這個獨生女，怕她吃苦，連肥皂和自貢鹽都寄來了。

一九七六年政策改變。凡是身邊沒有子女的父母，可以向上申請調回他們在農村、邊疆的一個子女。小珍子的情況特別有利，因她父親到省城講學，母親因心臟病住院，沒有親人照顧。小珍子的父母又是有貢獻的知識份子，理當優先照顧。然而，上級調令已下達近八個月了，却不見有任何動靜。後來，聽說是連部指導員要求她送塊臘肉，才能放人。小珍子頂着四十度的烈日，翻山越嶺到郵局打電報，要家人儘速寄來臘肉。十五天後，小珍子捧着未曾拆開的臘肉直往連部跑。一時，下工的人們

個個議論此事，都說小珍子就要出頭了。誰知，由連部回來的小珍子淚流滿面，倒在床上半句話也不說。在整整一個月的病休中，小珍子悶悶不樂，人愈來愈脫形，走路愈走愈拖鞋底，辮子不見用了，眼珠子更失去了光彩。人人都說小珍子變得痴呆了。

原來，送上臘肉的小珍子得到的是「我要人肉」的答覆。

（二）范根民之死

我和其他兩個女政治囚犯被押到一間囚房，進去時只見二十七個男囚犯零零散散地坐在地上，唯范根民一人躺在潮濕的地面上。牆角有幾根斷扁擔，看來是因爲用刑時太猛，打斷的，一個持槍的守衛大聲吼道：「這就是逃跑的下場。」只見范根民躺在血泊中呻吟，血不斷從他的補丁褲內滲出。男囚犯們不忍目睹這幕慘劇，個個都低着頭，看不出他們是害怕還是憤怒。看守命令一個囚犯用便桶拎來涼水，往范根民身上沖下去，反彈的水混和着血濺到大家身上。

這一晚，我怎麼也睡不着。次日早晨，聽說尿桶裡的尿一半洒到了地上，一半被發燒的范根民喝了。

第三天晚上，眾人又集合在這滿是尿臭和汗臭的房間，緊鎖着眉頭，忍受着那沖鼻的臭氣。看守告訴大家，團部已出動警衛搜捕逃犯。原來，范根民因為發癲那天下午沒有出工，趁一個人在牢房時，撬開窗子，翻過後山，穿過膠林，第二次逃跑了。

十天以後，傳來范根民死於昆明的消息。一個月後得知，范根民因為沒有通行證，躲在一輛出國部隊的貨車裡，餓了三天三夜。到昆明郊區後，范根民趁機跳車，步行了一段路，後搭一農民的馬車進了城。當天，便倒在街上昏死過去，被一名昆明延安醫院的工作人員送入醫院搶救。范根民只說了句「要告狀」便死了。死時全身淤血，七竅流血，人更瘦得皮包骨頭。那張早已濕透的狀態是被送到省委了。

●國內民運●

我們要做一個人

——給丁惠民的一封信

江濤

，但省委轉給了農墾總局，而農墾總局九個月後才來團裡調查此事。團裡隨便找了個理由，說范根民有病，便把此事搪塞過去了，掩蓋了拷打的實情。

范根民死了，留下了七個月大的遺腹子和一個老實的農婦。范妻受此打擊後，不幸早產。雖托人寫了狀子，但上告無門。

我曾和范根民同班勞動。有一次我們背竹排上山，依規定每人要背四到六塊七公分厚的濕竹排。范根民身強力壯，見我背上的血都從襯衣裡滲出來了，硬從我背上抽去二塊竹排，扛到自己身上。下山時我和他聊起入獄的事，才知道他因不服當官的多次誘逼其妻，甚至在其已有身孕三個月後還是不死心，於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出手打了那個當官的。就這麼被關進了牢房。

我咬破了手指，在一張手紙上寫了「血要償還」，那是一九七七年九月的事。

丁惠民：

一九八〇年初秋，在結束八年西雙版納的非人生活後，為推翻不合理的摧殘知青的制度，我們會要求北上請願，但却得不到通行證。為維護我們的人權和尊嚴，五萬三千四百三十一名全體簽名青年舉行了無限期的罷工，莊嚴的選舉了具有全權資格的青年，組成北上請願

代表團，遞交寫給黨中央鄧主席的公開信。

我們不遠萬里，跋山涉水，搭車、擋車、跳車。離開旱季酷熱的西雙版納時，我們僅着單衣。你考慮到季節和氣溫的變化，建議我們買了二百床兒童棉絮，自製棉背心，用以禦寒。

我們由千里外來到昆明省城，却遭到省委

(三) 病退秘方

李昌壽從北京探親回來後，天天咳嗽，晚上常常吵得同宿舍七、八個男生不得安寧，連竹籬隔壁的女生也受影響。終於，李昌壽拿到北京協和醫院的證明，以病退離開了農場。

事後，李昌壽的好友傳出他的病退秘方，幾個上海知青紛紛仿效，倒也十分靈驗。他把煙絲浸入墨汁後，再加以烘乾，然後用這種煙絲捲成煙卷，連續吸兩個星期，並和胡椒和開水，調成胡椒水灌入鼻孔，嚥進肚裡。這樣在醫生檢查時肺裡就出現了陰影，人也經常咳嗽不止。

八〇年知青全部返回城市後，聽說李昌壽弄假成真。他的肺部有陰影，並常有低熱，一吸煙便咳得很厲害。

的百般阻撓。北上的列車停發了，工人治安糾察隊出動了。我們只有採取應變措施，將全體人員分成幾路分隊繞路成都、上海到北京。到達北京後，我們得到政治局委員王震副總理的接見，黨中央答應了我們的全部條件，並派顧問團大舉赴滇。知青聽到罷工工資照發、知識青年哪裡來回哪裡去的中央指示，興奮了幾天幾夜。大家唱啊跳啊，喚醒了沉睡的哀牢山。

我們將做一個真正的人。八〇年初，幾十萬知青從黑龍江、內蒙古、江西、安徽、雲南回到上海，其他的各大小城市，如北京、天津、武漢、成都、昆明也都有知青返回。這批沒有戶口，又沒有職業的青

年紛紛向解決知青問題的「上山下鄉落實政策辦公室」要求戶口、工作、住房和醫療條件。但是，由於這些問題並沒得到妥善的解決，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有怨言，駭人聽聞的偷盜事件更是層出不窮。

你、我和益倫坐在上海人民公園的中心草坪上議論如何解決知青的吃飯問題，當下便起草我們的宣傳綱領。我責怪你為什麼要在光天化日下商議此事。你說：「怕什麼！讓他們明着來捉，比暗地遭害好，我們是遲早躲不了的！」

我們找過市委書記王一平，代表幾十萬要工作要戶口的青年提出正當的要求——我們要生產自救，得到的答覆却是「自發的個體戶是資本主義復辟手段，與社會主義方向不符，要打擊！」當時知青面臨的窘境使我們不得不挺

江濤（右二）與知青攝于西雙版納



而走險。不管它了，我們自己幹自己的！我們賣掉所有值錢的私人財產，我們從募捐的餘款中買了四十台工廠的過時陳舊的補鞋手搖機。我們動員和組織了男女青年趕製餛飩。這些青年取消了作傢俱的計劃，將那些用汗水換來的西雙版納木料支持我們，做了上百副貨郎擔小轎子。我們去殯儀館、火葬場幫人寫輓聯。我們自製的花圈真假難辨，比國營價廉物美。我們還負責預約訂貨，準時送入弔喪大廳。我們的早點攤有生煎饅頭、豆花、擔擔麵。北京的杏仁兒茶也擺了。此外還有鷄鴨血湯大餅油

條。北京車站、上海吳淞口、重慶大渡口等地到處可見。我們做的娃娃套裝經濟實惠、式樣新穎、美觀大方。儘管黨報上一再阻擋，要人民不要上當、小心假貨，我們的貨仍然供不應求。知識青年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我們的顧問是當時的退休工人。我們做到了按勞取酬、互相救濟。家長們個個稱好，社會人人支持。

我們常常熬夜。你說我瘦得太苗條了，我說你瘦了顯得更高。就這樣，我們經常苦中作樂。記得我們最後一次集會是在某位名演員家裡。她女兒為我們唱了「金陵塔」。聽罷，你感觸良深的說：「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說不定明天我們就各奔東西，今後誰也不記得誰了。」

就在分手的第二天，上海刮了一陣「颶風」，聽說一晚抓了不少人，第二天就取消戶口，把知青送往青海勞改農場。我在家中的信箱發現一封沒寫地址也沒貼郵票的信，上頭寫着「二十四小時速離滬，注意有盯梢。小心颶風！」我急得六神無主，又不能向父母說必須離開的理由，不能讓他們再為我受驚嚇了。我藉故找母親吵架，說要離開這十六平方的小籠子

。母親知道我的委曲，體會我沒有戶口、沒有工作的煩惱，同意我到外婆鄉下小住。我走了，臨行轉移了請願團所有文件和代表留影。我剪去了你最欣賞的一頭剛留長及肩的秀髮。趕着深夜的快車來到無錫，在車站候車室裡等候了一夜。第二天候着長隊等着出城去梅村的長途汽車。

我經阿梅姨介紹，進了一個極需英語老師的梅村大隊小學。當時，我手中只有一本英語課本，還是前十年編的，自己都沒認識幾個單字。

我落腳的宿舍是一棟破廟；一半做為宿舍，另一半仍是廟。我借來阿梅姨的棉被，學校一只破舊的手搖唱機。晚上聽唱機逼自己死背五十個單詞，還規定自己不得忘記卅個字以上。

我的報酬是一天八角。學生們幫我澆灌一塊菠菜地，還為我的自留地多蓋了一層稻草，以防早秋的寒霜。我常常得到半個紅薯，雖然泥都沒弄乾淨，我還是大口的吃。在偌大的後廟裡，我也漸漸習慣了夜裡野貓的啼哭，陰森的寒風，和躲都不躲的老鼠，任牠們將我的鞋子移來移去。

我常給孩子們作英語單詞的謎語遊戲，用英文教他們唱一、二、三。期末的統考，我的學生竟在縣裡名列前茅。頓時，梅村的學校到縣學校都傳說紛紛「是誰派來的老師，這樣的水準為什麼不調縣裡？」「聽說是上海人，可是操一口京腔呢？」那一本寫滿了英文的本子，本來是用來硬背單字的，也被說成是我的英文日記簿……

第二天，教導主任找我，要我停一堂課，全校收聽政治教育的廣播。他還告訴我，有一個男性朋友在校門外等我。此人一見到我就對

我說，「我叫錢××，從上海來，是西市偵警處的，我聽過你生產自救的講演，很佩服你。」他笑得有點陰冷，並不討人喜歡。「就這麼些嗎？」我冷冷地說。「不不！」接着他又嚴肅地說：「你聽我說，趕快離開這裡，避避刮颶風的風頭，過幾個月我再與你聯絡。」說完他就要走，我從他誠懇的眼神中發現一絲感傷和悲傷，使我改變了原先對他的觀感。「天黑了，沒有進城的末班車，你明天清晨再上路罷。」回到我的「家」，我拆了後廟裡學生用作兵兵桌的擋風板，並抱了我自己的一床被子讓牠蓋。自己穿了棉毛褲加上二件毛衣，拿枕巾裹了腳底。那晚，我們談了通宵。「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我納悶地說。「這個月你在哪兒我都知道。」他說。那晚的長談，我又知道

許多他的背景。他是四人幫在上海爪牙陳阿大的「一個智囊」！也是一個筆桿子。四人幫倒台時被判刑，雖曾多次要求開庭公佈他的罪狀，但未經許可。服刑的第二年得了特赦。以後並得到一份將功補罪的差事，重新揮動筆桿、寫材料、打報告。他可以進出賓館、飯店和高級場所，也可以與普通知青一樣要工作和戶口。特別注意有反對言論的人、青年學生領袖和拋頭露面宣傳民主的人士。我是他當時工作的一個重點。觀察的重點是我出入哪些場所、與哪些人接觸和在知青中散佈哪些言論。並等待上面的指示，隨時將我秘密逮捕。說到激動處，他傷心地哭了。

我別了那些有淳樸臉蛋的學生，急急坐上通往無錫火車站的長途公共汽車，告別住過二個半月的梅村小學。我，開始了新的逃亡。惠民，自那之後，我再也沒有機會見到救過我的錢××，更沒有機會見到你。一晃六年了，我通過各種渠道與你聯繫，始終沒有聯絡上。你莫非……

我們雲南兵團的那些老兵們，人還在，心還在，我們有了新的目標——在「中國之春」的旗幟下，為了人性的徹底解放而奮鬥着。

如今，願借「中國之春」，公開這封無法投寄的信。如果你在海外和國內，看到這封信，請通過「中國之春」，與我聯繫，共同回憶那些不可能忘懷的歲月。

祝福你！

你的朋友 江 濤

一九八六年八月於天涯海角

附件一：

關於選舉赴京請願團代表的方法和章程 《試行草案》

- 一、代表團正式名稱為「雲南農墾西雙版納地區首批赴京請願代表團」。
- 二、向黨中央國務院中能負一定責任，其身份是政治局委員的負責首長當遞交請願書和口頭匯報，反映知識青年實際情況，是這個代表團唯一宗旨。
- 三、無論發生任何情況，上述目的未真正達到，則視為匯報團的失責，代表團所有成員對此負全部責任。
- 四、每個生產隊（連）用民主選舉方法，初選一名候選代表。

- 五、每分場（營）在候選代表中產生兩名正式代表，由籌備分組審查資格後，成為各農場（團）全權代表。原則上一名上海籍，一名四川籍。
- 六、各農場由這些代表組成各農場（團）的代表分團，並以農場名稱分組籌備。
- 七、在此基礎上正式成立「雲南農墾西雙版納地區首批赴京代表團」。
- 八、代表總團的候選人員和職權，由籌備總組統一安排。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

附件二：

關於赴京代表團請願的募捐規定

這次代表團是代表了西雙版納所有知識青

年的利益而組成，他們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全體知青的自願捐獻。只要盡到他（她）們的力量，那麼，捐獻一分錢的同志和捐獻十元錢的同志受到同樣尊重。

捐獻方法：(1)各連隊（生產隊）推一人作召集人；(2)由該召集人將生產隊捐獻收集起來交分場（營）召集人或籌備組並作詳細登記；(3)各分場將所有生產隊捐獻總數上交，聽候總組命令準備統一調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

附件三：

雲南數萬知青請願書 ——代第三封聯名信

敬愛的華主席、黨中央，敬愛的鄧副主席：

我們幾萬多知識青年，在飽經風霜已過八年之後的今天，奮全力鼓起最後的勇氣，莊嚴地選派了有全權資格的代表，組成請愿團，前來北京向您們遞交這封疑結了我們全體簽名青年整個生命熱情和寄托我們全部人生信念的請愿書。這或許是種冒失行動，但確實出于不得已，甚至臨近絕望，請原諒吧！

在四害橫行的日子裏，社會是多麼不平等啊！同樣一代人，同樣是知青，命運却截然不同。有權有勢的，早已遠走高飛，得意洋洋；有門路的悄悄溜走，不聲不响；有錢財的，買通門路，不翼而飛。剩下的只是我們這些普通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子女，像一堆被人拋棄的東西丟在這裡，過路之人不屑一顧。疾苦病痛誰能過問？為了回去，有人不顧一切，女孩子被迫出賣自己純潔的青春，有人像禽獸一般蹂躪她們；男青年不惜斷肢截手，自毀前程。這難道是在編造神話麼！這些事迹，在八年的生活中看夠了，聽夠了。血淋淋淒慘慘，令人悲，令人憤。沉重的勞動，缺菜少油的飯食，枯燥無味的生活，望月思親的熱淚，充斥着整整八年的光陰。有多少人挨過領導的辱罵，幹部的拳腳，無情的棍棒！狠毒的槍托！這一樁樁一件件，沾滿了我們多少青春的血和淚。問一問那個青年沒有一肚子苦水帳？想一想這一切為了什麼？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害得我們好苦哇！是這幾條禽獸用他們惡毒的爪子把我們推向死亡的邊緣，使林彪一度狂吠的變相勞改成為現實！這八年的青春要向四害討還！這八年的怨恨要向他們清算！失去的青春永不復返，萬剛「四人幫」也難解我們知青之恨！

八年的歲月中，辛酸多於甜蜜，愁雲多於笑容，痛苦淹沒了幸福，這是多麼艱辛難熬的八年呵！父母的眼淚，銀白的鬢髮，兒女的悲

傷，思親的惆悵！千里迢迢，望眼欲穿！莫非人間真有望鄉崖？遙看銀河喜鵲搭橋，牛郎織女還有七月七，可是我們知青何時才能回到我們父母膝下？喜鵲報喜了！是英明領袖華主席挽救了黨。我們敬愛的鄧副主席重新工作了，我們等待着，一年二年過去了，撥亂反正的會議一個接一個開過了，可是我們知青問題却不見動靜，音訊杳然。八年還不夠麼？人生能有幾個八年？我們的青春剩下，僅二三年了，還能無端地消磨下去麼？上了三十的人還能有什麼指望？「四人幫」在上下鄉問題上沒有染指麼？毛主席關於接受再教育的指示我們是擁護的，但具體執行的方法到底是對還是錯？我們不明白！中國這麼大的地方為什麼只有農村才是我們這些人的歸宿處。難道接受再教育，就是用這種八年簡單笨重的強體力勞動來表現和實現嗎？

我們要提的疑問太多了。撇了多少年的苦水一下子也說不盡，過去了的東西，就讓它過去吧。過多重覆辛酸的歷史，只有給人帶來悲傷和憂愁，而這兩樣東西對我們這些在農村已八年的知青來說，是已經夠多的了。如果中央認為以前上山下鄉具體執行方法錯誤的話，請趕快為我們撥亂反正吧！八年了，父母的眼淚要流盡了，我們體內的青春活力即將衰老。再這樣下去，我們受不了，我們懇求，我們請求，不求金不求銀，只求讓我們回到父母身旁，我們可以幹最艱最累的活，領取最低水平的工資報酬，但只要是在父母膝下再苦也是甜的！

懇求中央早日決策。

雲南數萬下鄉知識青年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

《北上宣言》
由於我們合法的要求未能得到合理的解決，在盡到了一切努力以後的今天，籌備總組決定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派出北上代表團，我們相信向華主席鄧副主席請願是無罪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

附件四：

《罷工宣言》

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共產黨西雙版納自治州，景洪州黨委拒絕接待等候廿四小時的代表，拒絕開發通行證）北上請愿團籌備總組，在此正式宣佈，一切簽名知青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起舉行無限期罷工，為維護我們人權和尊嚴。

我們的復工條件：

- (一) 無條件批准北上，
 - (二) 追查引起罷工的責任，
- 所有簽名青年，都必須無條件的執行籌備總組的決議，繼續無限期罷工，沒有總組通知不得私自復工。
- 沒有參加簽名人員，如果自願參加我們罷工這一項正義行動，我們表示歡迎，這些人將不負責任，一切責任由籌備總組自負。

北上籌備總組常務委員會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

憋了八年的歌

（大罷工領導者之一）江濤



有一首歌在切切作響，
它浸潤著知識青年的血泪，
它飽含著父母親的哀傷，
它輕輕地敲打著我的心扉，
在高山在荒原輕輕地吟唱。
它在敘述一個悲慘的故事，
那麼駭人卻又那麼真實，
泪血作音符，
旋律悲又壯，
此歌能動萬物情，
密林深溝齊感傷，
句句扣心弦啊，
激我歌興三千丈，
我要唱，我要唱，
我要對著蒼天放聲唱。

怎奈何，
禍國殃民「四人幫」，
搞獨裁，搞專制，一言堂，
凶殘暴戾任歹毒呵，
誰有異議下鐵窗。
說什麼「上山下鄉」金光道，
父母兒女樂滔滔，
民意被強姦呵，
天理被踐踏，
迢迢九州寂無聲，
黑幕沉沉華夏罩，
我們有嘴不能說呵，
我們有嘴不能唱，
權把悲憤作心曲，
含怨茹恨盼時光，
一日復一日，
月月又年年，
春秋寒暑八年整，

天天都在悲歌鄉。

日出九天雲霧開，
四人幫被押上審判台，
幾聲抽泣，陰魂難轉，
笑今朝，歹徒處處受鞭笞，
百花競放鳥競啼，
民主國裏人歡暢，
亮開嗓子吐衷腸，
唱吧，放聲唱！
一首歌，一座噴射的火山，
一支曲，一把閃亮的利劍，
劍劍刺向四人幫，
怒髮衝冠並沸揚。

回首望——

風雨如磐八年前，
荒狼凶，鷹犬狂，
搞什麼「知識青年一片紅」，
怨聲載道人人慌，
家裏有白髮蒼蒼的老娘，
無人照顧，無人撫養，
自己年幼多病，
又怎能去揮鋤墾荒，
管你願不願意……
呵……苦嗚咽……
汽笛一聲人斷腸，
月台滾滾翻淚浪，
鑼鼓卻震天，
知青泪洗面，
胸前紅花閃……
欺逼哪有這麼甚呵，
什麼世道什麼天，
父母哭兒女，

兒女哭故鄉，
處處聞悲歌，
怨恨滿天揚，
泪水能滙千條江，
流入大海翻巨浪，
然而——誰又能，
誰又能挺著胸膛說真話，
憤歌向著世界唱，
霧正濃，夜正長，……

回首望——

行程十萬八千里，
竹屋竹牆竹搭床，
滿目青山將我們迎，
深山老村邀我們上，
一碗飯，一盆湯，
湯中只有鹽幾顆，
油星兒不見湯面上，
此種飯菜當食糧，
卻逼我們去墾荒，
鮮血流竹林，
汗水灑荒山，
鋤頭換了好幾把，
刀柄斷了又裝上，
人消瘦，山亦荒，
鮮血灑處野木盛，
汗洗荒山草更長！
不見膠林翻綠浪，
只留病魔緊纏身上，
面黃肚瘦苦難當。

姦淫女知青，
大撈知青財，
捆綁吊打家常飯，
洩憤報復尋常事，
多少知青被摧殘，
多少知青沉淪，消極頹唐，
多少人含恨離開人間，
多少人走邪道，一失足成千古恨！
多少心酸事，
攪的人發狂。

回首望——

人自有情女當嫁，
苦瓜苦藤苦姻緣，
長期不見笑顏開，
生兒育女人之常，
此處養兒泪汪汪，
營養不良兒多病，
母親疼痛在心坎上，
母親愁，娃兒啼，
忍痛送兒回故鄉，
常想母子常相繫呵，
卻又怕，孩兒在此難久長，
苦情長，苦情長，
一曲能唱三萬丈，
聲聲悲憤音高亢，
感謝黨中央，
粉碎四人幫，
消我心中氣，
我能放聲唱，
我願歌聲化利劍，
猛刺凶狠的四人幫，
還我青春奔四化，
攀登二〇〇〇年當關將，我要唱，放聲唱！



劉山青

探訪民運人士家屬遭逮捕 十五個團體仗義營救劉山青

本刊報導·香港居民劉山青因往中國探望民運人士何求、王希哲等人的家屬，在廣州被中國政府拘留，並於一九八三年二月被「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劉山青被捕後，香港居民一直沒有停止對其的聲援和營救工作，特別於八六年末在香港成立了「營救劉山青委員會」，專門負責搭救劉的各項事宜。

一項重要的聲援工作是發起簽名運動，準備將收集到的簽名證件寄交趙紫陽。香港居民響應熱烈，僅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天在旺角一處就收集到二千零八十七個街頭簽名。此外，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職工青年聯會等十五個宗教群眾團體專門派出代表前往廣州就劉山青事件詢問公安部門，敦促中國政府重審這一案件，早日釋放劉山青，並聯名致函廣東省公安廳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他們在信中指出，劉山青一貫熱衷於社會改革事業，與他們的團體一道曾做了大量的推動社會前進的工作。在過去漫長的五年牢獄生活中，只有其父被准予探監，成為他精神上的唯一支持。現在其父患病，極希望其子能早日獲釋。他們迫切要求中共政府能准予他們探望劉山青。

十五個團體之代表前往廣州詢問 有關劉山青事件座談會

今天是劉山青在廣州被捕五年之日。他在被判十年刑期後，現仍在梅縣第三監獄服刑。

我們十五個團體曾於本月十二日前往新華社香港分社請求安排前往廣州探訪劉山青。其中三名代表已於八六年十二月廿一至廿三日到過廣州。我們的目標是：

- 1 由省公安局安排我們去見劉氏。
- 2 詢問廣州法庭關於劉氏早日回港的機會。
- 關於探訪之要求，我們會詢問廣東省公安廳勞改局。經過他們一天的考慮後，他們的答覆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非犯人直系親屬不可以前往探訪。原因是若准許一般朋友探訪，則會有很多人藉朋友之名義前往，恐怕因此而大大增加有關部門之工作量。而劉山青現已服刑五年，剛好是刑期的一半，根據勞改局的規例，他將有機會被減刑，但必須符合一定之條件。不過發言人並沒有解釋何謂一定條件。指示我們前往廣東省高級人民法庭去查詢，因為釋放犯人之權力屬於省法庭。
- 在省高級人民法庭，發言人歡迎我們詢問。我們提出下列五問題：
1 重審的機會。他們答覆是犯人被判刑於上訴

失敗後仍有權申訴。

- 2 可否請香港律師辦理。答覆是可以。該律師可以在香港寫信申請或親自前往廣州辦理。至於香港律師可否前往監獄探他，則要待有關負責人商量後才能決定。並叫我們寫信給法庭，他們會在書面上答覆。
- 3 對於平反劉山青的機會，發言人說需要重新研究該事件方可決定。
- 4 對於減刑的機會。主要條件是他在獄中的表現要好，能積極勞動。並強調他認罪與否跟減刑無關。至於減刑多少則由法庭決定。（從劉氏親屬處知道勞改局人員曾透露劉氏近期的態度很好）。
- 5 法庭歡迎有關團體聯名寫信或直接前往廣州詢問此事，並應承會答覆。勞改局及法庭並接到了我們一封信，而且登記了我們的名字及香港居住地址。我們希望此行能夠對劉氏早日獲釋之機會有所貢獻。

致廣東省公安廳勞改局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庭：

我們是香港十五個團體的代表，一向關心香港居民劉山青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下旬在廣州被捕之事件。劉氏於一九八三年被判為「觸犯刑法第一〇二條，從事反革命宣傳煽動，判

刑十年，被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事件引起香港市民的關注，而我們的團體特別關心此事，因為劉山青和我們一起參加很多改革社會的行動。例如：一九七五年牛池灣木屋居民爭取入住公共屋邨、一九七六年在工人夜校工作、一九七八年支持金禧中學師生爭取復校、一九七九年支持油蔴地艇戶爭取上岸、一九八一年多次去探訪在街邊露宿六個月的馬仔坑火災災民……等。充分說明劉氏熱衷於推動社會前進的工作。

在過去五年漫長的牢獄生涯，只有其父親的探訪成爲他精神上的支持。劉氏的父親現患

●民運報導●

劉山青事件報告書

(中國之春駐港記者) 江流

一

劉山青，在香港已經大名鼎鼎了，但在世界範圍內，則仍然不爲人所知。劉山青是一位香港青年，因爲支持中國民運而被中國政府秘密逮捕、判刑，中國的民主運動不應該忽視他，說得準確些，劉山青應該與魏京生、劉青、徐文立等人排名一起，受到大家的尊敬和關注。中國之春在一九八三年即已關注劉山青一案，並已參與了香港民衆的某些營救劉山青的活動；然而我們所做的實在太少了。迄今爲止，「中國之春」月刊甚至仍未做過什麼報導。這樣忽視他是一個過失。

病，因此極希望其子能早獲釋放。我們也希望他能儘快與家人團聚，繼續參與有意義的社會服務。這次我們到來是爲了：

1. 詢問廣州法庭關於劉氏早日回港的機會。
2. 由省公安局安排我們去探望他。

聯署團體：

1.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2.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
3. 職工青年聯會。
4. 瑪利諾正義和平委員會。
5. 米蘭會關心社會小組。
6. 葵涌新區基督徒基層團體。

7. 新青學社。
8. 基督徒學生運動關注中國小組。
9.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10. 香港天主教青年聯會。
11. 新婦女協進會。
12. 國際公教學生運動亞洲區秘書處。
13. 草根文化中心。
14. 浸會學生會社會事務委員會。
15. 聖雲先堂和平小組。

聯絡地址：九龍界限街明愛中心六樓天主教大專聯會。

電話：三一三六四五〇三

二

劉山青，現年三十三歲，男，一九七三年就讀香港大學，曾任香港大學學生會時事委員會成員，積極從事學運。一九七六年，他與其他入一起抗議學生會盲從中共的潮流，譴責中共違憲，聲援「四·五天安門事件」。大學畢業後，他與朋友在香港創辦「新青學社」，致力提高年輕民衆的社會意識和家國情懷。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間，凡是香港發生的較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如抗議政府封閉金禧中學事件、佳視電視台員工爭取復工事件，以及偉大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他都曾積極參與，捧出他

的赤子之心。

「北京之春」發生後，他滿懷愛國激情地在香港響應中國的民主運動，參與了「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和「香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協會」的工作，並曾多次冒着坐牢的危險，回到中國與民運志士聯絡，力爭把中國民運的衝擊力，傳到香港，引向全世界，藉以加強中國民主運動的聲勢。

三

一九八一年，中共大舉鎮壓民主運動，大批民運志士被捕。神州大地，一時間寒流滾滾。也許由於血濃於水吧，劉山青無視兇險，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前赴廣州，探訪慰問被捕的民運戰士王希哲、何求的親屬，從此失蹤，下落不明。八二年一月至三月，劉父及劉的好友多方多次向香港和中國政府查詢，至三月二十三日，劉父始獲廣州公安局口頭通知：劉因觸犯刑律已被捕在獄。四月，營救劉山青委員會在香港成立，不斷進行記者招待會、發動簽名運

動、出刊劉蒙難書刊、登廣告、貼海報、散發傳單、赴新華社請願等等活動，強烈呼籲中國政府公佈拘捕劉氏的原因，要求對劉氏作公開的審訊。八二年十月六日，香港當局覆函劉父及劉的好友，表示駐北京的英國大使館已向中國政府查詢，答覆是劉持回鄉證（意思是劉屬中國公民）回國，因不法行為而被拘留。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劉父赴廣州，獲廣東省中級法院口頭通知：劉被判入獄十年，至於劉究竟做了什麼不法之事，則拒絕說明。消息傳回香港，當即輿論嘩然。國際特赦協會經分析，在四月三日把劉列為良心囚犯，呼籲中國政府應立即釋放。唯中共在港機構及所謂的港區人大



香港中國之春書屋介紹劉山青及大陸民運人士的圖片展



香港青年手持標語要求為劉山青平反

代表、政協委員，均一概裝聾作啞。八三年八月，香港中文大學的「兩岸民生比較團」赴京，向中共高層查詢劉案。隨後於九月，中文大學學生會羅永生獲廣州中級人民法院函，指稱對劉的處理「不存在違法問題，請勿疑慮」。究竟劉幹了什麼不法行為，則還是堅決避而不談。

此後，越來越多的團體及熱心人士，為劉氏撰寫、散發了越來越多的宣傳文字。中國之春在八六年四月五日，亦就劉氏及其他民運人士事件，在港九街道上散發了六萬張傳單。令人憤慨的是，面對群眾的強烈要求，中國政府竟可充耳不聞，終是不肯公佈劉氏究竟如何「不法」。

四

劉氏一案鬧至輿論嘩然，根本原因在於各界對劉案始終充滿疑慮：究竟劉氏有何「不法行為」？究竟是劉氏犯法還是中國政府犯法？中國政府要嚴肅法紀，明正視聽，就應該公佈劉案的全部法律紀錄（包括偵查紀錄、起訴書、全案法庭紀錄、判決書等等），甚至還應該讓劉氏會見記者。而中國政府面對天下人之疑慮，竟以一句「請勿疑慮」來搪塞，這是什麼民主？這簡直是視民為堯。

八〇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〇條規定：「把人犯逮捕後，應當把逮捕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屬或者他的所在單位」。而劉被捕後，廣州市公安局不但在兩個月內不履行這項規定，而且在劉父追查到廣州市公安局時，仍拒絕通知劉被捕的原因。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宣稱對劉案的審理「不存在違法問題」，完全是睜着眼睛說瞎話。至於還有多少「違法問題」，則還有待追查。

從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致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羅永生會長的信，可以看到中國政府指控劉氏的只是空洞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依據現行憲法，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和示威的自由，我們認為以言論思想定劉山青的罪，是違憲行為，是非常不適當的。

五

劉山青極少寫文章，他不像魏京生、劉青、徐文立、王希哲等人以紙筆針砭時弊，鼓吹民主改革。他所做的，只是傳播民主意識，支援受迫害的民運人士及其家屬。在這些平凡的民運工作中，表現出他對中國、對中華民族的

偉大忠忱。爲此，儘管他並非民運主將，儘管中國政府對劉案擺出老子就是要一意孤行的姿態，香港的熱心民運的人士，仍堅持爲劉氏吶喊，不讓劉山青冤沉。

其實，站在人權立場，也不容許不公佈劉的犯罪事實就把劉囚禁十年，見冤獄而置之不理，這冤獄明天將囚禁我們。爲此，很多社會人士，也不斷地爲劉吶喊、爲劉呼冤。

劉被捕至今，已五周年了。今年十月，營劉會召開了若干團體的代表，舉行會議，經檢討國內的改革形勢，會議認爲：在輿論的壓迫之下，中國政府已釋放部分民運主將，如貴州楊在行、上海的傅申奇等，實在沒理由不釋放

爲營救一位支持中國民運的香港青年請您慷慨解囊

中國的民主運動，有一位既平凡、又偉大的支持者，他叫劉山青，男，香港居民，現年三十三歲，在港任職營業工程師。一九七六年，他曾在香港支持「四·五天安門事件」群眾運動；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他曾參與「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和「香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協會」工作，積極支持民運，不時與國內民辦刊物人士交流思想。八一年十二月，正當國內一片紅色恐怖，民運人士紛紛被捕的時候，他鐵肩擔道義，前往廣州，探訪慰問王希哲、何求等民運人士的家屬。自此被中共當局秘密逮捕、秘密審訊，判刑十年。

劉山青被捕之後不久，一群正直之士激於義憤，在香港組織了「營救劉山青委員會」（簡稱營劉會），迄今五年。該會堅持不懈地爲營救劉山青而奔走吶喊，他們的吶喊激起了越

民運的支持者劉山青，爲消除香港民衆對中國政府的疑慮，以促進香港九七的繁榮安定，實有必要作一次廣泛的發動，爲此，就劉山青案向中國政府特作如下呼籲：

(1) 公佈劉的犯罪事實，公佈對劉案審理的全部紀錄。

(2) 給劉山青人道待遇，讓劉的至親好友探監。

(3) 對劉山青予以假釋或平反釋放。

這次會議決定：派人與新華社對話；派人去廣州監獄，要求探望劉山青；動員國際輿論，關注劉山青案；募集款項，以支持各項活動。會議又決定：如中國政府堅持不理不睬，又

來越廣泛的共鳴，要求中共公佈劉山青的犯罪事實及要求中共立即釋放無辜的呼聲此起彼伏。一九八三年四月，國際特赦協會亦已嚴重關注劉氏一案，把劉山青列爲中國地區的良心囚犯。

中國之春認爲：劉氏一案，是中國民運的一件大事；營救劉山青的工作，顯然就是一件悲壯的民運工作。對於營劉會百折不撓地致力於這一工作，我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此，我們謹向各界呼籲：爲營救一位支持中國民運的香港青年，請您慷慨解囊，捐款將由中國之春轉交營劉會。中國之春的成員並將響應營劉會的呼籲，將與營劉會一起爲營救劉山青而同赴艱難。

中國之春（香港）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聾又啞，便發起簽名運動及舉行請願抗議活動。中國之春香港成員派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代表們向會議表示：中國之春將會通知全球全中國各地分部，籲請他們關注劉山青案，籲請他們採取各種方式，支援香港的營救劉山青的運動。

這裡，我們謹呼籲所有中國之春成員及中國之春讀者，請你們行動起來，爲打碎劉山青冤獄，爲一個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及多元的美好中國而鬪爭。

「中國之春」駐港記者 江流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復活

(國內) 草葉

從埋的很深的地下
他又奇跡般的走出，
在這隆冬的夜晚，
我聽到了這鏗鏘的脚步。

是海的呼喚，
誰能阻住江河的奔流。
不要害怕黑暗的時間太久，
因爲我們都來自太陽，
生命的組成——
是自由的元素。

恐懼

讀報有感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宋佳佳

我的鄰居是從中國大陸湖南來的一位工程師，新近移民美國，一時尋不到理想的工作，只得暫時屈就於皇后區一家華人辦的電子工廠，做些粗工糊口。那家電子工廠各方面福利均差，唯有訂閱「中報」優待，每月僅區區兩元而已。叨這位高鄰的光，我也能免費閱讀這份名「中」實左的報紙（我會當面對一位「中報」編輯打趣道：「貴報已如比薩斜塔一樣斜得一塌糊塗了，何能言『中』？……」）

元月二十日的「中報」以赫然標題吸引了我的視線：千名大陸留美學人聯署公開信。翻過來第二版則是：全美中國大陸留學生關心中國政局，五十餘派派風起雲湧發動簽名請願，四百餘人挺身而出具列真名提出熱切呼籲。

我激動地逐一默唸着每一個簽名者的尊姓大名，其中有好幾位是我的朋友。然無論識或不識，我都為他們感到驕傲！這是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光榮榜！

但是，我不敢把自己的真實姓名「XX」簽在這光榮榜上，甚至連簽一個化名也不敢（簽上去便落了筆迹，認真追查起來，十個有十個都逃不脫！）……

因為我感到恐懼……
恐懼是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的人們的通病。對此，蘇聯著名離經叛道詩人葉甫圖申科曾寫下不朽的詩章——「恐懼」：

「……

恐懼曾經像影子一樣，
各處滑動，侵入樓房的每一層。

他們讓人漸漸地變得馴順，
他們給一切都加上了戳。

哪兒應該沉默！就讓你叫喊，
哪兒應該叫喊！就讓你沉默。

……

得知什麼人要去告密隱隱感到恐懼，
或者什麼人在敲門心裏感到恐懼。

然而，又怎能忘掉和外國人講話那種恐懼？

這還不算，還有和妻子講話的恐懼？

……

我們不怕冒着砲彈奔赴戰鬥，

我們不怕在暴風雪裏做工；

就是有時候和自己談話，

心裏却害怕的要命！

……

遺憾的是，由於蘇聯未曾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葉甫圖申科未能淋漓盡致地寫出留學生在海外對於共產黨「秋後算帳」手段的恐懼。

那位湖南工程師的太太並不是知識婦女，目前在一家西班牙人開的車衣廠裏做苦工。她看到「光榮榜」後亦不安地說：「這些人真膽大，將來回國有危險咧！……」認真想了一下，又說：「其實他們也沒說什麼，可是回去就麻煩了！」

這就是問題的所在！只要你發出未能「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聲音，你就不能不感到恐懼！

來到美國後，最令我稱羨的，不是物質生活的富足，而是這裏的人民享有免受恐懼的自由！他們可以介入政治活動而不必擔心有殺頭、流血之虞，更不必擔心進而株連父母妻小乃至七大姑、八大姨！

我不是勇敢者。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發言人的不祥之音——「我們不贊成採取這種公開信的辦法。」（見同日「中報」頭版頭條新聞）！便足令我閉戶裹足了。

恐懼！……

面對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光榮榜」，我不禁流下了羞慚之淚，我愧為炎黃子孫！

李服令和李跟黨的故事

(中國大陸留學生·加拿大) 尚昆

這兩兄弟都姓李，家住上黨郡。由于中國幾千年來是家長制的封建社會，是軍事型的社會，不管誰是皇帝，不管誰是司令官，最重要的就是服從皇上、服從司令官。于是李大伯把兩個兒子的名字起做「服令」和「跟黨」。

當時是清末，大哥李服令參加了清兵。當時又有革命黨造反，抓住就殺頭。李服令親手殺過幾個革命黨。殺頭是很殘忍的事，李服令起初也很害怕，也不知這些革命黨到底在搞什麼，但作為中國人，最要緊是服上，造反是最要不得的。李服令是個好兵，上面的命令一定服從，很快就習以為常了。但天不佑皇上，很快孫中山的革命黨就得勢了，李服令跟着長官，糊裏糊塗地編入了革命軍。當時軍閥作亂，李服令作戰很勇敢，雖然他不知道軍閥在幹什麼，總之是革命軍司令的指揮他就服從。很快就升了做排長。李服令武運不濟，在征戰中病了一場，暫時離開軍隊。當他養好病時，他所屬的部隊也不知去向。

當時內戰時期，李服令觀察了一下形勢，是中央軍勢大，于是他加入了中央軍。對於那些造反的共產黨李服令手下無情，照殺無誤，竟官升至團長。後來不知怎樣，共產黨越打越多，李部的中央軍被包圍，最後司令官起義。李服令加入了解放軍。此時，大軍南下，李服

令在追擊國民黨敵軍時，屢立戰功。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李服令已經榮升師長。

在一次會議中，李服令竟與小弟李跟黨相逢，李跟黨當時是中央委員。兄弟相對痛哭述舊，父親早已亡故，喜親兄弟倆都做了人上人。

李跟黨個性和李服令略有不同。李跟黨讀書時受同學影響加入了共產黨，當時毛澤東不很服上，李跟黨緊跟當時黨內最高領導，狠狠批判毛澤東的反黨思想。但毛澤東吉人天相，很快爬到了主席的高位。雖然李跟黨過去反對過毛，但現在毛是黨內地位最高的人了。李跟黨就堅決跟毛走。經歷次運動，李跟黨為人正派，在文革初期，很不習慣這麼多共產黨幹部被打成反革命。但李跟黨是好黨員，堅決跟黨走，也不遺餘力地支持林彪、江青，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後來李跟黨竟官升中央委員。

毛去世後，四人幫被抓起來，李跟黨一時間迷失了方向，他自言自語道：「偉大領袖的老婆也被抓起來了。跟黨走，到底跟誰走呢？」收音機播出一「英明領袖華主席」……對，李跟黨心裏一下子有了着落。誰是黨的當權人，就跟誰走。世事多變化，華國鋒掌權不穩，一個跟斗跌了下去，代之升起的新領袖是鄧小平，李跟黨永遠跟黨走，他馬上一心一意支持

鄧小平。因為誰在共產黨的位置最上層，誰就代表黨。居上者就代表黨，來自上黨郡的李跟黨深明這個大義。李服令和李跟黨這兩兄弟都沒辜負父親的期望，繼承着中國人的「優良」傳統。

最近，兄弟倆在北京開會之餘相會。李服

令對李跟黨說：「近來學生鬧事，真是反了。」李跟黨說：「主要是那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作亂，這個人企圖擺脫黨的領導，企圖反黨。」李服令說：「據說方深得人心。怪不得有這麼多學生擁護他。」李跟黨答：「總之反黨就是不對。」李跟黨的女兒，北大政治系的學生李向真插口說：「什麼叫反黨？」「什麼又叫跟黨走？我研究中國共產黨史，自黨誕生以來，不同的領導人就有不同的方向，張國燾、毛主席、江青、劉少奇、鄧小平……都互相矛盾，毛主席親自發動文革，鄧小平反文革。跟黨走，到底跟誰走?! 跟黨走?! 這太抽象了。」李服令說：「小真，少和你父親鬥嘴，你父親近來身體不好。」李跟黨心疼地望着女兒說：「讓她說好了，這就是兩代人之間的鴻溝。」這時，李服令的兒子，一個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李主見走過來插嘴：「向真說得對！不管東西南北地盲目跟黨走，是千百年來忠君思想的翻版，過去中國人最重要是服從皇上，現在解放後中國人最強調是跟黨走，結果跟出一個大躍進，後又跟出個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們盲目地跟下去，很可能跟出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們中國人什麼時候才能真正翻身？就是這種奴性，使中國遲遲未能趕上世界的進步。」李服令愕然，說：「我從來未像你這樣和我父親講話，真是不分長輩幼輩！」李跟黨笑勸說：「哥，別跟娃兒們一般見識，我先走了，改日再登門拜訪。」

(國內) 尹小明

「朦朧詩」運動評述

這是一次詩與文學的奇觀——說它是奇觀，因為它打破了中國當代文壇、詩壇數十年來缺少藝術流派、缺少真正的藝術創新與理論爭鳴的寂靜，以自己詩的語言，宣告了中國詩歌發展史的一個嶄新階段。

說它是奇觀，因為它竟引起詩壇、文壇如此巨大的震顛。而這由歡呼和詛咒、吶喊和圍攻、喝彩和嘆息雜揉而成的震顛，又綿延如此之長，波及如此之廣——從七十年代的傍晚，一直到這八十年代的正午；不僅詩歌界，整個文學藝術界、乃至超出文藝界的許多人，海外異邦的許多雙眼睛，都向它投以熱切的關注。

說它是奇觀，因為它不同於突呈異彩的地光或如幻如夢的虹霓，一瞬之間就消逝得無影無踪，只留給人們以記憶與感懷。它以自己似乎是不可思議，事實上却又完全合乎情理的內在規律性，頑強地存在着、發展着。

不管中國文壇是晴是晦，是風是雨，它像一幅正在創造過程中的長卷壁畫，在雨雪風霜的不同筆觸與不同氛圍之中，不斷展示出一幅幅不同的畫面，把自己完整的容貌逐漸呈現給歷史，呈現給詩歌藝術的現代畫廊。

就對故有藝術情性的衝擊與對我們民族新的藝術審美觀的發掘說來，這一新詩潮的貢獻，明顯地超過了近年來小說、戲劇、電影、音樂、舞蹈、雕塑等等文學與藝術形式的創新。本文試圖對這一「奇觀」的發生、構成、

以及發展的基本情況作一個粗綫條的勾劃，旨在當這一新詩潮即將成為我們詩歌傳統的一部分，而猶未失去其本身藝術活力的時候，讓我們當今與今後的藝術拓新留下更多一些經驗與啓迪。以下我準備以回顧性描述為主，而不過多地作理論上的闡述。但當讀者跟隨本文

重新瀏覽了如上之奇觀發生、發展的基本過程之後，也許已經得到了一種理論的昇華，而且這理論就根植於具體的現實之中。

(一) 潛流

雖然我們所論及的「朦朧詩」是在一九七九年以後開始發生影響的，但它作為一顆藝術種子，却是萌生在七十年代初期。一批思想與藝術感覺比常人敏銳，而其經歷與感觸相對其年齡又過於豐富的年輕人：北島、芒克、舒婷、江河、顧城等等，在當時「文革」動亂的年代裡，就在互不相知地默默寫着一種——彼此間相近似，却與當時流行的「大批判」與「大頌揚」的詩歌迥然相異的詩。他們中年長的剛剛夠得上青年的稱呼，但大多不到二十歲；而可以稱為他們中小弟弟的顧城，當時只有十二、三歲，還未走完他少年的路程。

下面就是他們當時的幾首習作：

「我走向雨霧中」。作者，北島。寫於一九七二年的北京。

褪色了，烏雲，
白濛濛，雨星。

藍色的斜綫，
抽打着灰暗的樹林，
彷彿在抽打一千枝手杖，
抽打一千顆老人的心。
——心呵，何處是家
何處是你的屋頂？

(共四節，錄第一節)

把灰暗的樹林寫成「一千枝手杖」，這在當時的「詩」中是無法見得到的一個「直覺意象」；而「抽打一千顆老人的心」，則是這一直覺意象的轉換深化，從而把具體與抽象、有

形與無形巧妙地疊印在一起。「心呵，何處是家／何處是你的屋頂」——按照客觀常規，心是無所謂「家」的，更談不到有自己的「屋頂」，詩人顯然把作為人體器官的心象徵化了。從這首詩中，我們當然能夠把握到詩人當時獨特的沉思者的情懷，但是作為詩的藝術品，它更能引起我們興趣的却是其與當時風行的詩不同的審美感受方式，以及因這種審美感受方式所帶來的真正藝術滲透入。（儘管這首詩尚帶有某種初試者的痕迹。）

「致大海」。這是一位南方姑娘一九七三年在蓉國海濱唱出的歌聲。作者，舒婷。

大海的日出

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讚嘆；

大海的夕陽

招惹多少詩人溫柔的懷想

多少支在峭壁上唱出的歌兒，

還由海風日夜

日夜地呢喃；

多少行在沙灘上留下的足跡，

多少次向天邊揚起的風帆，

都被海濤秘密、

秘密地埋葬。

……

……

……

……

……

……

……

……

……

……

……

向天邊的風帆。
——傍晚冷清的海岸。冷清嚴峻的巉岩。孤寂的身影在海岸徘徊，但驕傲的心靈却在夜闌跳動。

舒婷以她細膩和溫情的筆觸，把變換的大海和動蕩的生活融為一個整一的象徵性意象組合；她站在這大海、生活與詩歌三位一體的世界的門前，張開纖弱却是深情的手，把你迎向神奇的詩的天國，撫慰着你心靈的創傷。這樣的藝術氣息，無疑也是對當時詩風的大膽挑戰。其恬淡與靜謐，倒顯示出與謝冰心、戴望舒、何其芳等五四至三、四十年代某些詩人們的風格相近似。

「生命幻想曲」。作者，顧城。這是他隨其父親「下放」到山東農村——一處荒涼的鹽碱灘時吟成的作品。

把我的幻影和夢，
放在狹長的貝殼裡
柳枝編成的船篷
還旋繞着夏蟬的長鳴
拉緊桅繩
風，吹起晨霧的帆
我開船了

沒有目的
在藍天中蕩漾
讓陽光的瀑布
洗黑我的皮膚
太陽是我的繆夫
它拉着我
用強光的繩索

（全詩共十小節）

這裡，是一個現實之中無法看得到的世界：幻影和夢躺在狹長的貝殼裡。已經被編織成船篷的柳枝，仍旋繞着夏蟬的長鳴。船帆是一抹晨霧。陽光是直瀉的瀑布，洗黑詩人的皮膚。太陽又是繆夫，用強光的繩索拉着詩人行走着……這首詩，以自己簡煉的語言，新奇的意象，超出常規邏輯關係的總體結構方式，創造出了一個鮮明、清晰，而又縹繞着夢幻般神奇色彩的詩的宇宙。在我國前人那裡，很難尋覓到它的影子，它更接近於法國重要詩人、象徵主義的集大成者瓦雷里所終生企求着的「純詩」的境界。

在當時，這些新形式的初創者還不具備很深的藝術功力，詩藝上的某些追求也很難說是完全自覺的。這些作品，只是他們心靈意緒的一種直觀化。然而，這樣不同年齡、不同經歷、發生於不同地點的新嘗試，恰恰在預示：中國當代社會的特定境遇與特定社會心理，已經孕育了一種潛在着的詩歌樣式；而一旦這潛在着的涓涓細流與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詩歌與外國現代詩歌這些人類詩歌藝術之潮連接上源頭，則勢必在中國當代詩壇構成巨大的藝術落差，產生出能喚醒一代人、乃至一個時代審美知覺的隆隆轟鳴……

當然，正如一條小溪要匯向江河大海必須穿山越谷，經過許多荒野大漠一樣，藝術潛流的孕育、發展與構成，也需要在時間與空間上必要的擴延。在中國的七十年代初端，這些詩是根本不可能公開發表、自由流傳的，它們除了在少數朋友之間傳閱一下之外，並不為更多的人們所知。在當時的詩壇上，它們的確是不見任何踪跡的潛流。

(二)「解凍」與「不滿」的一代

「思想解放運動」的驚雷，不但劈開了凍結着人們思想的極左思潮的冰川，而且它隨之帶來的思考與探索的春雨，也使中國幾近荒絕的文苑詩壇泛出了新綠。

在一定時代的藝術舞台上，年輕一代的藝術家、詩人們是否具有一種與他們的長輩們有所不同的藝術主張與美學追求，是否隱蘊着一種反抗傳統的巨大潛能，從來是考察一定時代、一定民族的文壇藝苑是否有較大造就，會否在數年之中突呈異彩——為文學藝術的輝煌歷史再翻開新的一頁——的重要判斷標準。自從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詩壇的一大特點，就是青年詩人們開始越來越不安分守己。他們意識到，對他們來說，父輩詩人們在五、六十年代、乃至「文革」之中所選擇的那條詩歌之路，是走不通的，他們試圖為自己開闢一條新路。這樣，他們不僅表現出對周圍諸多現象的「不滿」（詳見駱耕野「不滿」一詩；此詩曾獲全國詩歌創作獎），而且對那些試圖幫助、引導他們的中、老詩人們頗有微詞。在一個全國性的當代詩歌討論會上，當一位老詩人又一次表示「引導」之意時，青年詩人曲有源竟直言回敬道：「現在還不知道該誰引導誰呢！」

思想的「解凍」對於這一代人的影響，其意義是難以估量的，而這一代人新的思想意識對於中國詩歌與整個文學藝術「復興」之影響，其意義同樣也是不可估量的。它使得冰滴化作清新的思想，使得這清新的思想能夠反映在報紙、刊物、書本上，在人們的精神領域暢然流蕩、交匯。同樣，它也使得以前那些「手抄本」能有機會公開發表，或以某種「半公開」

的方式在青年中傳閱、品評、滲透，使潛在的藝術力量得以實現。

正是在這七十年代末，這批詩歌新潮的先驅者們的作品進入了一個演練的階段：他們以自己創編的油印刊物「今天」為園地，集中發表了數量較為可觀的詩歌作品。北島、芒克、江河、舒婷、楊煉、顧城諸人的作品都曾先後在這個刊物上發表。儘管該刊物並非公開出版，但在幾個大城市的高等院校與青年工人中却是很有影響的。「今天」上的詩歌，水平並不一致，不少尚處於初試階段，但它們在美學風格上却構成了一種整體感，一種新的詩歌氣息，這種總體性的詩歌氣息對當時青年一代的詩歌趣味的影響是巨大的。一九七九年，北島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樹」、「這也是一切」、「祖國呵，我親愛的祖國」等等作品，開始出現在當時全國唯一的詩歌刊物「詩刊」上。詩歌界逐漸對他們的創作引起注意。

在這前後，諸多高等院校的文學社、詩社，也自辦起一批刊物，如北大的「未名湖」、人大的「林園」、北師大的「初航」、吉大的「赤子心」、武大的「珞珈山」、西北大學的「希望」，等等（幾乎每所高校都有這樣的刊物），這批大學生刊物上發表的詩歌，也都表現出與六、七十年代社會上流行的詩歌頗不相同的風貌。而經過相互間的影響、滲透，其美學傾向，開始日益向「今天」上的作品靠攏。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吉林大學的「赤子心」詩刊，這個刊物上發表過的詩歌，初期尚未從傳統詩風中全然脫胎出來，而後期，該刊的主要作者：徐敬亞、呂貴品、王小妮等人，却逐漸成為構成本文所評述的這股新詩潮的詩人，並以其標新立異的創新在全國產生影響。

——歷史將誠實地記住那些不無稚氣，却

充滿生機的自辦刊物；記住那些每天被無數創新的慾念與靈感侵擾得無法安寧、甚至睡夢中還在作詩的詩壇開拓者們；記住我們民族的詩的這樣一個嶄新的年代。

(三)一種新的詩歌觀念

詩是什麼？這是一個數千年來眾說紛紜、爭論不休的問題。對於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反映了種種不同的詩歌觀；而不同的詩歌觀，又由面貌各異的詩歌作品簇擁在它的周圍。一個真正的詩人，他也許不採用邏輯嚴謹、文字簡約、表述有序的語言把他的詩歌觀念抽象出來，但他却不可能胸中毫無關於詩的一定觀念。

十分明顯，構成文壇上某種奇觀的這股新詩潮，是作為對於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十年這段時期中詩的一種反撥而出現的。從五十年代末開始，流行的詩歌觀是一種非詩的詩歌觀，即詩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本身獨立性的減弱，乃至逐漸消失，除了其特有的分行、押韻、詞彩上的修飾之外，幾乎等同於宣傳口號。這就使得詩歌直接依附於社論、講話、文件、政策等等非藝術的東西而存在，為宣傳、教化、配合運動而存在。詩是什麼？詩是政治運動的號角，是階級鬥爭的刀劍與炸彈，是掃除牛鬼蛇神的鐵掃帚。於是一次運動，一大批詩，運動逐漸被否定，詩也隨即變得一文不值。實質上，這種「詩歌觀」是取消詩歌的詩歌觀，它把詩歌存在的根據從詩歌自身外化到其他客體上去，這樣，詩就不是因為本身的屬性而存在，而是因為那一客體的屬性才存在；它不是目的，只是一種手段、一種工具，而它作為一種藝術的本質規定性已經不復存在了。由於它存在

的根據是在別的對象上，那麼這種對象一旦被否定，一旦不復存在，所謂的「詩」，當然也就無所依附，也就失去存在的可能與必要了。這樣一種「詩歌觀」，顯然不是一般的偏差或失誤，而是詩的一種滅頂之災——十年浩劫之後，中國詩壇的滿目凋敝，就是這種詩歌觀最終的現身說法。

作為親眼目睹了這種慘境的詩壇後來者，新詩潮的詩人們創作詩的最基本宗旨就是：「詩首先是詩。詩作為直接的政治宣傳品的厄運早該結束了！」（楊煉）他們呼籲：「詩人，請帶上自己的心！」「詩是詩人心靈的歷史」（芒克）；他們認為：「詩沒有疆界，它可以超越時間、空間和自我；然而，詩必須從自我開始」（北島）。由於有本體論作為詩歌觀的基礎，把詩作為目的本身，隨着探索的不斷深入，他們的詩歌觀也在日臻成熟和完善。

「一滴微笑的雨水，也能包容一切，淨化一切。在雨滴中閃現的世界，比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更純，更美。」「萬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夢。每個夢，都是一個世界。……我也有我的夢，遙遠而清晰，它不僅僅是一個世界，它是高於世界的天國。」——這是顧城以詩的感受與語言對自己詩歌觀的表述。

「詩人應該通過作品建立一個自己的世界，這是一個真誠而獨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義和人性的世界。」——這是北島宣言式的凝煉、簡約的表述。

「繼承一種經過無數生命過濾的語言，並創造一個與這世界最隱秘的因果關係相連的超現實世界：一首詩，一個俯瞰平庸萬物的奇跡！」「詩介乎於聲音和寂靜之間，成爲一種穿透感官的神奇現象：既清晰又飄渺，既具體又抽象。……你的，他的，整個生命與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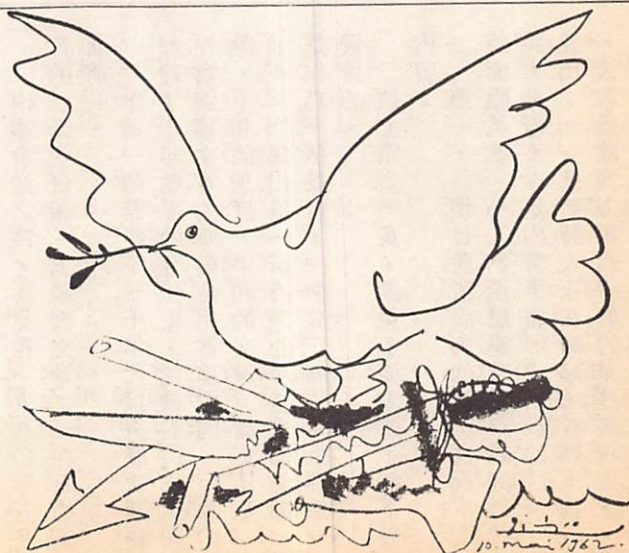
構成媒介性的語言。——這是楊煉顯得經過了深思熟慮的論述，顯示着他詩人兼詩論家的睿智與文彩。

他們的感受方式與表述方式各不相同，但却有本質上相通的一點，這就是，他們都認爲：詩是一個由詩人創造出來的、超於現實之上的獨特世界。創造這個世界，就是詩的目的本身；詩並不依賴於某種外在因素才能成立。這個世界，由詩人的情感意緒規定一切法規，因此，它不受客觀時空觀念與語言邏輯關係的限定制約。

但這個由詩人創造出的美與藝術的世界，又絕不僅僅屬於詩人自我，它超越自然，超越時空，也超越自我。「歷史、命運、變幻的心靈在這個宏偉而精緻的『框架』中，靜靜地呈現出自己的形象」；「每一首詩都成爲對人類感受和表達能力的一次發掘。每首詩都涉及無限。」（楊煉）

由於有這種以語言爲媒介、構成一個情感表象世界的總體詩歌觀，由於他們詩的世界是一個超時空、超自然、超現實、超自我的世界，因此，這些詩人們詩的感受方式本身就是「超感」的——亦即超乎一般感覺與知覺常規的。它們具體表現如下：

在詩歌的最基本單位「意象」的構成上，可以看到通感、交感、直覺——「錯覺」、「幻覺」等感受方式的自如運用，可以看到抽象概念與潛意識穿上了奇特的具象化的外衣；在意象之間的連接、組合上，超越現實生活中的常規因果鏈條與思維的邏輯關係法則，依據意象的形、聲、色、味等等外觀因素，使表面上看來並無任何關聯的意象與意象群之間建立同態對應，依此規律，使意象自由流動、轉換、烘托、印證。



春的使者 畢加索作

在詩的總體營造與結構上，既注重總體構思的象徵性，又廣泛運用中國詩學「興在有意無意之間」的結構方法，並自如穿插跳躍、省略、「蒙太奇」式的自由聯接、感受角度的突然改變、多重意識交替介入等方法，以打破一般思維秩序的網絡，增加一首詩的空間感、張力感與內涵量。

以上特點，只是對這些青年詩人整個創作特徵的一個簡略概括，而具體作品與這樣對總體觀念的概述相比，總要豐富、生動得多。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就不再作更具體的分析與說明了。

以上所述的這樣一種詩歌觀，這樣一系列

全新的詩歌構成形態與表現方法，它們之出現於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交，對於剛剛從「文革」浩劫的瓦礫中走出來的中國詩壇，將會造成怎樣的衝擊，與這種衝擊一同而來的阻力又將是多麼巨大——這是不難想像的。

(四) 最初的交鋒與交鋒前的寧靜

衝擊並沒有即刻就在詩壇顯示出來。當「詩刊」發表了兩三首這樣的小詩，詩歌界並未對它們予以很大注意。而那些自辦的油印刊物，也只限於在文學青年中傳閱，同樣尚未形成巨大的衝擊波。

當時特定的社會心理與讀者們長期以來形成的特定的詩歌興趣，決定了新的藝術原則與藝術形式的形成必須經歷一個潛移默化的啓蒙過程。因為對一定美學觀念與藝術形式的適應與把握，是鑒賞者心理上逐漸積淀藝術經驗的結果。只有經歷了這樣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新的藝術形式對廣大已經習慣了以往藝術形式的讀者說來，才不再是一座看不見的門窗，無法進入的城堡，才會呈現為一座新奇美妙，令人留連的宮殿。

讀者們當時所習慣、並所期待着的，是「將軍，你不能這樣做」、「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等等具有巨大社會影響，能引起各個階層的人們普遍關注的詩。這無論從當時的哲學思潮（真理的實踐標準對兩個凡是之否定）、社會心理（反官僚主義與不正之風）、還是從上述提到的詩歌欣賞習慣來看，都是情理之中的，是極為正常的。

人們期待着——期待着這種振臂一呼，衆聲鼎沸，猶如海嘯山崩的政治抒情詩再次出現。但是意味深長的是，人們所期待着的這種詩

歌，却始終沒再出現。同樣惹人思索的是，對於這種情況，大多數讀者並未感到很大的失望。在這段難得的平靜之中，詩歌最主要的讀者：青年一代讀者們——這經受了十年動亂，因而迫切渴求真善美，渴求心靈的溝通，渴望呼吸新鮮的思想與藝術空氣的一代人，已經與本文所評述的這些他們同代人的作品——這些追求真善美，閃爍着人性美、人情味、人道主義思想火花，而致力於藝術創新的作品產生了審美共鳴。上述詩人們的創作，則又與興發於同一塊土壤，因而彼此間相通、相近的其他青年詩人們的創作影響、滲透，於是聲勢日趨見盛，作品日趨見多，影響也日趨見大。一批感知敏銳，能與這一代青年詩人心靈相通的編輯們，通過「新星」、「新人新作」、「詩壇新一代」、「青春詩會」等等新穎別緻，而又順理成章的專欄、專輯，使這些作品紛紛呈現於「詩刊」、「星星」、「上海文學」、「福建文學」、「文匯月刊」、「春風」、「長江文藝」、「人民文學」、「萌芽」、「青春」、「芒種」、「四川文學」、「長春」、「醜小鴨」……等等諸多具有全國影響的詩歌與文學刊物上。這樣，也就使得更為廣泛的、各個層次的讀者能普遍注意到這些或稱之為「新星」、或稱之為「怪客」的詩壇新人們。

短暫的寧靜彷彿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於是在詩壇的地平線上永遠消失了。

首先到來的是尚未訴諸筆墨的舌戰。在一九八〇年春天的南寧詩歌發展問題討論會上，圍繞青年詩人的創新問題，展開了頗為熱烈的討論。一部分與會者贊同這種探索與創新，認為這發生於中國當代詩壇是難能可貴的，應予支持、扶植；另一部分與會者則認為這些創新的方向問題值得注意，因為他們（指這批青年

詩人）有脫離傳統，脫離現實主義軌道的跡象，必須予以引導，予以批評與幫助；第三者則是較為公允的中間派，他們的主張予以創新者們一定的寬讓與自由，同時也要幫助他們注意自身的偏差。這場討論由於缺少必要的理論準備，進展並不能說十分深入，其氣氛與後來的北京會議、昆明會議等相比，也還沒達到後者近於「白熱化」的程度。但它却是近年來圍繞這股新詩潮熱烈、持久爭鳴的一個序曲；既然序曲已經鳴奏，那麼它所引出的各個樂章，當然也就依次在詩壇上空迴響了。

(五) 「在新的崛起面前」——

謝冕的敏銳感知與平和態度

南寧會議之後，謝冕在一九八〇年五月七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

作為一個經歷了五十年代以來歷次運動、歷經了十年動亂的評論家，能夠看得出，謝冕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相當謹慎的，平和的觀點，平和的態度，平和的文風。謝冕不是，也並不試圖擺出這一新詩潮的理論家的姿態，他是作為一個長者，一個公正的詩歌批評家身份發言的。

該文章並不長。謝冕主要表述了如下幾個內容：

第一，詩壇目前所面對的實際情況——新詩面臨挑戰。「人們由鄙棄幫腔調的偽善的詩，進而不滿足內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詩。」他提出：「一批新詩人正在崛起，他們不拘一格，大膽吸收西方現代詩歌的某些表現方法，寫出了一些『古怪』的詩篇。」「他們是新的探索者。這情況之所以讓人興奮，因為在某些方

面它的氣氛與五四當年的氣氛酷似。」

繼之，謝冕在文章中從考察歷史的角度回顧了五四以來，中國新詩走過的歷程。他指出這樣一種事實：即六十年來，我們新詩的道路越走越窄。他認為，「這是受我們對於新詩發展道路的片面主張支配的。片面強調民族化群眾化的結果，帶來了文化借鑒上的排外傾向。」針對這些情況，該文集中論述了對於「傳統」的看法——「傳統不是散着霉氣的古董，傳統在活潑潑地發展着。」並通過郭沫若、艾青成功的例子，說明外國詩歌的影響加入我們的詩歌中之後，也屬於中國詩歌傳統的一部分了。

最後，謝冕在文中呼籲批評界接受以往多次對作家作品「採取行動」的教訓——「我們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訓（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實），我們又有太多把不同風格、不同流派、不同創作方法的詩歌視為異端、判為毒草而把它們斬盡殺絕的教訓。」（遺憾的是，這樣的教訓不久又被重複）在文章的結尾處，謝冕又一次強調：「當前的詩歌形勢是非常合理的。鑒於歷史的教訓，適當容忍和寬容，我以為是有助於新詩的發展的。」顯然，謝冕在此文中沒有、也並不試圖闡述多麼深刻的文學藝術理論（這些在他以後的幾篇文章：「失去了平靜之後」、「通向成熟的道路」、「中國最年輕的聲音」等等有進一步深入的闡述），他所談及的，大部分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他只不過以一個詩歌評論家的感知與良知告訴人們：詩壇新人們的崛起是一件好事，應當愛護、支持他們；同時提醒人們不要走過去「大批判」的老路。至於這篇真正經、地地道道的文學評論，後來是怎樣「加入」精神污染之列而被「清除」一番，這個特定

的時代之謎，將不是這裡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

總之，作為一名大學教授，作為一般人們心目中的所謂「學院派」的一員，謝冕對於新詩潮的這種敏銳感知與贊助態度確是難能可貴的，他所留給詩壇的，是自五十年代以來批評家們所鮮有的形象。而這篇文章本身，也標示着一批注重藝術本身特徵與發展規律的批評家正在形成。

（六）「青春詩會」與詩壇大論戰

與謝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發表的時問相交又，「福建文學」（即當時的「福建文藝」）從一九八〇年第二期開始，陸續發表文章，集中討論這一詩潮中引人注意的代表之一，閩籍女詩人舒婷的作品。全國先後有數十人（包括詩人、批評家與詩歌讀者）參加這一討論，涉及到詩歌的「自我」問題，民族化與外來影響的關係問題，詩的本質構成特徵問題，等等。討論雖以舒婷的作品為議題，但是涉及到了一系列與這種新的創作潮流有關的理論問題。這次討論進行了將近一年。

在這段時間裡，越來越多的新人新作不斷湧現詩壇。到了同年十月，「詩刊」以一整期的版面，刊出「青春詩會」，發表了十七位青年詩人的五十二首詩歌，使這批青年詩人的影響達到了一個空前的、為整個社會所側目的程度。（「青春詩會」的詩人與作品，層次並不盡一致，但是作為「這一代人」的詩，却顯示出特有的陣容與整體感。而其中的舒婷、江河、顧城、王小妮、徐敬亞、梁小斌等等，則是這一新詩潮的代表性詩人，其他大多也是贊助者或同路人。）

大批青年詩人的湧現，尤其是「青春詩會」這樣引人注意的形式，無疑對一些中老年詩人們構成某種衝擊，詩壇熱鬧的程度驟然增加了。不少人以顧城等在這一期刊發表的「感覺」、「泡影」、「雨打」、「弧綫」等小詩為例，以尖銳、激烈的措詞指責這些作品「晦澀」、「朦朧」、「不知所云」、「脫離群眾」、「脫離時代」、「奇詭怪誕到使人無法理解」。而贊同聲援的一派聲勢也在增加，隊伍益見擴大。言辭也逐漸激烈起來。其重要標示，就是同年九月二十日到九月二十七日的北京詩歌理論討論會，以及會後由「詩刊」一九八〇年第十二期發表的討論文章。（該期共發表了十三篇文章，支持者與反對者的比例是八比五。）繼之的還有昆明會議。到此時，「冷戰」已變為公開的論戰；心平氣和或旁敲側擊都已顯得與整體氣氛不和諧；中間派迅速分化——「第三條道路」已經無法再走下去了。但即使這樣，到此時為止，這場熱烈的爭鳴，還只是一次正常的藝術與學術上的論爭。

為了進一步探索討論中提出的一系列美學與藝術理論問題，「詩刊」約福建的批評家孫紹展再寫一篇分析更深入一些、理論色彩更強一些的文章（——作為這一新詩潮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孫在此之前已經發表了多篇文章）。這就是後來被稱作「第二個崛起」的那篇文章的起因。

「前因」雖然簡單，「後果」却要複雜得多。這一點，孫紹展與謝冕一樣，在動筆寫文章的時候是預想不到的。

（七）「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

孫紹展的大膽標新與意想不到的複雜局面

一九八一年，「詩刊」在三月號發表了孫紹振的文章「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據該作者自己說，此文發表之前，他已經正式通知「詩刊」：不再同意發表本文，要求予以收回（這是任何一個作者應有的權利），原因是該刊為文章加了非同一般的「編者按」（「詩刊」「編者按」概述了孫文之中的主要觀點，之後指出：「當前正強調文學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以及堅持馬克思主義學原則方向時，這篇文章却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等等背景。但據說「已經來不及了」。

孫紹振到底在文章中寫了些什麼？還是讓我們回憶一下這「第二個崛起」的實際內容吧。

可以看出，孫紹振是試圖對他的大學同窗——謝冕的那篇文章中提出的問題作進一步的理論闡述，他認為：「謝冕同志把這股年輕人的詩潮稱之為『新的崛起』，是富有歷史感、表現出戰略眼光的」。接着他提出自己的看法：「與其說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說是一種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孫紹振並沒有對這種美學原則作一個集中和簡約的概括和定義，但他通過引證與分析這批青年詩人們自己的詩歌主張，表述了這樣的內容：這批青年詩人們開始從本質上是非我的「社會的我」，回歸於真正意義上的「自我」——自覺的我（包含有社會性），這具體表現在：「他們不屑於做時代精神的號筒，也不屑表現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豐功偉績。」「不是直接地讚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靈中的秘密。」該文章引用青年詩人徐敬亞的話：「詩人應該有哲學家的思考和探險家的膽量」，並隨即指出：「這倒是我國當前的一種現實，迷信走向了反面，培養了那麼多的哲學頭腦，閃爍着理性的光輝。」以下

，他集中論述了人的覺醒、人的價值問題；藝術創新與傳統的關係問題；並論述了創新必然會遇到的阻力，以及從前人那裡合理地汲取養料對創新的必要性、重要性。這篇文章，除啓始「緒論」性的兩小節分段獨立而外，其餘數千字一氣呵成，不分段落，讀着它，令人不難想像出孫紹振作為一個雄辯家侃侃而談的形象。

孫紹振將這股新詩潮稱為「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無疑是十分有見地的。因為任何藝術創新的實質，都是一定美學原則、美學觀念上的突破。再優秀、完美的藝術形式只能在其特定的美學結構之中達到優秀與完美，而要繼續向前發展下去，就只有打破這種原則與結構，建立新的美學結構。若非如此，所謂藝術創新只能是「驢拉磨」式的原地徘徊，絕不可能構成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創新。該文接下來所闡述的人的價值問題、創新規律問題，也都頗有標新之意，即使今天讀起來也是饒有餘味的。但文章却明顯缺乏藝術的分析——缺乏從美學高度對這些青年詩人的作品與藝術主張予以分析、總結、概括，儘管他的文章的題目是關於美學原則的崛起；文章談哲學理論、社會學理論多於談詩學與藝術哲學的理論，儘管作者贊同青年詩人們提出美學與社會學不一致、而注重藝術目的本身的觀點（哲學、社會學與美學有關，但畢竟屬於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問題）。作者後來自己談到，因為是約稿，他的這篇文章是催促寫成的，某些方面考慮得尚不十分成熟、周密。總之，孫紹振的這篇「崛起」，帶有鮮明的思想解放運動以來「反思哲學」的色彩，這種反思哲學，恰是以發現人、注重人、重新審理人性、人的價值、人道主義等問題為重要標誌的。

從人性、人的價值、自我表現、人道主義等等在當時本身就十分敏感的問題出發，分析、闡述詩歌藝術之中的「新的美學原則」，這在一九八一年初的中國文壇，顯然是一種大膽的標新立異，加上「詩刊」的「編者按」等諸原因，孫紹振的這篇文章一發表，就使他原已生於心中的志忑馬上兌現為現實中的軒然大波。「詩刊」自從發表該文之後，在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等期連續發表了程代熙「評『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敏澤「關於繼承與創新」、涪涪「讀『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宋壘「追求什麼樣的心靈美」、李淮「理論討論要注意概念的科學性和明確性」等一系列辯難文章；「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程代熙的反駁文章，並在同版右下角摘錄了孫紹振文章的主要論點。到此時，文壇之「奇觀」已不在其他領域引起共震；「詩刊」的討論已不再是單純的學術爭鳴。

於是，討論由北向南轉移了，這就是上海「文匯報」在一九八一年五月至六月的爭鳴。

（八）圍繞艾青文章的論爭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二日，上海「文匯報」「文藝百家」專版發表了中國當時詩壇上最有影響的老詩人之一：艾青的文章，題為「從『朦朧詩』談起」。

對於艾青的發言，爭鳴的雙方都曾抱有各自的希望，爭鳴正式展開以來，艾青曾一度保持緘默，而這更增加了雙方各自的擔心與期待。但艾青先生的這篇文章，却使新詩潮的青年詩人與贊助新詩潮的批評家、讀者們完全徹底地失望了。艾青先生究竟發表了什麼見解？文章啓始，老詩人還努力使自己的情感與

語言平靜——「朦朧詩」作為一種文學現象，不足為奇，反對它也沒有用。奇就奇在有些人吹捧「朦朧詩」。但接下來，他却顯得不夠冷靜、不夠「大家風度」了：「香也朦朧，臭也朦朧，如在五里霧中」；「胡思亂想、苦思冥想、奇思怪想，把不能聯繫的東西扯到一起」；「以殘缺不全為美，畸形的、怪胎、毛孩子；像是在開化裝舞會，出現了許多蒙面人」。如果說以上句子儘管措詞尖刻、激烈，但仍是不同審美價值標準，不同藝術創作原則之間的辯難的話，那麼如下文字——「至於編者發表難懂的話，是為了迎合一部分讀者的心理，以為難懂的話才是好詩。」這顯然已超出了「朦朧詩人」與「崛起論的評論家」，而是將其鋒芒擴大到讀者與編輯們中間；至於認為「二十歲到三十歲的一代人」，「他們對四周持敵對態度，他們否定一切、目空一切，只有肯定自己。」——「他們尋找發洩仇恨的對象」，甚至「盲目射擊，流彈傷人」——這又不僅僅是指幾個詩歌新形式的探索者，而是總括了上萬萬的整個



欣快的土地 法國女作家馬格麗特特作

一代人了。

這樣，艾青先生就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置於整個青年一代對立面的位置上。

在艾青以頗富「文彩」的語言，從正面、側面，直接、間接等不同角度與方式發表了他對新詩潮運動的全面看法之後，不少對新詩潮支持與同情態度的讀者擔心：這下沒人敢贊成「朦朧詩」了；詩壇恐怕要沉寂下來了。但這以後，「文匯報」又在同年的六月十三日、六月二十五日兩次於此欄目中發表文章，對艾青的文章展開了不同意見的爭鳴，這就是李黎的「朦朧詩」與「一代人」——兼與艾青同志商榷——與亦歌人的「所謂『懂』詩？」等文章。

李文依據美學、心理學與藝術發展的一般原理，從這一新詩潮的起源、它的美學基礎與如何對待「看不懂」的現象這三個方面，發表了與艾青文章不同的主張。這篇反駁文章認為：根據中國特定的時代風尚與審美標準，「這些詩人和他們的作品的存在和發展是完全合理的」。而艾青的文章中，却「沒有考察這一詩

歌流派產生的時代原因和美學基礎，就宣告這是『西方的惡魔侵入了中國詩壇』。在從美學的角度分析了詩人進行審美創造的普遍規律，指出了審美主體的決定作用之後，李文強調：「這種藝術創作中，詩人們『自我』的主觀決定作用，與政治上所謂『個人至上』、『個人高於一切』、『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等概念，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輕率地把它們等同起來是荒唐可笑的，也是不科學的。」

針對艾青文中論及——「有的詩，看上多少遍也不懂，只能猜。」李黎在文中指出，藝術欣賞，需要欣賞者主體心理的積極配合，而多年來，讀者已習慣於那些激情外露，不用深思，不需藝術再創造就可「懂」得的詩，因此當一種「用一幅幅具體的圖畫，暗示，烘托，象徵詩人內在的思想感情，這樣一種全新的詩歌形式突然出現於讀者面前時，一般的人在欣賞的心理知覺上，顯然是不習慣的，顯然要發生『不順口』、『不舒服』、『讀不懂』、甚至於氣惱起來的情況。」

在文章最後，這位青年評論家指出：「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為同代的讀者所理解，但是作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詩人，却不會僅僅為了投合讀者傳統的欣賞習慣，而放棄真理，放棄自己的藝術追求。」

亦歌人的文章較短，集中談了對詩歌欣賞「懂」的概念問題。他認為：「艾青提出詩要人『懂』，包含了一個不正確的理論。『懂』，一般是指理性的認識。而詩主要是用形象表達情感」。文章認為：「朦朧詩的出現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它要求作者與讀者必須掌握藝術的特殊規律，它探索用那些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的形像去表達情感，它追求美的效果……『朦朧詩』的深刻意義是不容抹殺的。」

與前一段的討論相比，「文匯報」發起的這次爭鳴，在一些基本的美學與詩歌理論方面有了明顯的深化。

爭鳴，——只要是各方完全對等的自由爭鳴，無論其發生於藝術領域，還是發生於學術領域，都不會是徒勞無用的。科學與文明的拓展，常寄希望於這樣的自由爭鳴。但若有權力意志的控制，則無法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爭鳴，更無從企及「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

(九)「崛起的詩群」——徐敬亞長篇論文的的是是非非

一九八三年初，『當代文藝思潮』雙月刊在第一期登載了徐敬亞的長文『崛起的詩群』。一位後來曾經著文反駁徐敬亞的評論家看了徐文之後說：「才華橫溢！」（這似乎更有說服力）然而，『詩群』發表時詩壇的氣氛與發表後引起的一系列波動，却使這篇文章顯得頗有些「生不逢時」。

當然，環境、氣氛、受到的「待遇」等等，這些畢竟是外在因素，它們並不會從根本上影響一篇文章的實際價值。囿于篇幅，我們在這裡不可能對這篇洋洋三萬餘言，以其急促的節奏，表述了諸多新鮮、尖銳的觀點的長文作出全面的、細致的評述。但可以肯定地說：徐敬亞的這篇『崛起的詩群』，在整個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界是不為多見的，說它是一篇有見地、有情采的好文章是絕不過分的。作者不僅才思敏捷，感受準確、細膩，而且他本人又是這詩群中的一員，因而論述從容自如，絕無許多批評文章那種因不熟悉、不了解創作的真實情況，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不得要領，不着邊際的弊端。徐敬亞在整個大學學習期間始終酷

愛詩歌，致力於詩歌創作與對當時詩歌現狀的研究。他是我們在前面提到的吉林大學『赤子心』詩刊的核心人物，又是老詩人，該校中文系系主任公木的課代表與得意門生。作者有可比較系統地思考中國新詩的現狀與它走過的歷史，並把目光投向詩壇的未來。正因為如此，他才能以流暢的行文、豐富的材料，做出理直氣壯的發言。隨便舉如下二例：

關於詩中「自我」的問題，自討論展開以來曾多次引起爭論，有些批評家仍習慣于以抽象意義上的所謂「大我」來反對「自我」概念的偏執與極端，即忽視「自我」的社會性、歷史性的一面。而徐文在論述這一問題時指出：「自我」是個人對一代人的兄弟般呼籲！是以民族中的一代人抒發對外在世界的變革慾的面目出現。這與西方現代詩歌中，那種在大生產高度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個人與社會脫節、對抗的「隱私式的自我心理」截然不同。西方詩人多是從游離于社會漩渦之外的純個人角度抒寫。而中國新詩人却是從階級（這方面較少）、民族、國家或至少「一代人」的角度來寫詩，絕大多數詩人的「自我」觀，是比較準確得當的。

又如對於這股新詩潮產生的淵源，徐文指出：它「絕不是幾個青年工人讀了幾本外國詩造成的」，文革「這樣大的社會動亂，這樣衆多的心靈扭曲，不能不形成強大的心靈沖力量，不能不在這一基礎上爆發文學革命！詩，作為人性的最親密的朋友，作為心靈與外界最直接的連通線，不能不發生轉折性的變革！正是那些「吹牛詩」、「僵死詩」、「瞞和騙的口號詩」將新詩藝術推向了不是變革就是死亡的極端！才帶來了整整一代人藝術鑒賞的徹底轉移——這是新詩自身的否定，是一次伴着

社會否定而出現的文學上的必然否定。」儘管論述顯得急促，措詞顯得激烈，但對問題的闡述却是潑辣生動、一針見血的。

當然，徐敬亞首先是一個詩人（儘管也許他的這篇長文比他的詩更有影響），詩人的思維特點是情感與形象的互為推進，頗易把對象的某些特點推向極至；詩人的語言也往往受命于激情，而不易把握精當的分寸感。在某種程度上，『詩群』一文激情勝過思辯，文彩衝淡分析，抒懷有餘而邏輯上不夠嚴密的傾向，也是頗為明顯的（這一點，與上文論及的艾青的文章相似。艾青也是一個詩人）。加之這篇長文涉及及到諸多較為複雜的問題，也不免造成某些粗漏與偏差。這正像文學藝術史上任何一篇代表創新者的宣言一樣，在總體的合理性之中，也往往包含着某些偏頗與謬誤。比如把我國五、六十年代以來的詩歌創作等同於西方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詩歌，就顯得比較牽強。因為二十世紀中、下葉的中國與十七、十九世紀的歐洲，其經濟、政治、文化等背景都是頗不相同的，而建立在這樣不同背景上的詩歌，也是有美學上的本質差異的。與此相關，把古典詩詞藝術歸結為以封建政治、道德和小生產經濟為基礎，把民歌歸結為以封建田園牧歌為特徵，這樣直接的對號入座，也顯得武斷和缺乏說服力。文藝的性質與經濟政治制度的性質並不表現為如此簡單的線性因果關係；文化的價值也並不以社會經濟、政治的狀況為轉移。

但是，即使如此，『崛起的詩群』仍然包含了總體的合理性與歷史的必然性。它宛如一艘匆促歸航的船，雖然顯得不十分穩健，但由于同歷史的風向一致，就使得這船不會在辯難的波浪中被掀翻、淹沒，歷史將寬容地張開雙手在彼岸迎接它。這正像當年黑格爾評論狂瀾

突進運動的青年先驅者們所指出的那樣：「當這種熱忱以狂歡的情緒迎接那種精神的新生的朝霞，不經過深沉的勞作，立刻就緒直接走去欣賞理念的美妙，在某一時期內陶醉于這種熱忱所激起的種種希望和遠景時，則對於這種過分的不羈的狂想，人們尚易于予以諒解。因為基本上它的核心是健全的，至于它散播出來圍繞着這核心的浮泛的雲霧，不久必會自身消逝的。」（見「小邏輯」）

(一) 低潮——極「左」思潮的反覆與影响

我們在上小節已談到『詩群』一文的一「生不逢時」。因為自一九八一年底以來，詩壇上已不再具備正常的理論探索與爭鳴的氣氛。徐文在發表之前，當時的「中宣部」就已經作好了面對「組織力量」進行反駁的準備。因而徐敬亞的這篇長文發表之後，在「當代文藝思潮」、「詩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等等報刊雜誌上先後有十餘篇文章提出反詰，但不正常的是找不到一篇支持、抑或表示同情的文章。最令人無法忘記的是：『當代文藝思潮』一九八四年第一期登載該刊邀請蔣孔陽、高爾太等五名美學家 and 文藝理論家座談當時文藝思潮的發言情況，徐文的同情與支持者、美學家高爾太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話竟被一字不剩地刪掉，却又徒留下高爾太本人名字的三個字，於是讀者在版面上看到了中外文壇上堪稱一絕的——「高爾太：（略）……」這樣「獨特」的談話發表形式！（據說這並不是編輯們的主意，而是迫于該省宣傳部門官員們的壓力）

座談會紀要尚且如此刊發，更無法設想發表成篇的聲援文章了。

與理論的論爭相比，詩歌創作蕭條得似乎要更早一些。進入一九八一年以來，這批青年詩人的作品就極少再在刊物上出現了，有的詩人則更似乎是在詩壇上消失了。各種刊物雖在二期出版，但編輯與讀者們都感到有新意的佳作寥若晨星。少數直接「配合」形勢的「詩歌」，在「文革」後已基本匿迹了三年之後，又一度出現在某些刊物上。各家詩刊與文學刊物發行量普遍下跌。北島、舒婷、顧城、楊煉等人的作品，在這段時間裡相繼被點名批判，說它們宣揚了「存在主義」、「非理性主義」等「西方資產階級思潮」。其中楊煉的『諸日朗』一詩被批判得最起勁和持久，因為據說它「宣揚色情」、有傷風化！（楊煉曾怒曰：「這是中國評論界的恥辱！」）

一九八三年底至一九八四年初的「清污」運動，使近年來詩歌創作與整個文學創作退到了最低潮，它顯示了極左路線影響的嚴重性。由于這次運動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詩歌運動或文學運動，因此，對於作為這場運動標誌的一系列大批判文章，本文將不予以提及與評述。但無論論壇爭鳴的止息，還是詩壇創作的蕭條，都並沒有構成歷史發展的一個句號，它們彷彿只是一個破折號——引出的倒是人們對於極左思潮更強烈的憎惡與更自覺的抵制與清算。

這種否定之否定的歷史辯證法，在一個發展、變革、尋求轉機的時代顯示得如此清晰！

(二) 第四次作代會與今日之詩壇

一九八四年底至一九八五年初，全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召開。由于大會的具體內容，使得本身跨越八四年與八五年的這次會議具有

了某種「辭舊迎新」的象徵意義。

此次會議上，在人們心目中實際上已經成為新詩潮理論領袖的謝冕與作為新詩潮主要代表詩人之一的舒婷當選為中國作協理事，體現了整個文學界對於詩歌創新運動的關注與支持。

二月十二日，中國作協理論研究室邀請在京部分詩人、評論家舉行座談——這是全國作代會後作協主辦的第一個座談會。在會上，劉再復、劉湛秋、張志民、牛漢、楊煉、鄭敏、屠岸、邵燕祥等十多位老、中、青三代詩人紛紛發言，感慨詩壇新的春天得來不易，呼籲給予藝術探索者愛護、聲援、支持。在近年來「朦朧詩」運動中給予探索者熱情支持的評論家謝冕、吳思敬、李黎等應邀參加了座談會。

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廈門文學評論方法論研討會期間，中國作協理論研究室與『詩探索』編輯部聯合召開與會詩歌評論家座談會，孫紹振、樓肇明、李黎、張炯、劉夢溪等十餘人先後發言，一致呼籲：要從根本上杜絕那種粗暴的、帶有某種「大批判」餘風的所謂「批評」，開展最符合詩歌藝術特徵的美學的批評。許多發言者回顧了這幾年詩歌創作與批評走過的道路，指出這是一條充滿坎坷的過程，因而，今天詩歌的春天決不能再得而復失。大家在發言中還相互傳告，北島、舒婷、楊煉、顧城、江河等人的詩集已被譯成英、法、德、瑞典、挪威、丹麥、日本等多種文字在其他國家出版。有的評論家還通過具體分析，認為：在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中，詩歌最有希望達到世界總體文學的先進水平。大家展望詩壇前景，對未來充滿信心。住在廈門鼓浪嶼的舒婷應邀到會，並在發言中介紹了她與其他青年詩人們的創作近況。

同年三月二十一日，由徐敬亞主編的『深圳青年報』文藝版，以整個版面發表了北島、舒婷、江河、梁小斌、顧城、楊煉、付天琳、李鋼、駱耕野、王小妮、孫武軍、王家新、陳所巨、梅紹靜、楊牧、張學夢、葉延濱、徐小鶴、徐國靜、高伐林等二十名詩人的作品，並在同一版發表了謝冕與孫紹振的兩篇短文。謝冕在這篇題為『它們存在並且生長』的文章中說：「這股後來被叫做崛起詩潮的中國新詩運動，最敏銳地傳達了時代大潮的潮音。他們令人目眩的挑戰性創新，使當代中國人對神的否定和對人的重新肯定的這一時代精魂，在詩歌領域中成爲實體。」他着重強調了這樣的事實：「在文學的復興運動中，新詩體現了變革的先聲。」孫紹振的文章題為『自由的風在召喚』，他寫道：「在改革的浪潮面前，生活方式在迅速發生變異。……人的價值標準正在巨變，新的價值觀念和審美心理模式正在崛起。」他指出：「誰最先感受到這靈魂深處的偉大陣痛，誰就不能不改革詩。」

該版編者爲此專版寫了這樣的編者按：「改革之潮湧蕩，觸目皆是崛起！爲推進文學改革，開拓創作自由之風，爲展示我國詩歌新林的陣容，本報博集了國內二〇位青年詩人的最新作品，轉成了詩專版。」

一九八五年底，上海『文匯報』發表被譽爲青年一代理論領袖的著名哲學家、美學家李澤厚的文章『新詩史的一頁』。李澤厚在文中指出：「朦朧詩終于度過了它那苦難的朦朧歷程，由一個貶詞變成了一個愛稱，不僅在海外，不但在青年人中間，也在所謂之文壇中，在新詩的歷史上。」「青年一代的聲音再也休想阻擋得住了！歷史的發展是這樣的公正而無情，我怎能不高興而感慨！」

誠然，真正的詩歌道路，任何時候都只有經過詩人們自己在藝術上的開拓才會出現。令人興奮的是，今日中國之詩壇，正是由這樣一大批勇于探索與開拓的詩人們所構成。本文已多次提及的當年那批先驅者，雖已愈加成熟，但並未停頓，他們都在不斷探尋新的突破，並已相繼發表了一批新的力作。與此同時，一批又一批詩人在不斷崛起，他們的名字已達到排列不完的程度，幾乎每一家刊物的每一期，都會出現新的名字，新的詩歌。專門發表詩歌的詩報、詩刊，已增加到近二十家（這是自五四新文化運動，新詩產生以來所從未有過的）。無數非正式出版的詩報、詩頁、詩刊、詩集，

●留學生園地●

精神負擔何其多？

（中國大陸駐外人員）

王小軍

聯工組（駐聯合國的中國雇員） 一翻譯
與當地美國人結婚了，這一下子成了頭號新聞。「怎麼這麼卑鄙？下賤女人！」各種指責、挖苦話持續了好長時間，她辭職了。

出了這件事以後，大家的眼睛盯住了另外一個年輕、漂亮、活潑的聯工組的女翻譯，她常常有外國同事請吃飯，外國同事也喜歡與她聊天。現在，她除了上下班，不敢單獨吃午飯，不敢單獨一人去辦事，也一次次謝絕外國同事的約會。她向與她要好的人說，她感到精神壓力太大，同事們總是用一種不信任的眼光看她，有時還送上幾句讓人聽了透不過氣的話。她的臉日漸消瘦，失去光彩，往日充滿生機的神態不見了。我很同情她，但我不知道我

鉛印的、打印的、刻印的，幾乎遍布全國各地。這種詩歌繁榮、興旺的生動局面，在當今世界其他民族詩壇之中是無法見得到的。「朦朧詩」已同「美學熱」、「哲學熱」、「歷史熱」，以及大批青年畫家、青年音樂家的崛起一起，構成一個獨特的世界文化現象。

當然，並沒有哪個新詩人在簡單重複北島、楊煉、舒婷、顧城、江河等人當年抑或今天特有的旋律，詩的疆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寬廣與開闊，但是，同樣十分明顯，由當年那批最初的探索者們所帶來的那種新鮮的詩歌藝術氣息，已經融入當今中國大陸詩壇的空氣之中，正爲無數後續的探索者們自由呼吸着！

該怎麼辦，因爲我們彼此不相識。我只能抱怨我們國家的外事制度是那樣不尊重人權。

聯工組的人下班後有很多事要辦。聽來很好笑，每天都要填寫各種各樣的報賬單，光是這項工作就占用了大半剩餘時間，聯合國發給各人的各種補貼是包幹制，用多少都有一個固定的範圍。但咱們國家又有自己的一套，那叫「實報實銷」。是國家缺錢用呢？還是對聯工組的出勤率表示關心？說穿了就是一個「不信任」這報賬單填寫的是每天的活動記錄。領導的不信任，自己也爲了避嫌，從不與外國同事交朋友，實在推托不掉的邀請，就只好來個「三人行」。外國同事的友好態度，反成了中國人的一種精神負擔。

滴水成河，滙集民運真面目

支援民運 ● 徵集資料

為加強報導、分析、研判去年十二月在神州大地掀起的民運高潮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反應和對中國未來的深遠影響，以利民運的開展，本刊現公開徵集有關此次民運的各種資料，包括：

- (一) 各地大學校園張貼的大字報（原件、影印件、手抄件或照片）；
 - (二) 學生遊行示威場面的實況錄音、錄像或照片，遊行示威前後全過程的實況報導（參加人數、遊行路線、校方反應、遊行時與公安保衛人員的衝突經過等）；
 - (三) 參加此次民主運動的人士記述此次運動的日記、書信；
 - (四) 因此次事件被逮捕的民運戰士的人數、姓名、地址、工作單位，被逮捕的理由，逮捕過程的報導或照片，逮捕後預審時的答辯詞；
 - (五) 鼓吹民主、自由、人權的學者、作家所發表的文稿（手稿或剪報）、演講錄音；
 - (六) 曾刊登過「大膽言論」在大陸公開發行的各類報刊、雜誌或未公開發行的內部出版物（原件或剪報）；
 - (七) 中央及各級黨、政、軍機關針對此次事件的各種文件（原件、影印本或手抄本）；
 - (八) 中央及各級黨、政、軍負責人針對此次事件的內部講話、指示；
 - (九) 中央高層因此次民運引發的權力鬥爭的內情報告。
- 務求註明人物、時間、地點等基本情況。零星、點滴資料亦屬歡迎。
- 請註明資料可否發表。各種資料，不管發表與否，本刊均給予優惠稿酬。
- 您提供信息和資料，就是對民運的支援！

有獎徵集大陸留學生新通訊錄

自二月起，新學期開始了。各校迎來了新出國的同學，並將編輯新的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通訊錄。本刊特有獎徵集這些新通訊錄，以利於與各校留學生們的交流。如有可能，本刊將嘗試編纂全美、全日、全歐、全澳中國大陸同學總通訊錄。

- ▲凡寄本校全套的新通訊錄者，本刊贈寄過去十二期中國之春，並將贈閱中春二年；
- ▲提供不了全套通訊錄也無妨，凡提供十名以上大陸留學生通訊處者（寫出姓名和院系），獲贈未來一年及過去六期中春；五名以上者，獲贈中春一年。

感謝您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援！

- 歡迎您加入民運的行列！
- 齊心致力中國的民主大變革！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 多元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1 號萬隆大廈 1206 室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ée Cedex 2, France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電 話：(美洲) (718)429-6777 ; (718)507-6442 (香港) 3-7710410

■零售價：(美) 2.00 美元 (加) 2.50 加幣 (港) 8.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